



政见合辑
二〇一四年夏

政见合辑

二〇一四年夏

轮值主编：武卓韵

本期设计：钱争予



政见 CNPolitics
新浪微博



政见 (cnpolitics)
微信公众号



政见 CNPolitics
fb.me/cnpolitics

靠谱地谈论中国

关于政见

面对中国这样一个古老、庞大而复杂的国家，从官员到农民，从时评人到的哥，似乎人人都可以评头论足一番；但是，似乎又没有人能真正将它弄明白、说清楚。大众媒体和社交网络上充斥着令人目不暇接的信息和似乎永无止境的争吵，但是，它们都太局限了。

要想更靠谱地谈论中国，你需要接触更智慧的头脑，吸取更优质的思想资源。

我们的使命与愿景

成立于2011年11月的“政见CNPolitics”，希望带给你这样的

资源。我们是一个完全由志愿者组成的独立网站，成员包括海内外政治学研究者和国内一线时政记者。我们秉持专业、独立、理性的原则，跟踪阅读全球学术界对中国政治和社会的最新研究，从中挑选出最具价值的部分呈现给你。

我们引介的思想资源，绝大部分都是在大众传媒上无法见到的。它们呆在仅有专业人士才经常问津的学术期刊、报告、会议中，普通公众鲜有机会接触。

当然，来自学界的研究成果也有其局限性。但至少，比起大众传媒提供的快餐，比起社交网络上那些泛着情绪化泡沫的争吵，学界的研究有着严格的学术规范，基于丰富的研究材料，经过了理性的逻辑推演，可以在更大程度上接近真相，提供更具解释力的观点，是更值得你参考的信息。

我们的努力已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有多位大学教授在自己的课堂上使用了我们制作的内容，中央编译局出版的期刊曾转载我们的文章，还曾有省部级官员与我们联系，介绍自己的研究成果，我们也得到了包括大西洋月刊在内的众多外媒译介。不过，比起这些，我们更看重每一位普通读者从“政见”的内容中吸取的营养、得到的启发。

我们的风格与旨趣

我们致力于发掘理性、靠谱的思想资源，理性并不等于枯燥，它们往往是鲜活、有趣、令人茅塞顿开的。

我们将普通人难以接近的学术研究成果，以强调“专业性、趣味性、信息量”的写作风格呈现给你，节省你的宝贵时间。

媒体报道

他们不忙着在公共辩论中站队，而是为读者普及热门话题背后的知识；

他们不直接发表政治意见，而是编译介绍外国的学术观点；

他们管自己做的事情叫“政治科普”。

（年轻政网深入浅出），《联合早报》，2013年6月30日

5月21日，一个由青年人自发组织的非盈利网站“政见”发布了一条“图解中国五十六个民族”的微博。3个月内，这条微博被转发2786次，评论382条。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徐泓转发微博并评论道：“中国公民基础知识之一：多民族。好帖。收了！”

一个名为 CPGTour 的网友评论道：“太棒了，要顶！如果这个有英法文版就更好了，给外国人介绍时更加生动。以前没见到过这么棒的图文并茂又简洁的分析介绍。”

《凤凰周刊》主笔黄章晋曾写过关于少数民族的专题，他看到这张图后，留言道：“看到这图，想想我的呈现形式，我觉得我像一条听到自己腰椎咔嚓一声折断了的小狗……费劲巴拉地写了一大堆，被人一张大图给灭了。”

（“沟通是解决问题的开始”，《中国民族报》，2012年7月24日

新一代人对现实的认知和行动力，完全跃升到了一个新的层面，他们知道怎么通过社会网络激发参与和共建新的平台，从生活的裂缝本身，给社会撕开了新的出口。

《商业周刊 / 中文版》(Bloomberg Businessweek)

各界评价

口水少、有新知，值得关注。

何帆，最高人民法院法官、学者

总体来说，“政见”的信息图新闻产品引领了业界的潮流，树立了一定的评判标准。经由“政见”的介绍和推广，信息可视化的概念在国内新闻界得到了广泛关注。虽然“政见”团队自身具有有别于专业媒体的特殊性，它的信息图新闻也并非量产，但它在新闻领域作出的信息可视化尝试确实在逐渐改变国内传统的生产模式，更新了受众的阅读体验，这对于信息时代新闻业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龙昊，《新闻信息可视化的尝试——以“政见 CNPolitics”的信息图新闻生产为例》，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6月

一群年轻的新闻人将目光投向海内外的学术界，将最新的中国政治研究成果简洁但又严谨地报道出来，为

普通公民提供更为专业、独到的优质信息。如果你渴望在时政话题上比市井杂谈、网络吐槽有着更为深入地表达和理解。

北大媒介观察

与其关注大V，不如关注 @政见CNPolitics，理性地思考政治。

微博网友 @Nate_invictus

“永远不要怀疑那一小部分有思想并且持续努力的公民能够改变这个世界，事实上，人类的历史从来都是这样。”——这种精英主义的话刊登在 @政见CNPolitics 上真是再恰当不过了。

微博网友 @ 龍助

团队成员

观察员:

曹起瞳	杜月	方可成
归宿	韩笑	林知阳
刘冬舒	刘冉	刘岩川
马军	马亮	缪莹
邵立	宿亮	陶郁
王绍达	王韬	王也
武卓韵	杨鸣宇	杨天兆
尹月	于灵歌	羽人
袁幼林	奚应红	张跃然
周航		

制图师:

黄俊如	焦佳文	吕妍
钱争予	苏颢云	姚辰
周优游		

新媒体运营:

李大岩	蓝培源	卢凯悦
吴睿	徐驭尧	余莉
于灵歌	赵蒙昉	张烨

设计师:

林亦然	钱争予	朱丹青
-----	-----	-----

工程师:

黎达	林育颖	周优游
----	-----	-----

其他成员:

陈仲伟	励轩	刘含章
汪吕杰	王磬	吴瑶

感谢曾经为政见团队做出贡献的:

常远	操傲文	陈磊	傅若兰
韩智轩	江舟忆	宋广易	袁林

目录

编者的话

我们在冷静地迎接喧嚣 1

开篇语

今天，我们关门读书，还是改造社会 5

热点·世界杯

伪球迷是如何产生的？ 59

美国人为啥不玩足球？一种司法文化解释 65

专题

课堂笔记

和政见一起学耶鲁宪法课：课程简介 72

和政见一起学耶鲁宪法课：第一周	75
和政见一起学耶鲁宪法课：第二周	82
和政见一起学耶鲁宪法课：第三周	90
和政见一起学耶鲁宪法课：第四周	95
和政见一起学耶鲁宪法课：第五周	103

学术论争录

市场化改革让谁成为赢家（一）	120
市场化改革让谁成为赢家（二）	124
市场化改革让谁成为赢家（三）	130
市场化改革让谁成为赢家（四）	135
市场化改革让谁成为赢家（五）	140

政治

官员晋升机会与财政创收	145
揭开“写作组”的神秘面纱	150
胡温时代的改革缓解了居民收入不平等吗？	154
《现代汉语词典》折射的语言政治	159
民生能否换民意？	163

入党，为什么？	170
什么样的失职官员更容易受到处罚？	175
高绩效的政府容易获得市民信任	178
港府、北京、资本家：谁在治理香港？	183
腐败在中国更难被发现	187
哥大教授：中国的“法治-稳定”悖论	191
谁是当代中国的“县官”？	194
为了晋升而污染	198
“大政府”让干部子女经商更易成功	202
数据描摹中国网络政治的极化	207

外交

在非洲，中国是美国的老师？	214
中越南海问题博弈的安全困境	218
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有病	222
奉行现实主义的中国：进攻还是防御？	230
古巴=香格里拉？——中国网民的古巴印象	235
中国在非洲：跳出道德纷争，来点技术分析	242

“金砖国家”已是国际政治集团，而非经济集团	247
中国正在攫取非洲的耕地吗？	251
投资阿富汗艾娜克铜矿：看上去很美	255
移民欧洲：迅速增长的“第三波”	261
民意能影响中国的外交政策吗？	267

历史

未竟的远征：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中国	271
命运交叉的城市	278

社会

“扩招”经历了怎样的决策过程？	287
穷人一定支持“劫富济贫”吗？未必	293
“南稻北麦”真的导致了文化差异吗？	299
为什么农民不愿意入户城市？	306
中国独立纪录片：公民行动进行时	311
谁在支持草根非政府组织？	317
越来越多私营企业主成为基层政治精英	322

大坝建还是不建？到底谁说了算？	326
大飞机之梦依然遥远	332
修建高速公路如何影响中国区域经济发展	338
中国还是巨型跨国企业：究竟谁在收购世界？	342
中国的央行有多独立？	346

民族与宗教

哪类少数民族更易离心	355
自我表述：民族团结的助推器？	360
中国的民族政策该改吗？——围绕马戎的争论	365
市场化改革催生民族间经济不平等	372
天津教案、谣言与隐秘空间	376
小众“教门”是怎样炼成的？	381

学人自述

白柯：法治与转型中国	392
------------	-----

编者的话

我们在冷静地迎接喧嚣

这本合辑的开篇是一篇旧文。大约一年半之前，政见团队在北京单向街书店举办沙龙，探讨学术研究和现实政治之间的关系。一年之后的春夏之交，这次沙龙的完整文稿终于和所有的人见面。在这个一切都以快为第一要务的时代，一年半的时间足以让很多东西黯然失色，但是这次沙龙所探讨的话题却依然鲜活，并永远都是一代又一代学者们所要面对的选择。

这个夏天我们终于迎来了期盼四年的世界杯，但其他很多大事，却并不在我们的愿望清单当中：我们从小学习 56 个民族团结如一家，但这个夏天每一个中国人都深深感受到了频繁的恐怖袭击背后若隐若现的民族矛盾；我们从小听说睦邻友好，但却发现中国因为南海问题与邻国不断产生摩擦；我们以为十多年前轰轰

烈烈的反邪教运动早已落幕，而山东招远的一场血案又让“邪教”这个许久没有听说的词再度成为了热点。

作为以普及学术研究为己任的团队，我们从未把自己关闭在象牙塔之中。我们一边欣赏精彩的世界杯，一边探讨了足球文化和（伪）球迷文化；我们不满足于义愤填膺的抗议，而是用严肃的态度向大众介绍中国在南海问题当中的处境，以及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存在的误区；我们用了大量篇幅探讨恐怖主义和民族问题；我们努力梳理隐藏在恐怖的邪教杀人案件背后的共同机制——所有这些都试图解答开篇语中里提出的那些问题。

但是我们毕竟不能仅仅追逐热点。这个夏天政见一共发布了48篇研究速览，14篇专栏和1篇学者采访。除了上述那些话题，我们大部分的内容依然在关注那些看上去和普通人的生活距离遥远的话题：美国的宪法到底是什么？中国过去几十年的改革曾有过什么样的争论？中国在非洲的外交如何？法治和稳定有何关系？这些问题的意义何在？我们普及这些研究的意义何在？

这不由使我想到，早在政见成立初始，民族问题就是我们关注的重点内容之一，但彼时学者们关注的问题却并未被大多数公众所意识到。当越来越多的安全威胁让这个话题成为热点的时候，

我们才发现原来学者们已经早就警告了危险。

学者不是先知，他们并无异于常人的能力。区别在于，学者能够在纷扰的世界里筛选有价值的信息，并通过严肃的学术训练用科学的工具和方法来解答问题。而这个过程是冷清、艰辛而孤独的。

这种孤寂和热点所带来的喧嚣的对比，正是开篇语中所说的象牙塔和花花世界的对比。任何学术研究都不能在一朝一夕之间完成，而朝夕之间社会所关注的热点却在变化。所以学者们并没有主动去追逐热点的能力，但是学者们所关注的问题，却很有可能在未来某一时刻成为热点，而学者们当下所做的解答，也会在未来的那个时刻凸显出重要的意义。

而在这之前，我们依然需要冷静地等待喧嚣的到来。

武卓韵

2014年8月

开篇语

古今中外的知识分子，有的直接参与政治，有的远离时局潜心研究学问，也有的如蔡元培那样呼吁“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今天，社会科学研究与社会现实改造之间，是否应该保持距离？海内外的中国政治研究者们，究竟为何研究政治？他们是关起门来在书斋里“为学术而学术”，还是有着更加关涉现实的愿景？

今天，我们关门读书，还是改造社会

2013年1月3日，政见团队在北京单向街书店举办沙龙，探讨一个经常引发争议的话题：学术研究与现实政治的关系。古今中外的知识分子，有的直接参与政治，有的远离时局潜心研究学问，也有的如蔡元培那样呼吁“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而在西方学术界，也有许多学者在反思一个基本问题：“政治科学有用吗？”

在今天，社会科学研究与社会现实改造之间，是否应该保持距离？应该保持多大的距离？海内外的中国政治研究者们，究竟为何研究政治？他们是关起门来在书斋里“为学术而学术”，还是有着更加关涉现实的愿景？

以下是经过编辑整理的沙龙文稿，与各位读者分享。

对“政治”的几种误解

方可成：非常荣幸，这是单向街书店在2013年的第一场活动。我们今天是以一个团队的形式过来的，这主要是因为，比起之前来做沙龙的人，我们几个人的分量不够，所以我们就想用数量来“凑”。不过请相信，我们几个人的身份、观点、角度各有不同，不是简单的人海战术。

我们几个人都是“政见”团队的成员，当然我们同时也有其他的身份，因为我们是一个用业余时间做的兴趣团体。

陶郁：谢谢大家！刚才可成谦虚地介绍说我们团队的分量还不够，但是大家看我的身材，就知道我在重量上肯定是足够的。我叫陶郁，在英国牛津大学政治系读博士，平时在政见团队做观察员。

张跃然：大家好，我叫张跃然，目前是在美国杜克大学读社会学，本科生。

方可成：不知道今天有没有人是想见到女作家张悦然而来的，不过我相信，男版的张跃然更不会令你失望。跃然，杜克大学是被称为南方的哈佛，对吧？你们自己是不是这么称呼？

张跃然：我们自己其实不这么称呼。我们说哈佛是北方的杜克。

周航：大家好，我叫周航，我现在在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里当研究助理。

方可成：周航现在的工作机构很有意思，大家可能没听说过，中文名叫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英文简称是 SIPRI。他之前在法国、瑞典都留过学，在这两个国家都留过学的人估计挺少的，所以特别期待他今天给我们带来新鲜的观点。

今天来到现场的还有一位团队成员汪吕杰，他在路上，很快会到。汪吕杰本科也在北大，研究生是在荷兰莱顿大学。莱顿大学也是中国研究领域的一个传统牛校。

最后自我介绍，我叫方可成，现在是在南方周末报社当时政记者。

我们今天谈论的主题是关于学问和政治，我觉得“学问”这个东西还是比较好理解的，但说到“政治”这个词，大家可能有误解。我自己做了一个总结，归纳了国人对政治的几种常见误解。

第一种误解就是把政治当成从小到大我们的政治书上的政治，其实这种政治课更准确的名字应该是思想教育。

第二种误解就是认为政治和普通人没有什么关系，他们只跟那些会在新闻联播里出现的人有关系。但别忘了，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会出现在新闻联播里面，你哪一天在大街上走着走着，面前突然出现一部摄像机，一个话筒伸到你面前，问“你幸福吗？”然后你就可能上新闻联播了。其实“你幸福吗”也是一种政治，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我想说的是，正如国父孙中山说的那样，政治乃众人之事，并不仅仅跟少数政治精英群体有关。

第三种误解是，一旦听说你是“搞政治”的，或者说你是研究政治的，或者像我这样做政治报道的，就马上想要离你远一点，因为觉得你这人是“反动派”。这种观点可能更多出现在我们的父辈身上，这是他们经历的年代给他们留下的烙印。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可能忘记了，其实我们国家的核心领导力量中有一个核心机构，叫做“中央政治局”。

还有第四种误解，认为政治是很肮脏、下流的东西。这种偏见是存在很广泛的，比较遗憾的是有一些知名人士也这么认为。比如说刚刚过去的2012年，中国有一个很红的人，那就是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他在去瑞典领奖的时候，在斯德哥尔摩大学有一个演讲，其中有这么一段话：“文学远远的比政治要美好。政治教

是教人打架，勾心斗角，这是政治要达到的目的。文学是教人恋爱，很多不恋爱的人看了小说之后会恋爱，所以我建议大家多关心一点教人恋爱的文学，少关心一点让人打架的政治。”说实话我举双手同意大家应该多读一些教人恋爱的文学，但是我是坚决反对莫言先生对政治这种诠释。真正的政治恰恰不是教人打架，而是教人如何在一个利益冲突广泛存在的世界里学会和谐相处；真正的政治也并不是教人勾心斗角，而是鼓励人们学会宽容，学会负责，学会参与。

我觉得，连莫言先生这位出色的作家对政治都有误解，对政治的诠释都有偏颇，那么也许我们对政治的偏见是广泛存在的。作为一个在大众媒体工作的人，我个人就会很希望能够纠正大家的偏见，丰富大家对政治的理解。这也是为什么我会跟在座的几位，以及更多没来到现场的朋友一起，来做我们的政见团队。

理解政治的科学途径

方可成：理解政治有很多途径，我们团队更多是通过学术或者科学的角度来理解政治。我们认为政治是一种科学，是可以研究的，在英文里就是 Political Science。政治科学的研究和其他学科的研

究一样，有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通过这些理论和方法，可以对政治形成一种更加可靠、更加全面的认识，可以更接近真理。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政治学者，专门研究中国政治的也不少，我们这个团队所做的就是把这些学者的学术研究用通俗的语言介绍给大家。他们的研究可能是用好几十页英文写成的，但是我们只介绍他们的核心观点和有启发性的内容。

因为我们介绍的是学者们对政治的见解，所以团队名称叫“政见”。现在我们团队已经运行了一年多，这一年多当中，一些人遇见我说：你们的名字很“敏感”啊。我一开始很奇怪，后来终于想通了：原来，“政见”这个词在中文里好像有一个固定搭配，叫“持不同政见者”——但这真不是我们的理念。

我觉得有意思的是，在这样一个搭配里面，“政见”似乎是带有某种更现实的目的，希望能够干涉我们的现实，改造我们的社会。但是我们所接触到的研究，比如有人研究中国的政府结构，研究中国的精英政治，那么他们自己就想成为总书记吗？我们也有很多学者研究社会抗争，难道他们就是想来领导一场社会运动吗？显然不是这样的。

但又有人问了，既然你们和你们所介绍的这些学者，看上去

都没有直接参与改造社会的意愿，那你们还忙活啥呢？的确，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学者做这些研究，我们做这些事情，确实是有社会关怀在的。我们似乎愿意去推动社会的改变，当然这是我个人看法，不代表其他几位的意见，大家知道媒体人嘛，总喜欢这么说，“推动社会进步”这个短语估计媒体人用得最多。所以这里面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对于政治科学的学术研究，到底是关起门来在书斋里为学术而学术呢，还是要——套用一句共产党语言——理论指导实践，改造社会呢？

“假如是一个萝卜，就力求做个水多肉脆的好萝卜”

方可成：好了，我冗长的开场白就要结束了，希望大家还没有失去耐心。下面的时间就交给他们几位，因为我的本职是记者，也不是做学术研究的。提问是记者的天职，所以我今天在这主要就负责提问和穿针引线。我想先请陶郁来谈一下。因为你是我们几个人中唯一的博士。

陶郁：我现在还没有毕业，只能算博士研究生。

方可成：但今后应该要注定走科研这条道路的，那你自身作为一

个研究者来说，你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什么样的？

陶郁：好的。我现在要说的东西，只是我个人的观点。我并不想告诉大家世界应该是什么样的，更不想告诉大家世界只能是什么样的，我是想告诉大家世界可以是什么样的。在此基础上，我希望大家结合自身实际，得出自己的结论。

如果有一天我可以自己来做研究，我应该是一个学者，以教书育人作为工作，通过学术活动来养家糊口；但是，我的生活和学术不可能脱离社会而独立存在，我同时又是一个公民，和其他任何公民一样，我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其实，这并不只是我必须面对的选择，任何一个社会科学研究者都面临这个选择：你既是一个学者，又是一个公民；那么，你该如何选择自己在社会里的角色呢？

这个问题不仅需要学者来说，也值得所有想做学者的人去思考。但是，我又认为这个问题不会存在同一而明确的答案。具体来说，有的人可能更愿意做学者，愿意做学者胜过愿意做一个对社会事务非常积极的公民；有的人可能更愿意认为自己首先是一个公民，认为积极介入和干预政策进程和公共舆论要比闷头做学问

更重要和有趣。我觉得这两种选择都无可厚非。但是，不管如何选择，每个人都要做出自己明确的选择；而一旦做出了选择，就要争取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记得杨绛先生曾经说过：“假如是一个萝卜，就力求做个水多肉脆的好萝卜；假如是棵白菜，就应力求做一棵滋滋实实的包心好白菜。”同样的道理，如果您选择“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那就应该认认真真地做一个学者，贡献出原创而扎实的学术成果；如果选择您觉得“天下之大，已经容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那就应该光明而坚定地站出来，振臂高呼、脚踏实地，直接推动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或许有人能够同时做好上面说到的两件事情，但是我很怀疑这样的人不会很多，反正我自己肯定不在其中。

方可成：你好像没有直接回答我们的问题：做学问到底应该“开门”还是“关门”。

陶郁：我觉得就读书而言，当然应该“开门”读书，要了解书斋之外的广大世界，要了解这个世界上正在发生的重大事件。但是说到做学问，那就应该专心致志地做学问，可以而且应该把门打开，

但是不要太受门外的喧嚣干扰。否则，就直接走出门去，广阔天地，大可作为。

方可成：陶郁的观点——不管是他之前在“政见”团队里写的文章也好，还是他刚才说的观点也好——都是无懈可击那种，标准GRE 作文的感觉。

陶郁：谢谢！不过，从经验研究的角度来看，什么都能解释的理论并不好，因为它没法证伪，往往就意味着什么也解释不了。所以，我觉得你在暗示我没讲清楚。

好的“公知”长什么样

方可成：你刚才说到两重身份，一个是学者的身份，一个是公民的身份。我想，大家都是公民，可能对公民的身份更感兴趣一点，那么你能不能先把你对公民这个身份的理解更明确地解释一下。

陶郁：我觉得，当一个学者首先强调自己的身份认同是“公民”的时候，他很可能选择成为公共知识分子，俗称“公知”。“公知”这个词，现在好像臭大街了。但是，我们在这里就事论事，只按原

本的字面意思来理解“公知”，就是“公共领域的知识分子”。换句话说，按我的理解，如果某位学者选择成为公共知识分子，他往往更愿意通过做一些对能够影响现实社会和公共舆论的事实，去引领世界的改变。

选择成为“公共知识分子”，这是每位学者的自由。但是，我觉得好的“公共知识分子”会时刻提醒自己注意两点：

第一，他应该对自己说，和大多数普通公民一样，我可能在一个或者有限的几个知识领域懂得很多，但除此之外我对别的领域可能并不比别人多了解多少。所以，当你去做一些实事或者呼吁一些改变的时候，心里对一些问题要做出明确的回答，比如，你对自己所呼吁的这个东西是否真的明白？你的呼吁是否真的出于公民的责任感和道义的要求？你的呼吁是否仅仅出于自身的激情和个人偏好？

第二，我们需要承认，相对来说大家会更尊重有知识的人。但这并不意味着有知识的人就能够滥用这种尊重。因为大家尊重有知识的人，所以即便是学者说出一些超越自己知识范围和研究领域之外的话，大家也把这些东西当作严肃和认真的结论去听、去接受，而这种现象有时候会产生很不好的后果。

我觉得学者需要记住这些风险，说话要负责任。同时，社会大众也需要对学者说的话做出清醒的判断，不要全盘接受，当然也不必全盘否定。如果某位学者说的东西与他自己的研究无关，我们就不必对他的说法过度迷信。

我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一段之间之前，邹恒甫老师在微博上爆料说：“北大院长在梦桃源北大医疗室吃饭时只要看到漂亮服务员就必然下手把她们奸淫。北大教授系主任也不例外。”这个事情一出来，就立刻在社会上掀起了轩然大波。邹老师是很有名的经济学家，但是当他讨论梦桃源的时候，显然不是用经济学家的身份来说话的；在这个时候，我们面对他的观点，就应该有一个自己的判断。从网上公布出来的信息来看，邹老师从2007年8月份以后就不在北大任教了，而他去梦桃源的次数似乎也并不十分频繁。换句话说，虽然邹老师在经济学方面的造诣深厚，但他对于梦桃源的了解，显然不如专门前往调查此事的记者多，大概也不如经常去那就餐的北大师生多。因此，尽管邹老师是很好的学者，我们却未必要相信他对于梦桃源的爆料，特别是在北大进行了详细调查并且公布了调查结果之后。但是，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一点，邹老师虽然在梦桃源这个事情上可能给出了错误的信息，

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因此否认他的学术能力和研究成果；他对梦桃源里发生的情况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并不意味着他在经济学领域的判断就是错误的。

方可成：我觉得你这个提醒挺好的。我们在决定是否相信一个学者之前，应该先看清楚他在发这言的时候是作为专业领域的研究者，还是作为一个外行、作为跟我们一样的人。

但是有人认为：许多公共知识分子选择在自己的领域之外发声，是责任感的表现。打个比方，假如说我在经济领域有建树，我成了一个知名的经济学家，但这个时候我通过我在这个领域的影响力，来推动我在其他领域的影响力，比如说我也许会去关心法治、关心劳动教养问题。其实，社会对学者有这样的期待，希望学者使用他们的地位和话语权去推动一些东西，但你的意思好像是说学者不应该这样做。

陶郁：你提到的问题把我们刚才的讨论又往深推了一层。不过，你说如果一个人有大的社会影响，他就有了改变社会的责任，我对这点不是特别赞同。我觉得，不管一个人有没有社会影响，他都有权利选择自己是不是主动要站出来通过某种方式来改变社会。

很多看起来最柔弱最无力的人，最终被证明可以推动社会的变革，社会或许对他们并没有期待，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改变历史进程。同样，你不能说那些默默无闻在书斋里做了很多很好的研究的学者，他们对社会的发展就没有贡献。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有人愿意做研究，有人愿意搞实务，这是社会分工，不管是做好研究还是搞好实务，都能改变社会，都是在推动世界进步。

马克思是典型的社会实践和学术研究不分

张跃然：陶郁刚才区分了学者作为学者的身份和他作为公民的身份这两者的区别。通过参与社会活动直接对社会施加影响力，和在书斋里通过社会研究的方式施加社会影响力，是两条不同的途径。我的发言主要集中在后者上。

因为我是学社会学的，所以主要还是结合社会学来谈。社会学有一个非常本质的精神：让大家去挑战、质疑那些那些被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价值、信念、事物等等。在我们很多人的意识当中，价值中立就是一个被当成是理所当然的，被奉为绝对正确的观念：如果是做学问，一定是要保持价值中立。但是我要说的是——借用刚才陶郁的表达方式——我不是说社会科学不应该价值

中立，但是社会科学也许可以不价值中立。当然，要讨论这个问题，也要区分不同的学术层面。如果一个学者已经进入了一个具体的研究项目，进行具体的研究操作，那么必然有一套学术规范去限制他，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在这种技术操作层面之上的，这个学者如何选取他感兴趣的研究问题，如何看待研究的意义，这里边，一个学者自己的价值倾向、关怀、态度，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就社会学来说，现代社会学在创立的时候，就是有一帮人要研究我们如何创造一个更好的社会。换句话说，社会学诞生之时明确地违背了价值中立原则，带有强烈的价值倾向，而且是强烈的影响和改造社会的倾向的学科。当社会学发展到经典社会学三驾马车时期，马克思、韦伯、涂尔干这三个人中，尤其以马克思为首，典型是社会实践和学术研究不分。这在我们今天来看是值得批判的事。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是社会学一个非常好的学术传统：知识的生产是在社会实践当中完成的。俗话说“实践出真知”，很多宝贵的社会学知识，就是学者在主动干预社会、参与社会实践当中生产出来的，极大地扩大了我们的学术视野和知识范围。等到 20 世纪 60 年代的时候，在行动中直接创造知识，

这一整套理论和方法论，被冠以“行动社会学”的称谓，堂而皇之地成为社会学中的一个流派得以传承下来。

方可成：堂而皇之是褒义还是贬义？

张跃然：它作为一个中性词出现，仅仅指行动社会学是一个已经进入了主流学术视野、被整个学术界承认的流派。等到 21 世纪，在主动参与社会实践这个基础上，又进一步出现了解放社会学。这一流派的学者就认为，社会科学应该直接表明自己的态度：我们就是为了关怀社会，我们就是为社会中被压迫的、底层的、被社会结构所侵害的那部分人的利益说话。

方可成：你提出来一个很重要的词，也会是我们今天讨论的一个核心的词，就是“价值中立”，不过你能不能先解释下这个词？

张跃然：按照美国社会科学的标准教育体系，强调价值中立，强调你作为一个学术研究者应该保持一种对社会旁观的态度，通过非常理性的、冷静的、实证的方式去分析这个社会是怎样运行的。但是在后来的学习中，我自己就开始逐渐怀疑这一点了。在看了很多学者的研究之后我有一种感受，即使我们在做研究时候满足了

各种各样的技术规范，但一个学者在选择他感兴趣的题目、以及学术研究所期待实现的目标的时候，他很难保持价值中立，很难作为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出现在学术研究场域之中。换句话说，价值中立在学术研究层面没有充分的可操作性。那么这就有问题了，如果说价值中立本身就是一个不可达到的，一个非常理想化的状态，那么这个东西是不是值得追求的？如果一个东西，它看起来更美好——比如说共产主义社会——但是我们现在在任何一个社会形态当中无法达到这样的目标，它是否是现阶段这个社会所应该追求的东西？我倾向于给出否定答案。

很多学者提出，价值中立这个概念对社会科学界的影响力大小，是和整个社会的结构有关系的。如果一个社会处于相对静态稳定的话，那么一个学者有可能保持一个旁观者的态度。但是如果一个社会在剧烈动荡当中呢？如果任何一个人都会被时代的剧烈变迁所影响的话，如果任何学者本身就是剧变社会当中的一份子的话，他是不可能保持价值中立态度的。

陶郁：和跃然不同，我很赞成在学术研究中保持价值中立。我们现在确实处于一个剧烈变化的时代，而剧烈的社会变革总会刺激

很多学者。在变革的时候跳出来振臂一呼，应者云集，说好听一点叫雄心，说不好听点叫野心，反正在英文里这是一个词，叫ambition。我想，ambition这种东西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有。但是，越是在你的雄心或者野心容易被唤起的时候，如果你想要有做出特别严谨和认真的思考，就越需要主动而刻意地压制。当然，压不压制这种雄心或者野心是你的选择；但是，你要意识到这个问题，尽量不让自己的雄心或者野心干扰自己正常的学术研究。

方可成：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应该给我们有些公共知识分子们看一看。

神学博士与人类学博士之争

汪吕杰：不好意思刚迟到了，因为人太多不好进来。我在荷兰是学汉学，方向是中国历史，本科在北大学宗教。以我在宗教学系的例子来说，我大一时候有两个老师，他们都是教宗教的，一个是神学博士，一个是人类学博士。神学博士是一个很虔诚的天主教徒，然后人类学博士说：你做研究不应该有信仰，否则你会戴着有色眼镜去看这个宗教。但神学博士说，你信仰这个宗教不妨

碍你去研究宗教，只是研究角度不一样。

那个人类学博士，为了让自己和宗教保持足够远距离，选择了河北一个乡村的妇女群体来作为他的研究对象，让我想到了我后来看到的一本书《阿赞德人的巫术、神谕和魔法》。当时欧洲有很多人类学家跑到非洲大陆去，找到一些原始部落，让自己和他们保持足够远的距离，观察他们的社会是怎么运行的，从中领悟人类社会是单向地发展还是多向地发展。但是即使是这样，这些人类学家也无法保持一个足够远地距离，因为他们只要生活在这个部落里，他们就会和这个部落产生直接或者间接的联系，对这个部落的人产生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甚至，这个部落看到一个新鲜的外来的白人，都已经受到了影响。我想问题并不是学者是否应该开门或者关门，而是学者能否做到开门或者关门。在宗教研究的领域内，无论你是否信教，你都会对宗教研究产生自己的观点，更不用说是政治，我们生活里每一点都能体现出政治，比如说前一天修地铁，或者说今天的南方周末新年献词，它们都是政治在人类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部分的体现，每一个人都会参与到里边去。学者无论写不写文章，他都是在改这个社会，所以说我觉得没有学者会完全的做到价值的中立或者价值的客观，

也没有人能够真正的闭门造车。

方可成：从我的专业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有点像拍纪录片时你的摄像机会不会形成干扰，能不能做到客观记录。这是一个可以深究到哲学层面的问题，但我们暂且打住这个。

智库如何干预政策

方可成：我很想让周航来说下，因为他是在一家智库工作。智库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个比较陌生的东西，因为中国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智库存在。智库这种组织在做研究报告的时候，是否要遵循价值中立的原则呢？而且智库都是有一些资金来源的，这些资金来源会不会影响价值中立的追求呢？

周航：我分享一些个人想法和感受，不代表研究所本身的观点。

智库在中国可能很多人都没听过，通常我们也称之为政策研究所。智库跟大学里研究机构最大的区别是：我们希望研究结果更具有实践性，政策性导向可能更强。与其他非政府组织，如发展类的 NGO 相比，智库尝试做的可能更多是政策或者思维上的干预，而发展类的 NGO 可能更多是做具体的发展项目，更多接

触社会底层，做干预项目。

当你尝试去了解智库的时候，你会发现智库机构其实数目庞大，也可分为不同的类别。最主要的分类可能是意识形态上的。目前为止，智库发展最好的应该是在美国和欧洲。在美国，意识形态对智库可能会有比较大的影响。有的智库可能是保守派势力的阵营，智库里研究人员往往会有比较清楚的政策目标，就是希望推广某种以保守主义为基础的政策。

智库还可以从他们不同的研究课题上进行分类。比如有专门研究环境和气候变化的智库，有专门研究国际冲突的等等。在研究国际冲突方面，比较知名的国际智库例如有国际危机组织，总部在布鲁塞尔；当然还有我们的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等等。

智库也可以从资金的来源方面进行分类。我想资金来源可能是很多人对智库研究抱有戒心、打个问号的原因。每个智库都有自己的特殊情况，但通常都对自己的资金来源非常公开。例如在 SIPRI 的网站，你可以找到 funding 这个页面，去浏览研究所的资金来源。智库的资金来源可以是多方面的，第一是智库所在国的政府，如我们研究所的部分资金也从瑞典政府获得；第二是智库所在国以外的外交体系，如外国大使馆等；第三就是数目众多、

关注重点不一的基金会。

通常，当我们不了解某个研究所的价值取向和意识形态的时候，你可以看它的资金来源。不过，智库的资金提供者原则上是不应该去干涉智库的研究过程和研究方法的。

智库做出来的研究报告，可能会采取不同的方式来公布。像 SIPRI 的所有政策研究报告是公开的，任何人都可以去 SIPRI 网站上下载。当然，当智库写完了报告，或者在研究的过程中，也会时常与资金提供者进行沟通和交流，汇报研究的日程与不同研究阶段中得到的研究结果，类似工作汇报吧。

当然智库在获取资金可能会采用不同的方式或者技巧，比如有的研究所的部分研究项目可能非常缺钱，遇到资金困难，他们可能会舆论造势，希望能引起公众以及潜在资金提供者的注意，这也是存在的。

方可成：我不知道有没有智库因为资助方不喜欢就被迫改结论的情况？

周航：就我个人所了解的智库当中应该还是没有听说这样的情况。这样做，对智库和资助方的声誉都没有任何好处吧。

方可成：也是，一般这种事情也不能让人公开知道。

陶郁：这里还应该注意一个问题。如果智库迫于资助方的偏好而改变了结论，那就属于造假，而造假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不可以接受的。但是，即便没有造假，各个智库的结论可能也还是有偏差的。许多智库都有自己明确的价值取向，而这些价值取向或多或少会左右智库的研究选题，也或多或少会左右他们选择对什么样的研究结论进行宣传。

“和平研究”能带来世界和平吗？

方可成：周航的硕士专业很有意思，叫“和平研究”对吧？

周航：我的硕士专业名称叫和平与冲突研究。

方可成：那么回到改造社会的问题，你觉得做这种研究的话，它改造社会的力量有多大呢？通俗一点问，世界和平能不能依靠你们？

周航：和平与冲突研究是一个新学科。最开始是五六十年代，在挪威、瑞典、丹麦等北欧国家成立了一批致力于研究和平的科研

机构。像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最开始就是因为瑞典首相为了纪念瑞典到 20 世纪 60 年代已经 150 年没有战争的背景下成立的。

以我的理解，和平学跟其他学科最大的不同是：当你听到和平这个词的时候，你就会想到和平往往是好的东西；而当我们提及冲突的时候，不管我们怎么定义冲突，往往觉得它是负面的，所以和平与冲突研究跟其他社会科学相比较，最大的不同的是我们有一个非常明显的道德规范维度。

这也就使大部分和平学学者，他们从事研究的时候，都非常希望他们的研究能起到一个改善社会的作用。他们认为和平学的自身属性就是具有有改造社会这一维度的。因为和平既然是好的东西，那么和平学研究的最终目标可能就是去打造和平或者说减少冲突。

和平与冲突研究这种比较强烈的规范维度，或者说道德判断维度使学者们非常希望他们的研究结果能对我们如何达到和平、减少冲突有一定的启示作用。但这也正是和平学经常被其他社会科学学科所诟病的一点。面对这样的批判，和平学的学者们更多是承认和平学的这一属性，但是他们更多把和平学的强烈的道德规

范维度看作是一种优势。

因为，首先第一，这使得和平学非常强调人的能动性。也就是说不管和平是多么虚无缥缈的目标，我们都是有能力去达到的；不管战争或者种族屠杀是多么可怕的事情，解决战争冲突是多么巨大的难题，我们还是有能力去避免和减少冲突的发生的。和平学强调这种主观能动性，强调人能去做些什么。

第二，这种主观能动性的强调使得你的研究不仅仅停留在学术的层面，而是希望研究的成果往往可以指导大家去改造社会现实的某一部分。因为这个前提，和平学的研究者必须对自己研究领域中所使用的一整套语言、概念、假设和理论体系等更加持有“戒心”。做研究的过程必须强调批判性思维、自反性思考方式的运用，时刻反思研究中频繁使用和依赖的概念对研究结果可能带来的影响，认真探讨研究过程中做的所有决定对研究结果会带来什么影响。

我觉得这一点也和我们今天探讨的主题非常相关的。关门读书为学术而学术，还是为改造社会而学术？这两者在我看来，可以被看作是一条线段的两个端点，然后大家都可以在这个线段上定位自己。和平学刚好是在靠近线段的中间位置。一方面非常希

望能起到改造社会的作用，但另一方面这种改造社会的“冲动”使得和平学必须时刻意识到学术研究存在的许多局限性，无论是在研究理论、方法和语言上；在研究中不断反思这些局限对研究结果可能带来的影响。

社会结构决定学术研究的角色

方可成：现在让我们回到刚才跃然提出的社会结构的问题，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社会结构的变迁和学术研究的态度有怎样的关系？

张跃然：虽然学者在学术活动中的价值倾向的确受个人态度的影响，但任何个体行为都不可避免地受大的社会结构、社会环境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很可能是更主要的。

由于中国进入现代文明的时间还太短，这一点还不太能看清楚。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其他国家的情况，在这里我以美国的宏观社会发展过程与学术主流价值趋向的变迁为例。在上世纪的二三十年代，美国社会的矛盾非常尖锐、冲突非常剧烈，女权运动、种族平等运动以及阶级斗争风起云涌。当时在美国非常兴盛的是行动

社会学，当时很多社会学家，以 W·E·B·杜波依斯为代表，都是在非常积极地参与社会实践、非常能动地引领社会运动的过程中生产知识的。

等到战后，尤其是 50 年代这个阶段，美国社会进入短暂的稳定时期，社会学界也开始发生一些变化，对宏观社会结构的研究非常流行，“排除价值倾向”也开始被作为一种学术准则提出。虽然这么说，但在实践过程中，学术研究在揭示宏观社会结构的时候往往带有一种潜台词，即这种社会结构的存在是有道理的，因此也间接地把当时的社会结构合理化了。所以你说它没影响社会吗？其实它是在加固整个社会结构。

等到六七十年代，社会形势又不一样了。民权运动开始兴起，轰轰烈烈的种族运动、同性恋运动、环境运动、反战运动等等给美国社会带来很强的冲突感，稳定被打破了。这一轮风起云涌中，很多社会学家本身就是社会运动的引导者、参与者，他们在社会运动当中直接生产出来的知识又被直接运用到社会运动的组织、动员、发展当中去。在动荡的社会环境下，学术和社会实践的关系又变得非常紧密。

等到 80 年代之后，情况又不一样了，美国又进入一个相对稳

定的社会环境。价值中立这种工具实证主义的态度也在这个时候被封为圭臬。但其实呢，虽然学者们号称价值中立，学术知识的生产和整个社会还是有千丝万缕的制度化联系。

我举两个 2012 年的新例子。在美国有一项法案叫 *Affirmative Action* (平权法案)，就是要求美国大学为了照顾种族的平衡，给予少数族裔学生优惠录取的政策。学者研究发现，在大一的时候，这种破格入选的学生和正常的学生在成绩上有一定的差距，但到了大四这种差距就非常不明显了，这是之前的研究已经证明了的。而在 2012 年初，有一个新的研究指出，为什么到了大四这两类学生的学术差距不明显？因为那些破格入选的学生在选专业的时候更多选择了人文和社会科学，而不是自然科学和工程这种硬科学。这个研究本身在取样、分析方法上没有任何问题，但是这个学者之所以选择这个问题进行研究，本身在背后就有价值判断的因素，这是很明显的。这个研究发表出来后，媒体很快就进行了报道，在整个民权运动界掀起了非常大的影响，受到很大的抨击质疑。这个研究本身已经有意或者无意的变成了社会实践当中的一部分。

第二个例子是 2012 年六月份发表的一项研究，说的是同性恋

伴侣领养孩子的问题——在美国，同性恋伴侣即使没有结婚也是可以领养孩子的——这个研究说，这些同性恋伴侣抚养孩子的结果没有那些正常的男女合法婚姻组建的家庭养得好。这个研究发遍之后的第三天，就被夏威夷州的一家法院写到一起针对同性恋婚姻领养子女的案件判决书里去了。当然这个研究后来也被学界批得一无是处，因为它在研究方法上有很大问题。

我想说明的是，即使学者本身没有想通过这个研究去干预社会的意图，但是美国的社会制度，这样一种“法律、传媒、社会运动、NGO 和学界有紧密的制度联系”的状态，使任何一个可能产生社会影响的研究都会间接地改变现实。即使学者本身追求价值中立，但美国社会已经将学界和现实实践的关系制度化了，学术界已经变成了整个社会结构当中的一块，在被动地发挥社会结构所希望它发挥的那种功能。这种情况出现在静态、稳定的社会当中。而在那种巨变、动荡的社会当中，可能学术界和社会实践的关系更多是前台型的，学者直接介入到社会现实的改造当中去，最大程度发挥自己的能动作用。

所以我要说的就是，学术和社会实践的关系可能更多的是社会结构因素所决定的。

今天，在中国，怎么做？

方可成：跃然给我们描述了一个类似波浪线的过程，这让我想到，在中国可能也有类似的情况。在过去的100年前，尤其是民国年间，救国的紧要关头。当时同样有一群年轻的知识分子像在座的几位一样，漂洋过海去发达国家留学，他们中的一些人也遇到了今天我们所讨论的这个问题。

我也想听在座的各位谈谈，目前中国是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之下呢？当然我们不再是国难当头了，但是我们的社会也是处于很多的危机之中。

张跃然：我的主要观点是：在什么社会干什么事。大家都知道，中国目前处在剧烈动荡的社会环境中，按照我之前论述的这个机制来看，应该是有很多社会科学研究直接面向社会现实改造。但很不幸的是，80年代改革开放后，整个社会科学界极大地被当时美国社会科学界所影响，在很大程度上直接把美国那些适用于静态、稳定社会的价值观念和研究方法借用过来了，导致现在中国社会科学界也是价值中立之风大行其道。我个人认为这是很可悲的事情，浪费了很多利用社会实践来生产知识的资源。

不过，目前很多学者已经回过味儿来了，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开始尝试在转型社会当中寻找新的研究模式。我之前在政见年末荐书活动当中推荐的是《转型社会的研究立场和方法》。在这本书当中有一些学者，以清华大学的沈原教授等人为首，认为在中国社会剧烈转型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应该摒弃价值中立，在学术研究当中体现非常强烈的关怀倾向，主动地采用干预社会现实的方法做研究、生产社会进行互动。比如像沈教授现在做的社会学干预研究，就是通过直接和研究对象互动，帮助他们争取权益、帮助他们进行身份改造的方式生产社会知识。当然目前这种研究方法也没有成气候，以后有怎样的前景也不好说，但这说明在目前这种转型社会当中，学术研究有很多可能性。

陶郁：我提供一些替代性的意见供大家参考。

虽然我个人不太喜欢后现代视角和建构主义，但我同意福柯的看法，我觉得任何社会科学知识都不是凭空而来的，知识背后也存在权力关系。无论我们觉得自己能在多大程度上做到超然于社会之外来研究社会，我们每个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都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周围社会的影响和塑造。不仅如此，我们的背景、我们

的身份、我们选择做什么样的研究、我们能拿到什么样的经费从而能做哪些方面的研究，这些都受制于我们所处的社会，这些东西背后也往往都有价值判断和权力关系。对此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并且应该直言不讳地承认。

但是，知识分子是否就应该直接站到社会的最前排来引导社会改变，并且能够通过这种直接的引导让社会变得更好呢？我对此表示怀疑。大家都有选择的自由，你可以在前排也可以到后排去。同时，人的精力和能力是有限的，一个人能否同时在前排和后排两线作战并且都卓有成效呢？我觉得这个好像不太现实。

今天的中国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我想这是大家的共识。但转型期的我们应该做什么、应该怎么做，或许并不需要统一的答案。我觉得转型期的每个人都应该做好自己。还是前面说过的那个观点：如果你觉得自己做学术更好，就去做学术；如果你觉得自己做社会运动更好，就去做社会运动。当然，你可以尝试在做社会运动的时候运用你的学术知识，也可以尝试采用参与式观察的方法来加深自己对于社会变迁的理解。但是，不管怎么选，都要明白自己想做什么、在做什么，要避免两头都想兼顾但最后什么也做不好。

汪吕杰：我硕士学历史的，2013年放在整个中国历史的框架中去考虑是一个很小的点。在这样的时代里我们应该做什么，胡适曾说学生不应该参加活动，但是我觉得他的意思应该是说不是所有学生都去参加学术活动，也有部分学生觉得自己有活力，有动力，他们就可以参加一些社会活动，但另外的学生就应该在学校待着看书。我觉得中国有13亿人，不是说13亿人都应该去参与游行，也不是说这个13亿都应该来到这个大悦城里参与这个沙龙，每个人都应该有他自己应该做的事情，擅长做的事情，所以说我觉得我们不必强求每个人去做什么，要做什么，应该做什么，应该让每个人自己去选择，按照自己心理的原则去做他觉得好的事情。我不同意刚刚陶郁说有人做得好台前就做不好台后，我觉得只要他自己觉得是合适的，无论台前台后，他都可以去尝试的。

周航：我可以分享下我自己的一些思想变化历程。一直以来，因为我自己的兴趣，我非常希望能在发展类的非政府组织中工作，去做项目，做实事，我总觉得这能带来更大的满足感，这种满足感或许也来源于你觉得你正在“改造社会”。但是，后来我读的硕士项目却是非常以学术研究为导向的。从这个时候，我开始接触学

术研究，在这过程中，你会发现学术研究的成果经常会有各种各样的局限性，这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可能会更加突出。你可能心怀改造社会的雄心壮志，并且小心翼翼，非常严谨地做研究，但是当把研究成果应用在实践中层面上时，会经常发现并不如你设想的如意有效，现实社会总还有更多的影响因素是你的学术研究中难以考虑到的。这也使得我逐渐在关门读书和改造社会这个问题上更趋保守一点。

现在我在 SIPRI 工作，个人觉得 SIPRI 中国研究项目的重点更多的不是提建议，或给各国政府提供政策咨询，而更多的是把关注点放在展现和理解中国对国际问题的观点。我们的研究所通过跟中国的学者、智库、大学研究所等机构打交道，来理解中国看待国际问题的角度和视野，也希望让国外更多人了解来自中国的观点，了解中国是如何看中国自己在全球社会中扮演的作用。也只有在深入了解的基础上，才能有机会提供好的政策建议。所以，我觉得我们做的更多事情是希望能在读者的思维层面上起到一些改造作用。

研究所的这种研究方式，或者研究态度也会对我有影响，尤其是影响了我对今天所探讨的这个问题的看法。在闭门读书还是

改造社会之间，我现在会觉得，首先要讨论的是，你对你想去改造的事务到底认识和了解有多深。只有理解好了，才能谈的上以什么方式，用什么方法去改造。但是，可能能做到理解好这一步，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现场交流

方可成：我们还有半小时的时间，跟现场的朋友们做一些交流。

提问者 1：我的问题是关于“价值中立”的。我觉得价值自然会制约你的行动。如果你做智库写报告，不可能保证一辈子都不受到外界干扰，不可能一辈子都保证不在某些压力之下修改报告。我觉得，每个人的研究成果都会被别人去评价，人们做研究的时候可能还是希望得到其他人的支持、或者被政府拿来运用，而政府如果运用了你的成果，会支持你做出更多的成果，但这些成果可能不是价值中立的。不知道你们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周航：我赞成你所说的，智库的研究和学者个人的研究一样，都需要做自己感兴趣、觉得重要的课题研究，而这里面其实可能已经多多少少存在价值判断了。但重要的是，在研究的过程中你如

何把握研究与自身价值判断间的关系和距离。

我也赞成你对智库独立性的看法。智库的确难以保持完全的独立，因为毕竟要受到多方面的限制，比如资金方面的限制。但是，一个好的智库应该也完全清楚研究的操守与底线，要清楚价值判断对研究过程和结果可能带来的影响。我觉得，现实中，许多知名的智库之所以他们的研究报告比较受欢迎和受重视，也是因为读者认为他们大部分的报告相对中立和客观。

而对于读者来说，他们也应该对智库的报告有自己的判断。当然有些客观指标或许可以告诉你哪些报告比较受重视，比如报告被引用的次数。还有就是去看下智库的资金来源，智库某份报告的资助方。如果一个智库尝试去将它的资金来源多元化，它受到单个基金会或者资助方的价值影响就会越低，可能就可以保持更好的独立性；而且资金来源的多元化，也代表机构被不同的单位认同。

陶郁：你谈到的这个问题，学者们确实经常遇到，而且不仅仅是中国的学者经常遇到，外国学者也会遇到。

在和一些朋友交流的时候，我发现他们有个错觉，就是以为写

内参写报告是中国学者的专利，而外国学者都在埋头做研究，外国大学和智库之间的界限泾渭分明。其实，我听说即便是在美国某些非常重视研究的高校里面，如果某位教授的研究成果直接受到了国家决策层的重视，或者研究报告变成了某个层面的政策蓝本，这些看似不那么学术的研究成果，也可以被列入晋升考察的范围。

提问者 2: 我想问一下陶郁。我觉得知识分子在做研究的时候能不能做到价值中立，可能不仅取决于自己，也取决于社会。在有些国家，知识分子受到的保护和尊重比较多，他们或许能够选择价值中立。在另一些国家，如果你的研究角度和观点和政府所希望倡导的东西不一致，你选择坚持自己的东西，就可能要面临很多阻力。但是，即使在环境比较严酷的国家里，依然有知识分子站出来挑战既有的官方价值，他们甚至可能因此而失去自由。你怎么看待他们这种行为？你觉得在这样的社会里知识分子是否只应该去专心做学术研究？

陶郁: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但我觉得可能需要具体明确一下。
如果你是问我对于他们行为的看法，那么答案很简单：第一，

他们有选择的自由；第二，他们做出了自己的选择；第三，他们为自己的选择承担了后果；第四，他们的选择是勇敢而令人钦佩的，但他们的做法是否改善了社会则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如果你是问我在同样的情况下更应该做出什么样的选择，那么我可能得多说几句，因为这个问题或许并没有简单明确的答案。

首先，改造社会有很多方法。在选择使用某种方法来改造某个社会之前，学者应该充分了解这个社会的结构，并且根据这种了解来明确做出某种选择所可能带来的后果。如果你能够接受这种推演出来的后果，那么就明确而坚决地做出自己的选择，因为你有选择的自由。

第二，我们要把学者的研究和学者的行动区分开来。有些站在社会变革最前沿的学者，可能很无私、很勇敢、很有责任感，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学习和感激的品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当他们做出无私、勇敢、有责任感的行动之后，他们的学说就更加正确了、他们的观点就更有指导意义了。甚至从长期来看，是否所有无私、勇敢和有责任感的行为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了呢？这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我猜，至少政治学家 James Scott 会给出否定的答案，因为他写过一本书，副标题就叫：那些试图改善人类

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

提问者 3: 我发现你们四个人有两种不同的观点。陶郁说更希望学者做些很纯粹的研究，跃然说社会研究要影响社会。我非常赞同跃然的观点，我觉得既然你选择了做社会科学，最终还是希望影响社会。所以我想问陶郁：如果学者像你所说的那样去做很纯粹的研究，他们还能影响社会吗？他们怎样才能影响社会？

陶郁: 不好意思，我又要霸占话筒了。

谢谢您的问题！我觉得我刚才的发言或许给大家造成了一种错觉，感谢您给我提供了一个澄清的机会。

我们说要安心读书，并不是说要把自己永远困在书房里当书呆子。所谓价值中立，是指在研究过程中不能让个人价值干扰学术判断，当然更不能为了达到某个特定结果而造假。但是，在进行研究以前，学者可以也应该按照自己的价值来确定研究对象，而研究什么样的标准，往往也取决于学者想从什么方面改造社会。同样，在研究结束以后，就像吕杰刚才提到的，学者可以选择把自己的研究成果推向社会，亲自或者让其他人通过利用自己的研究成果来改造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便学者专心在做很纯粹

的研究，即便学者对于研究之外的事情一点都不感兴趣，即便学者根本不去推广自己的研究成果，他也可以影响社会，因为他为这个世界提供了改造世界的工具和方案。

另外，请不要忘记，学者影响和改造社会的方式有很多，他不一定非要亲自站到社会运动的最前线，而可以通过影响关键人物的方式来影响整个社会的进程。比如，学者可以给决策者提出一些很好的意见和建议，也可以培养一些有能力也有意愿的学生。有时候，学者通过这些方式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可能要比他自己直接站到社会运动的最前线还大。

汪吕杰：我觉得你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怎么定义改造社会，到底是改变政体才算是改造社会，还是说你正常生活里的某些行为也算是改造社会。举个例子，前几天出了个关于闯黄灯的新交规，我觉得这条交规出台肯定是有依据在那里的，肯定有相关的专家进行调查。我猜测专家在调查之时并没有想到要改变交规，但是他的调查结果可能直接或者间接地导致了新交规地出台。所以我觉得每个人无法保持价值地绝对客观，也无法保证自己的研究不对社会产生影响。因此我的观点是所有研究都在改造社会，只是影

响或大或小。我并不赞同你刚才所说的研究无用论，我相信每个人的研究都是有意义的。

提问者 4: 我的问题和刚才跃然谈的内容关系比较大。我举一个例子吧，前些时候南方周末做过一个关于富士康自杀连跳的报道，能看出来记者在报道社会前沿问题的时候是希望在理论上、知识结构上找到一定的深层解释，那篇报道最后引用了涂尔干论自杀的观点。作为读者我能感觉到作者尽力想达到一定的理论高度，但最后呈现的效果并不理想、并没有解释清楚。我觉得原因可能是，文章引用的理论来自西方，它在发展过程中基于西方的社会实践，和中国当下的现实没有太大的关系。所以在中国做解释性报道是非常苦难的，这里存在一个真空，无法找到针对中国的、而又基于扎实的实证研究的理论模型。所以我想问跃然，你觉得那西方的那套理论来解释中国发生的社会现实，是不是不太严谨的，中国自己的学者又应该怎么去做研究？

张跃然: 具体到你举的例子来说，我觉得根本原因是记者的理论素养有问题。涂尔干的自杀理论想要解释的是社会在宏观层面上自杀率为何升高，这一理论认为原因在于宏观社会结构发生了重

大变化。换句话说，这一理论中自变量是宏观的，因变量也是宏观的。而富士康连环自杀现象，是在一个具体的微观社会生活场景中自杀率短时间激增的问题，所以记者实际上误用了涂尔干的理论。这就好比，这儿有一个理论解释今年我国农业在宏观数据上苹果为何减产，但你却用它来解释你今天为什么买到一箱烂苹果。

不过，你指出的这个问题确实是存在的，而且是非常重要的、非常棘手的。中国现在社会现实的发展比目前中国社会科学界的理论发展的速度要快得多得多得多，而目前现在我们社会科学界所拥有的很多理论资源是来自于西方的那些适用于静态稳定社会的理论和研究方法。所以我感觉目前的现实是：第一，理论的进步速度远远落后现实的发展速度，第二，我们所拥有的理论资源也许整个方向就是错误的。我的观点是，在这个转型社会当中中国学者在理论和方法论上应该有更大的突破和创新，比如直接干预法等等，通过社会科学知识的生产为整个社会提供更多的解释工具。

提问者追问：有没有具体案例？

张跃然：比如说清华大学沈原教授做的干预实验。他的研究团队进行过几种不同的尝试，比如目前北京中产阶级住房业主的维权，通过组织他们的业主委员会、引导他们与其他利益团体进行沟通的方式看他们公民意识的形成，还有更强的干预实验，比如对河北的一些农民工进行维权教育、社区组织，赋予他们谋取更多权益的力量。社会学干预是目前一个比较具有亮点的尝试。在目前中国社会科学界，应该想象出更多的可能性，创造出新的闻所未闻的研究方法。

提问者 5：听了几位的谈话，我的感觉是价值中立不太可能。我的理解是：我们都生活在社会中，个人很难脱离社会的影响而去单独解决一个问题。但是，跃然刚才谈到，就对待价值中立的态度而言，美国的社会科学研究是有曲折和变化的。我们都知道，学者往往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他们对社会有一定的导向作用。所以，我想和你们探讨一个问题：到底是社会科学研究者的思想变化导致了社会发生变化，还是社会变化导致社会科学家的研究发生了变化呢？

张跃然：这个问题有点类似于先有鸡还是先有蛋：是社会结构的

变化导致个体行为的变化，还是人的行为的变化塑造了新的社会结构。从宏观来讲，我们如果想要完全正确的答案，就是这种作用是相互的。当然，这种相互作用哪方强哪方弱呢，在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情况。我能想到的就是，在一个静态稳定的社会当中，社会结构对个体行为的约束力比较充分，而在一个比较动荡的社会当中，个体行为的能动性对社会结构的改造体现得比较充分。正因为静态稳定社会当中，人的行为没有改变社会结构的空间，所以才为价值中立的工具实证主义的滋生提供了土壤。而在中国这样极速转型的社会当中，可能人的行为对社会结构的影响力显得更强，所以我认为学者有比较多的空间站到前台来用自己的学术知识生产来引领整个社会的结构变革。

陶郁：我插一句。我觉得，跃然的回答四平八稳，把许多情况都考虑进去了，因此你很难反驳他。当然，我也并不是要反驳他，因为讨论的目的不在于争出高下，而在于增进理解。

我想，如果想要更明确地回答你的问题，或者想要更深入地就你提出的问题进行讨论，我们必须约定一个共同关心的时间段。在此基础上，我们才可以具体讨论在这段时间里面，到底是学术研

究对社会变化的影响大，还是社会过程对学术研究的影响大。否则，可能很难把这个问题说清楚。

我想提醒大家一点，有些社会变化或许看上去像是由某项学术研究导致的，但在下结论之前，我们一定要谨慎。今天，如果你跑去和许多学者聊天，经常可以听到许多人说“某某政策是我一手促成的”。我最开始听到这些说法的时候，对于这些学者的崇拜之情绝对是自心底油然而生；但是，听得多了，看得多了，了解得多了，往往就发现现实可能没有那么简单。

我并不是说这些学者都在吹牛，他们可能确实为某项政策的出台提供了大量的资料、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但是，政策出台和社会变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我倾向于认为，社会中每时每刻都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见解，而其中许多见解都具备发展成为政策的可能性。但是，最后哪些见解被采纳了呢？答案可能并非是因为这个见解比其他见解更高明，而或许只是因为这个见解更符合决策者的利益和口味。

不过，话虽这么说，学者还是应该努力做出高水平的研究——至少是合理的研究。否则，就算是纯粹为了发表文章和晋升职称而做出很多荒谬的研究，倘若有天这些荒谬的研究被作为出台某

项政策的依据，那么学者也逃脱不了世人的谴责与良心的折磨。

那么，在当今中国，学术与政策相互影响的关系到底如何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而且也值得研究的好问题。抱歉，我目前对这个领域不太了解，但是我们可以一起去看看有没有这方面的文献。如果有的话，我们可以通过学习来增进了解；如果没有，这或许是一个值得填补的学术空白。

提问者 6：谢谢大家给我们带来这样的这么好的演讲，让我很受启发。我大学毕业才一年，对你们谈的这个话题可能理解比较肤浅，但还是想说说我自己的想法。

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话题，是要在关门读书和改造社会中做出选择。我听下来，感觉最主要的结论就是找到自己的角色。我同意这个结论。但是，我想更重要的问题是怎样去找到适合自己的这个角色。

我想，你们今天讨论的时候，都是站在学者的角度上来想问题。不知道你们是否思考过自己的受众是怎样的。不知道你们认为他们能不能主动去思考和判断。你们可能都来自非常优秀的学府，所以觉得独立思考是件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我所接触的

许多朋友就没有自己的价值判断，他们对自己的角色很迷茫，可能也不知道怎么去选择自己的角色。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希望你们以后能多思考和注意。

提问者 7: 我有同样的问题，所以能否插一句话？

我觉得，西方的高等教育可能已经普及了理性启蒙，但这个东西在中国的高等教育里目前还是个奢侈品。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的院校，偏科的情况比较大，大家更关心的还是自己的前途。日本有学者提出了一个概念，叫“注意力经济学”，大概意思就是说：现代社会和微博一样，谁的粉丝多谁的形象好我们就听谁的。

你们希望让每个人都能对学者的言论做出自己的判断，但是这在现实中很难做到。比如说，于建嵘老师说的很多东西，就会被人们不知不觉地用到生活中。但你说他是学者还是公知？恐怕很少有人能区分清楚。其实，大家也不愿意那么区分，因为他说得观点让大家听上去很爽，所以大家就很愿意听。最近受到批判的韩寒，也是类似的情况。

我认为，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的公知，就和理性的公民一样稀少。我们对公知的期待，就是希望他们能唤起我们的理性，能让

他们破解我们所盲目相信的一些东西。可是反过来，很多人慢慢就将启蒙理性的公知当作了盲目崇拜的对象。

这说得好像跟今天的主题有点远了，供你们参考。

另外，我是一位女同事介绍过来听你们讲座的。但是我注意到今天来的几位都是男士，希望以后也有女生加入你们的行列。

方可成：我们政见团队其实有不少女生，不巧的是她们现在都不在北京。所以这次没能过来。我们还有时间回答最后一个问题。

提问者 8：我觉得，知识分子存在分工。具体来说，一些知识分子可能更容易直接参与影响社会进程的活动，因为他们的研究本身就与社会联系更密切；另一些知识分子，他们的研究成果更加基础和抽象，不容易直接和社会变化发生关系，而这些人更应该关起门来好好去做研究而不被周围社会中存在的短视因素所影响。我觉得马克思是个很好的例子，如果马克思每时每刻都参与到社会运动中，并且每时每刻都对社会发表意见，他可能就没有机会坐在大英图书馆里面认真思考像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这样最基本的社会问题。所以，我想听听你们几位怎么看。

张跃然：这位同学提到非常好的“分工”。在之前的讨论当中，我强调的也是社会科学可以不怎么样，而不是必须不怎么样。确实我们应该容忍一部分人去打破目前被广泛承认的价值中立的观念，走一条新的道路。而另外一方面，即使学者不走到前台，只躲在书斋里进行工具实证主义研究，也有很多制度化的渠道把你的研究和社会现实联系在一起。作为一个学者，你的研究成果最后是不是不可避免的影响社会现实的，区别只在于渠道，是通过前台的方式还是后台的方式。这种区别是由每个人研究的不同领域、它所做出的基本假设等等因素造成的。但我们应该明确地一点就是，没有人可以真正的把自己关在书斋里，让学术研究不和社会现实产生任何联系。

汪吕杰：你的问题的关键是怎么确定这样一个分工，一个学者对自己的定位到底是书斋派还是实践派。我觉得梁启超在中青年时期如果没有那么积极地参与社会活动，他之后的学术造诣不会这么高，他对中国的理解也不会这么深。所以直接回答你的问题，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说学者自身是怎么定位的。这个定位并不是他的学术流派来决定，而是他的学术追求来决定。另外，没有人

可以真正地在书斋里完成他的学术工作、把自己的学术影响完全放在自己的书斋里。即使有人将自己的著作埋在深山里，如果这个著作很有价值，他的命运还是会有转折。

周航：刚刚提到的这个分工是一种二元化的概念。我认为每个学者在不同的生活阶段，因为自己的个人生活经历不同，或者自己所在的社会阶段和社会结构不同，可以做不同的尝试。我并不认为一个从事研究的人，从一开始进入象牙塔里，就得一辈子只待在象牙塔里。这种身份是可以转变的。我并不认为就一定存在这样的分类，一派人是完全在象牙塔里，另一派人就是必须改造社会。每个人都可以因为自己的个人经历的变化，社会结构的变化而转变，所以我个人不大赞同这种二元化的概念，将两者完全区分开来。前面已经提到很多次，不可能所有的学者都完全远离社会，尤其是社会科学研究。只是在这种大前提下，学者以什么样的程度去干预社会，而这种程度在我们自己的人生当中应该是可以不断变化的。

陶郁：我非常同意他们几位的说法，特别是周航提到：人们并不总能按照自己的意愿随时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回到你的问题。我

不知道今天大家之所以记住马克思，是因为他写了《资本论》，还是因为他写了《共产党宣言》。我想，可能二者都有吧。所以说，即便是同一个人，只要精力和能力足够，他也可以既从事学术研究，又直接参与社会运动。但是，这并不影响钻研学术与改造社会之间的分工，因为我们对这两件事情的评价标准是根本不同的。一部学术著作，即便在改造社会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功，但是如果它里面有逻辑上或者材料上的错误，我们还是认为这不是一部严谨的学术著作。同时，有些本来是作为学术成果发表的东西，虽然随着时间发展可能被证明在学术上是站不住脚的，但却影响了社会的进程，我们也没有必要用学术缺陷来抹杀这些作品的现实影响。

方可成：由于时间关系，提问环节到此结束，更多的问题我们可以之后私下交流。在结束沙龙之前，每人做一个简短的总结。

汪吕杰：那还是回到最初我们这个主题，我觉得每一个人应该开门去看这个社会，然后再做学术，至于到底是开前门还是开后门就是大家自己选择了。

周航：第一点是价值判断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是难以完全避免的。第二点是我们作为公民，应该相信自己有能力，有能力用批判性的眼光去认识和反思这个世界。我觉得任何人都不应该在这点上质疑我们自己。

张跃然：第一，价值中立不一定是我们必须追求的事；第二，学术知识的生产和社会实践永远联系在一起，区别只不过在于联系的渠道是前台还是后台、是直接的还是非直接的；第三，这种差异主要取决于社会大背景大环境，是静态稳定的社会，还是剧烈变革的社会。

陶郁：我想接着刚才最后一位同学的问题说。我觉得：社会有分工，而每个人都应该明确自己在分工中的定位，明确定位之后就好好做好自己的事情。

事前得到主持人允许，可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法国学者迪韦尔热的教诲，在《政治社会学》这本书的导言中，他明确写到：

我们无须去探求现阶段社会科学所不能达到的客观性和中立性，社会学家应该意识到他本人也不可能摆脱

意识形态的影响，但要限制由此而造成的对现实的曲解。这首先要要求他必须认识到本身的意识形态并承认这一点。其次，要求他在提出假设和理论时，不仅要考虑到自己的，还要考虑到别人的意识形态。最后，当他提出自己的理论和假设时，应该尽量明确说明除了业经科学验证过的成分外，还借鉴了哪种意识形态。

当然，如迪韦尔热所言，“要遵循这些要求，也不是很容易做到的。”不过，无论如何，这应当成为学者对自己的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学者应当“开门读书”，但同时也要“专心治学”。

方可成：我本人的总结很简单，那就是请大家继续关注和支持我们的团队。我知道来单向街做沙龙的很多嘉宾都是在交流之外再卖一卖自己的书，我们暂时还没有出版纸质书，但是目前在“字节社”有几本电子书售卖。谢谢大家！

热点·世界杯

伪球迷是如何产生的？

美国人为啥不玩足球？一种司法文化解释

伪球迷是如何产生的？

——你看球的真正原因

世界杯赛期，一种叫做“伪球迷”的物种大量滋生。他们到底因何而生？在更宽泛的意义上，人类社会的风尚是如何在人群中蔓延开来的？又在何种情况下发生变化？

◎ 王韬

过去两周*，你身边是不是突然冒出来很多“球迷”？那些之前从来不关心足球的人，突然间都成了狂热分子。不仅如此，每个人还都有自己坚定支持的球队，自称铁杆。一时间，真假球迷难辨，成就了全民足球盛宴的“假象”。

在这段时间，坚持不看、不聊足球的人会尤其孤独。他们很多

* 本文发表于2014年6月28日。

同伴选择了追随潮流，加入伪球迷的队伍中，独乐不如众乐。虽然不如真球迷那般狂热，但伪球迷仍然会在一次足球盛会中成为中坚力量。更为重要的是，很多伪球迷就在这一过程中正式皈依，心甘情愿地升格为真球迷。从非球迷转变为真球迷虽然可以一次完成跨越，但是经历了伪球迷的过渡阶段实现成功转型的亦不在少数。而未实现如此转型的人，则在世界杯结束后重回非球迷的大家庭。

足球狂热如何一传十、十传百？一个非球迷如何变成球迷，进而又带动身边的人成为球迷？这是一个对经济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有极大吸引力的问题。他们关心的当然不只是足球领域本身，而是人类群体行为中普遍存在的从众效应的发生机制——换个问法，风尚是如何在人群中蔓延开来的？又在何种情况下发生变化？

针对这些问题，社会科学家们提出了花样繁多的解释，我在此列举几种，这些解释各有千秋。虽然其中一些放在球迷的情境下不尽完美，但仍值得一提。

第一种解释是：作一个“异类”会遭受群体压力。这一点当然

很好理解。如果你身边的朋友大多都是狂热的球迷，而你拒绝看球，你也许会为你的不妥协付出代价。就算他们不公开宣布将你开除出圈子，当他们兴致勃勃地看球或是聊球的时候，你自然被冷落一旁。被孤立的滋味可不好受。出于这样的原因，也许一部分非球迷选择“弃暗投明”，加入球迷的队伍中，沐浴组织的温暖。

第二种说法将注意力放在人性自身的特征上。人和许多群居动物一样，拥有从众的本性。在漫长的进化史中，面对弱肉强食的丛林竞争，人类不断强化了与同伴保持行为一致的行为特征，这或许有助于更好的合作，抵抗外来威胁，助于族群繁衍。人们希望和大家一样——既然大家都看球赛，我也看看有何妨？

第三个假说也走了相似的路数。人们行为保持一致，有助于实现人类合作的正外部效益。有些习俗风尚的的起源也许充满随机，但后来者会选择跟随而不是另起炉灶颠覆即有的规则。比如，为什么有些国家开车靠右行，有些国家则靠左行？为什么键盘上的字母是特定的排列顺序？那个紧跟键盘的发明者之后的使用者完全有理由可以颠覆这种排列规则，但他们并没有这样做，因为这样作不值得。将这种解释运用在足球狂热的传染上似乎略显牵

强，喜欢足球并不会带来某种形式的规模效应。但即便如此，这一解释框架在理解历史演变的路径依赖特征上十分有力。

上面的三种解释都从不同的侧面解释了从众行为的合理性，但都存在一个不足，即暗含着少数服从多数的初始假设。无论是群体压力、从众本性，还是合作的外部性效益，都是在风尚已经成为风尚的时候才开始发挥作用，却并没有解释这一风尚为何在一开始得以形成。换句话说，这些解释能解释“从众”，却无法解释“一对一”的传染。如果我的朋友中只有一俩人是球迷，那我还会不会成为球迷？

第四种解释对这一点给出了肯定的回答。在这种观点看来，一个人选择接受某种风尚也可以是被他人说服的结果。今年的克拉克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 Matthew Gentzkown 在他和别人合写的一篇研究“说服”的论文中将说服分为两类，一类是直接改变人们的激励机制，设计奖惩规则改变人们选择特定行为；而另一类则是改变人们的信念，即对事件发生概率的判断，从而说服其采取特定的行动。坦率讲，在作不作球迷这件算不上性命攸关的事情上，不大有可能有人对我们语重心长地进行说服工作，但

是这样的例子也不是完全没有。

上面的解释关注了一对一的“传染”，却对风尚的连锁机制再次忽略。这就涉及到第五种解释。在一篇广为引用的论文里，Sushi Bickchandani 等三位经济学家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在他们的模型中，每个人依据其之前人的行动和个人判断做出行动，作者们发现，在一定情况下，人们开始无视自身获得的信息，一味追随前人，追风现象自此发生。更为有趣的是，一次微小的信息扰动就会逆转潮流风尚的方向。这一现象被称为“信息瀑布”。按照这种解释，足球迷传染链条的开端是真球迷，但该链条的末端的追随者们则大多是伪球迷。正如这一理论所预测的，对这些伪球迷而言，改弦更张放弃球迷身份是一件很容易发生的事情。

围绕非球迷为何会选择作伪球迷，上面的五种解释提供了不同的机制。在经济学家看来，它们无一例外都是成本收益考量的理性决策。然而事实上，真正因爱上足球而做球迷的人，是不会按照这些规律行动的。从非球迷到真球迷的变化，无需上面的种种理论去解释，而应当诉诸于足球魅力本身。这就是为什么我仅仅关注伪球迷的原因所在。真爱常常意想不到就发生了，至于为

何，原因千奇百怪。你能说因为喜欢帅哥就喜欢足球的女球迷就是伪球迷么？

参考文献

- Kamenica, E., & Gentzkow, M. (2009). Bayesian Persuasion (Working Paper No. 15540).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 Bikhchandani, S., Hirshleifer, D., & Welch, I. (1992). A theory of fads, fashion, custom, and cultural change as informational cascad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92–1026.

美国人为啥不玩足球？一种司法文化解释

在美国的体育版图中，足球另有内涵，美式 football 指的是比 soccer 热门得多的橄榄球。美式足球与欧式足球两种运动，在大西洋两岸待遇迥异。这到底是为什么？

◎ 宿亮

世界杯，四年一度，球迷在世界各地疯狂——美国可能要除外。

在美国的体育版图中，足球另有内涵，美式 football 指的是比 soccer 热门得多的橄榄球。本届世界杯，美国队第一轮小胜加纳，副总统拜登迟到，不知是不是世界杯不如“超级碗”吸引人。美式足球与欧式足球两种运动，在大西洋两岸待遇迥异。这到底是为什么？

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法学院终身教授 William Pizzi 曾试图在论

文《足球、橄榄球与审判体系》中给出答案。Pizzi 把法庭上或纵横捭阖、或暗藏玄机的司法实践类比风靡美国和欧洲的两种足球。通过比较两种运动，他尝试剖析美国人的司法文化，解决为什么美国人爱玩橄榄球这样的悬念。

足球和橄榄球是两种运动。看足球，只需知道身体侵犯或危险动作是犯规，其他的就交给场上球员去自由发挥了。而在橄榄球场上，想要向解释“越位”一样给姑娘们说清楚“攻防线”（line of scrimmage）的概念就太难了。

说实话，什么时候抱着球、什么时候把球扔到地上、什么时候用脚踢，这些橄榄球规则的细节都不太简单。

不说别的，就说裁判数量吧。足球场上能够吹停比赛的裁判只有一个，加上两名边裁和第四官员，寥寥几人。而在橄榄球赛场上，6到8名裁判都可以扔小黄旗中断比赛，然后裁判会一起研究一下究竟犯规是否成立——不少时候，商量的结果是没有违反规则。

因此，足球和橄榄球在比赛节奏上完全不一样。足球要保持比赛的连贯性，在进攻有利的前提下裁判对某些犯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比赛最后的伤停补时往往也就是几分钟时间。比

赛大多数时候，足球裁判的角色是比赛的背景。但在橄榄球比赛中，赛事频频被中断，裁判会商，甚至美国职业大联盟还曾经引入了视频回放来协助裁判判罚。至于比赛时间，橄榄球采取精确计时，所以规定时间半小时的半场球往往能延续到一小时，甚至更长。

足球比赛中，罚任意球，排人墙有距离的限制，需要裁判出手调节，但没有人严格用尺子去量距离。橄榄球赛场上，10码罚球就是10码，差半码都不行。球场上有辅助线，场边裁判也会测量距离。

就球员与教练的关系，两种运动也差异较大。足球场上，教练只能老老实实地待在场外规定区域大呼小叫，最多通过三名轮换球员来影响比赛。但在橄榄球赛场上，教练几乎决定着每一次进攻的策略和防守的阵型。先前，教练会把一名球员叫到场边暗授机宜，然后球员把信息传递给四分卫；如今，教练直接通过装在四分卫头盔上的对讲机指挥比赛。

也就是说，足球场上的天才球员往往即兴闪光，在快节奏的攻防转换中通过个人发挥创造“决定性瞬间”，不可能依靠暂停时间跑去问问教练应该怎么踢。橄榄球比赛中，一个好的四分卫是

严格执行教练意图的四分卫，好的球员也是严格遵守纪律、守住自己位置的球员，而不是即兴发挥。

Pizzi 教授认为，美国人喜欢看橄榄球符合美国的司法文化特征。

美国司法体系对程序性的要求严格细致，只有受过严格训练的律师才能熟谙这套把戏。一个好的律师就像橄榄球教练，会告诉证人应该如何出庭作证，甚至找模拟法官和陪审团给证人“排练”。证人最好别自由发挥，这会让法官和律师“头大”。

审案到了一定阶段，每一个细节的程序合法性都是律师和法官考虑的终点，律师和法官甚至会在审理过程中“开小会”，分析证据的合理性以及是否应提交给陪审团。

在欧洲大陆法系的国家，审判程序更像是足球比赛。证人按照自己的方式陈述事实，不会被随意打断，哪怕证人说的是美国司法体系中不予采信的风言风语”。司法体系并不希望证人事先受到影响，律师预先告诉证人应该怎么出庭是非常不合常规的做法。

大陆法系的法官就像足球裁判，让证人用自己的语言和节奏描述案情。有人担心这样的模式会使证人遗漏重要细节，但大陆法系认定，用可能的遗漏换取证人的独立性是正确做法。

就像足球和橄榄球，在观感上，美国司法体系和欧洲大陆法系国家的审判过程完全不同。欧洲律师就待在自己的位子上，按照规定提问、陈词；而美国律师在法庭上很“活跃”，可以跑到陪审面前去质询证人，在法官席前总结陈词。这两种区别，像极了足球和橄榄球教练在球场上的不同表现。

那么，作为一个美国大学的法学教授，Pizzi 更喜欢那种运动呢？这名学者说，橄榄球代表了美国司法文化中不少特点，比如尊重程序、让每一步审判都尽量理性化。不过，这种文化在不断的不断发展中也越来越娱乐化，吸引媒体关注，反倒影响了司法公正。比起欧洲司法体系中让证人自由发言的模式，美式司法文化漏洞不少。看起来，Pizzi 教授更喜欢的还是足球赛场上的即兴发挥的球星，就像他觉得证人应该尽量少受影响，在自然状态下向法庭提供证据一样。

参考文献

- Pizzi, W. T. (1994–1995). Soccer, football and trial system. *Columbia Journal of European Law*, 1, 369–377.

专题

专题

课堂笔记

和政见一起学耶鲁宪法课：课程简介

◎ 卢凯悦 / 笔记

耶鲁《宪法》课将会引领听众探索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文本之一——美国宪法，并探究其中家喻户晓的民主理念，包括人民主权、三权分立、联邦制、人权……这些词汇不再是隐藏在理论课本中的概念，而是散落于日常生活中的真知灼见。

你将从本课找到下列问题的答案：

- ※ 为什么美国宪法在 1789 年通过？
- ※ 为什么宪法修正案不断添加？如何添加？
- ※ 谁来决定宪法的真正含义？

- ※ 合理宪法解释的根基是什么？
- ※ 成文宪法是如何与不成文宪法权威（司法判例、总统声明、重要法令、经验常识）相结合的？

还有这些问题：

- ※ 参议院如何“打击”众议院？
- ※ 众议院如何“打击”参议院？
- ※ 国会如何“打击”总统？
- ※ 总统如何“打击”法院？
- ※ 副总统是用来干什么的？

授课教师

阿希尔·里德·阿马（Akhil Reed Amar）生于1958年9月6日，耶鲁法学院教授，专攻宪法和刑事诉讼法。被认为是当今美国法学界最有影响力的学者之一。阿马于1980年毕业于耶鲁学院，1984年毕业于耶鲁法学院，取得博士学位。他的著作甚丰，包括《美国宪法传》以及最新著作《不成文宪法》。

授课形式

课程持续 12 周，每周由 4 个 20 分钟左右的小型讲座以及 1 个额外讲座（Bonus Material）组成。额外讲座包括助教对学生典型问题的讲解、最高法院法官来访耶鲁大学的演讲、耶鲁法学院稀缺书籍部门的幕后介绍等等。此外还设有论坛，供学生向助教提问。

政见团队将选取每周课程内容的精华与各位分享，力图让读者在最短时间内吸收最有营养的内容。若有兴趣了解更多，则请收看课程视频。

和政见一起学耶鲁宪法课：第一周

大热的《纸牌屋》，让人们对美国总统制、国会政治都充满好奇。剧中的美国政治是一片丑恶，现实生活中是否如此？政见 CNPolitics 将与你一起学习耶鲁大学在 Coursera 平台上的网络课程《宪法》，探究美国政治的真实面貌，了解总统、国会、法院等出现在《纸牌屋》中的元素。

© 卢凯悦 / 笔记

第 1 课

Q1：为什么美国宪法是世界民主进程的一个转折点？

1787 年以前，世界范围内存在民主元素的国家有：

※ 大英帝国：有下议院；但同时有世袭的君主制以及贵族领导的上议院。

- ※ 瑞士：牧羊人与牧牛人很大程度上是自治；但很大程度上只是因为瑞士多山，邻国不想爬上去，即使爬过去了也没啥好抢的。
- ※ 古希腊的小城邦：有一定程度的自治，但局限有：a) 地理空间狭小；b) 无法军事自卫；c) 只存在小城邦（polis）中，居民少，民主采用的是面对面集会的形式；d) 城邦中居民的共同宗教是民主的基础。

世界的其他地方，都被暴君、国王、皇帝、沙皇、苏丹、酋长等统治。

今昔对比：

印度，意大利，德国。

教授的冷幽默：

美国宪法的转折点作用就如同 B.C.（Before Constitution）和 A.D.（After Document）的交叉点

1787 年及以后：

- ※ 美国宪法的伟大之处在于它是由人民所选出的代表认可并批

准的。

- ※ 美国宪法里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是“我们人民”（We the People）。
- ※ 相比之下，英国法律是由不成文的习惯法组成，并未真正代表民意。

与独立革命时反革命人士遭排挤甚至驱逐的情况不同，宪法的批准过程容纳了各方激烈的争论。后来的一些美国政要曾激烈地反对宪法，如詹姆斯·门罗、阿尔布里奇·克林顿、塞缪尔·柴斯，他们后来分别担任了总统、副总统、最高法院法官。

第2课·宪法序言

Q2：宪法出台后，13个州里的8个州对选民的财产限制都降低或取消了。但是，妇女普遍没有选举权，少数州仍有选举权的种族限制。那么，序言是否名不副实呢？

教授认为，这些缺陷需要放在当时的大环境中来考虑。

历史传统：

首先，在 1787 年以前，无论是在雅典、瑞士，或者英国，妇女从来都没有选举权。而美国妇女在 1920 年代获得投票权，也正是得益于宪法序言中包含的民主理念。

国家安全：

其次，妇女并不服役参军而保卫国家。国家安全与民主是紧密相连的。a) 宪法最初就降低或取消对选民财产限制的重要原因，就是因为独立战争中大批穷人扛起武器保卫国家；b) 第 15 条修正案中，黑人被赋予选举权，也部分是因为他们也参战；c) 妇女在第 19 条修正案中获得选举权，是因为当时的伍德威尔逊总统认为，妇女为一战做出重要的战时贡献，理应得到选举权；d) 再后来，选民的年龄底线被降低至 18 岁，是因为美国人年满 18 岁就可以服役。

地缘政治：

在宪法批准过程中，反联邦党人曾经争辩说，即使各州同意了宪法，如果《权利法案》未能施行，各州应保留退出联邦的权利。联邦党人坚决反对。实际上，英国和瑞士能成为民主国家也

得益于地缘因素。英国为岛国，瑞士有阿尔卑斯山，只需规模较小的常备军，军队并不对国内民主构成威胁。

第 3、4 课·宪法第一条：国会

Q3：国会（Congress）一词出现在了《邦联条例》和《宪法》中，它们是否存在不同？

《邦联条例》：

- ※ 国会集万千宠爱于一身（权力集中）；
- ※ 相当于战时委员会，其制定的法令不具有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执行力；
- ※ 国会只具有条例上明确规定的权力；

《宪法》：

- ※ 国会只是三权分立制度中的一个分支；
- ※ 明确规定国会为立法机构，并为两院对称结构；
- ※ 具有明示与默示权力。

Q4：两院制必定导致更少法律的通过吗？

教授并不认同。互投赞成票以通过法律（log-roll）使得通过的法律数量并不必然减少。然而，两院制确实可以有效阻止那些存在违宪风险的法律通过。

Q5：第一条（Article I）中的民主理念还体现在其它什么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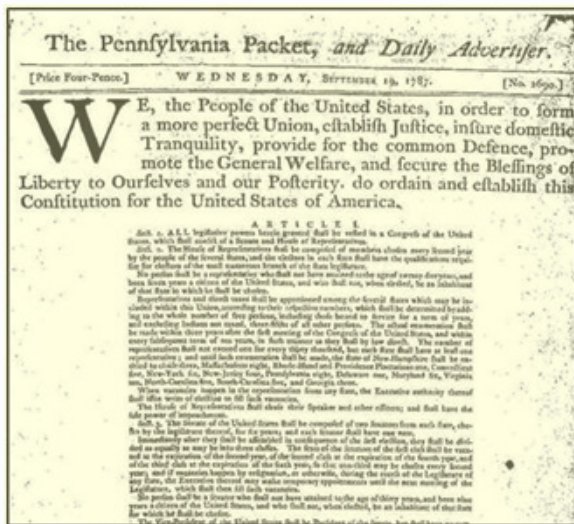
首先，国会规模：联邦党人最初设计的国会众议院只有 65 人，理由是《邦联条例》中规定国会人数为 13 个州 × 每州 7 位代表 = 91 人，由于国会参议院将有 $13 \times 2 = 26$ 人，那么众议院将只有 56 人。反联邦党人认为：国会规模太小，并不能真正代表人民。联邦党人认为：国会需要比常人更优秀的精英，如果规模过大会存在多数人暴政（tyranny of majority）的危险；国会议员众多导致效率极低，内部矛盾重生；议员数量过多会使得国家财政支出困难，因为国家要为他们支付薪金以及旅行费用。

其次，议员薪水：必须由国家支付，否则，只有富人才有能力当选议员。

第三，年龄限制：众议院满 25 岁，参议院满 30 岁。看似不平等，其实是为了防止太子党执政。年纪轻轻就能崭露头角的一般都是出身良好的贵族子弟。

第四，众议院席位划分：根据每 10 年一次的人口普查而调整。但仍有不足，比如臭名昭著的五分之三条款（每个奴隶算作五分之三人计入众议院和参议院席位分配中）。

每周读图



1787 年《宪法》草案制定后，报商嗅得商机，刊登了宪法草案。图中的序文部分是加大字号的，可见报商也懂得序文那区区几行的重大意义。

和政见一起学耶鲁宪法课：第二周

从上周开始，政见 CNPolitics 与你一起学习耶鲁大学在 Coursera 平台上的网络课程《宪法》。上周，我们共同了解了为什么美国宪法是世界民主进程的一个转折点，研读了宪法序言中的关键问题，并初步认识了国会。

本周，我们继续探究国会，并从几个关键数字了解美国总统。

◎ 卢凯悦 / 笔记

第 1 课·《宪法》第一条：国会（一）

1、国会说话的地方

国会山不仅仅是投票的地方，更是一个演讲的地方。英国将立法机构称为 Parliament，来源于法语单词 parole（说话）。国会山是严格保障言论自由的场所，议员可以自由辩论，不会因谴责他人而遭到起诉。尽管美国公民也有言论自由权，但议员的言论自

由权涵盖更广。

2、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划分

在美国，中央与地方的权力界限实际是一个联邦制（federalism）的问题。

美国独立前，大英帝国与美国殖民地之间保持一种默契：中央政府（大英帝国）管理外交事务、帝国内跨地域交易以及帝国在世界其它地方的势力；而地方政府（殖民地）管理内部税收问题以及其它内部事务。这种平衡被之后的一系列关于税收的法案打破：《印花税法》、《食糖法》、《唐森德条例》、《强迫法案》等。

大英帝国说：如果我们有权处理帝国事务，那我们就有权处理一切事务，你不能给哥划定权力范围——要么就听全听，要么就全不听。美国殖民地说：那就不听。于是殖民地人民就制定了《邦联条例》，其中央机构“国会”只能行使有限条例中明确规定的权力，各州保留余下所有权力。

3、《宪法》是平衡点

英国国会太强、管太多，美国人民造反了。

《邦联条例》下的国会太弱、管太少，各州之间勾心斗角，美

国人民又快要造反了。

这时，《宪法》应运而生，维持了这个平衡。

4、无代表，不征税

《宪法》规定联邦政府有直接向人民征税的权利。

美国人民反对英国议会征税，是因为他们在英国议会里没有席位，“无代表，不征税”（N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是美国人民始终坚守的信念。

新的国会是由人民选举出来的，直接代表人民，因此有征税权力。

第2课·《宪法》第一条：国会（二）

1、国会的权力范围

《宪法》规定，国会拥有制定涉及外交或者跨州之间的事务，比如说建立国有银行。上周已说过，国家安全与民主是密切相关的，国有银行在当时的重要作用就是提供军队的支出，保障国家安全。

2、具体案例

麦科洛克诉马里兰州法案（McCulloch vs Maryland），该案起因是马里兰州向美国第二银行在该州的分行征收税款来试图阻止其运转。

当时的最高法院大法官约翰·马歇尔判决支持建立国有银行。尽管《宪法》中并未明文提及联邦政府建立国有银行的权力，但马歇尔法官运用国家安全的概念来判决此案。他认为，国有银行对提供军事物资、保障战争的经济基础起着重要作用，从而“保障北至圣克罗伊岛，南至墨西哥湾，东西连贯太平洋与大西洋的美利坚共和国的安全”。

值得一提的是，该案发生在 1819 年，彼时加利福尼亚州和俄勒冈州尚未成为美国的一部分。而马歇尔大法官已经将西部的土地归作合众国的一部分，开始他的“大陆梦”了，这也是后来门罗主义的体现*。

* 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发端于 1823 年，即欧洲列强不应再殖民美洲或涉足美洲国家之主权相关事务。而对于欧洲各国之间的争端，或各国与其美洲殖民地之间的战事，美国保持中立。相关战事若发生于美洲，美国将视为具敌意之行为。

第 3、4 课·《宪法》第二条：总统

1、不同的“总统”

“总统”一词出现在《邦联条例》和《宪法》中，但具有不同点：

《邦联条例》下的“总统”是国会的总统 / 领导人。由于国会有休会期，总统并不“总在统”——也即并不总是处于在职状态。

《宪法》中的总统是美利坚共和国的总统，共和国永远都正在运行中，总统一直处于在职状态。

2、从数字了解美国总统

本课围绕几个数字：1、4、0、35 来理解“总统”制度。

“1”：一个总统。国会和最高法院都有多人，但总统只有一位。国会和最高法院都会休会、休庭，但总统是“永不睡觉的人”。

在《宪法》前，各州把自己的领导人叫做“州长”，任期通常只有一年，而且没有对议会的否决权。在《宪法》后，各州宪法开始模仿联邦宪法中对总统权力的界定，赋予州长更大的权力。

“4”：总统每届四年任期。总统为什么任期四年？因为要在众

议院的 2 年任期与参议院的 6 年任期间寻得平衡点。《宪法》第一条中创立了一个强大的立法机构，因此必须在第二条中创立一个可与之抗衡的总统制度。

另外，在这里附上家喻户晓的一段佳话：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在任职两届后主动退任，成为后来历届总统的模范。（唯一例外是富兰克林·罗斯福连任了 4 届。国会随后通过了第二十二修正案来限制总统任期届数。）

“0”：对总统的财产与宗教都是零要求。这是民主的重要体现。

总统必须在出生当天是美国公民——不一定非得在美国呱呱坠地，比如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麦凯恩就出生在巴拿马，当年竞选总统的罗姆尼父亲出生在墨西哥，但是根据当时的法律他们都是美国公民。这项规定看似有反移民倾向，但如果我们考虑国父制定宪法时的身份，就可以理解他们的初衷——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就并非生在美国本土，詹姆士·威尔逊来自苏格兰……39 位签署宪法的国父中有 7 位、国会成员有十分之一都是出生在国外，他们实际上是十分赞成移民的。那为什么还有这项规定呢？因为国父们担心来自英国的贵族们会漂洋过海来美国当总统，再度控

制美国人民。

“35”：总统必须年满 35 岁。这是为了防止年轻的“太子党”执政。美国人对世袭制非常警惕。提醒美国国父们要设定总统年龄限制的是时任英国首相威廉·皮特的个人经历。皮特在 21 岁成为国会议员，24 岁当选首相——因为他有个强大的父亲，为他的政治前途铺好了道路。

乔治·华盛顿当选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膝下无子。实际上，华盛顿的就职演讲中本来有一段话，大意是“你们放心，没有华盛顿二世的存在，不存在太子党执政的风险”。不过这段话被负责演说稿的詹姆士·麦迪逊删掉了，因为这段话太个人化，万一像“只担任两届总统”一样被奉为传统就不恰当了。

华盛顿后第三位总统托马斯·杰斐逊（1800—1808）与第五位总统詹姆斯·门罗（1816—1824）都没有儿子。托马斯·杰斐逊和约翰·亚当斯竞选总统时，杰斐逊是庄园主，亚当斯是农民的儿子，然而舆论都说杰斐逊是民主党人，亚当斯是君主，为什么呢？因为亚当斯有一个儿子。

巧合的是，美国的最开始几任总统中也只有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1796—1800）有一个儿子，而又正是这个儿子约

翰·昆西·亚当斯（1824—1828）当上了第六位总统。当然，他当上总统时已经达到“年满 35 岁”的要求。

每周读图



参议院辩论：参议院內，议员亨利·克莱正在众人瞩目下自信地发表演说。美国两院严格保证言论自由，议员可以自由发表演讲。议院中的言论自由比美国人民所拥有的言论自由更为广泛。



华盛顿家庭照：这幅图中的五人是华盛顿总统、总统夫人玛莎、两位收养的继孙女、仆人。图片的背景是一轮升起的太阳（rising sun），象征着合众国的未来，但图中却没有儿子（rising son），体现了美国人民对世袭制的警醒。

和政见一起学耶鲁宪法课：第三周

本周政见 CNPolitics 继续与你一起学习耶鲁大学在 Coursera 平台上的网络课程《宪法》。上周，我们共同探究了国会，并从几个关键数字了解美国总统。本周，我们补充几点关于总统的信息，然后把目光转向司法机构。

◎ 卢凯悦 / 笔记

第 1 课

上周我们通过几个关键数字了解了美国总统，这节课上补充一些信息：

1、总统全年无休

在国会或州议院里，某个议员去世了，要等到下次选举才能填上空缺。但如果总统去世了或离职了，立马会有个副总统补上，

总统职位必须是 $7 \times 24 \times 365$ 工作制。

2、立法者不能同时是执法者

在英国，议员同时担任内阁成员。但在美国不可以如此，所以，希拉里·克林顿和约翰·克里都是必须先离开参议院，才能成为国务卿。

第 2 课

1、不增不减的工资

最高法院法官的工资只能增加不能减少，因为法官一般终身担任，通货膨胀使得加工资是必要的。总统的工资在任期内不能增不能减，因为四年的通货膨胀不会厉害到哪里去。

2、不得不拿的工资

总统必须拿工资。华盛顿一开始坚持不要工资，正如他在独立战争中不领薪金一样。不过，国父最终认为他必须拿工资，否则开创了“总统不拿工资”的先例后，以后只有富人才能当总统了。

(大家是否想起了孔子教训子路的故事?)

3、弹劾

参议院对总统的弹劾必须由大法官来主持。

为什么不由参议院领导来主持呢? 因为副总统是参议院领导, 由副总统去主持关于总统的弹劾是不合适的。

那么对副总统的弹劾由谁来主持呢? 《宪法》没有说。

第 3、4 课

1、司法机构的权力相对最弱

《宪法》第三条是关于司法系统的。为什么司法机构排在第三, 而且是三条条款中字数最少的呢? 因为在独立战争中, 总统、军人、和人民都是英雄, 但是法官是“狗熊”。独立战争时各州的法官都是由英国国王任命的, 是国王的亲信。所以国父们给予司法机构的权力相对最弱。

总统有权解聘他的内阁成员, 但是大法官无权打发比他低级的法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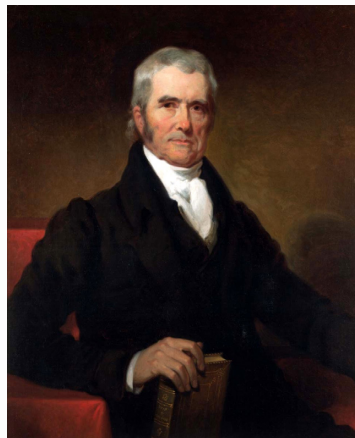
2、司法审查

马布里诉麦迪逊案开创了司法违宪审查的先河。1801年，当时的美国总统亚当斯在其任期的最后一天午夜，突击任命了42位治安法官，但其中16人的任命状未能及时送达；继任的总统杰弗逊将这16份委任状统统扔掉。其中，一位因此而没能当上法官的人叫做马伯里，由此提起了对麦迪逊的诉讼。

根据1789年《司法法》，最高法院对此具有初审管辖权，于是马伯里直接向当时并无实权的最高法院提起诉讼。在由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主笔的判决意见中，裁定马伯利应该获得获得委任状，但同时首次运用司法审查权，判定《司法法》因为违宪而无效。

但该判决更重要的一点是：他首次运用司法审查权，判定《司法法》因为违宪而无效，理由是：根据美国宪法第三章第二节第二款，最高法院对此案并不具有初审管辖权，而仅具有上诉管辖权。所以，该案件被撤销。虽然马布利未能得到委任状，但美国最高法院的一再避免与行政权正面冲突的基础上，树立了对宪法的解释权，即司法审查权。依此案为标志，司法权成为制衡行政权和立法权的第三种权利。

每周读图



John Marshall，马布里诉麦迪逊案的大法官。

安德鲁·杰克逊总统，图片上写着“安德鲁国王”。这是讽刺他使用的否决权以及他与最高法院的关系（他非常强势，他说过“最高法院下的判决，那就让最高法院执行去吧”，然后公然无视法院判决……）。当时的反对派人士自称“辉格党”，意在暗指安德鲁是君主，因为辉格党在英国是反对君主制的党派。

和政见一起学耶鲁宪法课：第四周

本周政见 CNPolitics 继续与你一起学习耶鲁大学在 Coursera 平台上的网络课程《宪法》。上周，我们共同探究了国会，并从几个关键数字了解美国总统。本周，我们补充几点关于总统的信息，然后把目光转向司法机构。

◎ 卢凯悦 / 笔记

第 1 课

1、宪法前三条——“并不分立”的三权分立

《宪法》是清晰有条理的文本，三权分立体现在前三条条款中。而之前的许多法律文件都可以说是“大杂烩”，十分繁琐细碎。

同时，《宪法》中的权力也可谓是相互交错。比如说否决权（*veto power*）在第一条款中被提及，因为否决权有关法律制定过

程。但同时否决权又是总统的权力，而总统权力是第二条款的主题，因此它也在第二条款中出现。

2、宪法第四条：州与州之间的关系

- ※ 水平联邦制（州与州）
- ※ 垂直联邦制（州与联邦政府）

3、第四条款的思想基础

独立革命之前的 1754 年阿尔巴尼会议，本杰明·富兰克林有一幅政治卡通漫画“Join or Die”（团结或者灭亡）。富兰克林提议，所有殖民地联合组织一个委员会共同处理州际事务，类似于如今的北约或欧盟。他还提议由英国国王任命一位委员会主席来主导该联盟的事务。

教授的比喻：原来的殖民地关系就如同一个车轮，从一个中心点辐射出的轮辐。富兰克林想为这个车轮增加一个轮辋，将原本老死不相往来的殖民地连接起来。

然而，殖民地并不愿意将权力交给某个所谓的中央委员会，英国也担心殖民地联合起来反叛。富兰克林的伟大设想失败了，但他的理念为后来的《宪法》第四条铺垫了思想基础。

4、为什么州际事务如此重要？

打个比方，美国人民应该有从某个州迁往另一个州的权利，这就涉及到了多个州的合作。但这又涉及到了其它问题——

5、斯科特诉桑福德案（Dred Scott Case）

黑人奴隶德雷德·斯科特随主人到过自由州伊利诺伊和自由准州威斯康星，并居住了两年，随后回到蓄奴州密苏里。主人死后，斯科特提起诉讼要求获得自由，理由是他到过自由州伊利诺伊和《密苏里妥协案》规定的排除奴隶制的准州地区。当时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坦尼判决：即便自由的黑人也不是《美国宪法》中所指的公民，所以斯科特无权在联邦法院提起诉讼。该案的判决严重损害了美国最高法院的威望，更成为南北战争的关键起因之一。

第 2 课

1、各州相互尊州人权

某人从 A 州去了 B 州，则：

- ※ 该人享有 B 州的所有公民权利 (civil rights), 如携带枪支正当防卫、言论自由等;
- ※ 该人不享有政治权利 (political rights), 如投票、竞选州议员等。

2、充分互信条款

A 在康涅狄格州起诉 B, B 败诉了并需要赔偿 A, 但 B 的所有财产都在纽约州, 则 A 有权要求纽约州尊重康州的法院裁决并且使用 B 在纽约州的财产作为补偿。也就是说, 纽约州应该给予康州的裁决以充分信任与尊重。

3、第四条款可以解释斯科特诉桑福德案中坦尼大法官的动机

他担心如果南方蓄奴州的奴隶北上到自由州, 若按照宪法第四条款, 奴隶将会与北方自由州公民共同享有携带枪支、言论自由等权利。

4、奴隶制不仅仅是单个问题, 而是一系列问题

- ※ 公民: 有色人种的自由人是否算作公民?
- ※ 众议院: 奴隶该如何被算入众议院的席位?

※ 选举人团：奴隶该如何被算入选举人团？

※ 逃奴问题：当奴隶从蓄奴州逃往自由州，其身份是否改变？

5、逃奴法案

如果逃奴从蓄奴州来到自由州，自由州必须尊重蓄奴州的法律，将逃奴遣返。

但是，解读逃奴条款有两种方式，挖的就是“被指控”（alleged）这个字眼。

一种方式更亲奴隶制：自由州不经过正当程序就可以遣返奴隶，尽管奴隶仅仅是“被指控”而还未被确认为逃奴。

一种方式更亲自由：自由州需要经过正当程序判定奴隶为逃奴才能遣返，如果判定为自由人，则无需遣返。

当时的最高法院选择了第一种方式来解读，同时制定了许多奇怪的不成文规定，比如说，如果一个法官判定有色人种为逃奴，会获得更多薪酬。因此，逃奴条款引起了北方自由州的强烈不满，也为美国内战埋下导火线。

再回到斯科特诉桑福德案，为什么奴隶斯科特在逃奴条款之下仍向最高法院提起诉讼呢？关键词在于条款中的“逃”（fugitive），

而斯科特并不是“逃”奴，是他的主人自愿带他到自由州的。

第 3、4 课

1、宪法第五条：如何启动修宪以及通过修正案？

启动修宪的两种方式：

(1) 国会两院必要人数（而非全体议员）的三分之二以上多数可以提出宪法修正的议案。

(2) 美国三分之二以上的州要求国会召开修宪会议时，国会必须召集全国性修宪会议。

宪法修正案在获得国会或者全国性修宪会议的通过后，通过修正案的两种方式：

(1) 获得四分之三以上的州的批准方能生效。

(2) 国会有权选择各州立法机关或者各州特别修宪会议来执行上述批准程序，同样需要四分之三以上的代表同意。

2、宪法第六条：宪法的权威性

联邦协约（federal treaties）是在宪法之下和州宪法之上的，

因为联邦协约关系到整个美国，超出了各州的独立管辖范围。当两个处于同一权威水平的联邦协约或联邦法令相互冲突时，应该以制定时间最近的协约或法令为准。但是，尽管宪法的制定时间非常久远，仍然有至高权威性，因为宪法是由人民批准的，具有更加民主的群众基础。

3、宪法第七条：规定了这部宪法本身得以生效的表决程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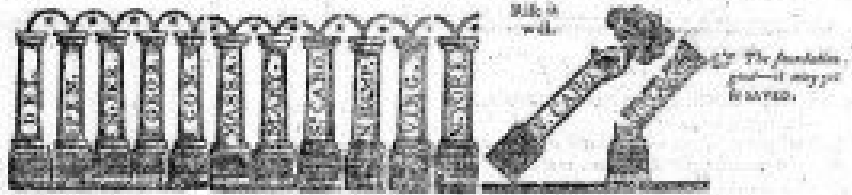
起初美国宪法作为邦联条例的修正形式，需要获得全部 13 个州的批准方能成立。然而宪法第七章只要求获得 9 个州以上的批准就可以使宪法生效。

每周读图



富兰克林的 Join or die 漫画

REDEUNT SATURNIA REGNA,
*On the erection of the Eleventh PILLAR of the great Na-
 tional DOME, we beg leave most fervently to salute " OUR DEAR COUNTRY."*



The FEDERAL EDIFICE.

ELEVEN STARS, in quick succession rise—
 ELEVEN COLUMNS strike our wand'ring eyes,
 Soon o'er the vaults, shall dwell the benignant DOME,
 COLUMBIA's head—and FREEDOM's hollow'd bosom.
 Here shall the ARTS in glorious splendour shine!
 And AGRICULTURE give her stores divine!
 COMMERCE shall'd, dispense us more than gold,
 And this new world, teach WISDOM to the old—
 RELIGION here shall fix her blissful throne,
 Array'd in wisdom, like the parent GOD!
 JUSTICE and LAW, shall watch PEACE restrain,
 And o'er " SATURNIAN AGE," restore again.

BOSTON, Saturday, August 2. | waves dashing a... | the wheels of the
 Since our left... the... | storage concealed. Some of the flags were well

The Eleventh Pillar: 1787—1788 年，原本的 13 个殖民地中的 11 个联合起来形成了一个更加完善的联盟。但是余下的罗德岛和北卡罗莱纳该何去何从？

和政见一起学耶鲁宪法课：第五周

本周政见 CNPolitics 继续与你一起学习耶鲁大学在 Coursera 平台上的网络课程《宪法》。上周，我们共同探究了州际关系、奴隶制与修宪。本周，我们将把目光转向宪法修正案。

© 卢凯悦 / 笔记

第 1 课·修正案

1、独特的修宪程序

许多州宪法的修正案是直接与原宪法文本合订在一起的，成为天衣无缝的“宪法 V2.0”或“宪法 V3.0”。

但美国宪法却不是这样运作的，因为美国宪法并不只是一代人、一群国父们的心血，而是跨代的、国父们与修正案制定者们

的共同思想结晶。

2. 修正案制定的 4 个高峰期

宪法最初请求人民批准时通过的前十条修正案——《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南北战争之后；20 世纪初；20 世纪中后期

3、早期的州宪法实验

美国的第一轮宪法改革发生在州的层面上，有些州大获成功，有些州以失败告终。比如说，1780 年麻省就向全体选民公开州宪法并举行投票，对 1788 年全民公投美国联邦宪法的方式起了引导作用。在第一轮州宪法改革中，许多州宪法都包含了权利法案、议会两院制、三权分立，宾州宪法为其议员支付薪水，宾州和纽约州宪法涉及人口普查以重分议院席位，这些早期的成功的州宪法实验都为后来联邦宪法的制定提供了思想来源。总的来说，联邦宪法在制定与批准时都是十分民主，举国公民都在讨论它，这也是《权利法案》得以制定的基础。

4、1803 年最重要的宪法性决定 (constitutional decision) 是什么？

是我们在第三周提到的麦迪逊诉马伯里案吗？（如果忘了，可

以回复“宪法课”复习)不是的。虽然此案中马歇尔大法官开创了司法审查的先河,司法审查在日后的重要性也越来越大,但在当时的环境下,最高法院极少运用此权力。

教授认为,答案应该是“路易斯安那购地案(Louisiana Purchase)”。该购地案有不好的地方,如印第安人受到巨大损失;昭昭天命(Manifest Destiny)和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但购地案也意义深远:一方面,合众国选择将新得的疆域按照以往制定的条件,纳入成为合众国的州,而不是将新疆域殖民化;另一方面,它沟通了大陆东西部,为超级大国的崛起奠定基础。

5、另一个重要的宪法性决定是废除奴隶制

第2课·《权利法案》

1、后来才流行的称呼——权利法案

用《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来形容前十条修正案并不是一开始就流行开来的。实际上,在第14条修正案后,宪制定者们才喜欢用“权利法案”代指这些修正案。权利法案在1789年在

国会提出，1791年批准通过。权利法案在合众国初期的意义远远没有现在重大。

2、权利法案的中心：联邦制（federalism）、地方主义（localism）、平民主义（populism）

在某种程度上，权利法案是反联邦党人对宪法原文本的批判。教授提醒大家注意时代背景：宪法最初制定时是在美国独立革命之后，大英帝国对美国殖民地的过强控制仍历历在目，因此反联邦党人十分忧虑，担心一份给予中央政府过大权力的宪法会使历史重演。因此，权利法案是对联邦政府权利的一系列制约。

最先提出权利法案的是国父詹姆士·麦迪逊，他的初衷不仅是限制联邦政府权利，也是限制州政府的权利。比方说，州也不能剥夺公民言论自由的权利。然而，在人权方面对州政府的限制法案一直到南北内战之后才提出（第14条修正案）。

3、三种主义的体现

地方主义：第一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建立教堂。而州却可以建立教堂，并且某些州确实这么做了。不仅如此，国会还不能拆散州所建立的教堂。第二修正案旨在州军队与联邦常驻军的势力

抗衡中保护前者。美国人民非常担心军权膨胀导致独裁，因此允许个人和地方具有自卫权利，因此这体现了地方主义。第十修正案规定除了明确赋予联邦政府的权力外，其他权力归属于各州。

联邦制：规定了国会在某些领域上只有明示权力（enumerated power），不得越界。

平民主义：根据第一修正案，人们有集会、请愿的权利，“人民”（the People）一词在前十条修正案中出现频率非常高。

4. 修正案快速浏览（1）

※ 第一条 保护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出版自由，以及集会的权利、抗议的权利和请愿的权利。这也体现了人民主权（popular sovereignty）：人民有权决定自己的事务，国会无权强制我们说什么、出版什么、信仰什么。教授提醒大家，第一条修正案虽然说联邦政府无权干扰个人事务，却没有说州政府不得侵犯个人权利。因此，在南北战争前的南方蓄奴州，州政府经常剥夺公民的言论自由等权利，将“公开批评奴隶制”设立为死刑罪。这直到第 14 条修正案才被补上。

※ 第二条 保护持有与携带武器的权利。体现了平民主义和地

方主义，保障了万一发生军事政变，州政府能扛起枪支进行反抗。

- ※ 第三条 禁止军队在和平时期的强迫驻扎。
- ※ 第四条 禁止不合理的收押。如今该法律被“证据排除法则”（Exclusionary Rule）所补充加强。
- ※ 第五条 征用条款（Takings Clause）。
- ※ 第六条 有关陪审审判以及犯罪案例。
- ※ 第七条 有关民事陪审团（可见，陪审团是权利法案的一大内容，而陪审团是由普通人民组成的）。
- ※ 第八条 禁止施予残酷且不寻常的惩罚。
- ※ 第九条 保护在宪法中未列举的权利。
- ※ 第十条 将宪法未授予美国联邦政府的权利保留给各州。

5、为什么国会愿意通过一条限制自身权利的法案？为什么联邦党人詹姆士·麦迪逊会提出一条反联邦党人性质的修正案？

原因在于：权利法案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联邦党人与反联邦党人的一种妥协。只有承诺了权利法案，才能获得足够多的支持来通过美国宪法。另外，麦迪逊也需要他选区的人民的投票才能

进入国会，他只有承诺提出并且一直支持权利法案，才能持续获得人民的支持。其他的议员候选人也懂得这一点。

教授提醒大家，在第四周中我们提到过启动修宪的两种途径：国会提出或者各州召开修宪会议（如果忘了，可以回复“宪法课”复习）。议员们深知，如果他们不主动提出一些合理的修正案，各州召开修宪会议可能会通过一些更为激进的修正案。国会难道愿意在这个过程中失去控制权吗？

另外，议员们并不是永远呆在国会里。他们会被接替，因此他们也是在限制他们的接替者的权利。

要注意的是，尽管第一条修正案通过了，但它在当时的执行力并不如现在强。可以从在该修正案通过后的十年内就产生了《客籍法和惩治叛乱法》（*Alien and Sedition Act*）体现出来。直到第14条修正案开始限制州政府的权利后，权利法案的重要性才逐渐扩大。

6. 修正案快速浏览（2）

- ※ 第十一条 限制联邦法院的权力。
- ※ 第十二条 修改总统选举的程序。

在原来的总统选举程序中，得到选举人团票数最多的候选人当选总统，票数第二的人当选副总统。1796年选举中，约翰·亚当斯当选总统，托马斯·杰斐逊（亲奴隶制）成为副总统。两人一开始还能勉强和谐相处，但是逐渐分歧越来越大，各自率领一个党派。在1800年选举中两人再次对峙，杰斐逊胜出。美国人民感觉到势头不妙，于是修改总统选举规则，总统与副总统“捆绑”在一起再进行投票。这个变动一方面提高了美国人民的选举积极性，避免了总统与副总统之间矛盾激化的局面，另一方面却也加速了美国党派的形成。

教授提醒的另一个注意点是，1796年与1800年的两次选举都是非常明显的南北州之间的对峙，而不是大小州之间的对峙。北方州投给了北方候选人亚当斯，南方州投给了南方候选人杰斐逊。谁是摇摆州？纽约州。纽约州彼时仍是蓄奴州，是南北州相会之处。纽约州第一次投给了亚当斯，第二次投给了杰斐逊。杰斐逊第二次能胜选，也有很大部分原因是南方州拥有更多选举人团票数（五分之三条款使得拥有众多奴隶的南方州在众议院拥有更多席位）。总的来说，选举人团是亲奴隶制的，尽管修宪者们试图改进选举人团制度，却没有改变五分之三条款。因此，美国人民彼

时拥有一个亲奴隶制的总统制，这在杰斐逊总统后的强烈支持奴隶制的杰克逊总统身上得到突出体现。

教授还提醒大家注意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现象：紧跟着亲奴隶制的第 12 条修正案之后，是反奴隶制的第 13 条修正案。第 12 条修正案的提出原本是想为杰斐逊带领的亲奴隶制的民主共和党（后改名为民主党）带来福利，最后却为一位反奴隶制度的共和党人——亚伯拉罕·林肯——带来了机遇。

第 3 课·新自由的诞生（之一）

三大主题：民主、国家安全、奴隶制

1、民主与国家安全的关系

独立战争的将军华盛顿深知，美国赢得独立战争有很大部分原因是法国在关键时刻的援助，但长期依赖法国也不是办法，因此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2、《邦联条例》与《宪法》再比较

在《邦联条例》里，(1) 中央与各州没有强制的税务关系，各州有违背协约不交税的激励。(2) 条例规定了大陆会议有与外国

签订协约的权力，但是各州有违背协约的激励。由于各州不遵守协议，外国最终也不会遵守协议。比如，独立战争后，英国本来答应撤走许多堡垒。但是许多州本身就没有遵守和平协定，所以英国也以此为理由，没有撤走。

《宪法》不仅有制定条约的权利，还有强制执行条约的权利。

(1) 宪法有强制征税权。(2) 有了固定税收，中央政府就可以建立并支付军队，进行外交。由于人民能被征税，因此必须被代表，必须有议会。有了议会，就需要有行政分支与司法分支来相互制衡。这是宪法框架的再现。

3、中央政府有了这么大权力，最不高兴的是各州

因此国父们决定向全体公民而非各州政府征集支持。

4、宪法原文本的一个失败之处是没有彻底废除奴隶制

它赋予国会废除奴隶制的权力，却没有要求国会必须废除奴隶制。

5、林肯的当选总统具有讽刺性

他只赢得了全国不到 40% 的选票。但是他揽下了几乎所有的

北方州，最终以稍微多数的选举人团票数险胜。

6、林肯是第一位公开反对奴隶制的总统

但是，林肯一开始并不支持立刻废除奴隶制。

过往的总统要么就是亲奴隶制的南方人，如安德鲁·杰克逊；或者同情南方的北方人，如来自宾州的詹姆斯·布坎南和来自新罕布什尔的富兰克林·皮尔斯。

林肯刚上任的纲领是什么呢？并不是立刻废除奴隶制（很多现代人对这一点存在误解）。他并不认为联邦政府有权利命令蓄奴州立刻废除奴隶制。实际上，“No New Slavery”（在新的领土上没有奴隶）才是他的口号。根据（荒谬的）斯科特案的判决，林肯以及他的政党的纲领是违宪的，因为新的领土有权采纳奴隶制。

但是，林肯的百年计划是，西部领土被纳入为合众国的州是必须是自由州，这样一来，自由州的数量就将大于蓄奴州了。林肯同时希望处在南北边界上的州能废除奴隶制，联邦政府给予资金作为补偿。

总而言之，林肯在制定计划时非常现实，他深知奴隶制的废除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第4课·新自由的诞生（之二）

1.（再次强调）林肯是第一位公开反对奴隶制的总统

乔治·华盛顿在临去世前给予他的奴隶以自由，但他当总统时，从来没有提出过废除奴隶制的有关议题。约翰·昆西亚当斯是反对奴隶制的，但他的搭档是副总统——来自南卡罗莱那州的亲奴隶制的约翰·C·卡尔霍恩。昆西亚当斯只有在卸任后才开始谈奴隶制问题，因为在任时他需要南方的投票数来完成许多工作。

2、林肯遇到的挑战与挑衅

对于林肯的当选，南方采取极端抵制的回应方式，对于林肯提出的所有议题都说“不”，有点类似与奥巴马总统第一任期时，共和党政客小艾迪森·米奇·麦康诺所采取的策略。因此，林肯的发挥空间非常有限。但是他可以任命反对奴隶制的人做西部的官员。

3、从预期的“百年”到实际的“5年”

在1860年林肯正式上任之前，南卡罗莱那州甚至单边声明退出联邦。在林肯正式上任后不久，南方人又在萨姆特堡挑起了争

端。南方人的冲动与暴躁（用教授的话来说，就是“because they were arrogant and drunk with power and evil”）引发了导火线，奴隶制在接下来的5年中就被废除了。倘若南方人拉长战线地抵制，奴隶制的废除也许真的像林肯预期的那样需要100年。南方人非常自大傲慢，禁止言论自由。然而，正如同历史上的许多暴君一样，禁止言论自由的后果往往是削弱自身力量。

4、第13条修正案是如何诞生的？

南方的几个州擅自脱离联邦，被迫开始战争。林肯最初的目的只是为了挽回各州，避免“房子分裂”。到了1862年，为了赢得士气，争取更多支持，尤其是反叛州的奴隶的支持，林肯发表了《解放奴隶宣言》（*The Emancipation Proclamation*）。这个决定有多重考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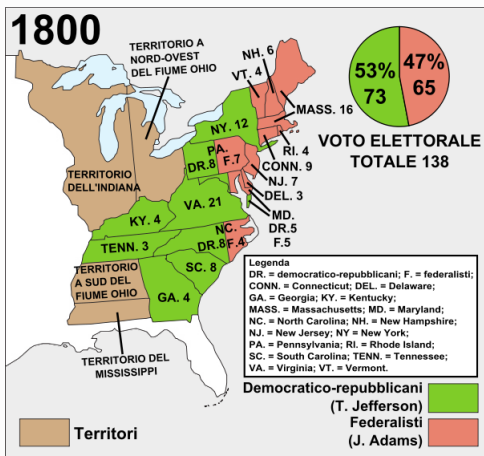
(1) 外交考虑。南方产棉花，英国的经济利益在南方。如果这仅仅是一个事关美国分裂的内战，英国一定会站在南方一边（别忘了美国是从英国脱离出去的）。所以林肯需要重新定义战争的意义，将之变为一个事关人类自由的（高尚的）战争。这样一来，英国人民的舆论是不允许英国政府支持南方的。

(2) 战事考虑。林肯想争取南方奴隶的支持，为军队增加人力，增大南北方军队的人数落差。林肯的英明决定为日后北方军在葛底斯堡战役、维克斯堡战役、亚特兰大战役中取得胜利奠定了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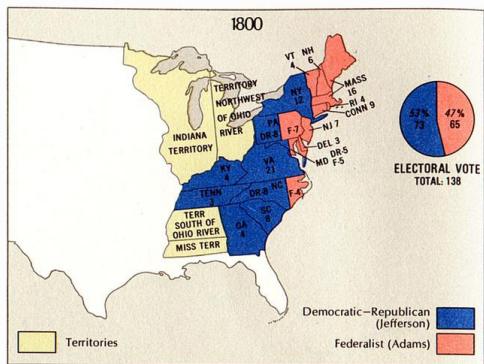
林肯在赢得第二次选举时，努力推动第 13 条修正案的通过，提出要给予联邦政府“立即在所有地区废除奴隶制”的权力。教授提醒大家，之前的《权利法案》是具有地方主义色彩的，是顺应人民对联邦政府过大权力的忧虑而诞生的。在第 13 条修正案中，却出现了“国会有权执行该法令”的字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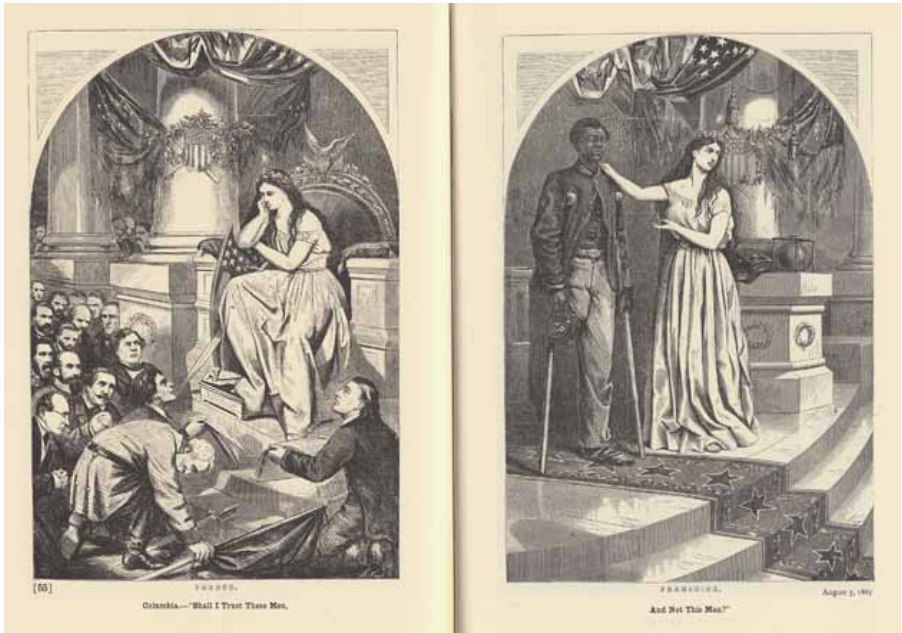
林肯以及他的政党很快就面临另一个问题。如果南方奴隶全部变成自由人，那他们将按照“五分之五”而不是“五分之三”记入众议院席位。南方会在人数上得到极大优势，假若被解放的奴隶没有投票权，国会重新被南方人占领。于是第 14 条修正案也被提上议程。下节课将具体讲解意义重大的第 14 条修正案。

每周读图



1796 年与 1800 年总统选举票数对比图：这两次选举的候选人都是约翰·亚当斯和托马斯杰斐逊。在第一次选举中，亚当斯以 71:68 胜出。第二次选举中，杰斐逊以 73:65 胜出。从两次图中可以清楚地看见南北投票的分界线。





Shall I Trust These Men (left) , And Not This Man (right) ?

美国被描绘成哥伦比亚女神（Lady Columbia）。难道（左图的）那些曾经拿起武器与她敌对的白人应该重获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而（右图的）保卫她的忠诚的黑人却应该被剥夺公民与政治权利吗？

专题

学术论争录

市场化改革让谁成为赢家（一）

西方社会学界对中国市场改革和社会转型的争论：1989—2003

市场改革如何影响社会不平等？在改革这盘大棋中，赢家和输家各是什么人？旧体制中的精英们都去哪儿了？针对这些问题，西方社会学界曾经洋洋洒洒地打了十余年口水仗。

◎ 张跃然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社会主义国家从计划经济中走出，经历了市场化改革的剧变。这一变革为众多社会学家带来福音：比起变得日益稳定、无聊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转型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无疑是更有趣的研究对象。

社会学家们最关心的，莫过于经济转轨背后的社会结构变迁：市场改革如何影响社会不平等？在

改革这盘大棋中，赢家和输家各是什么人？旧体制中的精英们都去哪儿了？针对这些问题，西方社会学界曾经洋洋洒洒地打了十余年口水仗。这一组政见专栏，以分阶段的章节形式，力争展现这场争论的精要。

一、普适理论的冲锋号

对于转型国家社会结构变迁的论争，滥觞于华裔社会学家倪志伟（Victor Nee）在1989年提出的市场转型理论。

在倪志伟看来，市场化改革使整个社会从一种特定状态变化到另一种特定状态。在改革前的计划经济体制中，资源和产品分配完全是由政治权力完成的，所以掌握政治权力的官僚阶层无疑是整个社会金字塔塔尖儿上的群体。

改革后的市场经济体制中，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自由贸易取代了政治权力，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要途径。因此，在市场化改革中获益最多的，是在旧体制中对自己所生产的产品毫无配置权的直接生产者，尤其是农民、工人以及在计划经济体制中根本不

存在的个体户、私营企业主。相应的，官僚手中的权力则变得越来越无足轻重，寻租空间也越来越小。这样一来，旧体制中的政治精英（也就是官僚）阶层会逐渐解体，他们大部分会被挤出社会上流阶层，取而代之的是市场竞争中的成功者。换句话说，旧体制和新体制中的精英阶层，几乎是两拨完全不同的人。

倪志伟在提出市场转型理论时，脑中所想的并非只有中国。在他看来，市场转型理论应该是一个“普遍真理”，适用于任何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社会。最让人激动的是，虽然这个普遍真理简单到只包括了一个自变量（市场化改革），但看起来牢牢抓住了宏大复杂的历史变迁底下的本质——用最简单的模型创造普适的巨大解释力，无疑是许多社会科学工作者梦寐以求的事。

在1989年那篇石破天惊的论文中，倪志伟用1985年在福建两个村儿收集的数据作为对市场转型理论的支持。要为看起来全知全能的市场转型理论提供支持，这样的实证证据未免有些单薄。在数据分析中，倪志伟发现，市场改革导致“真才实干”（以受教育程度衡量）的收入回报不断增高，而农村中的自谋职业者和个体户所获得的相对收入回报已经和掌握政治权力的干部不相上下。也就是说，至少在倪志伟所调研的农村场景中，市场化改革确实

大大提升了原先弱势群体的经济地位，减小了政治权力的相对重要性。

但 1985 年这两个村儿的数据中所包含的信息并不足以旗帜鲜明地支持市场转型理论。1991 年，倪志伟在另一篇论文中呈现了数据分析所获得的另外两个结论：农村干部或其家人涉足做买卖的概率显著高于一般人，这种“干部-个体户”杂交体比一般的个体户收入丰厚得多。

这种“杂交精英”的存在让倪志伟不得不对市场转型理论做了修正：政治当权者的没落是随着市场缓慢崛起的渐变过程。在改革初期，政治权力依然能获得丰厚的物质回报，这种物质回报在短期内甚至会被放大。但随着市场不断发育成熟，政治权力的弱化是如滔滔江水般不可阻挡的大势。也就是说，按照修正后的市场转型理论，从旧体制向新体制的转型过程，道路是曲折的，但终点是确定的，前途是光明的。

参考文献

- Nee, V. (1989). A Theory of Market Transition: From Redistribution to Markets in State Socialism.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4, 663–681.
- Nee, V. (1991). Social Inequalities in Reforming State Socialism: Between Redistribution and Market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6, 267–282.

市场化改革让谁成为赢家（二）

西方社会学界对中国市场改革和社会转型的争论：1989—2003

经济体制转轨释放的不仅有市场的力量，土生土长的社会制度（比如家庭、宗族、村治）和文化传统的力量同样被大大释放出来。因此，市场改革并非是从“政治权力决定一切”转变到“市场竞争决定一切”的简单过程。

◎ 张跃然

二、事情有那么简单吗？

市场转型理论的简单论断，很快就遭到了其他实证研究的质疑。戴慕珍（Jean Oi）和林南所做的民族志田野研究是其中的有力代表。民族志田野研究的优势在于，研究者用田野中活生生的、实打实存在的实证机制，破除理论建模的不接地气，也避免了定

量分析对现实过度剥离而得出的偏颇结论。

戴慕珍的研究发现，农村告别联产承包责任制带来的农业繁荣，进入乡镇企业林立的工业化阶段之后，基层政府在各种制度激励下，以经济发展、财政增收为首要的、甚至是唯一的行政职责，在刺激辖区经济增长方面无所不用其极。基层政府追逐物质利益的一面被大大强化，提供公共服务的责任被降至形同虚设的状态，导致基层政府“公司化”，形成“地方政府公司主义”。

在这个过程中，基层官员的权力没有丝毫的减弱趋势。官僚手中的权力，一方面来自于计划经济时代残留下来的行政手段配置资源的权力，另一方面，新的市场体制恰恰赋予官僚更加强有力的支配经济运行的手段。戴慕珍的研究表明，在农村迈向工业化的阶段中，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不但没有减弱官僚阶层的重要性，反而有所增强。

同样分析农村工业化，林南对大邱庄的田野研究发现，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决定经济如何发展和社会结构如何变迁的并非仅有政府和市场这两个因素。经济体制转轨释放的不仅有市场的力量，土生土长的社会制度（比如家庭、宗族、村治）和文化传统

的力量同样被大大释放出来。因此，市场改革并非是从“政治权力决定一切”转变到“市场竞争决定一切”的简单过程；市场改革的道路究竟往哪儿走，取决于社会制度。市场转型理论，把本该是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的“三角关系”，简化成了政府、市场之间的“两点一线”。

以上的实证证据都来自于农村，那么城市的情况又如何？边燕杰和 John Logan 通过对天津市民 1978—1993 年间收入数据的分析，发现随着经济改革深化，一方面，政府部门和国有经济部门的收入水平依然显著高于其他部门，另一方面，“真才实干”（还是以受教育程度衡量）所获得的收入回报也确实不断增加。这说明在当时，政治权力和“真才实干”都是社会不平等结构的重要决定因素。市场转型理论所预测的“政治权力的重要性被削弱、真才实干在市场竞争中胜出”的结果并不准确。这一发现虽然不能否定市场转型理论（倪志伟已经说了，政治当权者的没落是随着市场缓慢崛起的渐变过程），但至少说明，市场转型理论的预言想要变现还为时过早。

除去这些实证层面的挑战，在理论层面，市场转型理论受到

了 Rona-Tas 的猛烈攻击。他首先指出，市场转型理论在实证层面上，根本没有办法被证伪。如果有研究者发现政治精英的经济地位确实相对于其他社会群体在下降，那么市场转型理论就获得了支持证据；如果有研究者发现政治精英的经济特权依然坚挺，那么市场转型理论可以辩解道，这一类发现只能说明市场化改革还在进行时，所以政治权力的经济回报依然丰厚，等到市场化改革完全的那一天，这种经济回报自然消失。

在以上介绍的实证研究中，除了林南的研究触及到了市场转型理论的基本假设问题外，戴慕珍、边燕杰和 John Logan 的发现其实都可以通过以上方式被市场转型理论解释。也就是说，无论哪种实证发现，都不能证明市场转型理论是错的。一个不能被证伪的理论意义何在？

继而，Rona-Tas 提出了与市场转型理论针锋相对的权力兑现理论：市场扩张虽然弱化了政治权力直接配置资源的作用，但为政治权力提供了数不胜数的寻租机会（比如市场准入、政策优惠、行政执法），政治精英可以积极应变，将政治权力通过寻租经济回报，摇身一变，成为新的“政治-经济-社会”精英。也就是说，旧

体制中的精英在转型过程中被再生产了出来。

Rona-Tas 同时指出，在市场化改革的不同阶段，社会结构变迁的方向是不同的，但这种变迁趋势与市场转型理论所刻画的好相反。在改革早期，市场仍然不成气候，只是小规模地“侵蚀”计划经济，市场活动风险大而回报低。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在旧体制中身无长物、走投无路的社会群体才会被逼无奈涉足市场活动（比如成为个体户），以求得改善生计的一丝希望。随着他们在市场活动中获得物质回报，这时候人们可以观察到，社会不平等的差距被缩小了，政治权力的相对收入回报有所削弱。但随着市场改革越演越烈，各项市场制度不断完善，国家的政策支持越来越多，市场活动变得更加“安全”，风险小而回报大。这时候，之前在政府部门、国有部门持观望态度的政治精英便会纷纷踏入市场领域（比如自己或家人下海），凭借政治权力所带来的数不胜数的寻租机会，将手中的权力兑现为物质资本。按照这一理论，倪志伟在 1985 年那批数据中观察到的，不过是市场改革早期“侵蚀”阶段的特殊现象，而倪志伟却把它当成了社会转型的终极走向。

市场转型理论认为，随着市场化改革深化，政治精英的经济、

社会地位先提高，后下降；权力兑现理论却断言，随着市场化改革深化，政治精英的经济、社会地位先下降，后提高。

参考文献

- Bian, Y., & Logan, J. R. (1996). Market transition and the persistence of power: the changing stratification system in urban Chin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1(5), 739-758.
- Lin, N. (1995). Local market socialism: Local corporatism in action in rural China. *Theory and Society*, 24(3), 301-354.
- Oi, J. C. (1992). Fiscal Reform and the Economic Foundation of Local State Corporatism in China. *World Politics*, 45, 99-126.
- Rona-Tas, A. (1994). The first shall be last? Entrepreneurship and communist cadres in the transition from socialism.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0(1), 40-69.

市场化改革让谁成为赢家（三）

西方社会学界对中国市场改革和社会转型的争论：1989—2003

经济转型的过程是个政治过程，它不是由什么“看不见的手”自然而然推动的，而是各种政治精英形成的利益集团在特定的政治体制中不断政治斗争、讨价还价所决定的。

◎ 张跃然

三、基本假设站不住脚？

这场争论的高潮出现在1996年。抱着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心态，《美国社会学杂志》在1996年专门辟出一期，供各方学者讨论经济转型国家的政治精英命运和社会结构变迁。在这波论证高潮中，学者们的争论焦点已经彻底超越了“实证证据能否支持理论”的问题，转而聚焦市场转型理论的基本假设。

利用这一机会，倪志伟对质疑者们做了两点反击。

首先，倪志伟提出，市场转型理论并非不可证伪：中国各地

区间市场化程度不同，因此可以用跨地区比较的方式验证市场转型理论。如果研究发现，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方政治精英的相对收入回报越低，那么则验证了市场转型理论，反之则证伪。

其次，他指出，市场转型理论关注的并非政治精英收入回报的绝对值变化，而是各个社会群体之间经济地位的相对变化。在市场化进程中，政治精英的权力和经济收益在绝对数值上完全有可能上升，但只要其他阶层的权力和经济收益上升得更多，那么政治精英的经济地位相对于其他群体就是在下降的，这种情况与市场转型理论的刻画相符。他认为，之前的质疑者（如戴慕珍）错误地将关注重点完全放在政治精英身上，忽视了与其他社会群体的比较，其实是犯了“国家中心主义”的错误。根据这样的方法和思路，倪志伟用 1989-1990 年在中国农村收集的一批数据证明，越是市场化程度高的农村地区，干部的相对经济地位越低。

但是，根据同样的方法和思路，谢宇和韩怡梅（Emily Hannum）分析 1988 年一次全国抽样调查中城市部分的数据，最终得到的结论与倪志伟分析农村地区数据的结论完全相反：在城镇地区，政府、国有部门相对于其他部门的收入优势不受市场化程度影响，而受教育程度的经济回报甚至与各个地区的市场化程度负相关——也即，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方，有真才实干的人反而越不容易获

得高回报。

他们进而指出，导致这种奇怪现象的原因是：中国城市地区当时还没有形成真正的劳动力供应市场。二人并没有纠缠于“这一研究发现是否能驳倒市场转型理论”，而是直截了当地指出，市场转型理论的基本假设，完全可能是靠不住的——市场转型理论背后的假设是，各国的经济转轨，无论其具体制度环境、社会历史环境如何，都是沿着从绝对的计划经济向全面的自由市场这一条预设好的既定道路前进的。但谢、韩指出，经济转型过程不是从A到B的单一线性过程，没有明确的路径，而是有许多可能的方向，各国经济转型的结果可能完全不同。商品市场发达而劳动力市场缺失，有可能就是中国经济转轨的最终方向，而非中间形态。

谢宇和韩怡梅的观点获得了白威廉（William Parish）和麦宜生（Ethan Michelson）的支持。这两人将 Rona-Tas 的“权力兑现理论”发扬光大，更进一步地直接指出：经济转型的过程是个政治过程，它不是由什么“看不见的手”自然而然推动的，而是各种政治精英形成的利益集团在特定的政治体制中不断政治斗争、讨价还价所决定的。讨价还价的最终结果，可能是一个有利于政治精英阶层的市场结构，在这类市场结构中，经济利益的分配方式必然有利于政治精英（比如各类寻租机会使得官员可以将政治权

力兑现为经济资本)。这样一来，旧体制下的政治精英不仅可以适应市场的出现，还可以在市场发展中扩大自身的特权。

同样通过跨地区比较的方法，在分析 1988 年那批全国抽样调查中农村部分的数据后，两位得出的结论与倪志伟截然相反：在农村，无论一个地区的市场化程度如何，干部家庭的收入均显著高于其他家庭，其中的差距也不随着市场化程度增加而减小。更有甚者，干部家庭的成员更容易从事当地薪水最高的职业。两位总结道，经济转型的市场结构取决于该国的政治构造，而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下，市场结果明显有利于掌握政治权力的群体。

争论进行到这一地步，我们能更清楚地看到市场转型理论的两大基本假设：“各国经济转型是沿着一条道路、通往一个确定的终点（市场经济）吗？”——“是的”；“无论具体的制度环境如何，市场本身在用同样的方式影响社会结构吗？”——“是的”。在学者一浪高过一浪的质疑声中，这两大假设都开始显得站不住脚。

正因为此，Ivan Szelenyi、Eric Kostello、魏昂德（Andrew Walder）、David Stark 等学者开始明确主张，针对经济转型国家的讨论，不应该再围绕任何所谓的“普适性理论”展开，而应该着眼于转型在什么样的制度环境内进行。市场在发育过程中，会和包括国家和社会关系、政府政策、社会制度、经济增长速率、国际环境在内

的各种环境因素互动，这种互动决定了最终发育出什么样的市场结构、市场游戏中的赢家和输家是谁。脱离具体的制度分析泛泛而论市场的作用，无异于白费唾沫。

“制度分析”视角的言外之意是：再继续讨论市场转型理论是对是错，只能把人带到沟里去，这理论所想要解决的问题本身就是假问题。

参考文献

- Nee, V. (1996). The emergence of a market society: Changing mechanisms of stratification in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1, 908–949.
- Nee, V., & Matthews, R. (1996). Market transition and societal transformation in reforming state socialism.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1, 401–435.
- Parish, W. L., & Michelson, E. (1996). Politics and markets: Dual transforma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1, 1042–1059.
- Szelenyi, I., & Kostello, E. (1996). The market transition debate: Toward a synthesi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1(1), 1082–1096.
- Stark, D. (1996). Recombinant property in East European capitalism.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1, 993–1027.
- Walder, A. G. (1996). Markets and inequality in transitional economies: Toward testable theor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1, 1060–1073.
- Xie, Y., & Hannum, E. (1996). Regional variation in earnings inequality in reform-era urban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1, 950–992.

市场化改革让谁成为赢家（四）

西方社会学界对中国市场改革和社会转型的争论：1989—2003

在市场部门中，受教育带来的收入回报逐渐提高，这是因为市场刚刚发育之时，进入的劳动力通常是被逼无奈、甚至是被非市场部门赶出来的（比如下岗工人）。而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多在体制内有安稳位置的人嗅到了市场中潜在的巨大机会，自愿地离开体制，进入市场部门（下海）。

◎ 张跃然

四、制度比什么都重要（上）

在1996年那场盛况空前的论争过去三年后，倪志伟和曹洋试图将制度分析的元素纳入市场转型理论的框架之中。在修补后的理论框架中，制度环境是重要的，但制度环境只影响经济转型的过程，而不影响最终结果。在从“绝对的计划经济”到“自由的市

场经济”的渐变过程中，具体的制度环境会导致政治精英保有不同程度的经济特权。但他们依然坚信，随着市场成分扩张，政治权力的经济回报会不断减低，如大浪淘沙般，政治精英所占据的社会金字塔塔尖儿位置最终也会被新的市场精英取代。

简而言之，制度决定的是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中间状态”是什么样，而经济转型最终的结果则不受具体制度环境影响，依然是市场转型理论所预言的共同终点。

对于这种观点，周雪光尖刻地反驳道，制度分析视角和市场转型理论的分歧势如水火，根本撮合不到一块去。他总结道：市场转型理论所看到的是，政治和市场存在且仅存在“谁来配置资源”的竞争关系，经济转型被简化为从政府配置资源走向市场配置资源的过程。而制度分析则强调政治和市场之间的互动多种多样，政府和市场不仅能够相互竞争，还能够互相支配、互相利用、互相依附、互为因果、相互割裂，而恰恰是具体的制度环境，决定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究竟兑现哪一种可能性。

在实证方法层面，周雪光还否定了最初由倪志伟提出的通过跨地域比较来验证市场发育对社会结构影响的方法：各地区之间

的差异，并不仅仅取决于各地不同的“市场化程度”，还取决于各种不胜枚举的制度环境变量，在不控制这些变量的情况下，即使我们观察到各地区社会收入结构确实有差异，也不能指出这些差异是由哪些因素导致的。

在周雪光看来，考察经济转型对社会结构的影响，只能比较不同时间节点上同一地区的社会结构变迁，而不能比较同一时间节点上不同地区的社会结构变迁。通过对1993—1994年在全国20个城市收集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周雪光发现：随着时间推移，市场化改革深化，政治权力和国有部门的相对收入回报始终居高不下，但受教育程度的收入回报确实不断增加。

“受教育程度的收入回报不断增加”看似支持了市场转型理论的假设，但周雪光指出：谁说这一结果一定是由市场转型导致的？如果是政府、国有部门在选聘、晋升机制中越来越看重官员的受教育程度，那么也能导致受教育程度的收入回报不断增加。完全不同的自变量通过完全不同的因果机制都能导致相同的结果，想要摸清真正存在的因果机制是什么、到底是市场还是其他制度变量在起作用，唯一的手段就是扎实的制度分析。

吴晓刚和谢宇通过分析 1996 年一次全国抽样调查中的城市数据，为周雪光的观点提供了更为坚实的证据。吴、谢确实观察到，随着时间推移，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的收入回报在市场部门逐渐提高，而在非市场部门停滞不前。但更深入的分析表明，这一变化不是由市场本身的发育导致的，而是由于市场部门和非市场部门之间的劳动力流动机制变化导致的。市场部门在城市刚刚发育之时，进入市场部门的劳动力通常是被逼无奈、甚至是被非市场部门赶出来的（比如下岗工人）。对于这部分进入市场部门的劳动力而言，收入水平和受教育程度的收入回报都很低。而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多的在体制内有安稳位置的人士嗅到了市场中潜在的巨大机会，自愿地离开体制、进入市场部门（下海）。一方面。这部分人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另一方面，这部分人在市场部门的经济收入也高于他们在体制内的薪资（他们正是因为看到这点才选择离开体制的）。这两种机制混合在一起，呈现出“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的收入回报在市场部门逐渐提高”的表象，但其内在根源并非市场逐渐发育完善、变得越来越“公平”、重视“真才实干”，而

是因为在特殊的劳动力流动制度之下，进入市场部门的，其实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

参考文献

- Cao, Y., Nee, V. G., & Zhou, X. (2000). Comment: Controversies and evidence in the market transition debate. Author's repl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5(4), 1175–1195.
- Nee, V., & Cao, Y. (1999). Path dependent societal transformation: Stratification in hybrid mixed economies. *Theory and Society*, 28(6), 799–834.
- Wu, X., & Xie, Y. (2003). Does the market pay off? Earnings returns to education in urban Chin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8, 425–442.
- Zhou, X. (2000).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urban China: evidence from panel dat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5, 1135–1174.
- Zhou, X. (2000). Reply: Beyond the Debate and Toward Substantial Institutional Analysi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5, 1190–1195.

市场化改革让谁成为赢家（五）

西方社会学界对中国市场改革和社会转型的争论：1989—2003

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早期确实为旧体制下的弱势群体提供了发家致富的通道，从而打破了既有的阶级格局。但随着市场化改革以更大的规模展开，旧体制下的政治精英成了市场游戏的最大赢家。

◎ 张跃然

五、制度比什么都重要（下）

周雪光、谢宇等人的研究工作，支持了“制度分析”视角的有效性，也说明了普适性理论的无效性。不过，这些研究都以城市数据为基础，而中国农村的情况又如何？魏昂德通过分析1996年抽样调查中的农村数据，给出了答案。

通过对产业结构不同的农村地区进行比较，魏昂德发现，在

主要依靠农业的农村地区，买卖人、个体户相对于普通农民家庭，具有很大的收入优势；但在乡镇集体企业发达的农村地区，买卖人、个体户相对于在乡镇企业工作的普通家庭，不具有收入优势。也就是说，农村工业化的进程使得原先出现的“市场精英”又重新泯然众人了。然而，不管是哪种农村地区，政治权力的收入回报却十分稳定而丰厚。魏昂德总结道：经济转型过程中形成的利益分配格局是什么样，并不取决于市场本身的扩张，而取决于市场以什么具体形式、什么产业结构、什么劳动力配置方式扩张。

此后不久，魏昂德承接本文第三部分曾经介绍过的由白威廉、麦宜生提出的“经济转型过程也是政治过程”的视角，总结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和中国转型的经验，具体回答了“在什么样的政治制度环境当中，经济转型为旧体制中的政治精英提供了哪些兑现权力的机会”这一问题：

——如果经济转型发生在旧有的威权政体迅速崩溃时，旧有的政治精英往往失去政治权力，如果此时政策管制使得瓜分国有资产非常困难，那么这一精英阶层会迅速解体；但如果瓜分国有资产的政策限制很少，那么这部分人可以近水楼台，迅速掠夺国有资产，摇身一变成为市场精英。

——如果经济转型是在旧有的威权政体之下进行，旧有的政治精英依然把控政治权力，这些官僚们至少可以通过寻租途径扩大经济收益，此时如果将国有资产私有化的政策限制很少，那么官僚们还能通过掠夺国有资产产生财，大大强化自身的精英地位。

在研究范式上从“理论先行”向“制度分析”的转变，此时已经成为大多数学者的共识。这场持续十余年的争论，其意义远非争论出市场转型理论是对是错，而是从根本上否定了“脱离市场化改革发生的制度环境来谈论改革结果”的做法。

社会科学中最有意义的进步，往往发生在抛弃对于普遍真理的追求、转而强调社会系统的复杂与多样的时候。没有一种因果机制和一个理论模型，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真正值得挖掘的，是在具体的制度环境下，社会中的个体、群体和制度之间具体的互动机制是怎样的。若干“理论”的生产，是对各种不同的互动机制之间的共性的总结，而并非寄希望于发现某种普适性的机制。而后续的基于具体机制的实证研究，又会不断揭示和补充先前理论的不足，推动学术发展的车轮。

这段学术论争，也让我们更能看清中国的现实问题。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早期确实为旧体制下的弱势群体提供了发家致富的通

道，从而打破了既有的阶级格局。但随着市场化改革以更大的规模展开，旧体制下的政治精英成了市场游戏的最大赢家。

参考文献

- Walder, A. G. (2002). Markets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rural China: Political advantage in an expanding econom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31–253.
- Walder, A. G. (2003). Elite opportunity in transitional econom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8(6), 899–916.

政治

官员晋升机会与财政创收

揭开“写作组”的神秘面纱

胡温时代的改革缓解了居民收入不平等吗？

《现代汉语词典》折射的语言政治

民生能否换民意？

入党，为什么？

什么样的失职官员更容易受到处罚？

高绩效的政府容易获得市民信任

港府、北京、资本家：谁在治理香港？

腐败在中国更难被发现

哥大教授：中国的“法治-稳定”悖论

谁是当代中国的“县官”？

为了晋升而污染

“大政府”让干部子女经商更易成功

数据描摹中国网络政治的极化

官员晋升机会与财政创收

下级官员推动财政创收的动力先随着晋升机会的增大而加强，在晋升机会达到一定程度后便随着其继续增大而减弱，呈现“倒 U 型”趋势。

© 张跃然

从晋升激励的角度解释中国地方政府官员行为，已被广泛采用于研究中。那么，官员晋升激励能否解释地方政府的财政行为呢？德州农工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助理教授吕晓波与其合作者的一篇新近研究给出了肯定的答案。他们认为：地方官员推动财政创收的动力，随晋升机会的增大而出现先加强后减弱的“倒 U 型”趋势。

研究者在展开具体的实证分析之前，首先提供了一个简单的形式逻辑。如果上级政府将“财政收入”看作判断下级官员能力的重要标准，那么为了得到晋升，下级官员势必会拼命提升其辖区内的财政收入：财政收入越多，证明官员能力越强，因此更可能获得晋升。然而，当晋升机会非常大或非常小时，下级官员推动财政创收的动力都很弱。如果晋升机会本身很小，那么晋升机会的增大会使下级官员对自己的晋升抱更大希望，从而将更多精力放在财政创收上。如果晋升机会已经很大，那么晋升机会的进一步增大会使下级官员觉得自己进了保险箱，从而懒于继续证明自己的能力。因此，下级官员推动财政创收的动力先随着晋升机会的增大而加强，在晋升机会达到一定程度后便随着其继续增大而减弱，呈现“倒U型”趋势。

这一逻辑若要成立，必须满足两个前提条件。第一，财政收入确实是上级政府对下级官员进行晋升考察时的重要评判标准。第二，地方政府官员确实有影响税收多少的渠道。研究者首先指出，除去一些社会环境不稳定的少数民族地区，在地市级政府对县级官员的晋升考核中，财政收入一直是重要标准之一。其次，县级官

员虽然完全无法干涉国税系统，也不直接领导县级地税部门（它们由地市级地税部门领导），但仍然可以通过许多间接手段干涉本辖区税收缴纳情况。因此，研究者通过考察“县级官员通向地市级政府的晋升机会如何影响县级财政收入”来验证之前提出的逻辑。

如何测量县级官员的晋升机会？研究者认为，县级官员的晋升机会，可以用每个地市级行政单位下辖县级行政单位的多少来近似估计：由于地市级政府的领导岗位个数是固定的，县级行政单位越多，晋升竞争越激烈，晋升机会越小。

研究者利用 1999—2006 年《全国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中的数据，用每个地 / 市下辖县的数量测量县级官员晋升机会，用县本级税收加上向上级政府缴纳的税收来测量县级财政收入。在控制了辖区人口、辖区面积、农业人口占比、经济发展指标等变量后，研究者发现，地市级行政单位的平均县级财政收入，确实随着该地 / 市下辖县的数量增加而先增大后减小，与研究者提出的逻辑一致。通过变换县级财政收入的测量方法、增加控制变量、空间模型分析等方式，研究者说明了这一研究发现是稳健的。

这一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在于，无法说明“地 / 市下辖县的数

量”与“该地/市的平均县级财政收”之间的倒U型关系一定源自于“晋升竞争→晋升机会→财政创收动力”这一因果机制。社会科学研究中，经常存在着棘手的“多对一”难题：许多可能的因果机制，都可能导致同一个相关或因果关系。例如，本研究中所呈现的倒U型关系，不一定是以晋升激励为内在机制的。不同规模的地市级行政单位，可能在人均财政支出水平和结构上不同，从而导致其给下辖县级行政单位制定的税收指标不同；地市级政府和下辖县级政府围绕如何分配财政权责的协商过程，也可能受到地/市规模的影响，从而影响县一级的财政收入；不同规模的地市级行政单位，也可能有着不同的晋升考评方式，同样影响县级官员财政创收的动力大小。本研究无法排除这些替代性解释、说明晋升机会大小是唯一或主要存在的因果机制。此外，由于数据所限，本研究也未能涵盖对地方政府运作十分重要的大部分非税收入。

在之前的文献中，对中国地方政府的财政行为的解释，往往以政府自身的财政支出需要或官员的自肥需要为基本出发点。而这一研究使我们清楚地看到，各级政府间的组织与制度结构，也能深刻影响政府的财政行为。虽然本研究对政府间互动关系的理解

稍嫌机械，也未能在因果机制层面提供足够扎实的实证证据，但却拓展了政府财政研究的解释工具库，为今后更有洞见的研究打下了基础。

参考文献

- Lv, X., & Landry, P. F. (2012). Show Me the Money: Interjurisdiction Political Competition and Fiscal Extraction in China.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揭开“写作组”的神秘面纱

写作组组员经常需要投票决定文章具体用词，而具体内容仍然会被更高层的意见所修改。这也保证了官方文章可以精准地反映官方态度，而精明的官员往往善于从文章中寻找蛛丝马迹。

◎ 刘冬舒

中国共产党一直通过各类宣传工作来传播其理念并引导社会思潮走向，各大官方报刊发表的官方文章无疑是一大重点。来自台湾的学者蔡文轩和高鹏翔（音译）独辟蹊径，从文章作者的署名出发，揭示了宣传工作中的“写作组”制度，使外界得以从新的角度认识中共的宣传工作。

写作组制度起源与六十年代中苏论战期间，负责起草论战所需的大部分文章。目前人民日报有着最为完善的写作组制度，负责传播中宣部制定的思想和政策。作者根据对人民日报内部人员

的访谈，将人民日报的评论性文章分为三类。第一类为社论或评论员文章，一般由写作组集体或高级记者创作，涉及重要话题，直接表达中宣部和人民日报编辑部的立场，因此从不使用个人署名。第二类为针对特殊事件的评论文章，一般是基于中宣部的指导，由人民日报内部写作组创作并署集体笔名。第三类为读者评论，不反应官方立场，不在本文讨论之列。有时，人民日报会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一般这类文章由更高层创作，例如1977年胡耀邦组成创作组以“岳评”为笔名发表的文章。

这项研究进一步对人民日报常用的几个写作组及其笔名做了具体分析。“任仲平”，作为“人重评”的谐音，寓意“人民日报重要评论”。这个小组被认为是人民日报最重要的写作组。专门处理重要议题。例如1993年发表的支持邓小平南巡及改革政策的文章和2003年关于非典问题的文章，都出自这个写作组。此外，常见的写作组还包括：“何振华”——寓意“如何振兴中华”，主要负责反分裂主义的文章，例如针对“藏青会”的批判评论；“柯教平”——寓意科技教育评论，主要撰写科教方面的文章；“国纪平”——含义为国际评论，主要表达中国官方对国际问题的看法；以及“仲言”——意为“重视言论”，负责引导文艺创作工作。

除去人民日报，其他部门也会成立自己的写作组。例如中组部的“仲祖文”和“仲组轩”小组、政法委的“钟政轩”小组、中宣部理论局的“钟轩理”小组（主要在其主管的光明日报发表文章）以及中央委员会的“秋石”小组（主要在中央委员会主管的《求是》杂志发文，被认为代表该刊官方立场）。同时，少数政府部门也有自己的写作组，例如卫生部的“卫民康”小组。

作者还特别讨论了两个由高级领导人成立写作组以表达其立场的案例。第一个是著名的“皇甫平”小组，由邓小平成立。该小组的名字有双重寓意：“黄浦江评论”及“辅助邓小平”。这个写作组1991年发表了一系列支持改革政策的文章，为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另一个例子则是胡锦涛成立的名为“郑青原”的小组，含有“正本清源”之意。该小组发表了一批涉及中国政治改革的文章，作者认为传达了胡锦涛本人在这一领域的看法。

写作组通常由记者组成，任务相当繁重。一篇文章的发表往往要经历相当多轮、不同层级的修改和讨论，以确保文章正确传递和反应了官方意见。组员经常需要以投票的方式决定文章具体用词，然而具体内容仍然会被来自更高层的意见所修改。例如，

1991年江泽民就直接指示删除了人民日报社论中“在改革开放中，要问姓资姓社”一句。这也保证了官方文章可以精准的反应官方态度，因而精明的官员往往善于从文章中寻找蛛丝马迹。

这篇论文最后分析了写作组的笔名制度在当下存在的意义。首先，随着社会发展，越来越多的基层官员和人民对以党务部门名义发表的宣传文章持负面看法，写作组笔名的使用可以避免这类负面反应。更重要的是，笔名可以隐晦的体现文章作者所代表的政治派别，因而可以保证在不直接公开党内分歧的情况下，表达各自的不同观点，并使基层官员通过识别这套隐晦的“政治密码”洞悉内部争论和意见。

无疑，这篇论文通过对党内写作组及其笔名使用的研究，揭示了宣传工作不为人知的另一面。此外，本文通过对不同写作组笔名及其所扮演的不同利益派别“代言人”的分析，也为进一步分析党内决策机制提供了新的途径和思路。

本文已刊发于 2014 年 6 月 25 日出刊的《青年参考》

参考文献

- Tsai, W. H., & Kao, P. H. (2013). Secret codes of political propaganda: The unknown system of writing teams. *The China Quarterly*, 214, 394-410.

胡温时代的改革缓解了居民收入不平等吗？

上届政府采取了诸多措施以减少收入不平等，诸如改革个人所得税、废除农业税、西部大开发以及制定最低工资保障等。这些政策是否真正起到了效果？

◎ 袁幼林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以及沿海、内陆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愈发凸显。胡温时代采取了诸多措施以减少收入不平等，诸如改革个人所得税、废除农业税、西部大开发以及制定最低工资保障等。新任领导班子上台以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也继续成为重要议题。

自 90 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居民的收入不平等究竟有着怎样的变化趋势？胡温时代的政策是否促进了收入分配平等？北京师范

大学教授李实和西安大略大学教授 Sicular 做出了回答。

城乡收入比超过 3

两位研究者使用了国家统计局以及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的两组数据。两组数据存在各自的局限性：统计局的数据在家庭收入层面上忽视了房屋拥有者的估算租金（imputed rent），并且采用了较为简单的人均收入而非更为精确的等价尺度（equivalence scale）的计量方法；在样本收集层面上，2013 年之前以户口为基础的方法将大多数的农民工以及部分极贫者的收入排除在外。而收入分配研究院的数据只包含了部分省份，并且每次调查省份不尽相同。总体而言，研究院的数据估算出的不平等比统计局的更加严重，虽然两者的变化趋势大致相同。

根据统计局的数据，中国的基尼指数从 90 年代中期的 0.40 一路上涨到了 2008 年的接近 0.50，并在金融危机后回落到 0.47 左右。即便如此，中国仍位列世界最不平等的前 1/3 国家。两位作者认为，统计局的采样方法未能考虑到社会中的极富极贫人群以及部分居民的灰色收入，实际的基尼指数可能更高。

不平等的加剧并非意味着贫者愈贫。相反，按照 2002 年的

物价，从2002年到2007年，最贫穷的10%居民真实收入增长了46%，但是最富有的10%居民真实收入增长达到了94%。这样的变化带来了绝对贫困率的急剧下降：按照每天1.25美元购买力的标准，中国的贫困人口占比从2002年的19%下降到了2007年的8%。作者呼吁引入大多数西方国家使用的“相对贫困”概念，例如将贫困线划分在平均收入的30%。按照相对贫困的标准，中国的贫困率在2002年到2007年之间没有任何下降。

城乡收入差方面，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城乡收入比从90年代后期的小于3上升到2007—2009年间的大于3.3，并逐渐回落到3附近，但仍然超过了国际通行的极高城乡收入比的标准。研究院的数据由于考虑了房屋拥有者的估算租金，预估的城乡收入比更大。作者认为，城乡收入比的进一步拉大并不能完全由城乡居民劳动所得差解释，更主要的原因是城镇居民资产收入的增长，如分红、房租以及资本收益。

胡温时代的改革成效

作者接着分析了胡温时代几大收入分配改革政策的功效。

个人收入所得税方面，虽然个税制度采取了累进制，但是税

后的基尼指数在近十多年间只比税前低 2~3 个百分点。在 2011 年个税起征点提高到 3500 元 / 月后，只有少于 10% 的城镇居民需要缴纳个税，而超高收入群体的逃税现象层出不穷。

农业税的废除显著降低了农村的贫困率。2002 年，农村贫困线以下人口所缴纳的税赋占到了收入与贫困线之间差距的 1/4；而到 2007 年，这一数字仅为 1%。

最低工资政策在 2004 年正式由中央政府制定，但是作者认为此项政策对于不平等的减少收效甚微。主要原因有三：首先，许多雇佣农民工的产业并没有严格遵循最低工资政策；其次，最低工资和城镇居民平均工资比从 90 年代的接近 50% 一路下降到了 09 年的低于 25%；最后，最低工资的实施导致了失业率的上涨。

2000 年开始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使中央政府向西部地方政府财政拨款急剧增加。比如，中央财政拨款占西藏地方政府支出比从 2000 年的 61% 增加到了 2010 年的 92%。相应的，西部 12 省占全国 GDP 的比重从 2000 年的 17% 上涨到了 2010 年的 19%。但是，作者指出，东西部之间的收入差距仅仅占到了全国收入差距的 11~12%，而全国收入差距的绝大多数还是来源于东西部地区内部的收入差距。因此，西部大开发战略未必能缓解不平等。

此外，作者认为，户口制度的逐渐宽松化带来了农村进城务工人口的增加，并因此带来了贫困率和不平等的下降。在2002年到2007年间，进城务工人口的收入占农村居民收入的比重从11%上升到了18%。而2007年，无进城务工人口家庭比有进城务工人员家庭的贫困率低5.6%。作者因此认为应进一步加强农村城市人口流动，以给予农村人口更多的经济机会。

这篇论文利用严密的描述性统计，为我们认识再分配政策的效用提供了一些初步数据。但是因为并没有采用真正意义上的定量方法，无法得出稳健的因果关系结论。以最后一段为例，笔者认为仅仅通过比较有无进城务工人员家庭的贫困率得出结论忽视了反向因果关系（reverse causality）和忽略变量偏差（omitted variable bias）——若要更加清晰地衡量进城务工人员对于不平等和贫困率的作用，应采用诸如辅助变量（instrumental variable）的定量研究方法。

参考文献

- Li, S., & Sicular, T. (2014). The distribution of household income in China: Inequality, poverty and policies. *The China Quarterly*, 217, 1–41.

《现代汉语词典》折射的语言政治

新版《现代汉语词典》中依旧活跃的意识形态宣传因素可能并非来自国家控制，而是词典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为在市场竞争中塑造权威形象而主动呈现的结果，是一种吸引消费者的逐利表现。

◎ 曹起瞳

语言与政治密切相关。词典里收录哪些词、用怎样的例子，可以折射出时代的变迁。香港教育学院学者李肇祐通过比较 1959 年第一版和 2005 年第五版《现代汉语词典》（以下简称《现汉》）中的意识形态因素，揭示了改革开放后市场化导向下语言与政治的微妙关系。他提出了一种与众不同的理论：新版《现汉》中依旧活跃的意识形态宣传因素可能并非来自国家控制，而是词典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为在市场竞争中塑造权威形象而主动呈现的结果，

是一种吸引消费者的逐利表现。

词典可以分为两类：“描写派词典”旨在揭示语言运用的现实，当今英美的主流词典大多根据这一原则编写；与之相反，“规定派词典”旨在维护语言的“纯洁性”，防止其被“腐蚀”（即发生演变）。现代语言学并不承认语言具有“纯洁性”，正如作者在论文中指出的，语言正确性的标准通常反映了统治集团的权力。《现汉》就是这样的一本规定派词典。中共建政后长期重视语言文字工作。1956年，在周恩来的指示下，中国社科院设立了词典编辑室，负责《现汉》的编纂。

也正因此，通过比较不同版本的《现汉》，研究者可以洞察中国的语言政治发展——不同时期的政治关切如何影响了词典编纂过程。

论文作者在1959年第一版和2005年第五版《现汉》随机选择了70页中的2735个词条，统计了其定义和例证，并将其分为改革（包括“和谐社会”“按揭”等词和“辞退保姆”等例证）、革命（包括“按需分配”等词和“战胜邪崇”等例证）、科技、人文、宗教和其它等六类。分析发现，与第一版相比，第五版中改革类内容（词条、定义和例证数目）明显增加。

此处，作者还基于公开资料进行了定性讨论：例如，在时任国民党主席连战访问中国大陆后不久，虽然《现汉》第五版已完成排版，但编者最终仍加入了“愿景”和“体认”这两个出现在连战与中共方面联合公报中的词语。作者认为，这体现了“政治议题对《现汉》修订的决定性作用”。

不过，与第一版相比，第五版《现汉》中革命类内容的减少并不显著。一方面，作者指出，《现汉》第五版的收词量较第一版大幅增加，因而革命类内容的相对比例减少仍属明显。但另一方面，这也引发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国家早已不再提倡阶级斗争，但为何类似的词语仍保留在第五版《现汉》中呢？

作者驳斥了一个看似准确的解释——国家仍严控语言政策，持续在《现汉》的编纂中施加影响。实际上，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不断放松对出版业的限制（私人出版的词典数目急剧增加就是明证）；另一方面，在全球化、通讯技术进步和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今天，控制词典的编纂和修订代价高昂，不切实际。

相反，作者提出，《现汉》保持高度政治化，恰恰是基于市场考量。如今，词典市场百花齐放，商务印书馆需对《现汉》自负盈亏。由于中国的政治体制，《现汉》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保持高

度一致可以向公众体现其权威性。可能是鉴于同样的理由，商务印书馆不断强调其与中共的历史上的紧密联系。如此，在消费者的心理认知中，《现汉》获得了国家的认可，其内容的准确性自然有所保证，消费者因而愿意选择购买《现汉》而非其它同类词典。这种理论也解释了《现汉》编者为何时常公开词典编纂过程中似与官方价值取向有关的内幕消息（诸如“愿景”和“体认”等词语的收录过程）。

此项研究表明，政治与语言并不一定是传统的管辖和被主宰的关系；有时，市场化出版商也会刻意揣摩国家的意图，以获取经济优势。这一理论或许也可为市场转型时期其它领域的政治关系研究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 Lee, S. (2014). Defining correctness: The tale of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Dictionary. *Modern China*, 40(4), 426-450.

民生能否换民意？

政府颁布执行的民生政策，是否能推高民众对政府的支持度？美国德州农工大学政府学院助理教授吕晓波的研究表明，答案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 张跃然

政府颁布执行的民生政策，是否能推高民众对政府的支持度？美国德州农工大学政府学院助理教授吕晓波的研究表明，答案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他发现，中国在 2006—2008 年开始实行的免除学杂费政策带来了两大民意后果：一，推高了民众对政府进一步加大义务教育支出的期待；二，中央政府的支持度得到了显著提升，但地方政府的支持度并未受益于这项政策。通过数据分析，研究者进一

步推断，造成这种结果的，并非免除学杂费这一政策本身带来的物质好处，而是政府及官媒围绕这一政策进行的宣传。

政策提高了人们对政府责任的期待

从2006到2008年，中国先后免除了中西部地区、东部农村、东部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杂费，并通过中央政府转移支付的方式填补基层政府的财政损失。这一政策被认为是中国十六大提出“和谐社会”执政范式后重点关注民生领域的标杆政策之一。巧合的是，在2004年与2009年，也就是免除学杂费政策实行之前和之后，一个由海内外学者组成的研究团队在全国范围内各进行了一次抽样民意问卷调查（两次调查的受访者相同）。这两次调查数据，为研究者探寻免除学杂费政策的民意后果提供了实证基础。

在数据分析中，研究者假设，在该政策执行时间越早的地方，民众受这项政策的影响越深。因此，研究者将东部地区城市居民（2008年开始免除学杂费）作为对照组，将中西部地区居民（2006年开始免除学杂费）、东部地区农村居民（2007年开始免除学杂费）分别作为两个实验组。通过对比实验组和对照组，研究者希

望观察：在 2004、2009 两次调查中，受访者的态度变化幅度是否随他们受政策影响的深度（也即被政策影响的时间）而变化。这是一种基于实验组—对照组逻辑的“双重差分”方法。

通过这样的设计，研究者发现，免除学杂费政策推高了民众对政府进一步加大义务教育支出的期待。对比 2004、2009 两次调查，在回答“你认为为义务教育买单的责任在个人还是在政府”这一问题时，中西部地区受访者回答“政府为主”的比例增长幅度比东部城市受访者相应的增长幅度高出 32 个百分点，而东部农村受访者相应的增长幅度比东部城市受访者高 38 个百分点。

也就是说，受免除学杂费政策影响越深，人们越容易调高对政府教育支出责任的期待值。

为何发生变化？

那么，是什么因果机制导致了这个变化呢？研究者提出了两个可能的假设解释：一是“物质好处”效应，即那些直接受惠于免除学杂费政策的民众，更容易胃口变大，从而对政府期待更多；二是“意识动员”效应，即政府通过媒体宣传机器，将关于该政策的信息传达给社会，而人们在接受了相关信息之后，民意态度随

之发生改变，不管其自身是否受惠于这一政策。

为了检验这两个假设机制，研究者进行了数据分析。他发现，受访者的政策意识与对政府教育支出责任的期待高度正相关，而受访者是否受惠于该政策与对政府的期待值并无显著关系。

研究者由此认为，政府通过媒体工具围绕政策进行的“意识动员”才是推动民意变化的主要力量。

政策没能提高对地方政府的支持度

另一个引人关注的问题是，免除学杂费政策是否影响了民众对政府的支持度？

由于“你是否信任中央 / 地方政府”这一问题只在 2009 年的问卷中出现，所以研究者无法真正揭示该政策实行所带来的民意变化趋势，而只能是简单估测。通过分析，研究者发现，受访者“是否意识到该政策在本地区的实行”与其对中央政府的支持度显著正相关，而受访者“是否直接受惠于该政策”与其对中央政府的支持度无显著关系。

研究者据此推断，免除学杂费政策确实推高了民众对中央政府的支持，这一过程的内在机制依然是“意识动员”而非“物质好

处”。另一方面，无论是“意识动员”还是“物质好处”，都没能推高民众对地方政府的支持。

研究者解释到，这主要是由两个因素造成的：一方面，落实政策的具体责任由地方政府负担；另一方面，政府所控制的媒体工具，尤其是中央媒体，在宣传政策时主要强调中央政府的领导作用。这样一来，如果政策的效果好，人们认为是中央领导得好，如果政策的效果不好，民众会怪罪于地方政府。因此，民生政策对政府的民意支持的影响是不对称的，中央政府是这一过程中的主要受益者。

民生与民意的正反馈链条

这一研究为我们认识中国社会中民生政策和民意态度的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启示。许多学者曾经指出，中国政体的合法性主要建立在“绩效”之上，即民众对政体的认同，取决于政体能为民众带来多少现实好处。经济发展政策和民生 / 再分配政策，是政府为民众输送现实好处、为政体增加绩效合法性的两条主要渠道。然而，通过免除学杂费政策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这一系统中存在一条不稳定的“正反馈”链条：政府的民生政策会推高民众对政

府的期待，民众对政府要求得更多，政府为了安定民心，需要为民众输送更多现实好处，进一步推高民众对政府的期待……而一旦政府不能满足胃口日益增大的民众，则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

另外我们还能看出，即使民生政策在一定时间内增加了政体的合法性，不同层级政府在这一过程中的收益是不对称的：中央政府收获了大量民意支持，而地方政府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努力则被忽视了。这一不对称结构，可能会对央地关系产生负面作用，增加中国政府系统内部的不稳定性。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研究在第一组定量分析中采用的“双重差分”设计，存在一定漏洞。如果真如作者所说，以中央媒体为首的官媒围绕政策所进行的“意识动员”才是民生政策影响民意的主要渠道，那么“意识动员”的开展过程与免除学杂费政策本身的执行先后顺序并不必然重合。人们在媒体上读到、看到政策有关信息的时间，完全可能早于或晚于该政策在当地的执行时间；换言之，人们受该政策影响的程度完全可能与该政策真正执行的时间长短无关。这样一来，以政策开始执行的时间作为划分实验组与对照组的标准，其可靠性值得怀疑。这或许能解释，为什么虽然两个实验组的变化幅度均高于对照组，但中西部实验组（2006

年开始执行政策)的变化幅度却低于东部农村实验组(2007年开始执行政策)。另外,在分析该政策如何影响政府的民意支持时,研究者所采用的简单回归方法,也难以得出稳健的因果关系。

参考文献

- Lv, X. B. (2014). Social policy and regime stability: The effects of education reform in China.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入党，为什么？

对于年轻的大学毕业生来说，如果想进入党政机关、国有企业工作，并且希望有好的发展前景，党员身份或许是必备条件。但这在非国有企业并不成立——在非国有企业发展更好的是那些拥有较高学历的年轻人。

◎ 奚应红

中国城市居民选择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动机是什么？入党能否带来与预期目标一致的结果？共产党员身份对人们的政治信仰和行为又会产生哪些影响？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狄忠蒲（Bruce J. Dickson）发表在《中国季刊》2014年3月刊上的一篇文章试图回答这些问题。

通过对中国城市居民进行抽样调查，狄忠蒲教授发现，大部分人选择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首要原因是出于利益考虑。在他们看

来，加入共产党更有助于提升职业发展的前景。不同年龄群体的人想法略有差异，年轻人比年纪稍长的人更多表明自己入党的主要动机是自利，而不是出于政治意识形态的考虑。

这也反映出中共党员发展策略的变化——从原先强调“又红又专”、“三大革命阶级”（工人、农民和士兵）到后来侧重于具有不同技术背景的新型人才，尤其是所谓的城市“新阶层”，党在面对环境变化时也在积极做出自己的调整。

当然，为了保证党内的团结、党外的名声以及革命传统的延续，中共还是会加大对申请入党者审查的力度，并安排一系列政治学习的课程与考试，尽量排除那些纯粹为了物质利益而没有政治忠诚和信任的人。

此前，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曾公开表示，可以理解一部分人从个人利益出发申请入党，“但总体上来说，入党首先还是考虑怎么为国家、为人民、为社会办事”。

党员身份能否真正带来好的职业发展前景？研究者观察了党政机关、国有企业以及非国有企业等部门，在排除教育程度、年龄和性别等其他因素的干扰后，他发现：党员身份在帮助个人获取较高职务方面确实发挥着作用，但这种作用有大有小。具体来

说，在党政机关，党员身份是核心决定因素。在国有企业，党员身份的作用稍弱但仍很重要。而在非国有企业，党员身份并不一定与较高职务挂钩。

这或许说明：对于年轻的大学毕业生来说，如果想进入党政机关、国有企业工作，并且希望有好的发展前景，党员身份是一个必备条件。但这一情况在非国有企业并不成立。在非国有企业发展更好的是那些拥有较高学历的年轻人。

除了职业上带来的好处，党员还比非党员拥有更多的收入和更高的社会地位，对现在的生活也更加满意。但是在对未来的预期方面，是否拥有党员身份没有明显影响。无论是党员还是非党员，大家都普遍认为未来收入会继续增长，对未来充满信心。这或许也说明，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虽然分配上不公平，但覆盖面还是相对广泛的。

虽然越来越多的申请者不再把政治信仰和忠诚作为入党的第一考虑因素，但是中共还是特别强调这些因素。组织部门会经常动员党员参加各种政治性和公共性活动，以显示他们的忠诚，并为人民大众树立榜样。与非党员相比，党员更可能参加诸如投票、捐款、献血、义务劳动等活动。但是，参加这些活动是出于自身

的信仰和忠诚，还是由于组织的强制动员和隐性控制，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如果没有动员，中共党员是否会比其他人更加支持现状？针对这一问题，狄忠蒲教授对党员的政治信任和支持进行了分析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在面对中央和地方两个不同层级的政府机构时，人们有不同程度的信任和支持，对中央的支持高于地方。党员身份确实提高了人们对中央层级政府机构的信任和支持，但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和支持度却不突出。在针对地方政府的抗议中，我们也许会看到党员的身影，党员并不一定是现状的忠实拥护者。

这一分析还有另外一项有意思的发现：经济发展并不增加人们对政府机构的支持和信任。这与传统观点是相违背的——传统观点认为，中共的执政合法性是建立在经济发展基础之上的。这种现象可能的原因是，发达城市现在面临的更多是环境污染、交通拥挤和政治腐败等问题，民众的不满已经不再是单纯的经济展所能解决。

狄忠蒲教授的这篇文章是根据其在 2010 年秋天进行的面向中国大小城市居民的调查结果写成的。他总共选取了 3874 位受访者，包括常住居民和新兴城市移民，并对他们进行面对面的访

问。选择观察中国城市居民有很多原因，其中之一是中共现阶段的党员发展策略更侧重于城市地区。但我们都知道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尤其农村人口占很大比重，因此这项调查结果很难推广至全国范围

参考文献

- Dickson, B. J. (2013). Who Wants to Be a Communist? Career Incentives and Mobilized Loyalty in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1-27.

什么样的失职官员更容易受到处罚？

级别越高的官员，因为官民纠纷而受到惩罚的可能性相对越低，复出的可能性越大。为了逃避惩罚，一些官员把纠纷的扩大归结为少部份“别有用心”的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

◎ 杨鸣宇

如今，维稳已成官员绩效评估中的重要指标。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地方官员而言，如何回应群体性事件是一个颇为棘手的问题。一方面，他们必须尽可能平息民怨，甚至不惜使用武力来完成维护社会稳定的任务；而另一方面，假如他们所采取的手段不仅未能解决问题，反而进一步引发了更激烈的冲突，那么他们也很可能被认为失职，并受到上级的惩罚。

不过，根据经验观察，并不是所有“失职”官员都会受到惩罚，

那么是什么因素决定了谁受惩罚，谁又可以平安无事？

香港科技大学的蔡永顺教授和合作者认为，地方官员是否受到惩罚取决于两个因素：失职后果的严重程度；官员在该次事件中责任和角色。其中，后果的严重程度通过三个指标来衡量：事件的参与人数；造成的经济损失；是否被媒体曝光。而官员的责任则取决于纠纷是否直接由官员引发或者官员的响应手段是否恰当。

为了验证上述判断，他们搜集了486件发生于2000至2010年间的官民纠纷，并从其中选取了185件能够提供上述指标相关讯息的案例进行分析。

他们发现，官员受到惩罚的可能性和行政级别存在反向关系。也就是说，级别越高的官员，因为官民纠纷而受到惩罚的可能性相对越低。这背后的原因不难理解——首先，因为大多数官民纠纷都发生在基层，级别越低的官员自然越可能面对更多的社会矛盾，承受更多的失职可能。当然，假如纠纷能够在产生所谓的“严重后果”前得到解决的话，地方官员还是可能避免受罚。其次，从官员筛选和培养的角度而言，级别越高意味着花在培养该官员上的资源和时间越多，因此如非不得已，中央会选择尽量少惩罚级别高的官员，以免影响整个官僚阶层的稳定。而且，当纠纷超

出基层，惊动到上级政府并可能影响到政权的合法性时，“弃卒保车”就更是理性的选择。

更有意思的是，文章还简略探讨了地方官员“逃避”受罚的技巧和失职官员复出的问题。前者的典型手段包括截访，以及把纠纷的扩大归结为少部份“别有用心”的人在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而后者的分析结果则是级别越高的官员越可能随后复出，其原因就是上面提到的官员培养成本。另外，如果惩罚的决定是由级别相近的地方领导（比如说县级对镇一级进行处罚），而非更上级的政府官员作出的话，失职官员也可能有更多机会随后复出。作者认为这是一种地方“保护伞”的行为。

参考文献

- Cai, Y., & Zhu, L. (2013). Disciplining Local Officials in China: The Case of Conflict Management. *The China Journal*, 70, 98–119.

高绩效的政府容易获得市民信任

约有四成受访者表示需要通过关系或送礼才能在城市政府办成事情，另有超过四成受访者不满城市政府的办事效率。城市政府的执政绩效直接而显著地决定着人们的政治信任。

◎ 陶郁

政治信任是关乎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政治信任程度较高时，政府可以相对容易地安然度过经济危机；而严重下滑的政治信任，则可能威胁政权的存续。最近，美国田纳西大学政治学系教授钟杨发表论文，利用大样本实证研究数据，测量并分析了中国十大城市居民的政治信任程度。

钟杨发现，相对于城市政府而言，中央政府得到了更多受访者的信任。大多数受访者对于本地城市政府在多个领域的政策表

现感到满意，而不满则主要集中在腐败、低效和服务态度等几个方面。大部分受访群众都称自己比较幸福，也都对国家大事有所关心，但他们对西方政治制度的态度却不尽相同。更为重要的是，调查结果显示，对于当代中国大城市的居民而言，虽然抽象政治认知也对政治信任有所影响，但城市政府的执政绩效往往更直接而显著地决定着人们的政治信任。

钟杨所使用的数据来自 2012 年 5 月至 7 月间在北京、成都、广州、哈尔滨、昆明、上海、西宁、厦门、武汉和郑州等十座城市通过电话进行的随机抽样调查。在选取样本城市时，作者既考虑了它们的地理位置分布情况，也考虑了它们的经济发展水平。在每个样本城市中，调查员基于固定电话和手机号码，通过随机抽样的方式，采集了 700 人左右的数据，总调查样本数量超过 7000 人。经由此次大规模跨区域抽样调查获得的数据，有效消除了关于中国城市人口政治信任的信息盲区。

调查结果显示，在所有 7000 多名受访群众中，有近六成相信中央政府一直致力于为人民做好事，而只有不到半数受访者对本地城市政府给出了同样评价。不过，明确表达不信任城市政府的受访者，也只占总数不到二成，另有约三分之一的受访者态度模

糊。综合来看，即便受访者对城市政府的信任程度相对较低，中国城市居民的政治信任程度依然要高于其他不少国家和地区。

那么，应当如何理解中国城市居民相对较高的政治信任程度呢？既有的理论解释或是认为政治信任与执政者的具体绩效表现直接相关，或是强调抽象政治认知等因素对于政治信任的影响。钟杨对这两方面都进行了考察。

在调查中，受访者被邀请对城市政府在公共教育、医疗卫生、稳定房价、社会福利、环境保护、公共安全、基础设施、文化娱乐和公共交通等九个领域的政策表现进行评估；结果显示，城市政府在这些方面的绩效表现，基本上都得到了受访者的认可。使用以0分作为完全不满、以9分作为完全满意的量表，即便在稳定房价和医疗卫生等获认可程度最低的政策领域，城市政府收获的认可也超过了6分。就城市政府在信息公开方面的表现而言，约有四成至五成受访者表示满意，另有二成至三成受访者表示不满；而就城市政府在公共参与方面的表现而言，约有半数受访者表示满意，另有约两成受访者表示不满。

受访者对城市政府的不满，主要集中于腐败、低效和服务态度等方面。例如，约有四成受访者表示需要通过关系或送礼才能

在城市政府办成事情。另有超过四成受访者不满意城市政府的办事效率。对于城市政府工作人员服务态度表示满意或者不满的受访者，则各占总数的三分之一。

钟杨还测量了受访者对于一些抽象问题的态度和立场。例如，调查结果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表示西方政治制度不适合中国，但另有约四成受访者表示欣赏。又如，调查结果还显示，约六成受访者明确表示自己关心国家大事，这个比例要显著高于其他不少国家和地区。而在群众能否影响政府决策这个问题上，受访者之间则出现了显著的分化，各有约三分之一的人回答了“能够影响”、“无法影响”和“难以判断”。最后，就主观幸福感而言，约半数受访者称自己幸福或者比较幸福，四成受访者表示一般，只有不到一成受访者表示不幸福或者很不幸福。

那么，在中国的十个大城市中，人们的政治信任程度到底与具体政策绩效还是与抽象政治认知更相关呢？通过构建统计模型，郑杨发现，较之于抽象政治认知，具体政策绩效对于政治信任的影响要更为显著。具体来说，就受访者对于城市政府的信任而言，人们对于具体政策绩效判断的差异，可以解释政治信任差异的24%，而抽象政治认知的方面差异则只能解释8.7%；相应地，就

受访者对于中央政府的信任而言，人们对于具体政策绩效判断的差异，可以解释政治信任差异的 15.6%，而而抽象政治认知的方面差异则只能解释 10.5%。

可见，在当今中国大城市中，政策绩效对人们政治信任的影响更为显著和直接。执政者如果需要获取民众更高程度的支持，应该进一步提高政策绩效，并着力解决城市运行中可能存在的腐败和低效问题，并改进政府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

本文已刊发于 2014 年 5 月 21 日出刊的《青年参考》

参考文献

- Zhong, Y. (2014). Do Chinese People Trust Their Local Government, and Why? *Problems of Post-Communism*, 61(3), 31-44.

港府、北京、资本家：谁在治理香港？

香港企业家阶层在自身利益受损时，能够绕过特区政府直接求助于中央政府。这一制度不仅削弱了特区政府的自治权，而且造成香港政商关系逐渐恶化。

◎ 韩笑

最近，中港矛盾再次升温。“中港富人联手数钱，两地穷人频频对骂”一时成为坊间热议的话题。而香港政府在这一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低能无效和进退失据引来批评无数。与此同时，旨在争取落实2017年香港特首“真普选”诉求的“占领中环”运动不断蓄势。“占中”的联合发起人陈建民副教授认为，现今的政治制度已经无法治理这个越来越多元、开放又充满矛盾的香港社会。

香港教育学院助理教授方志恒（Brian C. H. Fong）在学术期

刊《中国季刊》发表文章，讨论了1997年香港回归后中央人民政府与香港企业家阶层合作治理香港的管治制度。其特点是，企业家阶层在自身利益受损时，能够绕过特区政府直接求助于中央政府。作者认为，这一制度不仅削弱了特区政府的自治权，而且造成香港政商关系逐渐恶化。

中央人民政府与香港企业家阶层的合作关系可以追溯到1982—1984年中英谈判时期。当时，北京就刻意拉拢香港企业家，意在使其成为未来特区政府的中坚力量，也希望扩展香港的政商管治联盟，这正是“港人治港”的题中应有之义。文章认为这种做法的原因有三，其一，中央人民政府希望通过维持香港投资者的信心并与华商资本家合作以维护香港资本主义体系的稳定。其二，北京也希望借助香港企业家的支持促进内地的经济改革。其三，中央人民政府将企业家阶层视为制衡香港民主派的重要盟友。双方形成合作关系的途径是中央人民政府将企业家阶层纳入统战联盟——他们被安排到负责主权交接的各种权力机构，如基本法起草委员会、香港事务顾问、香港特区筹备委员会等。

香港回归后，中央人民政府继续制度性地扶植香港工商界力量，使其巩固了与北京的直接联系。首先，在港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

中，工商界人士几乎占据半壁江山，包括了诸多香港富豪家族代表，如李泽钜、郑家纯、郭炳湘及冯国经等。每年的两会为香港企业家与中央政府直接沟通香港事务提供了机会。其次，香港中联办是日常统战工作的重要机构，企业家阶层正是统战工作的主要对象，两者关系日益密切。作者指出，每年的香港同胞庆祝国庆筹委会人员名单，囊括了几乎所有香港工商界重量级人物，如李嘉诚、李兆基、郑裕彤等。同时，2012年6月30日胡锦涛访问香港时，工商界的多位富豪均受邀会见。第三，在2003年CEPA（《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签署后，内地与香港经济不断融合，使香港企业家阶层有更多机会接触内地实权部门。

文章指出，中央政府和香港企业家阶层的合作管治关系，使香港企业家能够借助中央政府或中联办向特区政府施压，强势插手特区政府政策决定。企业家阶层游说中央政府改变港府施政决策已经在2000年的“八万五”房屋政策、2004年的“西九龙文娱艺术区”计划及2009年的延长董事持股禁售期等事件中显现。

尽管有评论认为，2012年的香港特首选举中，梁振英击败香港企业家阶层支持的唐英年当选特首，或许会为中央政府和香港企业家的合作管治关系画上句号。但是，作者认为，北京最后选

择梁振英是无奈的结果。在僭建风波爆发前，唐英年一直是中央政府属意的头号人选。但是为了平息争议，中央政府只好转而支持另一个建制派参选人梁振英。在选举结束后，中央政府也提出“大和解”呼吁建制派内部的团结，也意在继续与企业家阶层合作治理香港的管治制度。

最后，方志恒认为，这一合作管治制度已经深刻改变了香港的政商关系。在未来几年，2017年香港特首普选实施、亲北京政党内部的巩固以及内地资本所夹带的政治力量等因素，都将进一步影响中央政府与香港企业家阶层合作治理香港的制度。

参考文献

- Fong, B. C. H. (2014). The Partnership betwee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Hong Kong's Capitalist Class: Implications for HKSAR Governance, 1997–2012. *The China Quarterly*, 217, 195–220.

腐败在中国更难被发现

“维稳”被很多村镇当作不严格执行选举规定的理据，但其背后真正原因往往并不在此。地方官员可以轻易以“执行行政命令”作为其不严格遵守规定的借口，借此掩饰其腐败行为。

◎ 刘冬舒

十八大后，反腐败高潮迭起。在“大老虎”不断被揪出的同时，许多人也在思考：为何腐败在中国屡禁不止？许多相关研究试图从“中央缺乏决心”、“地方官僚抵制”、“制度设计缺陷”等角度回答上述问题。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庄梅林（Mayling Birney）博士则进一步提出：中国特有的以“行政命令”为主导的管制体系，增大了“发现和识别”腐败行为的难度。换句话说，腐败在中国盛行的原因，也许不仅在于制裁和监管手段不够得力，还可能源于腐

败在中国的管治体系下更具有隐蔽性。

什么是“行政命令主导”的管制体系？作者认为，有别于法治体系中官僚依据法律规定行政，中国的官僚更倾向于依据特定的行政命令以及其优先级顺序来制定自己的政策。例如，诸如发展经济这样高优先级的命令必须被履行，而保护环境或基层民主这样优先级较低的则可以被牺牲。因此，为了保障高优先级命令的落实，中国的官僚被赋予一定的自主权，可以不严格执行法律或低优先级命令。所以，为了实现经济发展，环保法规及指标可能并不会被严格执行。这些行为尽管有违法律，但由于其目的在于执行重要的行政命令，通常会被上级默许。

在这种行政体系下，腐败行为的标准将变得不再绝对。在法治体系中，违法施政往往意味着有腐败，但在中国治理体系中，不符合规定的行政措施，也许仅仅是履行某项重要“行政命令”的需要，而非以权谋私的腐败。故而，仅仅着眼于行为本身并不足以判断是否腐败，调查机关还需要进一步判断该行为背后的原因。

基于对河南和山东两省开展基层农村选举的实地调查，并结合《中国农村民主调查》的原始数据，作者认为：因为要清晰地判断某项违规行为背后的原因，反腐败调查面临着更高的要求，识

别和发现腐败行为的难度增加。这类信息通常难以获得，并难以明确甄别。例如，作者发现某村推迟村长选举的理由是“出于维稳的需要”，这一理由也获得了上级政府的认可。然而通过对村民的访谈发现，实际原因可能涉及村领导私自出售集体用地。

作者进一步指出，“维护社会稳定”被很多村镇当作不严格执行农村选举的理据，但其背后真正原因往往并不在此。地方官员可以轻易以“执行行政命令”作为其不严格遵守规定的借口，借此掩饰其腐败行为。在这种情况下，腐败行为无疑更为隐蔽和难以证实，因此从整体上遏制腐败的难度自然更大。

因此，作者建议，想要有效遏制腐败，除了加强制度建设外，还需要政府增加信息来源以评估下级政府的施政，并相对收窄下级政府选择性执行法律的自主权——前者包括通过媒体及大众等多角度收集信息，以期更好地判断下级政府行政的背后原因是否与腐败有关；后者则须着眼于明确判断腐败行为的标准，阻止官员以其他借口掩饰腐败行为。

基于其研究，作者最后提出了一个假设：行政命令主导的管治体系，可以引导腐败行为集中在（对政府来说）优先级低的领域。作者认为，在优先级低的领域，官员往往可以借口执行“优先

级更高的行政命令”而获得腐败的空间。而优先级高的领域往往伴随着不可妥协的行政命令，使得官员腐败的空间相对较小。作者认为，假如可获得进一步研究证实，我们或许可以推断：“行政命令主导”的治理模式在中国可以相对降低腐败的负面影响，因为腐败行为通常在相对不重要的领域发生。进而，这可以为“中国为什么可以在腐败严重的情况下仍然取得惊人的社会发展成果”这一问题提供一个可能的答案。

参考文献

- Birney, M. (2014). Decentralization and Veiled Corruption under China's "Rule of Mandates". *World development*, 53, 55-67.

哥大教授：中国的“法治-稳定”悖论

出于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地方政府会选择向司法机构施加压力，使判决结果倾向有益于可能的上访者，无论是否有法律依据。法律程序因此受到破坏，出现法律的民粹化倾向。

◎ 杨鸣宇

中国的市场改革除了带来经济发展外，对社会也至少造成了两方面的重要影响：第一，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利益出现分化；第二，法治改革。而这两点又是密切相关的，因为利益分化会带来纠纷的增加，这时候就需要规范的法律程序进行解决。

毫无疑问，伴随经济发展而迅速增加的社会矛盾已经是中国社会其中一个最严重的社会问题。那么，法治化是解决这些矛盾的良药吗？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的李本（Benjamin L. Liebman）教授

最近撰文形容中国陷入了一个所谓的“法治—稳定悖论”（Law-Stability Paradox）。

在李本看来，中国政府确实一直致力于法治改革，希望适应市场改革后的社会经济环境。但是法治化的进程在大约 2000 年开始出现了停滞。一个基本原因是：中国政府一直视法律为管治的工具，而不是约束自身行为的规则。

这样带来两个后果。首先，司法机构的权威受到了直接削弱。当它们面对一些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敏感案件时（例如土地纠纷、劳资纠纷），法院可能会选择不接受立案。即使法院作出了判决，它也欠缺足够的权力去执行判决结果。如果因为司法判决引发了所谓的“涉法上访”的话，法官即便遵守了法律程序也会被认为是失职。其次，出于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地方政府会选择向司法机构施加压力，使判决结果倾向有益于可能的上访者，无论是否有法律依据。法律程序因此受到破坏，出现法律的民粹化倾向。

李本进一步指出造成“法治—稳定悖论”的原因有四个。

第一，中国政府始终担心法治化会威胁到自己的权力，因此司法机构必须置于政府的监督之下，难以真正的独立。

第二，中国形成于革命时期的纠纷解决习惯有“民粹化”的传

统，这使中国政府在应对社会矛盾激增时倾向采取非法律的手段进行应对，比如说目前正在推行的“大调解”。

第三，“民粹化”同时和中国政府的合法性来源相关。因此中国政府对于基层的纠纷和怨气的产生尤其敏感。只要能平息这些不满，使用超越法律的手段就并不是非理性的行为。

第四，由于中国社会还处于急剧变化和发展的过程中，为了应对未知的突发情况，中国政府不希望自己受制于法律的约束，相反它需要使政体时刻保持一定程度的“弹性”。

总括而言，“法治—稳定悖论”的产生有着深刻的制度和现实原因。李本承认，中国法治化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因为它不可能脱离中国的市场转型的大背景。因此，中国只要一天没完成转型过程，这种法律和政体稳定之间的张力将会持续的存在。

本文已刊发于 2014 年 4 月 16 日出刊的《青年参考》

参考文献

- Liebman, B. L. (2014). Legal Reform: China's Law-Stability Paradox. *Daedalus: t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 Sciences*, 143(2), 96-109.

谁是当代中国的“县官”？

中国县级党政领导的平均年龄为 43.79 岁；95% 有本科或以上学历，但很多是在职学位；多数干部长年在同一地区工作，经历单一；有军旅经验的官员越来越少，在东部更是基本没有。

◎ 刘岩川

中国县级党政领导的平均年龄为 43.79 岁；95% 有本科或以上学历，但很多是在职学位；多数干部长年在同一地区工作，经历单一；有军旅经验的官员越来越少，在东部更是基本没有。

当许多针对中国政治的研究聚焦于北京或省级的政坛精英时，英国研究者塞金顿（Ian Seckington）另辟蹊径，将目光投向更接地气却没那么引人注目的县级党政干部。

塞金顿于 2006 年前后搜集了全国 268 位县级党委正副书记、

政府首脑的资料，其中包括五种行政单位的官员：县或内蒙古的旗、县级市、直辖市治下的区、地级市治下的区以及自治县。简历未在网上公开的官员不在考察范围内。需要注意的是，在直辖市内担任区党委正副书记或正副区长的官员，应该为厅局级。塞金顿将个别厅局级官员和县处级官员放在一起分析，未免有不严谨之处。

为了呈现县级党政干部的面貌，塞金顿从年龄、教育水平和任期等多个方面展开描述。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年龄便成为组织部门用人的重要考虑因素。邓小平曾将干部年轻化上升到战略层面。2006 年，中央文件正式提出县级政府领导的平均年龄应为 45 岁。塞金顿的研究发现，当时中国县级党政领导的平均年龄为 43.79 岁，已经低于中央的封顶。

2006 年的中央文件也提出，县级党政领导的学历应不低于本科，而此前的要求是大专或专科。统计表明，拥有本科或研究生学历的县级官员占考察人数的 95%。但更仔细的研究发现，多数人的学历来自参加工作以后的在职学习。塞金顿以官员简历上参加工作的时间为指引，发现多数官员在正常毕业年龄前就开始工作了。例如，62% 的官员是 20 岁或之前参加工作的，而 12% 的官

员在 17 岁或之前就开始了职业生涯。此外，拥有研究生学历的官员集中在东部地区。

或许是为了弥补基层官员在专业知识上的不足，县级官员有不少在职教育和培训的机会。官员们可以在各级党校、行政学院、社科院等机构进修。2005 年，中央还特地在上海浦东、延安以及井冈山设立干部学院。学习的科目多为政治与经济管理，但也包括法律等其他知识。此外，中国还为少数民族地区的干部设计了一套专门的培训机构。

在重视干部年龄和教育水平的同时，中央也希望通过延长官员任期避免其追求短期利益。2004 年，官员的任期由 3 年延长至 5 年，而且不能在同一职位连任超过两届。塞金顿的统计表明，多数县级官员在位的时间在 5 年以内。至少在当时，中央延长官员任期的举措尚未在县级体现出来。

在年龄、教育水平以及任期之外，塞金顿还通过其他角度衡量中国的县级干部：男性居绝大多数；多数干部长年在同一地区工作，经历单一；有军旅经验的官员越来越少，在东部更是基本没有，和建国初期干部多来自部队的情况大为不同。民族也是塞金顿考察的指标之一。在诸如贵州和湖南等少数民族聚集地区，少

数民族干部已经能在县级党政领导班子挑大梁。反观以新疆为代表的民族自治区，政府首脑依宪法都由少数民族担任，而权位更高的书记则往往由汉族出任。

塞金顿的考察已经过去数年，而改革的迫切性也让县级官员肩负了更多责任。在变革的时期，什么样的官员在治理中国的基层，不仅应该是组织部门重视的问题，也应该是大众关心的话题。

本文已刊发于2014年4月9日出刊的《青年参考》

参考文献

- Seckington, I. (2007). County Leadership in China: A Baseline Survey. *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5(2), 204-227.

为了晋升而污染

中国经济奇迹的背后，是对自然环境的巨大破坏。研究证实，当地方官员有很强的晋升激励时，他们就会有动力更多地投资高污染、高耗能的产业，从而拉动当地的经济增长，最终达到政治晋升的目的。

◎ 王绍达

中国经济奇迹的背后，是对自然环境的巨大破坏。《纽约时报》2007年的一篇报道称，按照欧盟的环境考核标准来计算，中国只有不足1%的城市居民可以呼吸到“安全”的空气。而水资源污染等许多其它环境问题也同样严重和棘手。

曾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环境污染是剧烈的经济结构调整所伴随的必然结果。但随后的跨国比较研究表明，中国的工业污染达到的是异常的高水平。那么，如果不是经济结构调整，究竟

又是什么因素导致了中国存在这样过高的工业污染呢？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经济学者贾瑞雪在她最新的工作论文中，基于地方官员的政治晋升激励，对此问题提出了一种新的解释。

她的基本逻辑是：由于高速的经济增长有助于官员的升迁，当地方官员有很强的晋升激励时，他们就会有动力更多地投资高污染、高耗能的产业，从而拉动当地的经济增长，最终达到政治晋升的目的。

基于这一逻辑，作者进一步构建了一个简单的政治经济学模型。其中，官员可以选择投资两种技术：“清洁技术”或“污染技术”；同时官员自身也可分为两种类型：“与常委有紧密联系”或“与常委无紧密联系”。根据以往的实证研究结果，作者给出了一个巧妙而关键性的假设：“与常委有紧密联系”与“经济增长”之间是“互补品”（即两种商品需要相互配合来发挥最优作用）的关系。也就是说，“与常委有紧密联系”的官员，若其它条件不变，每当创造同样的经济增长时，获得提拔的可能性会更大；因此“与常委有紧密联系”会使得投资污染技术变得更为合算（边际收益增加）。给定了上述的模型设定，作者得到了一系列符合直觉的推论，其中最核心的一个推论是：“与常委有紧密联系”会提升官员的污染水平。

在实证部分，作者综合了多个来源的数据资料，试图在因果推断的层面上严格检验上述推论。这样的检验在方法论的层面上是困难的，因为即便我们观测到“与常委有紧密联系”与“污染水平”之间存在相关关系，我们也不能断定前者就是后者的原因——“与常委有紧密联系”的官员可能被安排到更“容易”的地区任职，在这些地方不需要污染就可以轻松实现增长；或者“与常委有紧密联系”的官员由于未来更有可能升迁，可能会被上级特意安排在更“困难”的地方来考察其能力，在这些地方他们不得不多污染一些来维持基本的经济发展。

作者利用一个巧妙的自然实验来解决这些问题：她考察地方官员在其任期内“与常委联系紧密性”的变化情况，即关注“与常委有紧密联系”和“与常委无紧密联系”之间的相互转化。具体来说，在一个地方官员的任期内，若他的老同学、老同事进入了常委，则认为这个官员从“与常委无紧密联系”变成了“与常委有紧密联系”，反则反之。采用这个自然实验设计的好处在于，常委的人员变动是很难被地方官员所控制的，同时这样的变动发生在地方官员的任内（不会影响该官员在什么地区任职），于是我们可以有效地避免前述问题，并更清晰地观察到“政治关系”与“环境

污染”之间的因果关系。

具体的实证结果上，作者估计，“与常委有紧密联系”会导致“化学需氧量”（该指标越高代表水污染越严重）提高约 10%，会导致二氧化硫排放增加约 7%。类似地，模型的其它几个推论也都一一得到了实证结果的支持。作者随后又进行了一系列细致的稳健性检验，确保了结果的可信性。

综合来看，这篇文章构建了简洁有力的理论框架，并得出了详实可靠的实证结果，较好地解释了中国工业污染超标的原因，同时也是对“中国政治经济学”这一研究领域文献的一个很有价值的补充。

参考文献

- Jia, R. (2014). Pollution for promotion. Unpublished paper.

“大政府”让干部子女经商更易成功

在中国，“关系”可以创造财富。利用和政府官员的特殊关系从商牟利的例子比比皆是，干部子女从商能获得更大的收益也不是一个令人意外的论断。但是如何用数据提供证明？这样的关系中是否存在其他变量和机制？

◎ 王韬

两位学者——美国加州大学圣迭哥分校（UCSD）的贾瑞雪和长江商学院的兰小欢在去年的一篇论文中关注了这个问题。他们发现，虽然从整体上看，父母当官和子女从商的关系并不显著，但是相对而言，在有“大政府”的省份，官员子女更容易从商，并且获得更高的收入。

那么，什么样的政府是大政府？研究采用的标准是省政府开支占 GDP 的比重。考虑到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地方财政开

支是比财政收入更为合适的衡量数据。分析显示，经济水平和开放程度较低的省份，反而有更大的政府。

研究数据来自“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由中国人民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联合收集，根据行政区划进行多阶段分层抽样，包括除宁夏、青海和西藏之外的 29 个省级行政区。这一调查不仅包含受访者个人的职业和教育背景，还有其父母的教育和职业信息，这为该研究提供了操作的可能。文章采用了 2003、2005、2006、2008 四年的数据。

拥有企业或自主就业（self-employed）被认为是经商活动；在政府机关或事业单位工作，被定义为干部。在本调查中以受访者 18 岁为时间点进行考察，有 24% 的受访者父母是干部。作者在统计分析中排除了其他地域特征变量（比如经商环境和商业文化等）的影响，也排除了受访者的多项个人特征，比如教育、年龄、婚姻状况等的影响。

两位学者发现，在政府规模大的省份，干部子女经商概率更大。各省政府的规模和“官员子女与平民子女从商概率之差”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政府规模每上升 1%，干部子女从商的概率增加 0.7%。虽然从整体上看，父母是否是干部对子女是否从商

影响较小，但相对来讲，在政府规模越大的省份，干部子女比非干部子女更容易从商。

干部子女在“大政府”下从商是否更加有利可图？数据分析发现，政府规模大的省份，干部子女经商所获得的收入也更大。相比之下，政府大小对于不从商的官员子女收入则无显著影响。

那么，干部出身到底有什么好处？文章重点关注了两个方：一是更广泛的社会关系；而是直接获得更多的商业机会。

在受访的商人对自身成功因素的评估中，干部家庭出身的商人比平民出身商人更加强调社会关系的作用。本文指出了两个方面，首先是朋友圈子。研究采用春节期间非亲戚访客的数量来衡量掌握的社会关系资源。结果发现，官员子女的人际圈的确更广，朋友更多。第二个资源则来自婚姻。研究者发现，干部子女更有可能选择来自干部家庭的配偶。这种干部家庭的之间的联姻，被认为是另一个带来更多商业利益的来源。

“大政府”之所以让干部子女商人受益，还有其他因素的作用。此前已经有很多研究发现，“大政府”官僚化程度高，运行效率低，而有关关系资源的商人则能更轻易地应对这样的政府，调动所需资源。其次，大政府意味着更多的政府寻租和腐败机会。比如政府

采购，就是与政府关系密切的企业赚钱的好机会。

从更长的时间纬度来看，“什么样的人从商”其实是一个衡量中国社会激励结构的指标。论文中的另一项数据分析显示，在八十到九十年代之间，无论是干部子女还是平民子女选择从商的概率都不断上升；但自九十年代中期后，这一趋势明显变化，平民子女从商的比例开始下降，干部子女从商的比例则仍保持上升。2000年之后，干部子女从商的比例也一直高于平民子女。由此也不难推测，“关系”在今天并没有变得更不重要，真实的情况可能恰恰相反。

企业家的活动是市场经济充满活力的因素，也本应该成为那些出身条件不好的人改变命运的渠道。但是正如论文所发现的，在一个“关系”起主导作用的社会，企业家群体更有可能出身那些本已掌握优质资源的家庭，这对于中国的社会不平等状况无疑是雪上加霜。

在“政见”此前的一篇文章中^{*}，观察员张跃然探讨了社会科

^{*} 张跃然（2014年02月24日）。学术研究的意义：为什么仅仅依赖常识是不够的。 <http://cnpolitics.org/2014/02/research-and-common-sense>

学研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既然很多研究证明的不过是一个“常识”，研究还有什么意义？他认为，学术研究不仅以较为严格的方法证明“常识”，还明确了让常识成立的具体机制，让泛泛而谈变成明确而可信的论证。贾瑞雪和兰小欢的这篇研究，就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这样的目标。

参考文献

- Jia, R., & Lan, X. (2013). Red Capitalism: Cadre Parents and Entrepreneurial Children in China.

数据描摹中国网络政治的极化

利用四年间的“政治坐标系测试”数据，研究者发现，在中国互联网中稳定存在两类明显不同的个体：第一类人有着高度系统化的政治信仰系统，他们又分为自由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另一类人则在对各种社会政治议题的看法上缺乏自洽的逻辑。

◎ 赵蒙晰

中国思想界的左右之争随着社交媒体的出现日益草根化和白热化。然而，中国网民的政治态度和观点极化问题一直没有获得足够的关注，而审查的存在也导致数据获取受限，学者们往往很少去梳理各种混乱的价值标签，更遑论系统检测中国网民的政治光谱。美国西北大学博士生吴晓即将发表于《国际传播学刊》的研究，用扎实的经验数据和创新的研究方法弥补了这一领域的空白，描绘出中国网络意识形态的复杂与动态。

2007年，一套基于中国国情的“政治坐标系测试”* 在中国高校论坛和博客圈中开始流行。标准测试共50题，涉及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比一般的政治态度测试更能反映一个人一以贯之的价值体系。2008年到2011年，有几十万人次参与了调查。巧合的是，这段时间也是网民数量增长极快的时期，互联网普及率从16% 蹿升至34%。科学的测试方式，庞大的数据基础，关键的时间节点，这让研究者得以定量考察网民政治态度的分布和变迁。

研究者在2008到2011四年的测试数据中，每年随机抽取1000张答卷进行分析。与之前单独分析政治态度中某一具体方面的学者不同，本研究的重点在于考察人们的政治信仰系统（political belief system），即人们对不同问题所持态度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既可以是一致的，也可以是矛盾的。每个人态度的统一和对立会形成一张“观点之网”，而很多张网络的聚合则形成了人们的诠释性社群（interpretive communities）。

初步的数据分析结果显示，网民对问卷的回答可以归类为五个宏观层面的抽象价值观，分别是“文化自由主义（政治和文化上

* 中国政治坐标系测试（北大未名版）<http://www.zuobiao.me>

支持自由多元)”、“国家主义（维护本国政治领土军事力量)”、“政治保守主义（反对西式民主)”、“传统主义（尊崇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和“经济独立论（强调国家在经济领域的主权独立)”。作者同时设定了三个中观经济政策上的态度问题：“改革不满度（对改革时期收入分配不平等不满)”、“市场管制（国家干预市场价格)”和“农业补贴（国家高价收购农产品)”来进一步分析网民抽象和具体层面的观点一致性。

研究发现，在中国互联网中稳定存在两类明显不同的个体。第一类人有着高度系统化的政治信仰系统，根据公众舆论既有文献，这些人可被称作思想者（ideologues）。思想者的信仰体系发端于中国互联网内在割裂、二元对立的本土语境：一面是政治、文化上的自由多元主义，另一面是某种大国崛起的民族主义态度，包含具有扩张倾向的军事国家主义、对中国政治体制的包容、对传统文化的尊崇，以及对国家经济主权的强调。在这种交锋式的语境下，思想者内部自然发展出两派人马：对“大国崛起”不感冒的自由主义者，以及倡导“大国崛起”的民族主义者。

另一类人对各种社会政治议题的看法则似乎缺乏自洽的逻辑，他们给出的答案之间的相关性很弱或几乎为零。从分析结果来看，

他们没有任何共同的政治信仰系统，依据文献，作者用不可知者（agnostics）来形容他们。有趣的是，不管是思想者还是不可知者，在经济平等类议题上都缺乏系统认识，暗示了中国网民可能普遍缺乏对经济运作和政策的了解。

运用语义网分析方法，研究者进一步考察了网民的观点极化问题。如果两位作答者在 30 道问题中有 20 题以上答案类似，他们会被连接在一起。最终输出的网络图案和我们通常的认知一致：除了很多价值观点不一致的、处在意见模糊区域的不可知者，中国互联网上确实存在两个在许多层面互斥的价值共同体，也即上文所描述的自由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与上一节的发现相吻合，这两派人的观点在经济平等议题上的分野最不明显。

考察几年间的变化趋势，发现则更加有趣：对比四年的图案，自由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在两极的政治态度对立分布很稳定，而处在观点中间地带的不可知者的网络形态却差异较大。年份越靠后，中间地带的网络密度和集中度越低。具体来说，这个群体一方面表现出对于国家主义、政治保守主义、经济独立论和传统主义的反感，另一方面，则在文化自由主义方面出现越来越多的内部分歧。换言之，国家主义在整个互联网语境下的影响力正在衰

落，但同时，文化自由主义似乎也未能招募到更多的拥趸。

本研究不仅从分布上揭示了中国网络政治话语的现状，而且引入时间取向，绘制出这些政治话语在四年中的演变路径。此前，民族主义的研究往往定义不清晰，当民族主义被更细致地划分成军事层面的国家主义和政权支持度后，数据揭示：尽管很多网民支持中国强硬的外交手段和中国崛起的逻辑，但政权的支持度却在下降。

其次，自由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占据的两极阵营相对稳定，但不可知者的阵营却似乎在迅速萎缩，为今后的网络舆论增添了更多不确定性。

再者，正如数据已经呈现出的，中国网络的经济话语极其杂乱，网民的经济观点和其文化政治观点缺乏相关性，自由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虽然在“大国崛起”的方方面面都尖锐对立，在经济平等议题上却甚少存在争论。

最后，总体来看，虽然中国互联网的扩散是从年轻人向年长者，从高收入、高教育者向低收入、低文化水平人群转移，虽然政治极化的趋势普遍存在，但整个网络话语环境并没有走向娱乐和保守，而是进一步远离了国家倡导的意识形态。

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的时间跨度仅仅为四年，但揭示出的整体意见走向却非常明显。可见，不同于有着稳定政党政治和宗教认同的民主社会，互联网对中国社会思潮的改造和形塑作用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剧烈。虽然无法推导出因果关系，但本文为观察网络思潮的大趋势提供了纪录起点。在宏观背景上，互联网让人们逐步挣脱国家意识形态的束缚，在微观机制上，网络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既让现实更加自由多元，也让人们目睹了社会在各个领域的撕裂。

注：感谢论文作者吴晓对译介提出的修改意见。

参考文献

- Wu, A. X. (2013). Ideological polarization over a China-as-superpower mindset: An exploratory charting of belief systems among Chinese Internet users, 2008–2011.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http://ssrn.com/abstract=2408639>

外交

在非洲，中国是美国的老师？

中越南海问题博弈的安全困境

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有病

奉行现实主义的中国：进攻还是防御？

古巴 = 香格里拉？——中国网民的古巴印象

中国在非洲：跳出道德纷争，来点技术分析

“金砖国家”已是国际政治集团，而非经济集团

中国正在攫取非洲的耕地吗？

投资阿富汗艾娜克铜矿：看上去很美

移民欧洲：迅速增长的“第三波”

民意能影响中国的外交政策吗？

在非洲，中国是美国的老师？

中美两国对非政策的出发点有着明显差别。中国的注意力更多放在与非洲国家的经济合作，美国则更多试图在地区扮演“和平制造者”的角色。

◎ 归宿

上个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对非洲四国进行了访问，期间签署多个经贸大单，引起广泛关注。就在李总理抵达非洲前4天，美国国务卿克里也对埃塞俄比亚等非洲三国进行了访问。相较而言，克里的访问显得黯然失色，反响也较为有限。美国一些智库和政策研究人士关于美国对非政策也多有争论。近日，兰德公司研究员 Larry Hanauer 和 Lyle Morris 就联合撰文指出，在非洲，美国应向中国学习，多打“经济牌”。

文章认为，中美两国对非政策的出发点有着明显差别。中国的注意力更多放在与非洲国家的经济合作，以及由此带来的长期经济利益上。过去十年，中国对非贸易额年均增长 30%，已成为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而美国更多试图在地区扮演“和平制造者”的角色，关注点更多放在反恐、反海盗、解决地区国家冲突上。

因此，克里和李克强非洲之行的议题完全不同。克里在非洲之行中，着力推动地区的民主进程，与地区国家商讨合作打击活跃在东非的“基地”组织。同时，克里还试图居中调停，解决南苏丹、刚果东部和中非共和国的暴力冲突。而李克强的非洲之行则为非洲国家带去了 120 亿美元的援助，双方签订的合作项目超过 60 个。文章指出，尽管经常有人质疑，非洲一些国家的政治腐败和不透明，大大降低了中国经济援助非洲的效率，但如此大的经济投入，也反映了中国介入非洲经济发展的程度，和未来进一步与非洲加强经济合作的决心。

文章认为，相较于中国，美国政府在推动对非经贸合作的力度上就小了很多。根据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The U.S. Overseas Private Investment Corporation）的数据显示，1974 年以来，只有 63 亿美元被用来促进美国在非洲的投资。而美国贸易和发展署

1981年以来在促进对非贸易上仅投入了9000万美元——年均仅约300万美元。

投入和产出往往成正比。中非贸易额在2000年时还微不足道，但到了2012年已达1985亿美元，而同期美非贸易额只有1000亿美元，是中非贸易额的一半。渣打银行的数据进一步显示，到2015年，中非贸易额将达到2800亿美元。尽管国际社会对中非经贸合作多有批评，认为中国是在掠夺非洲资源。但实际上，即便美国曾通过旨在促进非洲商品出口的法令，但目前美非贸易仍然以石油、天然气等自然资源为主。以2011年为例，在当年美国从非洲进口的产品中，有4/5是各类自然资源。近两年奥巴马总统也推出了一系列计划，旨在推进美非经贸合作，但是目前为止仍然没有什么实质性进展，这也让外界怀疑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诚意。

文章指出，经济建设和安全建设对非洲同样重要。目前，中国在加大经贸投入的同时，也在扩大参与地区安全事务的力度，包括派出维和部队到非洲维和，参与打击索马里海盗的国际多边行动等。对美国来说，向中国学习，加大与非洲经贸联系，不仅有利于美国企业利益和非洲的经济发展，对于促进非洲地区安全和

稳定也大有帮助。

其实，对于中美两个大国而言，在非洲绝非“零和博弈”，相互学习和合作的领域有很多。上个月，中国工程人员在喀麦隆遭遇疑似“博科圣地”恐怖分子绑架，就充分暴露出中国当前在非洲安全投入和参与安全机制建设上的滞后。在这方面，中国还需要补很多课。因此，在美国向中国学习，加大与非洲经贸合作的同时，中国也应向美国学习，加大对非洲安全投入，更有针对性地参加非洲安全建设，这样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在非洲日益增长的投资和利益。

参考文献

- Larry, H., & Lyle, M. (2014). In Africa: U.S. promotes security, China does business. RAND Corporation. Retrieved from <http://www.rand.org/blog/2014/05/in-africa-us-promotes-security-china-does-business.html>

中越南海问题博弈的安全困境

越南和东盟国家越发担心中国试图建立一个由中国控制的东亚共同繁荣机制来控制南海问题。因此，越南和东盟试图通过引入美国的力量达成战略平衡。

◎ 刘冬舒

南海局势近年来持续紧张。其中，与越南的争议是整个南海问题中重要的一环。近期中越两国的接连交锋更突显了两国在这个问题上针锋相对的现实。佐治亚州格林耐特学院助理教授 Blazevic 对中越两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和角色做出了分析，并对如何促进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南海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地缘战略价值，使得它对中越两国的

生存都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通过对南海在航运，特别是能源运输中的重要作用的分析，作者指出：无论是中国还是越南，对南海主权的主张都更多是基于生存，而非为了最大化其力量。然而，两国目前对对方的意图都存在误判，以至于双方都认为对方的目的在于扩大绝对力量而非自我保护。这导致两国处于安全困境——双方都因为对方的举动而增加对南海地区的控制，因而导致和加剧双方都不愿意发生的地区冲突。

作者同时指出，两国事实上试图通过谈判和外交行动来降低风险和解决问题。然而，这种方式最大的问题在于无法辨别一个国家是不是说一套做一套——仅仅是声称和平对话但实质是在寻求力量最大化。而中越两国目前都对对方对话和谈判的诚意有所怀疑，互相指责对方的行动破坏谈判和对话的基础。同时，中国通过一系列立法，并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框架下加强对南海主权的声索，而越南则试图通过东盟机制并与美国建立密切的外交和防务关系来抵御中国。

中越两国就第三方介入南海问题有何看法？作者指出，中国一直坚持双边谈判解决南海争议，反对多边谈判和南海问题国际化。

这种立场阻止了联合国、美国甚至东盟在南海问题谈判上的参与，有利于中国作为相对国力较强的国家在谈判中取得优势。事实上，双方已经达成的一系列关于共同开发和北部湾专属经济区、大陆架及渔业合作的协议正是双边谈判的产物。而越南政府则越发认为，中国政府试图通过双边谈判来达成彻底控制南海的目的，对其国家和能源安全造成威胁。

另一方面，中国试图通过与东盟国家建立紧密的经济合作来改善关系，谋求在南海问题上的战略优势，这使得越南和东盟国家越发担心中国试图建立一个由中国控制的东亚共同繁荣机制来控制南海问题。因此，越南和东盟试图通过引入美国的力量达成战略平衡。美国自 2010 年开始频繁的介入南海问题，并与东盟和越南开展一系列合作。

作者最后对南海和平的发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再次提出，中越两国应该通过合作和协商建立规范性的机制来改善双边关系，解决问题。进一步的，作者认为第三方的介入对这个过程有正面意义——第三方的介入可以改善越南在双边谈判中的弱势地位，也可以促使中国更加依赖协调和谈判（而非武力威胁）解决

问题。作者认为，东盟和美国在这个过程中作用和角色不应被忽视，反而应该通过调停和斡旋，使双方开展约束性谈判（Coercive Bargaining），保护双方核心利益，开展一系列复杂而全面的风险评估，以实现南海地区的繁荣与稳定。

参考文献

- Blazevic, J. (2012). Navigating the security dilemma: China, Vietnam,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Journal of Current Southeast Asian Affairs*, 4, 79–108.

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有病

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看坏美国永远是正确的，把美国的威胁估计得严重一点、长远一点，“是政治避险的捷径”。但这样结果如何？十多年前中国专家们对阿富汗、伊拉克两场战争的预测和判断，就大多与事实相去甚远。

◎ 归宿

中国的国际问题和国际关系研究似乎是一项“全民运动”。不管是上电视和报纸的专家学者“名嘴”，还是出租车师傅，都可以对国际形势做一番评头论足。不过，一个国家的国际关系研究水平和其普及程度并不是一码事，姑且不说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无论是理论还是政策研究）在国际上尚难占据一席之地，一些“名嘴”、“大家”时不时的出位言论，更成为广大人民群众茶余饭后的谈资和笑料。

看起来，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有病，而且还不轻。那么，这病有哪些症状？病根在哪？最近，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牛新春在《现代国际关系》上发表文章，以十多年前中国国际问题专家对阿富汗、伊拉克两场战争的预测和判断为例，试图为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把把脉”。

预测的缺失

这篇文章选择了2001年—2004年国内学者涉及阿富汗战争与伊拉克战争的文章作为研究对象，其中以《现代国际关系》、《西亚非洲》作为学术刊物的代表，《世界知识》作为通俗刊物的代表。四年中，三家刊物发表的文章中，直接或间接涉及两场战争的文章为400篇左右，“基本代表了中国学术界的主流观点”，但这些文章中，对于形势的预测往往缺失，“大部分是关于解释、说明、评论类”的，预测仅仅是“只言片语”，而以预测为宗旨和目标的文章，更可以说是“绝无仅有”。

由于缺少对形势的预测，中国学者们的文章及观点只能跟着形势的发展变化而变化，甚至出现某种精神分裂，让人啼笑皆非。比如说，2001年10月7日阿富汗战争打响之前，学界普遍看衰美

国，认为美国既不能打垮阿富汗政权，更不能收到反恐效果。甚至有人说“美国通过军事行动来改变阿富汗政权结构，并非易事”。但当美国砍瓜切菜一般推翻塔利班政权后，学术界的判断“迅速逆转”，质疑美国能力的声音“烟消云散”，夸大美国军事、战略成就的声音明显增加。在对伊拉克战争以及两场战争反映出的大国关系格局变化等重大战略问题，以及阿富汗、伊拉克重建难度的战术性判断上，中国学者们也都出现了类似的问题。

文章认为，中国学者提出的观点，不论是战略性预测还是战术性预测，都缺少观点之间的碰撞和争鸣，即便有不同意见，也是“自说自话”，只是一味抛出自己的观点，并没有对逻辑、理论、事实的检验和质疑。

理论的贫乏

牛新春的文章指出，理论与实践的脱节，是这400多篇文章的通病，即便是有清晰的理论支撑，也几乎是清一色的现实主义理论，“进攻性现实主义与防御性现实主义交替出现”，“以不变应万变解释变化多端的世界形势”。比如在解释美国出兵阿富汗、伊拉克的战略意图时，学者们不约而同地使用了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

作者认为，中国学界对于现实主义理论的运行，并非是系统的、规范的，而是“无意识的”，或者“仅仅说是现实主义思维的朴素运用”。各学者只是简单运用“落后就要挨打”、“国强必霸”等观点，并没有仔细研究现实主义理论的前提、概念和逻辑。甚至，在这种“镜像思维”的影响下，中国学者也理所当然地认为美国的对外政策也是由现实主义主导的，“美对外战略死守冷战思维定势，借反恐追求地缘政治优势”等表述屡见不鲜，全然不顾自由主义和制度主义在美国对外政策制定中的优势地位——著名国际关系史学家约翰·加迪斯就曾说过，“在外交事务中，大部分美国人是自由主义者，在关于国家之间和平、合作和理解的问题上，大部分自由主义者又是乐观主义者。”

逻辑的混乱

文章认为，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对于两场战争的逻辑推理中，逻辑混乱的情况普遍出现，简单、率性、随意应用辩证逻辑等不足表现得也比较充分。比如，对主要矛盾、矛盾主要方面的认识缺乏标准；强调过度全面、辩证的研究视角，缺乏对细节、具体路径的实证研究，结论基本靠猜；名词性、概念性缺失，概念的

内涵、外延不明确，使研究过程、结论都具有模糊性；对每一个问题都是从全面的视角和矛盾的正反两个方面进行分析，直接导致了结论的“骑墙”等等。

文章指出，由于中国学界普遍对于缺乏对于相关概念的有效界定，也缺少对于细节的深入追踪，导致得出的结论要么是想象的而非通过实证得出，要么就是似是而非打“擦边球”导致难以证伪，失去了进一步讨论和探讨的意义。

文章犀利地批评道，由于中国当前的国际关系研究理论都是从西方成批引进的，都建立在形式逻辑之上，造成理论和逻辑思维的脱节，是当前中国国际关系研究“非驴非马”的状态的重要原因。

方法的困惑

作者发现，在其选取的所有研究文章中，只有一篇采用博弈论方法，其余的都是历史分析方法。文章指出，历史分析方法是一种优秀的研究方法论，但是过度依赖甚至粗暴地使用历史分析，往往是给预设结论寻找历史根据，而不是沿着历史轨迹寻求发展变化的态势。主要原因在于，历史分析方法认为每个事件都具有独特性，必须对其历史背景、原因、过程、影响进行具体分析，才

能弄清其实质，揭示其发展趋势。因此，历史分析方法关注具体事件和细节。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建立在形式逻辑之上的西方实证主义，体现在对于理论和简洁的重视上。

文章指出，近 30 年来，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在向西方学习的时候，将传统的历史分析方法与西方实证主义方面粗暴对接，将二者的缺点集于一体，形成了非中非西的研究方法。中国学者一方面放弃了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中对于理论假设的实证研究，另一方面又抛弃了对于历史的全景式复原，借用现实主义理论的“简洁性”，抓住一两个现实主义关注的因素进行历史分析，然后得出线性结论。

比如，在分析美国出兵阿富汗、伊拉克的战略图谋时，有学者就做出这样的推理：“根据美国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一贯作法以及美国目前对阿军事行动的某些作法，美国对中亚显然有着长期的地缘战略考虑。打垮塔利班后，美国有可能在阿富汗扶植一个亲美、亲西方的政权。”这个推理和结论，就没有详尽分析历史背景，仅仅按照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惯用逻辑，分析这些事件中权力政治的影响，然后就得出了结论。

更为荒唐的是，中国学者们还特别喜欢机械的运用比较-历

史分析方法，把历史事件信手拿来，简单类比。比如当论证美国在伊拉克战争势如破竹时，对比的案例是第一次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当美国陷入泥潭时，选择的案例则是越南战争。

病根在学风

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种种症状，病根在于学风。但由于包括国际关系研究在内的社会科学研究在中国有很多“难言之隐”，文章中所讨论的学风只是涉及研究的专业性和客观性，并突出表现为缺少国别领域的专家和受政治因素影响太多两大问题。

关于缺少国别研究专家的问题，文章指出，扎实的国别、领域研究是国际问题研究的基础，没有国别、领域研究，战略研究就是空中楼阁。但是在中国国际关系研究领域，情况却正好相反。作者选择的400多篇文章中，绝大多数都是战略研究，国别研究少之又少。“战略家”们掌握了话语权，真正为数不多的做国别研究的学者就更被边缘化。久而久之，在当前急功近利的学术科研体制和快节奏的信息时代大背景下，真正做静下心来做国别研究的学者几乎销声匿迹。

政治因素对于学术研究的干扰也是一个大问题。作者指出，

每一个国家都有政治正确的问题，只不过有的国家更严重些罢了。在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学界，一个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看坏美国永远是正确的，把美国的威胁估计的严重一点、长远一点，在政治上肯定是不会犯错误的，“这是政治避险的捷径”。同样，唱衰美国在政治上也永远是正确的，讲“西降东升”总是没问题的。但是，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呢？著名外交史专家章百家就曾指出，从我国的经验看，我们对于外来威胁的估计是过高的。

作者在文章最后说，这些“症状”反应出的，是当前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依然重视出思想、出观点、出点子，靠的是诸葛亮、笔杆子。国际关系作为一门学科要专业化、科学化，必须依靠理论、方法，必须积累大量的案例研究，研究具体实在的问题。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十年前存在的这些问题，今天依然存在，甚至还有恶化的趋势。想要“扭转乾坤”，还要学界和学者们都付出巨大的努力。否则，十年后的研究者再回头看今天的学术研究，难免得出类似结论。

参考文献

- 牛新春（2014）. 集体性失明：反思中国学界对伊战、阿战的预测。现代国际关系, 4.

奉行现实主义的中国：进攻还是防御？

中国的战略意图是：“把霸权（美国）排除在外，压制日本和印度，在东南亚避免遭遇制衡。”

◎ 宿亮

2013年11月，美国著名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访问清华大学，与学者阎学通辩论中国能否和平崛起。“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代表人物米尔斯海默一脸微笑，但其关于中国会在亚洲确立霸权、把美国逐出亚洲的理论保持一贯的尖锐。

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丛林法则”适用于今天的中国么？美国中国问题专家柯庆生1996年就在《外交事务》杂志撰文称：“中国

将是冷战后世界中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卫道者。”

台湾辅仁大学助理教授林一凡在一篇名为《中国外交政策中两种现实主义的故事》的学术文章中，对当代中国在国际政治中所奉行的现实主义进行分析，得出中国的战略意图是：“把霸权（美国）排除在外，压制日本和印度，在东南亚避免遭遇制衡。”

冷战后，国际关系理论界重要的发展是结构现实主义中“防御性现实主义”和“进攻性现实主义”两种存在针对性的理论流派发展。前者以兰德尔·施韦勒、法里德·扎卡利亚为代表；后者以约翰·米尔斯海默为代表。

无论“进攻性”还是“防守性”，两种流派都坚持经典现实主义以国家为中心，以及国际无政府状态的基本预设。换句话说，没有超国家行为体能确保国际安全，“任何国家任何时间都可能使用武力，所有国家都必须时刻准备，要么以暴制暴，要么为脆弱付出代价”。

具体做法上，防御性现实主义认为，安全困境不会让国家时时拔剑相向，因为这种困境可能会得以“解决”。一国可以通过技术、地缘、政治联合等防御性手段增加进攻性行为的复杂性，从

而克服安全困境。

进攻性现实主义则认为，均势“铁律”依旧重要。在安全困境中，单一国家不可能知道对方的意图，与生俱来地追求进攻性军事能力。在一个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世界中，只有最大化占有权力才能确保安全，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各国开始进行军备竞赛。在没有全球化霸权的时代，各国都在追求本地区的霸权。

林一凡通过现实主义这两种流派对中国进行分析。用防御性现实主义的视角，不必太担心“中国威胁论”，因为军事技术发展、美国及其盟友的关系动能保证东亚地区形成均势平衡，不会一边倒。而在进攻型现实主义的视角中，中国在东亚地区均势中，会利用一切机会扩展力量、增加在东亚的影响力，挑战东亚地区现状。

就中美关系而言，林一凡认为，美国是中国成为地区霸权的最大障碍。中国近年来的军事现代化很清晰的意图是对抗美国干涉东亚地区事务，同时避免东亚其他国家形成针对中国的联合。为了达到这种目标，中国还在利用各种机会施展软实力，增加在东亚地区的影响。

就中国与地区强国的关系，林一凡认为，中国更倾向于单极化东亚。由于日本始终没有肃清军国主义余孽，中国反对日本军事正常化。对于印度，中国强调印度是南亚国家，不希望印度过多介入东南亚事务，不承认印度是合法拥核国家，同时在国际问题中支持巴基斯坦。

在林一凡看来，中国对美国、日本和印度显示了进攻性现实主义的特点，而对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则显示了防御性现实主义的特点。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后，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向着积极方向转变。中国是第一个与东盟签订友好与合作条约的大国。不少中国学者也指出，中国对待东南亚国家，政策较为温和，原因是如果中国采用进攻性战略，可能导致这些邻国形成敌对中国的联盟，并与美国等远距离的强权国家关系越来越近。

不过，但就国力而言，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差别越来越明显，这也就决定了未来在中国与东南亚关系中，握有话语权的是中国。特别是在南海问题上，中国并不急于签订具有约束力的条款，但同时强调中国无可争议的主权。

林一凡认为，从中国的崛起来看，现实主义远远没有过时。进攻性现实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仍是解释中国外交政策的重要工具。换句话说，崛起中的中国依旧在战略性的进攻与防御之间奉行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准则。

参考文献

- Lim, Y.-H. (September 2011). A Tale of Two Realisms i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9(2), 299–312.

古巴 = 香格里拉？——中国网民的古巴印象

一方面，政府不希望切·格瓦拉的形象成为表达对国内问题不满的有力武器；另一方面，限制切的影响，又会“摧毁”共产主义最后的道德高地。所以这些年来，政府一直对切·格瓦拉避而不谈。

◎ 邵立

中国人对远在美国的“社会主义兄弟”古巴有什么样的认识？这种认识对中古双边关系又有什么影响？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的沈旭晖副教授对网络论坛上网民对古巴的讨论进行话语分析，发现人们对中古关系的认识存在偏差。他们讨论古巴，更多时候是为了讨论中国国内政治。

沈教授观察的论坛包括强国论坛、天涯社区、铁血社区、网易论坛、南坊社区、凤凰网论坛、和平论坛和途牛论坛，观察时

间从2008年10月，胡锦涛访问哈瓦那会见菲德尔·卡斯特罗开始，到2010年1月，吴邦国访问古巴期间结束。他发现中国网民的讨论存在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老朋友”的幻象

从国际关系的角度上说，中国网民普遍对古巴有良好印象，古巴是“真正的朋友”，非常愿意和中国交往、做生意。

不过，这个理想中的印象和现实有一段距离。中古两国曾于1960年代交恶——当中苏关系破裂时，古巴曾经想当调停者，但最终选择站在苏联一边。中国以停止向古巴出口大米以及进口蔗糖回应。但网民并没有对这段历史进行任何讨论。

此外，由于古巴还不是市场经济，中国商人在古巴实际并没有受到什么特别优待，商业成果极为有限，这也和网民心中的“老朋友”形象冲突。

作者认为这反映了中国网民对古巴的不了解。与此相反的是，因为朝鲜离中国很近，中国网民对朝鲜的印象以负面为主。

除了“老朋友”这个刻板印象之外，中国网民实际并不重视中古双边关系。很少网民把它看作是在美国的后花园遏制“帝国主

义”的可靠伙伴。大多数人认为古巴会在中美关系之间采取现实主义立场，不会向中国“一边倒”。虽然也有人建议在古巴建立战略军事基地，但主流网民还是认为应该以减少对外援助、加大对内扶贫为原则，不要往古巴投入太资源。作者认为，古巴遥远的地理位置让网民并不清楚它的战略价值，以及对于中国、拉美关系的影响。

切·格瓦拉：给政府出了道难题

从国内政治的角度上说，网民在讨论古巴时划分了两个阵营。作者发现，很多网民对古巴革命的理解都围绕着传奇革命家切·格瓦拉展开，甚至超过执政至今的卡斯特罗兄弟。切·格瓦拉被浪漫化的、反抗资本主义和剥削的革命家斗士形象，深刻影响了中国网络论坛的讨论。作者认为，对古巴和切的形象建构，基本上反映了网络群体之中新左派和自由派之间的观点分裂。

对新左派来说，切被看做是一个不可折服的、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国际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很多中国的年轻人将切看作抵抗的象征，象征自己对政府压制的抵抗、对日益增长的资本剥削的抵抗。尤其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切的形象随着话剧

《切·格瓦拉》的上演流行起来，很多中国网民赞赏他甘愿放弃自己的富足生活去追求理想世界的做法。

但是对自由派来说，切被看做是脱离实际的理想主义者。有人质疑他选择革命的方式，有人质疑如果他不是在年轻时就死了，就不会那么有名。更有极端的人把他称为“恶魔”、“色魔”或“冷血动物”。除了自由派以外，也有极端左翼的网民会批评切走的是修正主义路线。这说明，中国网民对切的看法还是非常单一而理想化。

而网上舆论对切的热捧，也给中国政府出了个难题。一方面，政府不希望切·格瓦拉的形象成为表达对国内问题不满的有力武器；另一方面，限制切的影响，又会“摧毁”共产主义最后的道德高地。所以这些年来，政府一直对切·格瓦拉避而不谈。

“古巴模式”的争论

除了讨论切·格瓦拉，中国网民还热衷于讨论古巴模式和中国模式之间的优劣。但这里的“古巴模式”并非基于古巴真实情况，而是中国网民基于“中国模式”想象出来的“古巴”。

在新左派眼里，社会主义是提供人们自由、健康、尊严和财

富的保证，而以经济为中心的发展战略应该被丢弃。因此，古巴便被想象成这样一个“先进”国家，因为它提供了相对公平稳定的社会福利系统，包括免费的医疗服务和教育。新左派“警告”古巴，不要模仿中国模式，应该尽量避免自由化带来的阶级矛盾和社会不平等。他们认为古巴的社会主义制度不错，之所以经常受到西方攻击，是“美帝国主义”推行和平演变的阴谋。他们反对古巴政府在2009年宣布的削减公务员计划，将其和中国在1990年代末期的国企改革造成大量工人下岗进行类比，呼吁古巴不要进行如此激进的改革，否则会削弱公有制经济实力，扰乱社会稳定和谐。

相反，自由派网民将古巴、朝鲜、越南和一些非洲国家放在一起，看作是低西方国家一等的非民主政体。他们嘲笑新左派用陈腐的经验去处理今日的问题。有些自由派指出，古巴的社会主义并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只是卡斯特罗家族控制的家族裙带政权。他们还怀疑中国媒体上关于古巴的正面报道并非真实，认为古巴的真实情况可能比中国还糟，因为中国的异议者至少还可以在网上表达自己的观点。但是，自由派对2009年古巴的公务员改革却持赞赏态度，认为中国应该学习古巴缩减官员队伍，减少贪污腐败。尽管这些赞赏“古巴模式”的帖子只占总量不到20%，但

沈教授评论道，这已经比网民对“朝鲜模式”一致鄙视的情况要好得多。

网络舆论与中古关系

沈教授认为，中国网上舆论倾向歧视非洲国家的黑人人种，歧视印度人贫穷，歧视日本人的侵略罪行，歧视朝鲜制度的落后。这些歧视给中国政府与上述地区国家开展双边关系带来麻烦。而网民对古巴却怀有相对良好的想象，有利于中古关系的发展。

古巴对中国在拉美地区的影响力至关重要。中国希望古巴能实现改革开放，以引入中国的工商业产品，将古巴培养成中国在拉美地区的附庸国。但另一方面，古巴的开放面临三重问题：第一，古巴自身制度在阻挠改革；第二，古巴当地的华人团体垄断了黑市交易，并不愿意开放，中国政府也要考虑他们的意见；第三，即便古巴真正实现开放，受益的并不一定是中国，更有可能是地缘上更亲近的美国。因此，中国对古巴的改革态度很暧昧，和古巴的关系也正处于非常微妙的时期。

但在中国舆论界，除了极少数去过古巴的旅行者、和古巴做过生意的商人之外，大多数人对于古巴的认识被严重扭曲。与形

象基本毁灭的朝鲜相比，古巴更像是“社会主义理想”的最后一个“模范”。如果日后中古关系恶化，或者古巴突然推行如“改革开放”那样的重大变革，认识上的偏差将会激起社会舆论的剧烈反应。对外，中国对拉丁美洲的外交战略将会受到内部的质疑和制约；对内，“模范”的陷落也会打击新左派对社会主义的信仰，给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带来新的挑战。

参考文献

- Shen, S. 2014. Potential Danger in Domestic Debate Constructing a Cuban Shangri-La: Online Chinese Perceptions of Cuba and Implications for China and the World. *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12(1), 66–86.

中国在非洲：跳出道德纷争，来点技术分析

中非的政治关系是外交部的领地，而商贸往来则是商务部的辖区。一旦接受商务部引导的中国企业在当地引发争端，承受政治压力的是外交部。

◎ 刘岩川

中国在非洲的利益，大概可以从四个纬度解释。政治上，中非之间的纽带由来已久。在毛泽东时期，由于北京同时对美苏采取对抗政策，中国在国际社会中陷入孤立。为了缓解孤掌难鸣的尴尬，中国不计自己的困难，为非洲的难兄难弟提供了慷慨的援助，并且在许多非洲国家的支持下进入联合国。近年来，面对西方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指摘，不少非洲国家在联合国选择辩护或沉默。在台湾问题上，多数非洲国家也一如既往地支持“一个中国”

的原则，虽然尚有布基纳法索等少数国家维持与中华民国的外交关系。

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利益迅速成为中国对非政策的首要考虑因素。庞大的能源需求使中国对非洲的资源垂涎三尺，而国家为企业制定的“走出去”战略，也让屡屡在西方市场碰壁的中国企业转向地大物博的非洲。与此同时，中国还通过低息贷款支持非洲的基础设施建设，但此时的慷慨却将中国推向了西方舆论的风口浪尖。一方面，多数建设项目落入中国企业囊中。这一安排支撑了让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战略，却对当地就业于事无补。另一方面，许多来自中国的贷款都以当地自然资源为偿还物，使西方认为中国的“援助”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不过，孙云指出此类交易并非中国首创。在中国与发达国家交往的历史上，外方也曾以中国的资源为代价提供资金。

与经济利益相辅相成的，是中国在非洲的安全利益。具体而言，随着双方经贸往来的加深，越来越多的中国投资和侨民暴露于各种风险之中。从以抢劫、绑架为代表的犯罪行为，到非政府武装的袭击，再到劳资纠纷和中国企业违规行为在当地群众中挑起的敌对情绪，中国面临的风险愈趋多样。索马里海盗是所有风

险中比较特殊的一种。在非洲陆地上，中国本着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不派遣军队维护中国的经济利益，而将希望寄托于联合国与非洲联盟的维和部队上。在海上，中国海军则派出了护航舰队，保障中国和其他国家的船只安全。

最后，中国也很重视非洲的意识形态价值。与中国交往的不少非洲国家，都并非西方意义上的自由民主政体。通过对非洲的支持，中国在推销自己的发展模式，即在缺乏政治自由的环境中维持相对的稳定和高速的增长，以此与西方的政治制度分庭抗礼。

在分析了驱动政策制定的国家利益后，孙云的研究中也提及中非关系中的若干细节：中非关系并非中国外交的重点，政府对非洲的中国企业缺乏有效引导，以及外交部与商务部在非洲问题上的竞争关系。

首先，即使有较高的媒体曝光度，中非关系并非中国外交政策的重点。诸如中美撞机等重要外交事件，往往牵动中共中央总书记、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办公室主任和国务委员等高层的神经。然而非洲事务则大都由负责事务性工作的外交部和商务部牵头。除了利比亚内战威胁中国公民安全、奥运前夕的达尔富尔危机影响中国形象、索马里海盗引起中国护航编队出动等敏感事件，

非洲事务较少上升到政治局层面。

中非经济往来的总量也不足以让中国领导人将非洲排在外交的首要位置。中国对非洲的投资仅占其全球投资的 3%，而贸易总额占中国外贸总额的 5%。

相较而言，中国外交政策的重点是其周边国家和美国。前者直接影响中国的生存环境，并且在一系列领土争端中与中国磕头碰脑。后者则是超级大国，在许多问题上与中国意见相左。

其次，中国对企业非洲的活动缺乏引导。不仅投资的产业带有重复性，对市场风险也缺乏有效的评估。更重要的是，企业的行为已经开始影响中国的国际形象。在非洲行走的中国企业不但有央企和地方国企，还有越来越多的民企。与国企不同，民营企业缺乏有效监管。企业家忠贞不二地追求利益最大化，将国内高污染、无序开发和压榨薪酬的盈利模式完整输出到海外，引起非洲当地群体的强烈反弹。企业虽然走了出去，但中国的政治形象却大打折扣。

最后，中国的非洲政策也引爆了部委间的竞争。中非的政治关系是外交部的领地，而商贸往来则是商务部的辖区。在中国驻非洲国家的使馆里，经济参赞处只接受商务部的领导，而不听命于

当地大使和外交部。一旦接受商务部引导的中国企业在当地引发争端，承受政治压力的是外交部。同时，由于商务部过多将援助项目导入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而当地政府往往又是相对腐败和集权的，暴露在舆论压力下的外交部时常感觉替商务部背了黑锅。

由此可见，中国对非洲的外交政策，并非简单的道德判断所能一概而论的。它既牵涉国家层面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也关乎政府与企业甚至政府部门之间的关系。

参考文献

- Sun, Y. (April 2014). *Africa in China's Foreign Policy*. Brookings Institution.

“金砖国家”已是国际政治集团，而非经济集团

“金砖国家”已自我定义成世界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言人，目前五国之间的伙伴关系更多是基于政治因素而非经济逻辑，新型市场经济下滑并不会影响“金砖国家”在世界政治体系中的地位。

◎ 归宿

2013年下半年以来，受美国缩减量化宽松、中国经济换挡升级、乌克兰危机局势升级等因素影响，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全球新型经济体在经济运行方面的表现普遍不佳，唱衰“金砖”的论调也再次在一些国际舆论中出现。

但是，经过多年的发展，“金砖国家”的概念早已拓展延伸。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庞珣（Pang Xun）近期在卡内基基金会网站上刊文，认为“金砖国家”已自我定义成世界新兴

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言人，目前五国之间的伙伴关系更多是基于政治因素而非经济逻辑，新型市场经济下滑并不会影响“金砖国家”在世界政治体系中的地位。

文章认为，近些年来唱衰“金砖”的论调，基本都是基于同一个逻辑：“金砖国家”是一个经济概念。从这个角度看，2001年提出的“金砖国家”的确有点过气：五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似乎是十年前的事。在过去的几年中，一系列类似的概念也多次出现，包括“未来11国”（NEXT 11）、“远望五国”（VISTA）等。而由“金砖”概念之父、前高盛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奥尼尔提出的“薄荷四国”（MINT），去年一经推出就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认同。

文章指出，“金砖国家”这个概念从经济学上说，的确不是那么严谨。“金砖国家”除了都在2000年以后的一段时间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以外，缺少成为一个集团的“共性特征”，各自经济模式差别很大。而且近几年来，除了中国经济仍然保持较高增长速度外，其他“金砖国家”的经济发展都差强人意。世纪之初的关于“金砖国家”可能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说法，也逐渐被证明可能只是失败的预言，不再被人提起。从2010年南非被吸收加入“金砖国家”来看，“金砖国家”这个概念似乎在经济上也没有明确的标准，

其在经济上的权威性大打折扣。

那到底是什么让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这五个截然不同的国家走到一起呢？作者认为，相较于为人津津乐道的经济奇迹，国际政治现实才是主要原因。其实，当2001年“金砖四国”的概念被提出时，这些国家还没有意识到这个标签的意义。直到2006年以后，“金砖”们才反应过来：这个标签可以加强彼此的身份认同，并作为采取集体行动，以改变国际政治的某些现状的符号象征。

2010年南非加入“金砖国家”就是国际政治因素的典型体现：南非的经济规模、影响力特别是经济增长率都与其他“金砖”相去甚远，但南非作为南部非洲最为重要的国家，其加入使得“金砖”的代表性明显上升。目前来看，这五个国家都是雄心勃勃的地区大国，挑战美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体系的实力和意愿都很强烈。

文章认为，目前“金砖国家”的联系还比较松散，但只要这五个国家还都致力于改变国际体系现状，这种联系就具有很强的政治意义。有人担忧，中国经济发展明显快于其他四国，会使“金砖”解体。但实际上，由于“金砖国家”是政治集团而非经济集团，中国的“一枝独秀”反而可以为其提供强有力的物质支持和基础。

对中国而言，随着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的迅速提升，也热切希望增加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和参与度，最终改变与己不利的国际规则体系，而“金砖国家”正是中国达到此目的的绝好抓手。因此，中国会和其他几个国家通力合作，保证“金砖”体系的顺畅运行。正如作者在文章最后指出的那样，“金砖国家”凭借其丰富的政治内涵重新获得了生命力。未来无论经济学界再都提出什么样的概念，都与“金砖”关系不大，“金砖”将一直按照自己的方式存在并发挥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 Xun, P. (2014). Are the BRICS Irrelevant? Carnegie-Tsinghua Center for Global Policy. <http://www.carnegietsinghua.org/2014/04/08/are-brics-irrelevant>

中国正在攫取非洲的耕地吗？

最近几年，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中国正积极获取大量非洲可耕地，以解决自身粮食安全问题。但实际上，中国企业目前主要是因自身商业利益驱动而对非洲农业进行投资，而且所获土地有限，农业产出也主要供非洲当地消费为主。

◎ 周航

“北京和马普托在 2006 年签署谅解备忘录……计划在赞比西河谷地区建大型农业项目……该项目预计会带来 2 万名中国人。”一份 2007 年发布在“瑞士国际关系与安全网络”网站如是报道。在 2007 至 2008 年期间，随着国际粮食价格上涨，中国在非洲的农业投资逐渐引起众多国际媒体的关注。许多类似的媒体报道被智库和非政府组织引用，以证明中国正在攫取国外土地（Land Grabbing）解决自身粮食安全问题。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龙的礼物》作者 Deborah Bräutigam 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张海森副教授发现，这些报道与实际情况有出入，其中部分甚至未经实地调查考证却不断地被转引，以致于到 2012 年，国际社会已基本形成了对于中非农业合作的误解——中国正积极获取大量非洲可耕地。两位学者的研究结果则显示，中国公司在非洲获得的土地有限，且农业产出也是供非洲当地消费为主。

中国与非洲在农业领域的合作最早可以追溯至上世纪 60 年代，主要是以对外援助的模式实现。当时，中国帮助非洲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不少大型国有农场。随后的二十年间，北京政府开始接手许多最初由台湾援建的农场和技术中心。这些项目大多因为非洲当地政府与台北“断交”而难以维持。从 90 年代开始，为了提高农业援助项目的可持续性，中国开始改进援助方式，推动政府援助与企业运营相结合的模式。最具代表性的尝试是 2006 年宣布建立的十几个援非农业技术展示中心：中国企业接受三年政府援助以建设和运营中心，并在此期间寻找盈利方式以让中心日后自负盈亏。

中国企业对非农业投资则可追溯至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当时，

由于国际金融和援助机构鼓励受援国进行结构性调整，不少中国援非农业项目被私有化，部分中国企业顺势承包下这些项目，如在塞拉利昂和马里的制糖项目。

目前，虽然多个中国政府部门和政策性银行（如农业部、中国发展银行和进出口银行）尝试推出不同措施以鼓励企业投资海外农业，但是敢于涉足非洲农业市场的中国公司仍较少。除了在喀麦隆、马里、塞拉利昂和赞比亚的几个农场项目，这些公司的投资规模也普遍偏小。两位学者以中国商务部公开数据为基础进行估算，认为截止至 2012 年，中国累计批准对非农业种植领域的投资大概仅在 1.72 亿美元至 4.88 亿美元之间。同时，鼓励对非农业投资的措施对双边农业贸易影响也十分有限。中国从非洲进口的农产品数量相对较小，主要集中在农工产品，如布基纳法索的棉花和津巴布韦的烟草。

两位学者最后仔细考证了数个广被传为中国“抢地”的真实案例，均发现中国在非洲农业领域的影响力往往被夸大。比如，媒体曾于 2007 年报道中兴能源有限公司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投资 10 亿美元租赁 300 万公顷土地种植棕榈以生产生物燃料。然而，该项目虽得到当地政府批准，但获批土地实际仅为 10 万公顷左右。

而且，作者发现截止至 2013 年 5 月，该项目进展停滞，中兴公司仅仅利用了 256 公顷土地种植玉米、大豆等。

两位学者最后总结说，中国企业目前主要是因自身商业利益驱动而对非洲农业进行投资，这些投资行为并非中国政府谋划在非洲获取土地种植粮食以满足国内需求的战略的一部分。与许多媒体报道相反，这些农业项目投资增长较慢，而且非洲政府在双边农业合作中的能动性（包括要求与中方建立合资企业、主动寻求中方技术支持、谨慎对待土地租赁分配等）也往往被低估。

参考文献

- Bräutigam, D., & Zhang, H. (2014). Green Dreams: Myth and Reality in China's Agricultural Investment in Africa. *Third World Quarterly*, 34, 1676–1696.

投资阿富汗艾娜克铜矿：看上去很美

中国企业投资阿富汗引发全球关注，也影响着政府介入阿富汗的程度和政策制定。海外投资取决于企业商业利益，还是经济外交政策？暂时受挫的艾娜克铜矿事出何因？

◎ 宿亮

阿富汗卢格尔省艾娜克，人烟稀少，地况荒凉。这里有千年文明遗迹，还拥有据信储量世界第二的大铜矿。2008年，中冶集团、江西铜业与阿政府签订协议，计划在这里投资将近50亿美元；另外，在阿姆河谷，中石油也拿下三处油田的开采权。

不少西方媒体评论，这是中国政府确保能源安全的战略行为。是这样吗？

六年过去了，铜矿项目建设并不顺利，投资方、阿政府和国际同行业分析人员通过媒体给出各种说法。实际原因又是什么？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学者艾丽卡·唐恩斯（Erica Downs）在一篇名为《中国入股阿富汗》的学术文章中对上述问题给出了自己的解答。

唐恩斯说，艾娜克铜矿建设方案一直推迟，由于无法得到先前许诺的高额回报和大量就业，阿富汗政府对中国投资方颇有微词。中冶和江铜方面给出的解释是：阿富汗从2009年开始启动艾娜克考古挖掘，影响了项目进展。

除此之外，还有几大因素影响艾娜克项目的推进。

首先，卢格尔省安全形势一直不好。以2012年7月为例，矿址一个月内遭19次袭击。特别是在美国撤军的背景下，未来不确定性仍旧很大。其次，中冶自身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澳大利亚等几处项目陷入用工合法性、预算超支等问题，难以顾及阿富汗。第三，中冶方面最初的方案过于乐观，中方估计5年就能完成项目建设，而同期美国企业的预测是7到12年。最后，美军即将撤离阿富汗，国内形势、政治派别力量对比尚不明朗。唐恩斯估计，

中国投资方可能希望等到形势明晰后再继续注资。

无论如何，曾经一个“看上去很美”的资源开采项目眼下似乎陷入停滞。如何通过这个项目观察中国资源企业整体“走出去”的战略推进？

唐恩斯认为，中国大型国企在海外投资自然资源、矿产的行为首先是基于商业利益的企业行为，而不是政府主动行为。这些企业行为可能会促使政府作出“应激式”的回应，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某些政策策略。

中国投资阿富汗，从地缘、能源战略上看，似乎政府主宰投资的说法能解释通。但仔细分析每一个项目，可以看到明显的企业利益驱动。

投资艾娜克铜矿的是中冶和江铜。中冶从 21 世纪初就在发展传统钢材冶炼之外的新业务，涉足自然资源海外开发和房地产。2009 年在港交所上市，专门把海外资产注入上市公司，以吸引融资。塔利班刚一倒台，这家企业就开始和卡尔扎伊政府接触，投资艾娜克是早已做出的商业决定。

而江铜作为一家典型中国冶金企业，其特点就是倾向于控制

矿产资源所有权，而非在国际市场交易原材料，不希望陷入供应链风险。艾娜克合同中，江铜获取至少 50% 铜矿石的优先冶炼权，预期将推升产量超过 50%。

投资阿姆河谷油田的中石油，看中的的是从中亚、伊朗修建途径阿富汗到中国油气管线的可能性，希望通过投资与阿富汗政府密切关系。

事实上，阿富汗并非中国传统外交优先地区，中国在国际框架下给予阿富汗的政府援助在整体援助中排名并不靠前。但不断增加的投资行为可能会“倒逼”政府形成更加积极的阿富汗政策。在公开场合，矿产企业的投资成为中国参与阿富汗重建表述的重要方面。

既然事先没有政府大力推动，中国企业是如何在阿富汗取得成功的呢？

相比西方国家的竞争者，中冶等中国国企设备成本等消耗较低，能获得的政策性银行贷款较多。另外，中国驻阿富汗的外交机构与国内各部门的互动支持也比美国等国家好得多。

更重要的是，中国国企不需处理西方企业复杂的董事会、股

东关系。在艾娜克合同中，中方承诺的回报最高，还同意阿富汗政府建设冶炼厂、发电站、铁路等条件。国企对利润的追求不像西方企业那样苛刻，决策灵活性较强。

一些西方企业认为，中国的“投资包”不公平。但事实上，这反映了在很多发展中国家能源产业的发展趋势。国际能源巨头已经开始向欠发达地区寻求资源，这些地区的政府自然会提出越来越高的基础设施条件。加之中国企业在这些方面的灵活性，“整体投资包”已经成为投资自然矿产的重要方面。

美国经营阿富汗十多年。唐恩斯认为，中国企业的投资在一定程度上“搭了便车”，利用了美国营造的阿富汗相对稳定局面，中冶和江西铜业的高管都曾向美国媒体说，因为美军驻扎，在阿富汗经商比较安全。

但换个角度看，这些投资并不违背美国利益。美国希望阿富汗经济繁荣以推动政治解决阿富汗国内问题，而矿业是阿富汗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面。中方的投资可能为阿富汗创造大量的工作机会，推动经济发展，帮助美国实现在阿富汗的目标。

艾娜克铜矿的未来仍值得观望，中国的海外投资更值得分析。

政府与企业在海外市场究竟应该形成一种什么关系？是企业利用政府“经济外交”追求利益，还是政府根据企业商业行为形成政策，如何让国企的每一笔海外投资都能够有的放矢、避免“夭折”？阿富汗或许能够提供一些答案。

参考文献

- Downs, E. (2012). China Buys into Afghanistan. *SATS Review* 32(2).

移民欧洲：迅速增长的“第三波”

从改革开放开始，欧洲华人移民增长迅速。这种增长究竟出于什么原因？现在这些移民社群的发展有什么特点和趋势？

◎ 宿亮

题记：2007年夏天，我在从意大利米兰至佛罗伦萨的火车上认识了一个中国移民。她此前一年非法滞留欧洲，在中国人开办的地下制衣厂工作。她是东北一名下岗职工，移民初衷是为“给孩子攒大学学费”。由于害怕被警方发现遣返，那次出行拜访同乡是她一年多以来第一次离开米兰。此外，我在那次旅行中还听到不少中国移民的群体情形和个

体遭遇，对欧洲部分中国移民群体产生复杂情愫。

中国人移民欧洲，从鸦片战争打开国门时就已经开始。一战时，曾有 10 万中国劳工在法国和比利时为协约国挖战壕。大量中国商人、学生移居欧洲，给这块大陆带来中国文化、语言和商品。

今天，移民欧洲成了中国不少代理机构和旅行社的广告语。新进移民欧洲的中国人有什么特点，给欧洲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人类学学者凯文·莱瑟姆（Kevin Latham）和诺丁汉大学中国移民中心教授吴斌最近发表了一项研究，他们通过对包括中国国务院侨办在内的中欧各个移民管理机构官员的访谈和数据整合，尝试白描欧洲的中国移民现状和发展趋势。

如果把早期中国移民视作“第一波”，那么华人移民欧洲的“第二波”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直延续至 20 世纪 80 年代。他大多从香港、印度支那出发，前往英法等前殖民宗主国。

改革开放后，“第三波”中国移民开始来到欧洲。在欧洲的中国移民数量本身并非最多，排在亚洲和美洲国家之后，但欧洲增长率最快。2006 年至 2007 年，欧洲国家中国移民中 79% 是新一波移民，而世界平均水平只有 22.7%。

中国人大量移民欧洲，原因来自中欧两方面。

- ※ 首先，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东北重工业企业的下岗职工选择海外移民寻找机会。不少人去了当时签证政策相对宽松的匈牙利。在欧洲的东北移民数量迅速增加，主要在欧洲人开办的工厂里做工，多数人从事技术要求不高的工作。
- ※ 第二，从1999年至2009年，中欧贸易额十年增长6倍多。不少中国人在这种背景下到欧洲寻找机会“淘金”。另外，中国移民开办的企业也因此有了更多工作机会，不少中国人开办的企业招募的几乎全是华人新移民。
- ※ 第三，中国人的购买力增加、贫富差距拉大。一方面，有钱人到欧洲旅游的越来越多；另一方面，难以在国内获得财富的中国人也开始通过移民寻找新机会，甚至不惜选择非法渠道移民。
- ※ 第四，中国移民涉足的产业增加。原本华人集中在餐饮、重体力劳动等方面，而奢侈品生产销售、皮草制造、中国产品

进出口批发零售等兴起给了移民新机会。

- ※ 第五，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非法移民欧洲情况出现，并形成专门偷渡的“产业链”。如今，随着移民渠道增加，这种情况已经开始减少。
- ※ 第六，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家一度移民政策宽松，并多次给与非法移民大赦，客观上鼓励了中国人移民，特别是在欧洲有亲属联系的中国新移民。
- ※ 最后，高等教育国际化趋势发展使在欧洲读书的中国学生越来越多。2010 年留学生人数大约比 2000 年增长了 6 倍多。现在，大约有 12 万中国学生在欧洲求学，其中 40% 在英国、23% 在法国、20% 在德国。由于数据统计问题，这一数字实际可能接近 20 万。这些学生大多来自中国中产家庭，一些人会选择在欧洲就业，成为在欧洲中国移民中“高知”和“白领”的主要来源。

这些多元化的原因导致新一轮移民欧洲的趋势发展较为迅速，不过，欧洲中国移民增长率已经开始下降，移民社群的状态也在

发生变化。

近些年来，欧盟出现的债务危机极大打击了整体经济。华人由于“隐形经济”的存在和社群相互帮助，受打击不大。但欧洲人消费水平下降影响了餐饮、零售等的商业机会。一些移民选择离开居住地，前往经济较好的欧盟成员国，或巴西、澳大利亚、南非等经济不错的国家生活，也有人选择回国发展。

另外，随着中国政府鼓励投资非洲、拉美和东南亚地区，一些在欧洲的中国移民选择跟随这股潮流离开欧洲，希望“搭顺风车”。

移民这几年成为欧盟成员国社会热议话题，移民政策不断收紧，也出现了部分欧洲国家政府与中国移民社群关系紧张的情况。

从行业上看，中国移民在欧洲从事的行业范围大为扩展。传统制造业已经饱和，诸如美容美发、中医、茶叶销售等新产业出现。华人开始尝试融入欧洲文化，学习当地语言。

随着新移民的加入，华人企业劳资关系发生变化，不断出现中国新移民建立工会，抗议工厂待遇，甚至诉诸暴力的情况。

华人移民中，第二代、第三代的成长越来越重要。他们有新的特点：在欧洲接受教育、不说汉语、与欧洲人交朋友、对中国没有归属感、就业视野更广、不与华人结婚。老一代移民开始担

心子女无法传承中国文化。

伴随新一代移民的是新媒体的发展，移民不用再看卫星电视和当地中文报纸。他们能够轻易看到中国电视节目和报纸、使用微博，这让第二代移民有着不同于前辈的新的身份认同。

随着投资、贸易、技术和信息的全球流动，中国对外移民数量也在增加，其中对欧盟的移民增长也值得关注。海外华人形成独特的亚文化，东南亚的“峇峇娘惹”更是其中独特的风采，而欧洲华人移民文化的演变与发展更是包含了中国人走向世界、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崛起的诸多线索和细节，值得细细品味。

参考文献

- Latham, K., & Wu, B. (2013). Chinese Immigration Into The EU: New Trends, Dynamics And Implications. *Europe China Research and Advice Network*. <http://www.euecran.eu/publications-2011/chinese-immigration-into-the-eu-new-trends-dynamics-and-implications>
- Latham, K., & Wu, B. (2014). Migration from China to the EU: The Challenge within Europe. In K. Brown (Ed.), *China and the EU in Context: Insights for Business and Investors*, Palgrave Macmillan.

民意能影响中国的外交政策吗？

民意是否可能影响中国的外交政策？澳门大学的两位研究者对此持肯定看法。其中一个可能的机制是，“民族主义”是政府的合法性来源之一，当民意涉及到对国家形象的维护时，政府就需要考虑如何响应。

◎ 杨鸣宇

中国政策过程的研究者普遍认为，改革开放后政策过程的参与者正变得越来越多元。但对普通市民而言，他们仍然缺乏制度化的参与渠道。民意究竟是否能够影响政府的决策？这种影响又是如何产生？这些问题在学界一直未能形成共识。

一些学者转而尝试在一些政策子领域寻找证据，比如外交政策。最近，澳门大学政府与公共行政系的王建伟教授和博士生 Xiaojie Wang 在《当代中国》上发文，他们认为，民意确实能影响外交

政策。

近年来，民意的作用在中国不断提升，这得益于几方面的因素。第一，经济发展促使了政府讯息的开放，今天市民可以容易地通过网络或其他媒体途径了解到政府的决策讯息。第二，媒体的商业化也会促使它们更倾向报道市民关心的议题，其中外交新闻是时事热点之一。最后，新闻媒体有时候并不单纯是新闻传播的途径，它同时也会成为民意的反映渠道，而这又反过来使其成为政策过程的参与者之一，对政府选择政策方案形成一定的约束。

两位研究者举了大量民意成功影响对日政策的例子，其中包括否决日本进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推迟合作开发东海油田、以强硬姿态响应对南京大屠杀的否认等。这些议题在网络和媒体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并进而形成巨大的民意压力，促使中国政府改变原来的政策方向，以平息民众的不满。

然而，这些例子是否足以说明民意产生了作用呢？恐怕还不够充份，因为有两个基本的理论问题仍未得到较好的解决。

首先，中国的媒体并不是完全的独立，报道内容始终受到相关部门的监管和审查。因此无法轻易剔除操纵民意的潜在可能。这时就难以识别到底是政府在塑造民意，还是民意真的影响了政府。

其次，假设民意确实能影响政府的决策，背后的机制是什么？研究者的解释是：因为民族主义 (nationalism) 是政府的合法性来源之一，因此中国政府需要想办法维持国家的形象，当人们的意见涉及到对国家形象的维护时，政府就必须考虑如何进行响应。但政府如何搜集民意，如何对其进行识别，民意又何时发挥作用仍然是个“未知的黑箱”。

因此，文章作者也强调：自己的意图并不是给出一个因果关系，而只是尝试根据已有的证据对民意影响外交政策这个过程进行一些初步的探索。

参考文献

- Wang, J., & Wang, X. (2014). Media and Chinese Foreign Polic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3(86), 216–235.

历史

未竟的远征：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中国
命运交叉的城市

未竟的远征：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中国

中国 20 世纪初的政治主题是如何作为一个平等的伙伴加入国际社会。一战爆发，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精英不约而同的激动，因为他们看到了中国在世界舞台改变地位的机会。

◎ 宿亮

一战已经过去百年。中国与一战的关系或许超过很多人的想象：在那场战争中，除了法德前线挖战壕的中国劳工外，差点就会出现三四万中国远征军代表协约国作战。为什么中国会对一战感兴趣？中国远征又为何最终没有实现呢？

香港大学历史学教授徐国琦在《军事历史》杂志撰文《大战和中国远征计划》，用史料还原那段战争风云中的中国角色。

一战爆发前后，中国正处于纠结的历史节点。甲午一战，连

原本小小的邻国日本都拥有了蛇吞象的本事。惨痛的代价让中国警醒，必须要走上复兴之路，否则民族存亡都成了未知数，这种社会思潮是中国在 20 世纪初的主旋律。

中国经历着社会和文化的巨变。大清帝国和孔子礼教统统被抛弃，亚洲第一个共和国成立，民族主义思潮崛起。为了与过去决裂，中国施行公历，社会精英开始质疑传统文化、语言，以及政治立场和外交实践。政治上的混乱局面之下，社会正孕育着活力、希望。那时的中国，一方面混战、民不聊生；另一方面，积极的社会实验也在发生。

徐国琦教授认为，中国 20 世纪初的政治主题是如何作为一个平等的伙伴加入国际社会。当时的中国正在列强侵略造成的被动和社会变革的主动力量推动下加紧现代化进程。这种现代化包含面向世界的国际化和面向国内的西方化。长期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始重视外交，因为这是弱国在国际舞台上表达声音的唯一方式。

不过，国际社会也在改变。长期奉行均势原则的国际局势此时受到美国、日本、德国等后发国家的挑战。这种局面给了中国机会。

一战爆发，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精英不约而同的激动，因为他

们看到中国在世界舞台改变地位的机会。梁启超说，这是“千年不遇”的机会。战争头两年在德国留学的张君勱回国后也积极推动中国政府参与战争，“中国为了废除列强的不平等条约，需要为世界做点什么。”社会舆论也纷纷强调中国参战的政治外交和经济好处。

不仅如此，北洋政府高官，如梁士诒、张国淦、段祺瑞，也都积极推动政府出兵。

除了中国，同样有人视一战为机会，那就是日本。日本作为协约国一员，希望攫取德国在中国的利益，1914年、1915年连续两年反对中国参战的请求，并在西方列强无暇顾及及时提出“21条”。北洋政府看到危机，为了避免沦为日本附庸，必须参战。由于受日本阻挠无法正式参战，中国在1915年中期决定以中立国身份派出劳工。

从1915年至1918年，大约15万中国劳工在英法政府的安排下前往欧洲，不少人在前线工作，大约3到4千名中国劳工丧生。这些牺牲最终给了中国外交官坐在谈判桌前的机会。

参战的机会出现在1917年。美国当年2月断绝与德国关系，呼吁其他中立国响应。中国第一个响应，这是等待了三年之难得

机遇。中国官方再次兴奋起来，他们知道加入战争是改变中国国际外交地位的难得机遇。

中国3月与德国断交。要不是段祺瑞政府与总统府、国会互相扯皮，中国恨不能第一时间宣战。中国宣战的那天是8月14日，恰巧是八国联军当年进入北京的日子。宣战难得地得到包括陈独秀、李大钊在内的全中国各政治势力的支持。

中国废除了德国、奥匈帝国强加的不平等条约、领事裁判权和殖民地，向全世界发出呼声，要求得到尊重，并希望日本归还山东权益。中国1917年3月向协约国提出要求，推迟庚子赔款，增加关税、在天津和公使馆区域驻军等。协约国没搭理中国的要求，但能够取回德奥掳走的权益，已经是不小的成功。

那时，协约国中只有法国急切希望中国派兵。按法方的一份计划，中国士兵可以组成1200至1500人的兵团，由中国军官指挥，先在后勤部门工作，随后上前线，把欧洲士兵从艰难的地面战中解放出来。法国人估计，以中国的人口规模，可让中国派遣70到80个军团。

法国之所以这样打算，是因为法国前线的中国劳工辛勤工作得到了法国军队认可。1917年8月，法国正式提出了要求中国派

兵的请求。

1917年9月1日，段祺瑞明确告诉法国，中国愿意与协约国展开军事合作，派遣数百名士兵前往欧战前线。在与法国人的密电中，中国当时的外交部提出，愿在6个月内派遣2万到3万中国士兵到前线，人数甚至可以更多。

但出兵欧洲的想法没有得到协约国所有人的同意。

日本要把中国变成附庸，多次阻止中国参战。与此同时，日本和英法俄签订密约，确保日本攫取德国在华利益。也就是说，当中国积极申请参战的要求获得同意时，中国参战最重要的目标，即恢复山东主权，已经没戏了。协约国欺骗了中国，而天真的中国却一直抱有出兵赢得公正和国际声望的信念。

日本虽然在背后玩弄了中国，但依旧担心中国出兵会增加中方的外交声望。日本虽属协约国，但没有向欧洲派出一兵一卒。相比之下，中国出兵，甚至取得战事成功，都会衬托日本的卑鄙。日本于是操纵中国国内政局，黎元洪和段祺瑞在国内争权夺利影响了中国政府的效率。

不只是日本，英国也不赞成中国出兵。傲慢的日不落帝国瞧不起中国士兵，认定中国士兵到欧洲不过是浪费轮船的吨位，没

有任何军事回报。不过，英国人没有明说，只是给法国提出了中国士兵来欧洲的苛刻附加条件，让中法都没有办法满足这些要求。

曾经积极让中国响应呼吁、断绝与德国关系的美国听到中国要出兵，也开始犹豫。先前，美国曾答应提供给中国 2500 万美军饷，但此时这笔钱连影子也看不到了。

中国政府 1917 年底就已经准备好 4 万士兵，只待解决运输和军饷就能出发。为了避免中国远征方案失败而导致法国声望受损，法国积极与英日美三方斡旋。与此同时，段祺瑞政府也紧张起来，因为远征方案失败同样会让段祺瑞名誉扫地。中法双方频繁通信，积极想办法。

此时，战事已经进展到 1918 年，协约国大部分已经开始考虑战后安排，根本不再考虑中国是否出兵参战的问题。1918 年 4 月底，法国遗憾地通知中国，方案取消。

历史不能假设，但看罢徐国琦教授描述的这段历史，不得不去想象整船整船的中国士兵抱着“汉阳造”、穿着略显破旧的军装，在中国港口接受民众的欢送，带着恢复民族荣耀的期待踏上征程，参与那场混乱的战争。

徐国琦认为，尽管历史学家认为一战是没有人获益的悲剧，

但讽刺的是，中国的确从中赢得了一些东西，例如部分领土主权、取消了针对德奥的庚子赔款、参加了战后的和平会议并把中国问题升级为世界性议题，与德国签订了第一个平等条约等等。

远征没能成行，但中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扮演的角色仍旧值得在百年之后细细咂摸。

参考文献

- Xu, G. Q. (2008). The great war and China's military expedition plan. *The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72(1), 105–140.

命运交叉的城市

如果历史可以重来，上海还会不会是今天中国最大的城市？必然和偶然，对于一座城市的兴起和繁盛，究竟何者作用更大？原子弹的打击不能延缓一座城市前进的脚步，屠杀为数不多的中产阶级却可能使其一蹶不振。

◎ 王也

如果历史可以重来，上海还会不会是今天中国最大的城市？

你的第一反应或许是：没错。面朝东海，背靠长江，得天独厚的地理区位，似乎注定这颗东方明珠的命运不会平凡。但再转念一想，似乎也不尽然。从历史上看，松江府华亭县，并不是什么历史悠久的江南名城。若不是鸦片战争之后签约开埠，黄浦江畔一夜变十里洋场，纵然造化垂青，也未必就能后来居上。看似必然的发展轨迹，其中多多少少好像还是有些偶然的成分。

那么，必然和偶然，对于一座城市的兴起和繁盛，究竟何者作用更大？对此，城市经济学家（或者说空间经济学家）一直争论不休。有些人觉得，地理禀赋，诸如是否依山傍水，是否位于交通要道，决定了伟大的城市能否在一个地方兴起。另一些人则认为，今天城市的面貌完全是历史路径依赖的结果：也许由于某个巧合，人口和货物开始在一个并不起眼的地点逐渐集聚，久而久之，这里就成了最初的城市。当下我们所看到的城市分布图景，不过是过去的先发优势持续至今的结果。一个有名的故事是，根据阿兹特克人的传说，他们的祖先在特斯科科湖心看到老鹰停在仙人掌上，觉得是吉兆，便停下来在这里建立了伟大的特诺奇提特兰。再比如有一种说法：今天西欧的很多城市，都位于当年十字军东征的道路交叉之处，由原先为军队提供给养的营地发展而来。如果当年的老鹰停在别处，或是军队由另外的路线经过，这些城市大概就不会是它们后来的模样。

自然，个例并不能够被用以佐证普遍的规律。而想用统计学方法寻找结论，一个不可避免的困难是，很多时候历史偶然因素和地理禀赋是难以区分的：优越的位置可能既影响最初集聚的产生，又对城市之后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2002年，哥伦比

亚大学的两位经济学教授 D. Davis 和 D. Weinstein 在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上发表了一篇题为“Bones, Bombs and Break Points: The Geography of Economic Activity”（简称 BBB）的文章，利用日本的数据，巧妙地解决了这一难题。基于考古挖掘的发现和封建时代的人口统计资料，两位学者首先考察了日本各地区在不同历史时期内人口分布的变化（所谓“Bones”）。他们发现，那些历史上人口较多的地区（绳文和弥生时代的数据根据考古发现推测而得），今天依然如是。这说明，城市的规模确实是有很强历史延续性的。但这一延续性到底是源自路径依赖，还是地理因素的持续影响呢？一个有力的证据，来自他们对二战期间，日本遭受盟军轰炸情况所做的分析（所谓“Bombs”）。

二战末期，盟国空军对日本本土发动了惨烈的空袭，共计毁灭了 66 个目标城市中的 220 万栋建筑，和三分之二以上的生产能力。在 1945 年 3 月 9 日的一次轰炸中，东京三个小时之内的死亡人数超过了八万，广岛和长崎的命运就更不必提。两位作者关心的问题是，在遭受了如此巨大的损失（所谓“Break Points”）之后，这些城市是否还能延续之前的增长态势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就说明必然的力量占据主导——区位上的优势，能够始终

牢固地将城市的发展限定在特定的轨道之内；如若答案为否，则偶然因素的作用更大——一次巨大的冲击，就可以将一座城市推进一蹶不振的深渊。根据日本战前和战后的人口普查数据，作者们惊奇地发现，仅仅用了十年时间，那些经受了灭顶之灾的日本城市，就迅速地回复到了战前的人口水平，并在之后保持了稳定的发展速度（包括广岛和长崎！）。他们因之得出结论：包括地理禀赋在内的必然因素，对于城市的发展具有根本性的，持久性的意义。

几年之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两位学者，Edward Miguel 和 Gerald Roland，又在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The Long Run Impact of Bombing Vietnam”。从题目就能大致猜出，他们是利用越战期间美军对越南的轰炸，重复了 D. Davis 和 D. Weinstein 的研究结果。类似地，他们发现，70 年代美军的轰炸对于其后越南各城市的贫困率、消费水平和基础设施建设等一系列指标并无显著影响。相比于之前的研究，这两位作者着重强调了轰炸这一事件的外生性。他们指出，美军的投弹主要集中于南北越的分界线——北纬 17 度附近，这就排除了增长潜力高的城市更容易成为轰炸目标这种可能性。最后他们

指出，由于越南政府权力较大，可能在战后实施了大规模的再分配，以至于抵消了轰炸产生的负面效果，所以上述结论仍有可被质疑之处。

若仅由上文的叙述来看，似乎必然因素在这场论战中已呈必胜之势。然而，有批评者指出，日本和越南都是十分特殊的例子，前者多山地而后者多丛林，可以兴建城市的地址本来就不多，故而良好的地理禀赋尤显重要。如果是在平原地带，地理因素的重要性可能就没那么明显。基于这样的思路，来自美联储的华裔经济学家 Jeffrey Lin 和芝加哥大学的 Hoyt Bleakley 合作，于 2012 年在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上发表了题为“Portage and Path Dependence”的论文。其中的 Portage，指的是在水运过程中，因为遇到瀑布之类的障碍，而必须将货物卸下并进行转运的这么一个地点。在 19 世纪之前的美国，水运在交通运输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因而在作为水运中转站的 Portage 处，很快就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的小城镇。但在进入 19 世纪之后，美国开始大规模地进行铁路建设，水运的地位不断下降，Portage 的先天优势一点点消失殆尽。那么，在地理上的有利条件被蚕食之后，Portage 旧址上的城市是否还能维持与之前相同的发展速度呢？两位作者给出

的答案是：能。

以芝加哥为例，它最早就是连结五大湖和密西西比河航路上的一个 Portage，在铁路兴起之后，其增长势头丝毫未减，一路发展成为了全美第三大城。其他的一些城市，诸如费城、匹兹堡和里士满，最早也是东部“瀑布线”上的一个个 Portage。利用美国历年的人口普查和灯光密度数据，两位作者发现，历史上的 Portage 与邻近地区相比，今天的人口密度更高，经济活动也更频繁（以灯光密度衡量）。而纵观整个历史时期（考察各年的人口增长），由 Portage 形成的城市也并未遭遇较大的增长波动。这就说明，必然因素或许只是城市起步的“第一推动”，之后无需其存在，城市的发展也能沿着先前的路径不断前行。或者说，所谓的“必然因素”，只是特定时间窗口下的一次历史偶然。如果当年的美国不是那么依赖水运，芝加哥和费城或许也不会具有今天这般显赫的地位。

MIT 的知名学者 Acemoglu 与其合作者 2010 年发表的“Social 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 A Legacy of the Holocaust in Russia”一文，为我们理解这一争论提供了新的视角。他们研究的问题，是二战期间纳粹在苏联被占领土上对犹太人进行的屠杀，对苏联城市造成的长期影响。他们利用解密的苏联档案，发现二战前犹太

人比例越高的城市，一旦被占领，战后的发展就越差，今天在投票时也会更倾向于支持共党政客。Acemoglu 等人给出的解释是，战前大部分犹太人属于苏联的中产阶级，而纳粹的屠杀破坏了当地的社会结构，极大地减少了中产阶级人数，从而显著地影响了战后当地居民的职业构成、政治参与，乃至中央的资源分配，进而阻碍经济发展。伯克利刚刚毕业的中国博士生 Bai Liang，在研究文革的持续性影响时也发现了类似的规律：当时越“革命”的地区，其后的工业化进程就越缓慢，人均收入也越低。他给出的解释跟 Acemoglu 等人是相近的。

对比这两篇文章和前面所述对轰炸城市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十分有趣的一点：原子弹的打击不能延缓一座城市前进的脚步，屠杀为数不多的中产阶级却可能使其一蹶不振。或许这正印证了莎翁的名句：“城市即人”；哈佛大学的城市经济学家 E. Glaeser 在其著作《城市的胜利》中，也反复论证了这一观点：“人才是城市中最根本，最具创造力的部分。”五光十色的城市图景，归根究底，还是由无数个体的命运在此汇聚交叉而成。在发生转折的十字路口，必然和偶然的因素谁占主导，也无非取决于自然禀赋到底对当地居民的生活有多大的意义。只有始终从人的需要出发进行改

变，始终以人的发展作为最终目的，一座城市才能保持自己的伟大和荣耀，才能在历史长河的怒涛之中昂然屹立，迈向永恒。

参考文献

- Acemoglu, D., Hassan, T. A., & Robinson, J. A. (2011). Social 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 A legacy of the holocaust in Russia.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6(2), 895–946.
- Bai, L. (2014). Economic legacie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 Bleakley, H., & Lin, J. (2012). Portage and path dependence.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7(2), 587–644.
- Davis, D. R., & Weinstein, D. E. (2002). Bones, bombs, and break points: The geography of economic activi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2(5), 1269.
- Miguel, E., & Roland, G. (2011). The long-run impact of bombing Vietnam.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96(1), 1–15.
- Nunn, N. (2013). Historical development. Chapter prepared for *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

社会

“扩招”经历了怎样的决策过程？

穷人一定支持“劫富济贫”吗？未必

“南稻北麦”真的导致了文化差异吗？

为什么农民不愿意入户城市？

中国独立纪录片：公民行动进行时

谁在支持草根非政府组织？

越来越多私营企业主成为基层政治精英

大坝建还是不建？到底谁说了算？

大飞机之梦依然遥远

修建高速公路如何影响中国区域经济发展

中国还是巨型跨国企业：究竟谁在收购世界？

中国的央行有多独立？

“扩招”经历了怎样的决策过程？

扩招决策没有遵循正常的流程。最初的建议是由经济学家，而不是教育专业人士提出；政策方案是由发改委，而不是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提出。决策时间过短，是典型的“游击队决策风格”。

◎ 宿亮

又是一年高考时。2000年前后的大学生，对一个中国特色的词汇都很熟悉：“扩招”。对于扩招的功过是非，学者、媒体、公众都有评价。不少分析认为，扩招与高等教育质量下降有关。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学者汪庆华在学术期刊 *The China Journal* 上撰文回顾了扩招的前前后后。他认为，扩招体现了“游击队决策风格”。

按照韩博天和裴宜理先前的定义，所谓“游击队决策风格”是

与机制化的正常官僚决策机制相对的，其特点是政治挂帅、重意识形态，多采取群众动员方式，不确定性强。

教育部曾认为“扩招时机未到”

回顾中国的教育政策，延安时期削弱职业教育家的权限，实施群众路线和群众运动，采取基于阶级的教育观。类似的教育管理风格至改革开放时期有了变化：虽然仍坚持政治挂帅，但非职业教育人士对决策的干预频率和程度减少。在20世纪90年代，教育决策逐步走向标准化和常规化政策制定。

那时，教育政策的决策有几个层级。教育部作为日常政策的最高行政决策机关，得到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的政策支持。同时，教育部经常性征求学者、主要教育机构和相关部门的意见。当然，重要决策仍需最高领导层拍板。

扩招政策于1999年6月出台。在此之前，按照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90年代初制定的规划，高等教育需“稳步发展”，到2000年，规模达到600至650万人，到2010年发展至1000万人。“高等人才供应应适当小于需求数量。”

从1996年开始，人们开始热议：如何让18岁至22岁的中

国青年接受高等教育的百分比达到 15%，并有人攻击教育部的政策过于保守。一些学者更进一步主张教育“适度超前发展”，提出 2003 年入学率达到 18%，2010 年达到 34%。

教育部回应：扩招时机未到。第一、财政拨款不足，需要多元化资金来源，如发展民营大学。但这种方式也需逐步开展，而且要避免民营大学学费过高、教育资源不足、盲目开设热门专业等情况。第二，就业存在潜在危机。中国大学生传统上被理解成精英，应在大城市工作，毕业生大规模增加可能危及社会稳定。第三，当时，教育的计划经济色彩依然强烈，学生包分配，急需整套市场化改革，之后才能谈扩招。

由经济学家提出的扩招建议

不过，为了回应批评，教育部还是提出了新的振兴计划，修改高教发展口号为“积极稳步发展”，打算入学率在 2000 年达到 11%，到 2010 年接近 15%，同时推行教育市场化改革。按规划，1999 年入学大学生比 1998 年增加 23 万，提升 20.4%，就业由学生自行解决，学费适当上涨。

但是，事后看来，1999 年实际入学人数增长 47.4%，增长速

度是 1994 年至 1998 年年增长速度的 15 倍。规划与现实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游击队决策风格”发挥了什么作用？

汪庆华在文章中指出，中国 1997 年开始进入社会震荡时期。国企改革开始，大量职工下岗。随即发生亚洲金融危机，私企同样受到冲击。再加上城市化进程发展，整体社会矛盾加剧。1998 年失业率达到 7.9% 到 8.5%，是 1949 年以来最高的一年。面对经济困难，中央提出拉动内需。此时，经济专业分析人士提出，教育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供小于求的领域。

1999 年 2 月 9 日，《经济学消息报》刊登经济学家汤敏及夫人左小蕾的公开信，建议“有关领导”推动在此后三到四年中让高校学生数量翻番，新增学生自行支付每年 1 万元学费。他们相信这会带动 240 亿学费及其他相关消费，并刺激 10000 亿相关投资，使 GDP 增长 0.5%。公开信引发社会的热烈讨论。

3 月，发改委在一份涉及当时经济与社会发展情况、任务的文件中第一次把扩招列为刺激国内需求的一揽子计划中重要组成部分。

紧接着，国务院 4 月要求教育部修改 1999 年高校招生计划。事实上，教育部门对扩招一直持保留意见。为了避免政策过

度超前，教育部委托北京大学高等教育中心做可行性报告。这份报告提出，扩招对经济刺激作用有限。与汤敏和左小蕾的结论不同，北大高教中心认为，在全国 119 个经济部门中，教育对国内消费和经济的刺激排名在 100 名之后。学费收入增加估计 131 亿元，带动其他投资 309 亿元。

但这份报告没有对最终政策制定产生影响。6 月初，最高领导层在短时间内作出了扩招决定。教育部当时负责高校工作的官员会议，时间紧迫，但最终还是决定当年立即实施扩招计划，“摸着石头过河”。

6 月，教育部在高考前不久公布新的招生计划，计划招收人数比上一年增加 50 万。而就在此前一年，入学人数增量不足 10 万。

汪庆华认为，扩招这一重大教育决策的作出没有遵循正常的决策流程。最初的建议是由经济学家，而不是教育专业人士提出；政策方案是由发改委，而不是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提出。决策时间过短，政策形成、决定、实施三步几乎同时进行。

文章指出，扩招决策对经济结果的考量超过了对教育本身的考量，决策过程是典型的“游击队决策风格”，并不专业。

扩招对当时入学的学生以及整个教育体系有着重要的影响，也

将是中国教育史上的重大事件。关于扩招有各种解读，汪庆华的文章从决策过程上给予教育研究新的视角，提供了新的洞见。

参考文献

- Wang, Q. (2014). Crisis Management, Regime Survival and “Guerrilla-Style” Policy-Making: The June 1999 Decision to Radically Expand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China Journal*, 71, 132–152.

穷人一定支持“劫富济贫”吗？未必

如果觉得自己目前的社会地位是通过个人努力取得的，那么人们便不支持再分配政策。如果认为自己目前的地位得益于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则倾向于支持各方面的再分配。

◎ 缪莹

在现代社会，“资源再分配”是社会福利的基础。所谓再分配，可以理解为“劫富济贫”——将多余的资源从富人手中拿走，拨给穷人，以达到增进社会平等的目的。

如此说来，是不是穷人应该对再分配举双手双脚支持，而富人则持反对意见呢？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原因在于：今日的穷人可能变成明日的富人，那些正在努力攀爬社会阶梯的人们自然不愿意在成功后将自己辛辛苦苦赚来的资源被再次分配；反之，倘

若今日的富人觉得自己经济地位并不稳定，则很愿意支持再分配的政策，以备日后意外之需。所以，人们对收入资源再分配的态度，和他们对自己的社会阶层流动性（social mobility）的估算是息息相关的。

在过去十几年里，学界对这个现象有不少研究。这些初步研究表明，如果人们将自己现有的社会经济地位归结于家庭背景、社会关系网，或者运气这种外界因素时，他们普遍更愿意接受再分配。然而，当人们觉得自己当下的经济地位取决于自己的努力时，他们则更有可能反对再分配。在俄国、美国等国家的研究也发现，当人们觉得自己有更大的社会上升空间时，会对再分配持保留态度。那么，在中国是否如此呢？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Monash University）的 Russell Smyth 教授 2010 年的调查研究表明，答案是肯定的。

Smyth 教授的调查数据来自受国家统计局直接管辖的北京美兰德信息公司，并对来自全国 32 个主要城市的近万名拥有城市户口的调查对象进行了面对面的访问。在这些受访者中，3.9% 的人支持资源再分配用于加强教育平等，11.5% 支持再分配用来给穷人以基础社会保障，19.9% 支持再分配用来减少收入不公，31.2% 支

持再分配用于失业保障。总共有 40.4% 的受访者支持以上四种再分配用途里的至少一项。

与此同时，访谈里还涉及到受访者对自己是如何达到当下社会经济地位的判断，以及对未来地位变化的预测。其中，36.1% 的受访者认为自己达到今天的地位是通过自我努力达到的，30.7% 认为是运气和机遇，27.2% 认为是通过社会关系，14% 自认是家庭背景的原因，12.3% 觉得是因为认识了有权有位的人。总的来说，人们对自己社会地位上升的空间抱有乐观态度：超七成的人认为自己的地位在将来有或多或少的进步空间，不到两成认为自己的地位不会发生变化，而只有一成不到的人认为有可能下降。

经过数据分析后，Smyth 发现，那些将自己目前的地位归功于个人努力的受访者，对再分配这一政策并不支持。越是认为自己目前的地位得益于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的人，则越倾向于支持各方面的再分配。觉得自己目前地位来自于运气和机遇的人并不支持有益教育平等的再分配，但支持有益收入平等的再分配。

在 Smyth 看来，大量受访者将自己当今的社会地位归结于家庭背景或社会关系，依旧是受到改革开放前的思想影响。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看，一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更多取决于他家庭背

景的资源累积，而非个人努力。而改革开放中不幸的“输家”则更是这么认为的：调查中发现，一些低收入的下岗人员、失业人员、待业人员和政府救济贫困人员，是最支持再分配的人群，毕竟他们是这一项政策最大的得益者。与此同时，老人也更容易接受再分配的概念，Smyth 也将这一点归功于历史原因：在类似的欧洲研究中，东欧人民也比西欧人民更容易接受政府带头的再分配政策，其原因正是在于东欧的社会主义历史。

不过，调查同时发现，个体户和自我雇佣人员也是较支持再分配的人群之一，尽管他们更容易将自己的社会地位和个人努力联系在一起。Smyth 教授对此的解释是：脱离了国家机构“铁饭碗”的人，更容易对自己当下的经济社会地位感到不安，而这种不安全感在毫无保障的个体户身上得到了最大的体现。因此，他们更容易接受用再分配来建起一张社会保障网，以防万一。

更有趣的是，学界也有一种富人“利他主义”和穷人“应得主义”的假说——大意是，假如富人认为造成自己现今社会地位的因素并不受自己控制（如家庭背景和关系等），则更容易有利他主义的表现；而假如穷人同样这么认为，他们则更容易觉得再分配是应得的。在本次调查研究中，这个假设在全国范围内是被证实

的。然而，当其将下岗人员最多的东北三省和全国其他地区进行对比的时候，Smyth 教授则发现，东北三省的高收入者更愿意将资源再分配在失业保障方面，而比较不愿意将资源再分配在教育、收入和社会保障方面。也就是说，这些人群支持再分配，并不一定是出自利他主义的考虑，而更可能是因为东北三省的高失业率十分明显，更容易引起他们的注意。

在文章中，Smyth 教授还提到了一个概念：赫希曼隧道效应 (Hirschman tunnel effect)。赫希曼隧道效应是经济学家 Albert Hirschman 在 1973 年提出的，大意是：假如有两排同方向的车队都堵在隧道里，经过漫长的等待，其中一队突然开始移动了，哪怕你在另一个停止不动的车队里，你也会觉得欢欣鼓舞，因为对方的移动意味着你也很快可以开始移动了。然而，当等待时间越来越长，你看着对方车队不停往前，而自己却原地不动的时候，这种希冀逐渐会变成不耐，失望，和狂躁，直至有些人忍不住企图插到另一个车队去，哪怕这可能是违反交通规则的。

这个比喻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中国或许可以引起共鸣。在 Smyth 教授的调查中，大量受访者对自己未来社会经济地位的乐观估计也表明了他们依旧对“车队”很快可以开始移动抱有极大

信心，哪怕目前他们自己所在的“车队”并没有动静。那么，在这些人的耐心被逐渐消耗光之前，国家如何处理资源再分配的问题，便显得至关重要。在一方面，和谐社会自然需要资源再分配来加强一定的社会平等，用于安抚依旧在车龙中等待的人们；而在另一方面，被用来再分配的资源很可能来自那些充满了雄心壮志想要“超车”的人，而他们恰恰并不支持再分配。其实，不仅仅是中国，全世界国家的政府都面临着如何在这两条车队中找到平衡的问题。

参考文献

- Smyth, R., Mishra, V., & Qian, X. (2010). Knowing one's lot in life versus climbing the social ladder: The formation of redistributive preferences in urban China.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96(2), 275–293.

“南稻北麦”真的导致了文化差异吗？

最近《科学》杂志上的一篇论文称，南稻北麦的农作物种植差异导致了文化差异，南方人更重集体主义，北方更个人主义。我们将向你解释：这一结论是如何得出的，其分析方法为何不恰当。

◎ 王绍达

不同区域间巨大的文化差异究竟因何而形成？这历来是心理学家所关心的重要话题。

一种主流的解释是“现代化假说”。此种观点认为，当一个社会变得更加富有、教育水平上升、资本化程度提高，这个社会中的个体将更加倾向于个人主义和分析性。然而，这种假说无法解释的是：为何日本、韩国、香港、新加坡等地的人均 GDP 已经高于欧盟，但当地的民众却仍旧普遍呈现出集体主义而非个人主

义的特征。

另一种最近被提出的解释是“病原体假说”。此种观点认为，若一个社会中传染性疾病比较肆虐，与陌生人打交道就会变得更加危险，这会导致该社会的文化更加孤立于外界，并在社会内部呈现出集体主义的趋势。这种说法得到了以往一些实证研究的认同，然而这些研究都存在比较严重的漏洞：传染病的肆虐程度与当地的平均温度是高度相关的，而温度又会影响许多其它因素，比如农作物的种类。

农作物种类对文化的影响则是以往的研究没有考虑过的。于是，来自弗吉尼亚大学的 Thahelm 与合作者在最新一期的《科学》杂志发表论文，提出一种“水稻假说”，以农作物种类的差异来解释不同区间的文化差异。他们还试图在中国南北差异的语境下，实证验证这种假说是否比前述的“现代化假说”、“病原体假说”具有更强的解释力。

作者认为，水稻的种植在灌溉与劳动力这两方面显著区别于小麦的种植。种植水稻需要完善的灌溉系统，而灌溉系统作为一种“公共品”，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来建设和修缮，这也就要求村民之间需要彼此协调、配合。同时，一个农户对灌溉系统的

使用有时也会影响到别的农户，这也要求邻里之间有更多的沟通。种植水稻也对劳动力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人类学的研究表明种植水稻所需的劳动力大概是同样面积小麦的两倍，中国古代的农书也认为“缺乏劳动力的家庭最好种植小麦”。由于水稻的种植和收割对劳动力的投入要求甚高，农民通常会采取劳动力交换、错峰播种等方法来更加有效地组织生产，而这些方法都要求村民彼此之间进行有效的沟通和协调。相比之下，种植小麦通常依靠自然降水就已经足够，不需要修建灌溉系统；同时对劳动力的需求也少于水稻。

因此，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种植水稻的村子比种植小麦的村子更有可能存在更多的村民间的合作与沟通。作者认为正是由于不同作物导致村民间的相处、合作方式存在差异，最终形成了地区间的文化差异，比如中国南方与北方之间的巨大差异。而这种差异并不仅仅存在于种植这两种作物的农民身上，而是会深刻地影响所有在种植水稻或小麦的地区成长起来的个体。

作者在北京、福建、广东、四川、云南和辽宁六个省通过问卷调查了 1162 名汉族大学生，并构造出了相关指标来衡量他们的集体主义、分析性等特征。在统计分析中，作者发现，只有“水

稻假说”能较好地拟合数据中的南北差异，另外两种假说都与数据不一致。但这显然不能说明“水稻假说”就是导致南北文化差异的原因，因为除了种植作物不同外，中国的南方与北方还存在许多其它的差异：气候、方言、与游牧民族的交流等等。为了进行严谨的因果推断，作者主要又采取了两种不同的实证设计。

第一种是针对“稻麦分界线”两侧的县进行比较。这种做法有些类似于计量经济学里的“断点回归”，其主要逻辑是：在稻麦分界线两侧的县城，其它条件应该大体类似，主要的区别就是种植农作物种类不同，因此通过将它们进行比较就可以排除其它因素的影响，从而得出“种植水稻 / 小麦”对文化差异的因果影响。作者发现，稻麦分界线两侧的县城的确存在显著的文化差异，且差异的程度和全国整体的南北差异方向、大小都几乎完全一致。作者于是认为这种结果可以极大地支持“水稻假说”的正确性。

但是，作者这样的设计是有着非常明显的漏洞的：在“断点回归”中，最重要的一个要求就是这个“间断点”是外生给定的，不能随便地进行人为选择。“稻麦分界线”并不能满足这一要求，因为种植何种作物显然是由当地的农民根据客观条件进行自我选择的结果。一种可能是，在稻麦分界线的两侧气候、地形等自然条

件存在差异，导致了分界线两侧呈现“南稻北麦”的景象。如果是这样，那么针对这条分界线两侧的县城进行比较就无法规避自然条件的差异对结果的影响，因而并没有达到作者使用此种方法的目的。另一种可能是，稻麦分界线的两侧气候、地形等自然条件几乎没有差异，这符合作者使用此方法的目的，但是我们不禁会问另一个问题：既然自然条件完全一致，为何还会出现分界线两侧“南稻北麦”的景象？这显然是分界线两侧的村民的想法、观念等存在差异，于是在自然约束相同的情况下却做出了不同的生产决策。在这种情况下，则显然是“观念、思想的差异”在先，“农作物种类的差异”在后，前者为因，后者为果。也就是说，是文化差异导致了“南稻北麦”，而非反之。这显然与作者的理论是完全矛盾的。

为了进行因果推断，作者采用的另一种实证设计是计量经济学中的“工具变量法”。如上问指出的一样，如果我们简单地检验“种植水稻 / 小麦”和“文化差异”之间的相关关系，则很难得到一个真正的因果推断，主要的问题在于“种植水稻 \ 小麦”的决策具有“内生性”：种植水稻的地区，与那些种植小麦的地区之间，可能原本就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内在差异。比如即便我们观测到前者

与后者的文化存在显著差异，也不能断言这就是种植水稻的功劳，因为一方面这还有可能是气候、地形、语言、与游牧民族交流等等其它因素的贡献，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是文化的差异导致了作物的差异，而非反之。因此，想要真正地建立起“种植水稻\小麦”与“文化差异”之间的因果联系，就需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工具变量”：这个变量只通过影响“种植水稻 / 小麦”的概率来影响“文化差异”，而与其它不可观测的影响文化的因素全部无关。

作者选取的工具变量是“当地环境是否适宜种植水稻”，原因在于这一变量是自然环境决定的，不可以人为选择，由此可以排除掉“文化差异”决定“作物种类”这种反向因果的情况。然而，作者选择的这个工具变量仍然是非常不恰当的：如上所述，一个恰当的工具变量只能通过影响“种植水稻 / 小麦”的概率来影响文化，它本身不能直接地参与对文化的影响。而我们诉诸常识就不难想到，一个“适宜种植水稻”的环境，通常湿润、温暖，人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与在一个干燥、寒冷的环境下生活相比，非常有可能形成迥然不同的生活习惯、性格、观念等等。因此，“当地环境是否适宜种植水稻”会直接地影响当地文化，这个变量不适合被当成工具变量，于是相关的实证结果也就无法有效地支持他的假说。

综合来看，这篇文章提供了新颖的理论假说，对一个重要的问题给出了新的解读视角，同时在统计学上进行了比较充分的相关性分析，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结果的可信性，这些都是文章的贡献所在。然而，这篇文章的实证部分设计较为粗糙，在试图进行因果推断时，对计量方法的运用存在明显漏洞，因而未能有效地在因果分析的层面上支持理论假说。因此，“南稻北麦”是否真的导致了文化的巨大差异，这一问题还有待未来更高质量的实证研究来给出答案。

参考文献

- Talhelm, T., Zhang, X., Oishi, S., Shimin, C., Duan, D., Lan, X.,; Kitayama, S. (2014). Large-Scale Psychological Differences Within China Explained by Rice Versus Wheat Agriculture. *Science*, 344(6184), 603–608.

为什么农民不愿意入户城市？

农村人口城镇化实际上是在挤压那些生活在城乡边缘的城市外围人口，逼着他们做出选择，反而侧面加强了农村和城市的两极分化。

◎ 缪莹

随着《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的颁布，城镇化在中国已经是不可阻挡的浪潮。新的规划里特别强调了加速“农民工市民化”，将早在2010年便已在部分城市实行的政策以更大力度推广。这是否意味着农民工终将融入城市的大熔炉？

哈佛大学学者尼克·史密斯（Nick Smith）在重庆附近的海龙村做了田野调查。他发现，农民工和村民往往都不愿意加入城市户口。

海龙村是一个典型的受工业化影响而快速发展的地区。从2002年到2010年，由于家具和机械制造业的进驻，海龙村的人均年收入从1500元涨到12000元。这也意味着人口的暴涨：海龙村的村民数量从不到2000升到14000，而其中有12000人是来自川渝其他地区的农民工。

由于在海龙村，原住民和农民工皆是附近的村民，他们之间的区别就和沿海地区原住民和农民工的区别不可同日而语。按照这种思路，史密斯将两者通称为“城市外围人口”（peri-urban）。简单来说，他将海龙村村民和打工者一概看成城镇交界处的常住人口，而不再做更细的区分。在史密斯看来，这些人生活在城市外缘，受着部分城市的制约（商品市场、政治体系），却不能享受全部城市的福利（国家福利和他们并无多大关系）。这就造成了这个群体的与生俱来的不安，这种不安来自没有保障。为了消除这种不安，他们必须要有自己的生存策略，而这些策略往往脱离了国家为其所安排的微薄福利和待遇。

史密斯发现，海龙村居民对国家福利并不信任。这一不信任来自于他们对农村福利的切身体验。研究参与者对低保表示了不满，并认为需要自己掏钱的医保简直是一场骗局。而现今，城市

户口也不能直接换来医保和养老保险，这都是需要自己掏腰包的。受访的很多居民，哪怕已经加入了城市户口，也并没有缴纳这些款项——而这些保险恰恰是城市户口最重要的“特权”之一。

居民们的这项选择并不仅仅来自对未来的不信任（付了钱就一定能拿到养老金吗？），而更多因为他们早已有了一套相互扶持的系统来填补国家福利上的空白。

在海龙村，家庭和村民之间的互相支持是尤其重要的。从在村里盖起一座房子一直到搬进新家，整个过程几乎没有寻求城市中常见的服务行业，而靠的都是亲朋好友和邻里。这些居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生活，在城市户口前面却受到了冲击。对海龙村的村民来说，离开乡亲们而搬到城市的高楼里，意味着和这个关系网的断裂。显而易见，想在城市里重新建立起如村里般以人情为主要结构的邻里关系网，并不那么容易。

另外，史密斯还指出，村民们平时往往在村里的荒地上也有建筑，这些建筑尽管并不被正式认可，却也给建立这张紧密的关系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拆迁补助并不包括这些荒地的使用。事实上，在村里建房是一件“住房适应家庭”的事情，由于土地的宽裕，村民们往往可以在家中添了新丁，或需要亲戚搬入

居住时另外添房，或修改房间的用途。这到城市便困难重重，家庭反而需要适应住房。

再者，为了防止被辞退带来的收入缺失，海龙村的居民们早就有了收入多样化的准备，而这得益于他们游走在城乡之间的身份。在工厂或农田工作的基础上，有些居民在荒地上建起了出租房，月入五千；有些居民则开起了小卖部，棋牌室，和小饭店；任何他们可以直接控制的经济来源都倍受青睐。相比之下，居民们普遍不愿意投资：他们觉得投资是一项危险的活动，容易受欺骗。而城市化再次威胁了这种收入多元性：为了搬入城市，他们必须放弃土地使用权，也没有了农耕或工厂劳作得来的基础收入。这时候居民便需要权衡利弊了——到底城市户口是否值得取代这个非正式却十分有效的支持系统呢？

总结而言，四点原因造成了海龙村居民对城市化抱有警惕：第一，目前的城镇化政策依旧将居民按照时间和地理划分：是否能够纳入城市户口取决于其在一个地区居住的时间长短以及和城市之间的距离。这直接忽略了海龙村村民之间相通的特征，并将他们划分成了不同的群体。第二，国家提供的福利在村民心目中并不可靠。第三，拆迁补偿仅仅补助那些可见的经济损失，而不能

弥补隐形损失，如人际关系网的丧失。最后，农村人口城镇化实际上是在挤压这些生活在城乡边缘的城市外围人口，逼着他们做出选择，反而侧面加强了农村和城市的两极分化。如此看来，从农村到城镇的转变并非如此简单，中国大幅度城镇化需要考虑的问题，还有很多。

本文已刊发于 2014 年 5 月 7 日出刊的《青年参考》

参考文献

- Smith, Nick R. (2014). Living On the Edg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Reform and Peri-urban Precarity in China. *Journal of Urban Affairs*.

中国独立纪录片：公民行动进行时

独立纪录片相当于一种“独立媒体”，更有可能建构开放的对话空间，对主流媒体的官方意识形态做出批判。在与主流媒体、政府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中，独立纪录片的制作和传播形塑着公民的身份观念，日益推动着中国社会公共空间的建设与转型。

◎ 于灵歌

看过《华氏911》、《神经病人》等纪录片的人一定对美国导演迈克·摩尔印象深刻：这位因吐槽美国政府而赫赫有名的“钉子户”，最拿手的就是通过拍摄纪录片来给政府挑刺，揭露社会问题。在当今中国，虽然还没有迈克·摩尔这样的“纪录片大拿”，但越来越多的中国公民选择独立纪录片作为介入社会生活的表达方式。

近日，一篇发表在学术期刊《亚洲研究》的文章指出，中国

的“影像行动主义”（Video Activism）正悄然兴起。作者对2004到2010年的独立纪录片作品进行观察，认为它作为一种“独立媒体”，在与主流媒体、政府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中，形塑着公民的身份观念，日益推动着中国社会公共空间的建设与转型。

新中国成立以来，纪录片的话语风格随着时代变迁和技术进步有所变动。曾经，毛时代的纪录片有着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纪录片实际成为政治宣传片的代名词。改革开放后，下岗、贫穷、教育缺失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受人关注，一部分职业、半职业电影人通过私人出资方式拍摄独立纪录片，关注弱势群体，反映社会问题。他们的作品带有一定批判色彩，于九十年代形成了“新纪录片运动”。

进入新世纪，随着技术的发展，数码摄像机开始普及，独立纪录片的制作成本大大降低，数以百计的作品涌现出来。大量独立纪录片着重揭露社会中的丑恶与剥削现象，开始以“耸人听闻”的主题为卖点，甚至不经当事人同意就使用了他们的图像资料。然而，自2004年起，这种方式渐渐被舍弃。部分独立纪录片开始采用实验性的话语风格——以一种“调查记者”的姿态，大量使用调

查采访的第一手资料，传达着与主流媒体不甚相同的观点与信息。

比如，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发生后，大量主流媒体报道聚焦在救灾英雄或灾难本身，而潘剑林纪录片《谁杀了我们的孩子》则聚焦在地震中校舍倒塌导致学生伤亡的事故，通过对受害人家属以及相关专家、官员的采访，披露了事故背后的争议与问题。同样，徐辛的纪录片《克拉玛依》展现了1994年新疆克拉玛依友谊馆发生大火、导致200多名学童葬身火海后，学童家长们10多年来痛苦不堪的生活与回忆。针对外界流传的悲剧起因——那句“学生们不要动，让领导先走”，由于话题敏感，主流媒体极少进行如此大规模的实地采访。

除了独立导演对灾难、事故进行调查性拍摄，文章作者认为，还有一类新的影像风格，可归为“行动者”的纪录片。这些独立纪录片的导演通常不是专业的电影人，而多为知识分子、学者、艺术家和记者。片子的议题更为广泛，包括环保、艾滋病、人权与法治等大量公共性的社会议题。这类纪录片通常不是按照拍摄计划进行，而是在偶发事件中拍摄，甚至常常与当地民众一起对抗来自官方的压力，从而自下而上反抗官方主流媒体垄断的话语权。

而在制作和传播这些纪录片的整个过程中，无论是拍摄者还是观看者，他们对公共话题的讨论、关注与参与都促进了其公民身份观念的养成。

首先，制作者担任了公民行动者的角色。他们多是中国当代的“公共知识分子”，在政治、社会中扮演着积极的角色。对于社会行动者来说，独立纪录片是一种直接有效的参与工具：这不仅记录了他们的言行，更是参与者“到达现场”的见证，具有真实性和力度。知名公民行动者、中山大学教授艾晓明在她的纪录片《公民调查》中，就拍摄了公民行动者谭作人等人追踪四川地震校舍倒塌真相的过程。这不仅是对公民调查活动的确证，也在向社会传播着调查本身所关注的话题和信息。片子在网上公布后，更多的志愿者、行动者参与到了调查中来。

其次，观众在观看中公民意识得到了激发和培养。由于独立纪录片一般只通过网络或小范围放映进行传播，因而所吸引到的观众一定是对影片内容感兴趣、关注相关社会话题的人，如电影专业教授、学生以及 NGO 工作者等。尽管观众规模未必庞大，互动却往往十分热烈，从纪录片形式到内容各方面进行讨论。艾晓

明的纪录片《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在正片内容之外就记录了观众的交流过程，片子的放映为相关议题关注者提供了公共讨论、表达意见的空间。

此外，独立纪录片不仅对小部分知识分子、公民行动者有所影响，还能唤起大众对公共问题的关注，甚至动员公民的直接参与。最显著的例子即是环保议题的纪录片。著名民间环保人士、奚志农的妻子史立红，曾拍摄纪录片《怒江之声》，这是国内第一部反映怒江的原住民对于怒江建坝的不同声音的纪录片。在拍摄之初，当地居民并不愿意对史立红团队表明自己的真实想法，只是被动地接受政府的移民政令。但随后史立红为他们播放了漫湾大坝建设时的纪录片，片中居民反映出补偿过少、移民后失业贫穷等问题，面临相似情况的怒江居民最终也敢于表露出自己的不满声音。最终，在民众的压力下，当地政府同意提高补偿额度并为移民提供医疗保险。而由于怒江大坝引起的多方争议，该建坝项目被暂时叫停。

由于独立纪录片的“独立性”——不追求商业利益，也不需接受有关部门的审查，它们更有可能建构开放的对话空间，对主流

媒体的官方意识形态做出批判，形同“独立媒体”。诚然，在中国，独立纪录片、尤其是关乎社会公共话题的纪录片作品仍然属于小范围制作，但却是具有相当社会影响力并不断成长的草根现象。

参考文献

- Viviani, M. (2014). Chinese Independent Documentary Films: Alternative Media, Public Spheres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Citizen Activist. *Asian Studies Review*, 38(1), 107–123. doi: 10.1080/10357823.2013.873016

谁在支持草根非政府组织？

尽管 70% 的受访机构处于不完全合法的“灰色地带”，但却有近半数机构至少有一个关系紧密的政府机构或人员。资金来源方面，拥有合法注册身份的组织更受基金会偏爱；艾滋防治议题则在吸引国外基金会上最为成功。

◎ 刘冉

近年来，中国草根非政府组织的数量急剧上升，它们对公民社会的动员以及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也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顾名思义，草根组织是生长于民间、独立于政府之外运作的非营利机构，那么它们的发展资源从何而来？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的三位学者安子杰、陶林与陈健民通过对位于北京、广东和云南的 263 个草根组织进行了调查与访谈。他们发现：这些机构能够动员的人力资源包括志愿者、理事会，以

及非正式的政府关系。而在资金支持方面，则表现出明显的地域差异和议题差异。

研究者选择北京、广东和云南作为研究区域，是因为此三地草根组织活跃，且工作领域有一定区分。其中，首都北京集中了大批注册和未注册的非政府组织，工作领域涵盖本地和全国范围内的多种议题。云南省经济发展滞后且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因而哺育了关注环保和扶贫的草根组织；由于艾滋病感染问题较为严重，这里也聚集了一批艾滋病关怀与防治机构。广东因其繁荣的经济和相对开放的政策环境，受全球市场和国际组织影响较大，因此民间志愿组织发展早于其他省份；此外，因省内聚集大量外地农民工，也由此哺育了较多关注劳工权益的机构。在其后的问卷调查和访谈中，研究者也印证了草根组织的工作领域与地域具有一定相关性。

接受调查的 263 家草根组织中，70% 并未在国内注册为社会团体——这其中包括了不同的状态：未注册、注册为商业公司、挂靠其他机构，或在香港注册等。北京是注册社会团体比例最低的地区，但与此同时彻底未注册的团体比例也最低，这是因为大批机构选择注册为商业公司（55.4%；广东为 19%，云南为 8.7%）。

研究者指出，这可能是由于首都的特殊政治环境导致政策管理较为严格，而广东与云南的气氛较为宽松，对非正式组织文化和个人关系网开一面。

研究者发现，虽然缺乏政府支持，但草根组织具有较强的社会人力资源支持。首先，28% 的机构没有全职雇员，工作全部靠志愿者完成；另外 45% 的机构雇员少于六人，在项目运转时需动员大批志愿者；所有机构中，超过 92% 在一定程度上依赖志愿者。研究者认为，全职员工的缺失体现了草根机构在资金和吸引力上的劣势，但志愿者的支持体现了一定的社会认可。

其次，除志愿者动员的社会能量之外，理事会也为草根组织带来了资金和政治保护。尽管中国的民间组织注册程序并不要求成立理事会，但近年来愈来愈多由国外基金会组织的 NGO 培训项目令理事会渐渐成为 NGO 标配。总体来看，58% 受访机构有理事会，其中北京比例最高，达 73%；而在所有设立理事会的机构中，74% 的理事是无薪的。尽管理事会的工作效果仍有争议，但其存在本身能够增强草根组织在国外基金会中的认可度。

草根组织所动员的第三类社会资源是与政府的非正式关系。尽管 70% 的受访机构处于不完全合法的“灰色地带”，但却有近半

数机构（46%）至少有一个关系紧密的政府机构或人员；这种联系可能开始于机构成立之后，也可能植根于机构成员此前的个人社交网络。这一点在北京和云南尤为明显（分别为54%和52%），在广东则比例稍低（34%）。这可能是由于政治资本在北京更为重要，而云南的HIV关怀组织更需要从卫生部和相关部门申请资金。

在资金来源方面，研究者通过数据分析发现，地域、议题、成立时间和注册身份对机构获得的资金支持有显著影响。其中，位于北京的组织在争取国内外基金会资助和商业公司捐款上具有明显优势，因此资金来源也最为多元；拥有合法注册身份的组织更受基金会偏爱；艾滋防治议题则在吸引国外基金会上最为成功。然而，值得警惕的是，有23%的机构八成以上的资金都来源于基金会，这种过于单一的资金结构意味着较弱的应变性。例如，2013年全球基金（Global Fund）宣布撤出中国，这可能对HIV关怀机构造成严重打击。

在政府支援方面，HIV议题明显最受政府部门关注，其他议题则有很少几率能够获得政府支持；有明确章程的机构、注册为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团体的机构更容易获得政府支持。此外，成立时间较长的组织更容易与政府保持良好关系；事实上，成立于

1990年代的许多组织，其领导者自身就拥有广泛的人际关系网。

此外，尽管未注册机构不能公开募款，但半数机构曾接受个人捐款，且个人捐款者更偏爱未正式注册的组织。然而与助学机构和劳工机构相比，个人捐款者对 HIV 关怀机构似乎不感兴趣，这可能说明此类机构在获取社会支持方面存在先天的道德劣势。

研究者总结并指出，在支援草根组织方面，基金会和政府机构的偏好较为一致，而个人捐款者的偏好与之明显不同；这一差异可能会随国内基金会的增长而愈发显著。因此，处于灰色地带和致力于非 HIV 议题的草根组织需要继续滋养和依赖其社会土壤，志愿者和个人捐赠者将对草根组织的多元发展起到核心作用。

参考文献

- Spires, A. J., Tao, L., & Chan, K. M. (2014). Societal Support for China's Grass-Roots NGOs: Evidence from Yunnan, Guangdong and Beijing. *China Journal*, 71, 65-90.

越来越多私营企业主成为基层政治精英

企业主正形成新的基层政治精英阶层。这种源于经济改革的趋势，对于企业主和当地党组织同样有利。新兴精英在中国并不一定会组成统一的新阶级形成对于政治改革的压力，他们更倾向于通过与当地党组织合作以获取政治地位。

◎ 刘冬舒

中国基层政治精英的形成和变迁，一直是研究中国政治发展的学者们重点关注的领域。无论是古代以士绅为主的农村治理，还是建国后依据阶级出身选拔基层干部的制度，都与中国社会整体的政治结构和政治发展密不可分。香港大学学者阎小骏基于对河北省某县的实地考察，提出：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企业主取代传统工农阶级，成为基层党组织的党委书记，并形成新的基层政治精英阶层。作者进一步指出，这种趋势改变

了基层的资源 and 政治结构分布，并在经济自由化背景下的中共基层统治结构转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者在三年时间内对河北省 Q 县进行了实地调查研究。结果显示，全县 354 个行政村中，有相当比例的村支书源自企业主群体，而“选拔先富群体进入乡村管理队伍”也成为当地选拔村支书的重要依据。这类村支书一般在公开的村级选举中获胜并由当地镇党组织任命。

与传统村支书权力主要基于上级任命不同，新型村支书的权力更多是基于他们与当地村民社会之间的互动和联系。作者根据这种联系，把新型村支书分为以下六种类型：(1) 外地经商的本地人士；(2) 在氏族中具有较高地位的本地商人；(3) 专业人士（乡村医生等）；(4) 本地农场主；(5) 从商的退伍军人或公务员；(6) 村镇集体企业经理。

作者进一步指出，这些新兴经济精英通常依靠相似的途径获得政治资本，并参与本地政治活动。这些途径主要包括本地慈善活动，为本村村民提供致富的途径，以及与当地政府的商业合作。这些途径保证了新兴的经济精英可以同时获得来自当地政府和村民的支持，并藉由这些支持，进入当地政治权力结构。

新兴企业主和经济精英为何寻求担任村支书？通过对 Q 县村支书的访问，作者分析了四类动机。第一类主要是为了“寻租”，即通过成为当地政治领袖确保其在本地的经济利益。第二类为政治追求，即通过成为当地政治领袖，获得参与当地政治决策的权力。第三类为宗族利益，即通过成为当地政治领袖来保护自己宗族的利益。最后一类则是为了社会地位，即通过担任村支书，获取与自己经济水平相称的社会声誉和地位。在这四类中，第一类仍然是最主要的动机，这反映出私营企业主寻求成为当地政治领袖，最主要的考虑仍然是经济利益。

根据其调查结论，作者总结说，新兴经济精英们并非以统一的新兴阶层的身份寻求政治权力，相反，他们更倾向于依据各自独特的情况分别寻求政治地位。这进一步证实了之前研究的观点，即新兴经济精英在中国并不一定会组成统一的新阶级并形成对于政治改革的压力，相反，他们更倾向于通过与当地党组织合作以获取政治地位。这种源于经济改革的趋势，对于企业主和当地党组织同样有利——企业主获得了参与本地政治的机会，而当地党组织可以利用企业主的人脉和知识更好地治理当地，发展经济。因此，两方都有相当意愿推动新兴企业主成为基层政治领袖。

这种趋势反应了中共在基层管制策略上的调整与转变，而这种始于改革开放初期的转变——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无疑改变了中国基层政治结构，使得以私营企业主为代表的经济精英更容易将他们的经济成就转化为政治权力，并使得他们在中国未来的政治发展中，可能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参考文献

- Yan, X. (2012). “To Get Rich Is Not Only Glorious”: Economic Reform and the New Entrepreneurial Party Secretaries. *The China Quarterly*, 210, 335–354.

大坝建还是建？到底谁说了算？

——中国环境政策的角力模式

大坝建还是建？到底谁说了算？中国政策的制定过程已经出现了多元化的倾向，即游离在政府体制之外的个人与组织也开始参与到政策制订的博弈之中，并影响政策结果。

◎ 邵立

以围绕怒江大坝的争议为代表，中国的环境政治（Environmental Politics）愈发成为受人关注的议题。怒江大坝并非孤例，类似的水坝建设争议还包括都江堰水坝、大渡河瀑布沟水坝等等。

康奈尔大学副教授毛学峰（Andrew Mertha）在专著《中国水之勇士：公民行动与政策变迁》中分析了这三个大坝的建设争议。三个计划都存在支持者和反对者，支持者通常由当地政府和负责水电工程的大型国企组成，相对于反对者拥有较多的政治权

力，按道理来说工程都能成功推行。但这三个案例的政策结果却不尽相同。其中，瀑布沟水坝的反对者被政府压制，都江堰的计划则被政府完全放弃，而怒江计划则是妥协和搁置*。

毛学峰采用了一种比较流行的视角——政策研究（policy analysis）的框架来分析政策背后的机制。政策研究大都从美国政治的研究之中发展而来。从美国民主政治体制出发，学者习惯应用多元主义的思维来看待政策的制定——即一个政策的最终出台，是在包括政府部门、企业、社会团体等利益相关各方，于一定制度环境下相互博弈而达成的共识或妥协。有学者认为，由共产党政府领导的政策制订过程，并不符合多元主义理论中“各方地位相对平等”的假设。例如王绍光和樊鹏就认为，中央领导层为医疗改革的“共识型决策”最后把关。但在环境政策领域，多元主义依然被视为解释政治博弈的有力框架。在有关水坝建设的政策研究之中，这种应用尤为突出。

毛学峰认为，反对者成功的秘诀是拥有三件武器：一是有积

* 曹海东, 张朋 (2004). 怒江大坝突然搁置幕后的民间力量. *经济*, 5. <http://finance.sina.com.cn/g/20040520/1615770147.shtml>

极的政策事业家（policy entrepreneur），例如环保组织；二是成功设置议程框架（issue framing），比如在都江堰建坝的争论之中，反对者成功塑造“保护文物框架”，压制了支持者的“发展框架”；三是得到广泛的支持和联合，即得到超出地域以外舆论的关注和支持，例如在怒江一例之中，环保组织不仅仅积极联系媒体报道，还利用个人关系与中央政府的官员进行接触游说，但瀑布沟当地民众的抗议却没有多少人知道。

通过这三个案例的比较，毛学峰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政策的制定过程已经出现了多元化的倾向，即游离在政府体制之外的个人与组织也开始参与到政策制订的博弈之中，并影响政策结果。

在今年新出版的《比较政策分析》学刊之中，新加坡国立大学的 Heejin Han、北伊利诺伊大学的 Brendon Swedlow 和 Danny Unger 三位研究者也把目光投向了怒江建坝计划。

他们运用另一个政策分析理论“倡议-联盟框架”（Advocacy Coalition Framework, ACF）来解释怒江建坝计划的政策变化。这个框架认为政策分歧通常只存在于一小部分专家之间，这些专家组成了相对稳定的“政策亚系统”（policy subsystem），存在于一个更广阔的政治系统里。

如果说毛学峰的理论着重解释相关利益群体如何运用政治能量, Han 等人则把分析重点放在支持者和反对者的理念分歧之上。他们把支持者和反对者分成两个联盟。“发展联盟”由华电公司、云南政府、怒江县政府、发改委等组成,他们主张快速上马大坝项目,促进当地经济增长,生产可再生能源。而“环保联盟”则由环保部门、环保组织、媒体和一部分学者组成,他们认为应该保护怒江的生态和地质资源,主张取消该建坝计划,如果不行的话,至少做到决策过程公开透明,让更多利益相关者参与到决策之中。

两个联盟都在政府内部和公共领域积极展开活动,谋求通过改变亚系统的外部环境来改变政策决定。例如,云南省和怒江县的官员想抓住全国人大开会的机会请求中央批准该项目,支持建坝的学者也在公众平台上论证“环保联盟”的破坏环境一说是杞人忧天。而“环保联盟”则通过媒体报道、环保评估、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等手段进行还击。在双方博弈的过程中,谁也说服不了谁,也没有达成任何共识和妥协。

因此, Han 与合作者根据倡议-联盟框架解释:怒江计划的反复搁置与重启,并不是双方角力的结果,而是来自外部原因的冲击 (external shocks)。怒江建造 13 座大坝的计划在 2003 年 8 月

提出，得到了发改委的支持。但在当年9月《环评法》实施，环保总局加入到建坝反对者的队伍。2004年2月，温家宝总理下令搁置计划。但从2005年到2006年1月，建造4座大坝的新方案出台，发改委和环保总局进行联合评估。但在2009年，温家宝再一次下令搁置整个计划。到了2013年政府换届之后，整个计划才再次重启。

在这个过程中，有两个外部冲击引起研究者的注意。第一个是在计划提出早期环保总局的介入，第二个是温家宝总理的命令。环保总局是一个特殊的外部冲击。研究者认为它只在计划刚提出时属于外部冲击，一旦介入，它就进入了政策亚系统，成为了“环保联盟”的一部分。而温家宝总理并不属于政策亚系统任何一方，他搁置计划更多是基于“和谐社会”治理思想中对于公众舆论的有意尊重。

虽然 Han 等人与毛学峰对政策结果的形成机制的见解有差异，但他们都同意多元化的联合政治（pluralistic coalition politics）在被看作“威权独断”的中国政治体系下得到了发展。但这种多元化并不见得是很普遍的现象。首先，这些文献都在观察怒江计划这种利益牵涉面广、科学技术条件复杂的水利工程，很难说能推广

到其他的政策领域。其次，温家宝总理对怒江计划的决定性动作，说明了高层政治家依然对政策制定有不成比例的影响力。因此虽然多元的社会主体似乎已参与到政策争论的过程中，但不一定能真正决定政策结果。

参考文献

- Han, H., Swedlow, B., & Unger, D. (2014). Policy advocacy coalitions as causes of policy change in China? Analyzing evidence from contemporary environmental politic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olicy Analysis: Research and Practice* (ahead-of-print), 1–22.
- Mertha, A. (2008). *China's water warriors: Citizen action and policy change*.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王绍光，樊鹏（2013）。中国式共识型决策：“开门”与“磨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大飞机之梦依然遥远

商用航空制造业是一项国际化、标准化的产业，对于市场化程度要求很高。中国试图采取“国家主义”，“举全国之力”取得成功，困难和挑战远远超过预期，前期投入的大笔资金也有可能“打水漂”。

◎ 归宿

近年来，中国的“大飞机之梦”越来越多地被人提起。商用航空制造产业作为国家科技实力和制造能力发展的重要标志，受到中国政府的青睐。但美国智库兰德公司的环境、能源和经济发展项目组在最近的一篇专题研究报告中指出：尽管有数以十亿计的资金投入和一系列优惠政策的扶持，中国的商用航空制造业发展并未达到预期，未来发展面临的挑战依然严峻。

行业发展前路漫漫

中国一直对制造商用飞机有着浓厚兴趣。但长期以来，中国的飞机制造业以制造军用飞机为主，商用航空制造业被严重挤压，产业规模非常有限，中国的商用航空市场也基本被外国企业垄断。

进入 21 世纪后，中国政府下定决心发展自己的商用航空制造业，并于 2008 年整合力量，成立了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COMAC，以下简称中国商飞公司），试图将其打造为比肩空中客车（Airbus）和波音（Boeing）的国际大型商用航空制造公司。ARJ-21“翔凤”支线喷气式客机和 C919 窄体中短途商用客机成为中国商飞公司首批重点发展机型。

兰德公司的报告认为，受政策刺激影响，中国商用航空制造业取得了一定发展。2005 年 -2010 年间，行业总产值增长了两倍多，相关从业人员超过 25 万人，ARJ-21 和 C919 两款机型在研发、生产、推广等方面也都取得了一些突破。但报告同时指出，目前商用航空制造业在中国工业总产值的占比仍然很小，2010 年时仅有 0.17%。同时，中国制造的飞机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也很有限，2011 年时仅占国际市场份额的 1.3%。中国民用航空制造业距离预

期的发展目标显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困难和挑战较为突出

报告列举了中国商用飞机制造产业面临的如下困难和挑战——技术上存在不足。中国已在制造飞机涡轮叶片等方面取得突破，但仍无法自主生产大飞机引擎、航电设备等重要部件。由于航空业高度重视安全问题，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FAA）和欧洲航空安全局（EASA）要求，任何航空零部件在使用前都要经过其检验和认证，这也对中国相关制造企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行业人才积累薄弱。项目组通过调查走访发现，中国商飞公司飞机设计团队中的大部分成员还不满 30 岁，商用航空制造所必需的复杂系统整合能力比较缺乏，这也是 C919 项目研制受阻的重要原因。此外，作为国企，商飞公司内部等级分明的管理架构，对跨部门交流合作造成阻碍，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企业效率。

海外市场竞争力有限。中国政府通过对外援助等方式，向一些东南亚国家推销中国商用飞机，目前也已有了一些成功案例。但这些案例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加之双方签订的合同很“软”，

未来执行程度还有很大疑问。中国商飞集团在海外缺少维修保障网络，同样严重制约了中国商用飞机在海外市场的竞争力。

内部博弈负面影响凸显。兰德公司项目组了解到，研制进度领先的 ARJ-21 项目在中国商飞公司内部“失宠”，负责 ARJ-21 项目的工程师和经理们都被抽调“攻关” C919 项目。这导致 ARJ-21 测试时发现的一些问题无法得到及时解决，可能会对其最终获得美国和欧洲的安全认证产生影响。

产业政策尚待调整

报告认为，中国扶持高端制造业的产业政策已形成一套“组合拳”：首先集中全国力量，成立产业龙头企业，从资金、人才上给予大量支持；再通过建立合资企业，引起国外投资和技术；要求相关国有企业必须购买“国货”，为产品建立销售渠道。此外，中国政府还会通过外交渠道，向国外市场大力推销高端制造业产品，帮助其增加国际竞争力。

但是，这套扶持政策“组合拳”的负面效应同样不容忽视，比如龙头企业产能过剩、产业整体“大而不强”、易与外国相关企业

产生知识产权纠纷等。

对于中国的商用航空制造业来说，上述政策的扶持效果并不明显。报告指出，除了之前提到的产业规模和海外竞争力等指标外，接受项目组访问的大多数专家都认为，即便中国商飞公司成功地将 ARJ-21 和 C919 两款机型推向市场，也不足以打破空客和波音两强垄断的局面。特别是 C919 可能还要面临空客和波音同类新机型 A320NEO 和 737MAX 的挑战，获得市场份额的难度更大。正如一位业内人士所说：“对于中国而言，造飞机并不难，只要钱投够了就行。但是运营一家有生命力、竞争力的飞机制造公司就没这么容易了，钱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报告认为，商用航空制造业是一项国际化、标准化的产业，对于市场化程度要求很高。中国试图采取“国家主义”，“举全国之力”取得成功，困难和挑战远远超过预期，前期投入的大笔资金也有可能“打水漂”。报告建议，中国政府可以考虑将更多资源投入到通用航空制造业（General Aviation Manufacturing）。中航通用飞机有限公司（CAIGA）已在该领域进行了一系列国际收购，为打开国际市场奠定了良好基础。

此外，中国还可以通过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为国外企业提供更公平投资环境等方式，吸引空客、波音等巨头更多在中国投资建立合资企业，以使自己更好地融入国际商用航空技术供应链，并借此促进本国相关产业的内生性发展。

本文已发表于 2014 年 4 月 23 日出刊《青年参考》

参考文献

- Crane, K., Luoto, J. E., Harold, S. W., Yang, D., Berkowitz, S. K., & Wang, X. (April 2014). *The Effectiveness of China's Industrial Policies in Commercial Aviation Manufacturing*. RAND Environment, Energ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Program.

修建高速公路如何影响中国区域经济发展

修路的结果不一定是致富——在 1997—2006 年间，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相比于其它边缘城市，被纳入高速公路网的边缘城市经济增长率平均要低 18 个百分点，工业总产值的增长率平均要低 26 个百分点。

◎ 王绍达

“要想富，先修路”，这曾经被认为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一条“金科玉律”。政府和民众似乎普遍认为，修建高速公路，可以帮助中心城市的各种资源（资本、人才、技术等）向规模较小的边缘城市扩散，从而带动边缘城市的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缩小区域间的经济不平等。

在这个美好愿望的指引下，中国政府于 1992 年开始实施一项规模宏大的“高速公路网”计划。该计划试图以高速公路连接全国

所有人口超过 50 万的城市，项目总施工长度超过 35000 公里，耗资超过 1200 亿美元。在 2004 年，由于这一项目即将提前完成，国家进一步将项目范围扩大为“连接所有人口超过 20 万的城市”，并计划最晚于 2020 年前全部完成。

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边缘城市被通过高速公路与中心城市相连接，学术界却也逐渐开始产生质疑的声音：修建高速公路真的有助于边缘城市的发展并缩小区域间的经济不平等吗？在一篇即将发表于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的最新论文中，来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经济学家 Benjamin Faber 试图运用严谨的实证分析来回答上述问题。

研究者认为，如果我们简单地检验“通过高速公路与中心城市连接”和“边缘城市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则很难得到一个真正的因果推断，主要的问题在于“修路”的决策具有“内生性”——被纳入高速公路网的边缘城市，与那些没有被纳入高速公路网的城市之间，可能原本就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内在差异。即便前者比后者经济增长更快，也不能断言这就是修建高速公路的功劳，因为还有可能是前者本身就比后者有更重要的政治地位、更好的经济发展潜质等等。

因此，想要真正地建立起“通过高速公路与中心城市连接”与“边缘城市经济发展”之间的因果联系，就需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工具变量”：这个变量只通过影响“边缘城市被纳入高速公路网”的概率来影响“边缘城市的经济发展”，而与其它不可观测的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全部无关。

作者于是独具匠心地利用算法中的“最小生成树”这一概念来构建工具变量，并由此估计修建高速公路的经济影响。他的主要思路是：给定一些确定的点（50万人口以上大城市，亦即“中心城市”）必须被纳入这个高速公路网，不考虑其它因素，理论上可以计算出一个对应的“最小生成树”（可以理解为一种铺设方案），使得铺设高速公路的总成本最低。作为一个理性的决策者，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肯定倾向于用这种成本低的方案。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如果一个边缘城市的地理位置恰巧处于上述的“最小生成树”上，那么它最终被纳入实际的高速公路网的概率就比其它的边缘城市更高，而这种概率的差异又完全是由算法的结果客观地决定，不受其它人为因素的影响。

于是，作者以“边缘城市是否处于最小生成树上”作为工具变量，在因果推断的层面上估计出了高速公路对区域经济发展的

影响。

具体的实证结果方面，作者发现“被纳入高速公路网”对于“边缘城市的经济发展”具有显著而稳健的负面作用：在1997—2006年间，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被纳入高速公路网的那些边缘城市，相比于其它边缘城市，其经济增长率平均要低18个百分点，而其工业总产值的增长率平均要低26个百分点。

通过对几个推论的验证与分析，作者进一步确认，高速公路之所以会对边缘城市产生如此巨大的负面经济影响，主要原因是高速公路导致地区间运输成本下降，从而导致边缘城市的工业经济不断向中心城市聚集。

综合来看，这篇文章运用了新颖而严谨的实证方法，分析了重要的经济问题，得出了虽然出人意料、却又令人信服的实证结论，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同时，本文所采用的分析框架还可以被应用于电力、电信、自来水等许多与“网络”有关的经济学研究中。

参考文献

- Faber, B. (2012). Trade Integration, Market Size, and Industrialization: Evidence from China's National Trunk Highway System. Working Paper.

中国还是巨型跨国企业：究竟谁在收购世界？

尽管当今中国的经济规模不断发展扩大，但中国远未具备收购世界的能力，也并未采取收购世界的行动。相反，源自西方的巨型跨国企业却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受益颇丰。

◎ 陶郁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会否威胁国际秩序的稳定？这个问题常常引发激辩。剑桥大学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诺兰（Peter Nolan）教授在2012年的专著中，通过对巨型企业和重要行业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明确指出：“中国并未收购世界，并且鲜有迹象显示中国会在不久的将来收购世界。”

在诺兰看来，“西方”与“东方”、“南方”与“北方”之间的界限曾经泾渭分明；然而日益深化的全球化进程，已从根本上改变了

上述状况。汽车和饮料产业主要国际厂商的统计数据说明，根植于西方的巨型跨国企业，才是全球化进程中的主要收购者。

具体来说，这些巨型企业利用许多国家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通过建立跨国组织或者高强度的兼并和收购行动，迅速实现了国际扩张。在此过程中，此类企业往往将总部保留于高收入国家，同时依据国际市场的结构变化，对资产进行了大规模重组。通过重组，巨型企业得以充分利用全球化进程所带来的便利以及自身在技术、资本、人力资源和市场经验等方面的优势，不断强化核心业务并剥离外围业务，对资产进行优化升级。

诺兰发现，上述产业整合进程不仅遍及主要发达国家，而且使发展中国家深受影响。通过这一进程，巨型企业在国际市场上集中掌控了财富、技术和商业权力，而它们实现增长的方式，则主要是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去进行商业扩张。这种商业扩张或许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指标，但最后的实际获益者却是巨型企业。

诺兰指出，庞大的人口规模、环境压力与治理成本对中国经济发展提出了诸多挑战，但巨型跨国企业却不必为这些隐性支出买单；相反，它们可以充分利用全球化进程与中国的开放政策，最

大限度地从中国的原材料、劳动力和消费品市场上获取利润，并不断扩大其影响这个全球最大新兴经济体的能力。

巨型企业或许对于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现代化进程具有推动作用，但它们在中国获得成功的主要结果，却是强化了自身在技术、金融和市场等方面的强势地位。相反，由于一些国家对于中国企业存在误解和敌意，即便是那些从规模上看已经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的中资企业，其核心业务对象和利润来源依然主要局限于国内市场。

诺兰还发现，巨型企业不仅直接从中国市场上获取利润，它们还逐渐将影响力和控制力渗透到了中国产业结构的深处。许多被贴上中国标签并被作为“中国威胁”证据的新兴公司，实际上却与高收入国家的巨型企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以银行业与航空业为例，即便是一些被普遍认为是中国经济命脉的关键产业，也不乏巨型跨国企业的深入参与。

因此，在诺兰看来，中国虽然正在崛起，但由于在技术、资金和市场等方面受制于西方，中国企业仍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相反，巨型企业目前依然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产业链中的关键环节，而它们也常常利用这种优势，努力维系自己对于世界

经济的紧密掌控。

同时，诺兰敏锐地观察到，较之于许多西方发达国家及这些国家中的大型基金公司，中国的对外投资与外汇储备规模其实并不算庞大，但这些领域却常常成为一些人宣称中国具有经济野心的“证据”；而中国企业如果想在高收入国家中扩展组织或者业务，则不得不面对诸多制度屏障。

可见，如果深入探究数据背后的结构和机制，我们便不难发现：当今中国的经济规模虽然不断发展扩大，但中国远未具备收购世界的的能力，也并未采取收购世界的行动。尽管一些观察家指责中国正在采用对外投资和企业并购等方式逐渐控制西方国家的经济命脉，但中国企业对于西方经济的影响，实际却远远称不上“威胁”。

参考文献

- Nolan, P. (2012). *Is China Buying the World?* Cambridge: Polity.

中国的央行有多独立？

一直以来，央行被视为中国政府体系内部较为开明的力量。其实，推动市场化导向的改革，本身也是央行提升自身地位努力的一部分。央行地位虽然在近年来有所提升，但眼下新一轮经济刺激出台与否，仍然因为部门博弈而充满不确定性。

◎ 王韬

最近，经济下行的风险又一次摆在中国决策者面前。新一轮刺激是不是迫在眼前？截止目前，市场虽然对央行是否全面宽松货币政策各有解读，但根据此前的经验，每逢经济下行，市场开始担忧，宽松刺激的可能性都迅速攀升。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不断强调为调整经济结构而容忍经济减速的态度，可是在中国特有的制度下，这一承诺仍然缺乏足够的可信度。

唯命是从，还是有较大自主权？

经济宏观调控主要有两个工具：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按照大部分发达国家的经验，货币政策由相对独立于政府的央行制订，以保证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之所以保证央行的独立，是为了避免政府对货币政策的直接干预，避免其通过扩张的货币政策稀释政府债务，实行短视的经济刺激，导致物价攀升，威胁经济长远发展。根据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观点，独立的央行是保证通胀有效控制的必要前提。也有各种研究从实证上证明：央行独立对与物价控制绩效显著正相关。

从很多方面衡量，中国的央行——中国人民银行都算不上独立。它下属于国务院，受国务院的直接领导，行长也由中央任命，任何重大的货币政策变动都需要经过国务院会议批准通过。加上中国实质上党政一体的政治制度，通常的观点认为，中国人民银行缺乏独立决策权，只是中央政府统一政策立场的执行机构。

央行听命于国务院，跟随政府财政政策实施货币政策，是常态，2008年金融危机应对就是一例。危机之后，中央决定实施财政四万亿刺激计划，货币政策也随之不断宽松，央行多次下调存

款准备金率。但是根据《华尔街日报》2011年的报道，央行行长周小川和央行官员实际上对这一刺激政策存在异议，担心其规模过大，引发不良贷款和通胀。尽管如此，这并未改变财政货币政策双管齐下的大规模刺激方案出台。这些刺激的负面效应自2011年起开始显现，近几年房价物价高企，金融危机后的多轮大规模刺激当说难辞其咎。但为了与中央保持步调一致，央行行长周小川在之后的多个场合为四万亿刺激计划辩护。

然而，人民银行就毫无独立性可言么？从更长的时间段看，中国人民银行作为央行在货币政策决策中的地位上升了多少？这些地位的上升归因于什么因素？如果说中国央行毫无独立性，为何在近二十年间，中国仍然较为成功地将物价保持在较低水平？在理解中国经济改革变迁的过程中，这些问题都是有趣而重要的。

与主流的意见有所不同，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央行虽然受政府领导，政治上缺乏独立性，但是在政策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中央行仍然享有较大的自主权，人民银行不是唯命是从的政策实施者，而是举足轻重的参与者。更为重要的是，伴随着经济市场化改革深化，央行在经济决策中的地位有显著提升。

领导人权力交替与经济周期

围绕上述问题，有两本著作提供了重要的视角。第一本是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政治系教授史宗瀚（Victor Shih）所著的《中国的派系斗争和金融》，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于2007年。第二本书来自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两位学者 Stephen Bell 和冯辉，书名《中国人民银行的崛起》，去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两本书的作者都拒绝将中国的央行简单地看作一个没有实权和影响力的机构，而是从更为细致的视角审视央行在中国经济决策中举足轻重的地位。

史宗瀚将央行地位的提升视为中央内部权力争夺的结果。在他看来，自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央体制内部大致存在两类领导人。一类掌握党政大权，政治利益主要源自地方政府，偏爱下放经济权力，看重经济增长，对通胀包容程度高；另一类官员则专门负责经济金融管理，利益根基大多在中央，因此倾向于经济集中化，收紧货币政策，对通胀容忍度低。两派领导人权力交替，成为中国改革早期经济周期性过热和紧缩的主要原因。

上世纪九十年代，央行地位空前提升。在史宗瀚看来，这源

自以朱镕基为代表的技术官僚派系在权力角逐中的有利地位。他们享有重要的党内地位，加上1994年通胀高企，通胀率一度超过20%，他们趁机推动了《中国人民银行法》颁布，巩固中国人民银行的央行地位，并依靠强硬的货币紧缩政策最终成功治理通胀。

亚洲金融危机中，朱又依赖于央行官员支持，克服多方阻力，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汇率政策，进一步强化央行的地位。朱支持者，包括周小川在内的年轻一代官员，也在后来身居重位，成为今天中国金融体系的主导力量。

央行变迁与三十年经济改革

在权力政治视角的基础上，《中国人民银行的崛起》一书的两位作者则认为中国央行的崛起还有其他制度性原因。人行的机构变迁的历程实际上根植于经济三十年改革的大背景。

首先，伴随着中国经济市场改革的深化，经济管理工作日益复杂，专业化要求更高，而大部分领导人只是负责全局性事务，缺乏充足的专业经济金融知识，因此不得不对依赖专业化的机构，这种依赖提升了央行的影响力。央行也因此不断增加其自身对货

币政策相关信息的掌控，巩固自身地位。举个例子，衡量社会信贷规模的指标有很多，但是传统的银行信贷指标越来越不能满足央行对于流动性的把控目的，在央行的力推下，社会总融资规模的指标被更加广泛地应用。这些技术层面的问题，看似无关紧要，实则拓展了央行在货币政策制定中的行动空间。

其次，恰恰是中国特有的经济转型路径，让中国的央行拥有多样的政策性工具——不仅包括单纯的利率工具，还有公开市场操作、存款准备金率和其他行政性工具，比如“窗口指引”，即通过召集商业银行负责人开会传递行政性指令。此外，也有经济学家发现，央行采取的汇率政策实际上也扮演了向市场传递货币信号的作用。多样化的政策工具虽然反应出中国经济市场改革不完全的事实，却客观上赋予了中国的央行相比于西方央行特有的优势。在特定情况下，手握多个政策工具的央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开国务院和与其他部门利益博弈，提前调整货币政策。这在2003—2004年一轮经济过热和资产价格攀升的应对中有所体现。

一直以来，央行被视为中国政府体系内部较为开明的力量。上述种种论点为这种偏好提供了解释。推动市场化导向的改革，本

身也是央行提升自身地位努力的一部分。推动国有商业银行上市，2005年说服中央允许人民币升值，近几年提出的人民币国际化，与这样的行为逻辑都是一致的。将这些因素考虑在内，应该承认央行地位有显著提升的事实。

但是，在澄清了过于简单化的判断之后，对央行独立性的看法也不该矫枉过正。即便央行不是一个纯粹的服从者，对政策形成具备举足轻重的议价能力，这一过程也是充满不确定性的，每一次政策的形成都伴随着与国务院下各个部门的博弈，拥有不同政策立场的部门，竞相说服中央，实施各自偏好的政策。这种不确定性不可避免地导致货币政策的滞后反应，也对货币政策的可信度打上了问号，这是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体制的局限。

考虑到中国的特有体制，央行独立性的话题在国内政策和学界较少提及。而围绕央行是否应该完全独立，在经济学界也有争议。根据央行反复强调的观点，中国经济正处在转型过程中，货币政策的目标并非单一地平衡物价与经济增长，还要兼顾汇率稳定、国际收支平衡和金融稳定一系列目标，与其他经济政策相协调制定货币政策或许是更优的制度安排。但是即便如此，央行不

得不承认，更加独立和更强的议价能力才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

眼下这一轮围绕刺激与否的讨论，当然也大致遵循本文中讨论的逻辑。货币政策是否进一步宽松，不好预测，只好等待。

参考文献

- Shih, V. C. (2008). *Factions and finance in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 Bell, S. & Feng, H. (2013). *The rise of 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 The politics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China's monetary and financial syste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民族与宗教

哪类少数民族更易离心

自我表述：民族团结的助推器？

中国的民族政策该改吗？——围绕马戎的争论

市场化改革催生民族间经济不平等

天津教案、谣言与隐秘空间

小众“教门”是怎样炼成的？

哪类少数民族更易离心

从未获得自治的少数民族群体，往往缺乏动员分裂活动的手段与能力；正在享受高度自治的少数民族群体，没有足够动机走向分裂。而曾经享有自治、后来失去自治地位的少数民族群体更容易发起分离活动。

◎ 陶郁

少数民族自治水平与离心程度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在世界范围内具有普遍意义的政治问题。

无论在东亚还是西欧，在北美还是南非，对于力图维护国家统一的政策实践者而言，民族问题往往意味着复杂的权衡和艰难的选择。一方面，给予少数民族充分自治，可能会降低这些群体的离心倾向，从而更有利于国家统一。另一方面，当少数民族获得自治之后，它们实现分裂的能力或许也会随之加强，而政治家

们因此产生担心，似乎也不无道理。

那么，少数民族自治水平与离心程度之间的关系到底如何呢？美国学者施罗奇（David S. Siroky）和柯非（John Cuffe）最近发表论文，指出应将上述问题放在历史发展的动态过程中加以理解。具体来说，少数民族采取分裂活动的倾向，取决于它们是否曾经获得过自治，以及它们是否正在享受自治。

施罗奇和柯非认为，从未获得过自治的少数民族群体，即便存在分离倾向，也往往缺乏动员分裂活动的手段与能力；一般来说，这些群体对于现属国家的敌意较低，内部较难产生旨在将族群从现属国家中分裂出去的领导群体。

正在享受高度自治的少数民族群体，虽然具备动员独立的能力，但往往没有足够动机去采取走向分裂的行动。原因在于，这些群体要么认为现状符合自己对于民族自觉的要求，要么担心会为分裂行为付出高昂的代价，包括失去正在享受的自治。

但是，那些曾经享有高度自治的少数民族群体，在自治程度受到外力压抑之后，却往往会产生出异常强烈的分离倾向。自治权利的丧失，往往会在这些群体中激起忿恨与不满，而自治造就的高效组织动员能力，又往往不会因自治权利被收回而烟消云散。

这样，失去自治权利的少数民族群体，往往不仅具有较强的分裂意愿，也具备采取分裂行动的能力。不仅如此，由于自治权利得而复失，这些群体往往不再信任政府为解决问题所做出的新承诺，从而加剧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分歧与对峙。

施罗奇和柯非指出，少数民族群体因失去自治权利而加剧离心的例子，在全世界范围内比比皆是。

例如，阿尔巴尼亚族人控制的科索沃地区，从1976年开始作为前南斯拉夫联邦的一个省分享受充分自治。然而，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随着米洛舍维奇和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势力在南斯拉夫境内不断增长，以及科索沃阿族自治当局对于境内塞族人实施歧视待遇，科索沃阿族人的自治权利最终在1990年被剥夺。然而，科索沃阿族人的动员网络并未因此消解，他们对失去自治的不满导致了最终摧垮南联盟的一系列离心抗争。

又如，苏丹南部在文化上与阿拉伯人占据主导的北部大不相同。1974年，苏丹内战以给予南部地区高度自治的方式结束。然而，随着北部主导的伊斯兰政策日益深入，1983年通过的新宪法极大地削弱了南部的自治权利，而此时北部势力又控制了位于南部的多处油田，激化了南部不满情绪。在这种情绪笼罩下，苏丹

南部争取独立的军事力量得以进行几乎长达 30 年的持续抗争，最终使原苏丹分裂为南北两个国家。

同样，阿萨姆地区在印度独立时获得了自治地位。然而，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印度中央政府开始干预这一地区的经济事务，并最终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全面废除了阿萨姆地区的自治权利。阿萨姆地区此前的抗争主要集中在自治框架之内，而此后则出现了大量旨在脱离印度的暴力事件和集体行动。

在案例研究之外，施罗奇和柯非还对世界上 324 个少数民族群体的自治状态与独立诉求进行了统计分析。他们收集的数据来自 100 多个国家，时间跨度自 1960 年到 2000 年，不仅包括测度少数民族群体自治状态和独立诉求的精确指标，还涉及政体类型、少数民族数量、少数民族分布情况、外部势力支援情况和时代与地区环境等控制变量。基于这些数据，统计结果充分证明：失去自治地位的少数民族群体更容易发起分离活动。

那么，某些少数民族群体之所以失去自治地位，是否恰因为它们提出了中央政府所不能接受的分离诉求呢？施罗奇和柯非认为答案并非如此。例如，科索沃阿族人在获得自治 1974 年至 1990 年间相对平静，印度的阿萨姆地区则在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群体暴

力反叛，而苏丹南部虽然一直不太平静，但冲突激烈的程度却在自治权被剥夺后陡然升高。

施罗奇和柯非的结论虽是基于对既往数据的分析，却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多民族国家如何以健康平静的方式维护统一，值得我们认真分析和思考；而施罗奇和柯非的研究则提示我们，在处理民族关系问题上，一方面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做到对症下药、有的放矢；另一方面要将现实问题放到历史进程中加以全面理解，做到温故知新、通权达变。

参考文献

- Siroky, D. S., & Cuffe, J. (2014). Lost autonomy, nationalism and separatism.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自我表述：民族团结的助推器？

当汉族大众随着影视与文学作品畅想本民族的辉煌历史之时，可曾想过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其它民族，也有自己的故事、成就和英雄？

◎ 刘岩川

当汉族大众随着影视与文学作品畅想本民族的辉煌历史之时，可曾想过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其它民族，也有自己的故事、成就和英雄？香港科技大学的西藏问题专家沙伯力（Barry Sautman）近期撰文表示，提升少数民族的自我表述对于减少民族隔膜有直观的作用。

Sautmen 笔下的“自我表述”不同于民族自决。它指的是通过少数民族自己的历史与文化，反抗主流文化对少数民族的偏见，

强化少数民族的尊严，以缩小经济上的不平等。自我表述可以用多种方式进行，比如加拿大的民族节以及当地华裔和墨西哥裔居民的博物馆。

当然，政府的政策也影响着自我表述的尺度。在美国，黑人博物馆的访客可以对奴隶制和屠杀畅所欲言。法国则正相反：所有的博物馆都是法兰西民族表达自我的平台，移民进行自我表述的空间极其有限。在中国，Sautman 坚持自我表述不能和中国的统一发生冲突，而国际人权理论中也并未给少数民族自决提供足够的法理支撑，除非该群体受到严酷迫害、被军事占领或者被殖民。

自我表述是构建自我认同的一种途径，也往往是针对外界歧视的回应。例如，穆斯林游戏开发者发明以伊斯兰英雄为主角的游戏，回应西方游戏将中东人与恐怖分子划等号的设计。当下的中国以汉族文化为主流，而少数民族文化在日常的话语中只占据次要地位。少数民族聚居的西部相对落后，更加深了汉族对于本民族文化的优越感。如一位少数民族知识分子所言，“经济落后”与“懒惰”已经成了少数民族的标签，而少有汉族敞开心扉去了解少数民族对此的感受。提起少数民族文化，依然有不少人会认为是“传统的”和“原始的”，而汉族好像已经卸下包袱追求科学与进步。

值得注意的是，1950年代的中国领导人曾明确向“文化沙文主义”说不。Sautman引用的史料表明，毛泽东就曾批判“大汉民族主义”，并举例说明了其表现形式：歪曲少数民族形象，不尊重少数民族文化，有优越感或者在经济上轻视少数民族等。但是，因为随后的中国越来越以阶级划分群众，加之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骤雨，针对文化沙文主义的论述销声匿迹了。

今天的中国对于民族歧视抱着怎样的态度呢？2008年，马里兰大学对16个国家对民族平等的态度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中国的民众几乎是最拥护民族平等的。绝大多数中国受访者支持政府消灭以民族为分野的歧视，强调各民族受平等对待的重要性，反对雇主针对少数民族的用人歧视，而且相信消灭职场歧视是政府的责任。同时，中国政府也参与了反对民族歧视的若干国际法。这些迹象表明，不但中国的民众普遍拒绝民族歧视，其法律体系亦对歧视持否定态度。

Sautman发现，新疆和西藏的教育、学术和艺术领域已经出现了自发的自我表述行动，并因为不带有分裂倾向而得以持续进行。遗憾的是，由于集会权利的不完善，少数民族群体中尚未出现专注歧视和不平等的组织。Sautman认为集会权的失落与官方

认为少数民族权益已经在人大中充分体现有关。比如，鄂伦春族在鄂伦春自治旗的人口比例只有1%，但占据了当地人大25%的位置。但是，这25%的席位不占多数，也就不能保证他们拥有足够的话语权。同时，由于人大每年开会的时间很少、不能充分表达民意的代表也从未遭到解职，Sautman对自治地区人大的作用疑虑重重。

在人大之外，少数民族也有许多协会：在国家层面有“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会”等，在地方有数量繁多的少数民族联谊会，在民间有“玉树州金巴慈善救助会”等草根组织。在浙江还出现了以促进商业利益为主旨的少数民族企业家协会。部分组织已经不完全受官方掌控并且有调节纠纷的功能。结合国外的经验，作者想象：未来的中国也许会出现一种代表所有少数民族利益的组织，它站在社会经济权益而非“公民社会-国家对立”的角度，致力于文化保育、民族平等和权益维护。

Sautman对自我表述问题的兴趣，来源于他对中国少数民族生活现状的观察。理论上，“少数”与“多数”之间的利益分配一旦失衡，将在社会稳定和民族和谐方面引起连锁反应。中国的快速发展本身就孕育了巨大的不平等，而许多海外学者认为“多数”对

“少数”的歧视导致了民族间的收入不公。虽然部分民族聚居于经济落后的西部农村是其看起来与汉族存在收入差距的原因，但是 Sautman 相信歧视行为是存在的，而且对民族间的收入差距以及民族隔阂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通过自我表述来伸张少数民族的历史与文化，理论上可以减轻其受汉族同化之忧，还可以让少数民族文化作为相对独立的存在受到民族大家庭的认可，从而实现民族间的和平共处。自我表述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但却能提升少数民族的自尊、加强“多数”对“少数”的认识。它对于中国民族的团结，或有可观的裨益。

参考文献

- Barry, S.(2014). Self-representation and ethnic minority rights in China. *Asian Ethnicity*, 15(2), 174-196.

中国的民族政策该改吗？——围绕马戎的争论

在西藏和新疆骚乱后，大量汉人既要求严惩参与骚乱并攻击汉人的少数民族人士，同时也对马戎的建议表示支持：剥夺少数民族的特权，以实现汉人和少数民族的权利平等。

◎ 励轩

中国是否应该改革现行民族政策？近十多年来，这一直是学术界的热门话题。2004年，北京大学教授马戎发表了《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族群问题的“去政治化”》一文，提出应当改革现行民族政策，引发了此后十年学术界对该问题的大规模争论。

政见团队自2011年成立以来就持续关注着这场争论。2012年，

政见团队制作了信息图《图解中国五十六个民族》*，并在图中系统介绍了争论双方的观点。2013年，政见团队发表了《中国民族政策调整路在何方》**，介绍了第一份以国内这场争论为主题的英文论文，即澳大利亚拉伯筹大学学者 James Leibold 为美国东西方中心所写的《中国的民族政策：改革不可避免?》(*Ethnic Policy in China: Is Reform Inevitable?*)。

2014年2月，美国新疆学家鲍文德博士（Gardner Bovingdon）发表了题为《胡想要点新鲜的：中国民族政策的话语和深度结构》的论文，试图重构围绕马戎观点的争议。鲍文德先生博士毕业于康奈尔大学政治学系，目前是印第安纳大学布鲁明顿分校中央欧亚研究系、政治学系、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亦任历史学系、东亚系兼职教授。他可以说流利的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俄语。除了是一位新疆的区域研究者，鲍文德博士也长期关注中国

* 励轩，钱争予（2012年5月）。图解中国五十六个民族。政见 CNPolitics。
<http://cnpolitics.org/2012/05/56-ethnic-groups>

** 归宿（2013年11月）。中国民族政策调整路在何方？政见 CNPolitics。
<http://cnpolitics.org/2013/11/ethnic-policy>

的民族政策变化。

为了让读者了解马戎观点提出的背景，鲍文德在论文中使用了大量篇幅介绍中国民族政策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1990年代初，苏联的解体让北京的强硬派认为胡耀邦的自由化改革对中国不仅是个风险，而且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而中亚数个突厥语国家的独立也给了一些追求新疆独立的维吾尔族人以希望，他们可能造成了1990年代新疆的抗议、爆炸和骚乱急剧增长。地方政府也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初进行了一些列政策紧缩行动，加强了针对非法宗教活动的严打。

鲍文德认为，尽管在1990年代，中共在辞令上继续坚持着数十年以来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但它开始允许部分学者去讨论更改这些政策的可能性。1998年中国社科院出版的一份研究建议政府“逐渐削弱民族区域自治的原则”。2002年，一些中国学者开始提出：由包括汉族在内所有民族的“共治”来代替“自治”。马戎教授著名的民族问题“去政治化”即是在此背景下于2004年提出的。

鲍文德认为，马戎深受建构主义的影响，以至于认为中国的民族政策保护甚至加深了群体间的差异，而不是促进他们融合进

统一的民族。另外，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则促使少数民族更为认同自己的群体，并且产生从中国分离出去的集体愿望。马戎认为，这些做法“政治化了”少数民族。通过改“民族”为“族群”以及取消对他们的优惠政策，中国能够把民族问题转化为更可控的、类似在美国和其他自由民主国家的“族群问题”。

尽管马戎是中国顶级大学北京大学的教授，并且部分官员的支持也使他得以出版这些在根本上是挑战五十多年来政策的作品，但他的想法公开后即在学术圈和政界高层遭到了严厉的批评。有学者总结说：“极少有文章支持马戎的提议”，这一点连马戎自己也承认。

大量学者认为，仅仅靠以族群来替换民族的建议完全是马戎误解或有意歪曲中国少数民族的真实本质。有学者认为，我们不能忽视民族的“政治属性”，简单的改个名称起不到任何作用。他们认为马戎将民族问题和政治脱离的想法参考自美国政治，但完全不适合中国的历史和现实。

虽然马戎的提议饱受批评，但2008年和2009年分别发生在藏区和新疆的骚乱让他的建议再次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骚乱期间，出现了不少攻击汉人的报道，这使得大量汉人公开批评中国

现行的民族政策。他们一方面对政府给予少数民族特权不满，认为一些不够优秀的少数民族人士在诸多领域凭特权抢走了优秀汉族人士的重要机会。另一方面，他们也对享有特权的藏族人和维吾尔族人以怨报德感到愤怒。出于这两个原因，在骚乱后，大量汉人既要求严惩参与骚乱并攻击汉人的少数民族人士，同时也对马戎的建议表示支持：剥夺少数民族的特权，以实现汉人和少数民族的权利平等。

骚乱之后，马戎的建议看起来得到了一些政界高官和部分学者的赞同。2011年，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发表文章提出：目前是时越过不准讨论民族融合的禁忌，建议政府不要设置新的自治单位，还应该将汉族和非汉族合校，去除身份证上的民族识别。关于改革民族政策最激进的建议来自清华大学的胡鞍钢和中央政法委的胡联合。他们联合提出了全面改革中国现行民族政策的“第二代民族政策”：政府必须放弃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停止承认民族差别，促使所有中国公民融合起来为中国国家安全服务。胡鞍钢和胡联合还捡取了马戎等学者关于苏联民族政策的观点，认为苏联的民族政策使得该国成为大拼盘最终导致自身的解体，因此他们催促政府应该选择巴西、印度和美国的民族“大熔

炉”政策。他们进一步认为，中国 55 个少数民族分离的认同对国家的长治久安是一个威胁，政府应该采取语言和其他政策消除各民族间的差异，使他们真正成为一个中华民族。尽管胡鞍钢和胡联合并未在他们的文章中提及马戎，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从马戎的文章中获得了灵感。

赞同声音之外，马戎依旧遭到了猛烈的批评。2011 年 12 月，中央民族大学张海洋教授发表了一篇针对马戎、胡鞍钢、胡联合观点的批评长文。文中使用了大量的比喻，并暗示若是马戎、胡鞍钢、胡联合的建议得到采纳，中国的民族和谐将会被摧毁。张还质疑了印度的参考价值以及苏联崩溃的故事，并且提醒道：香港、澳门正在成功推行一国两制。张海洋还认为美国经历了“排他”、“大熔炉”、“沙拉盘”，直到现在的“马赛克”，而马戎和胡鞍钢、胡联合则坚持要停留在“大熔炉”阶段。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郝时远研究员则在 2012 年发表的一些列文章中挑战马戎和胡鞍钢、胡联合的建议，认为印度、巴西或美国都不能为中国提供一个可行的模式。

鲍文德注意到，批评马戎观点的学者主要来自少数民族群体（尽管马本人也并非汉族），张海洋是满族（政见观察员注：张海

洋教授本人向笔者透露，他并非满族而是汉族)，郝时远是蒙古族，金炳镐是朝鲜族。鲍文德借用一位美国清史学家的话来解释此一现象：“每一个与我交谈过的少数民族人士都反对马戎的观点。他们将马戎的观点等同于废除某些政策，而这些政策提供给少数民族一些自治以及对他们自己语言、宗教和传统的某种保护。”

参考文献

- Bovingdon, G. (2014). Hu wants something new: Discourse and the deep structure of minzu policies in China. In S. H. Williams (Ed), *Social Difference and Constitutionalism in Pan-Asi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市场化改革催生民族间经济不平等

在政府部门 / 事业单位，维汉劳动者的收入基本没有差距，但在国有企业 / 集体企业、私有企业、个体户这三个部门中，维族人平均收入比本地汉人低。外来汉人在进入政府部门 / 事业单位时遇到较大的壁垒，但受到国有企业、私营企业用工者的欢迎。

◎ 张跃然

中国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和汉族的经济地位差距，一直是社会各界普遍关心的问题。一个尤为重要的问题是：如果这一差距确实存在，它是否是中国经济转型与市场化改革的结果？

苦于数据匮乏，这一领域少有翔实、全面的经验研究。香港科技大学吴晓刚教授与其合作者近期发表的一篇文章有效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通过分析 2005 年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全境采集的样本多达两万余人的一套数据，研究者发现：越是市场力量占主

导的经济部门，维汉劳动者的经济地位差距越显著。

一种在学界流行的观点认为，新疆地区民族间经济地位差距的出现和扩大，很大程度上源自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化转型过程。在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全面掌控经济生活，因此可以在各个经济部门实行向少数民族倾斜的用工及待遇分配政策，维持各民族经济地位平等，从而促进民族关系和谐。

但随着市场化改革，私营企业、个体户纷纷出现，国有企业也逐渐加入市场竞争，政府对这些部门的微观经济活动的掌控能力大大减弱，无法在这些部门继续贯彻民族平等政策。在参与市场经济活动时，企业的首要目标是逐利，而不是促进民族关系和谐，因此在用工、晋升和待遇分配上的标准依赖于企业管理者对劳动者能力的主观评价，这就为各种显性、隐性的偏见与歧视提供了发挥作用的空间。当民族间经济地位由市场竞争决定时，弱勢的民族群体便失去了原先拥有的政治保护。

此外，改革开放后，政府放开人口自由迁徙，使得大量汉族人移民新疆寻找经济机会，这也进一步恶化了维族人所面对的市场竞争环境。

在实证研究中，如果想要较为严谨地检验上述观点，则需要

通过分析在不同时间点采集到的数据，探究民族间经济地位不平等在时间维度上的变化趋势与市场化改革的因果关系。由于数据缺乏时间跨度，两位学者采取了另外一种研究设计，通过一个时间点（2005年）的数据来推断上述趋势：将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私有企业、个体户这四大经济部门看作是由“政府主导”到“市场主导”的连续光谱。如果数据分析结果证明，在“市场主导”的经济部门，维汉劳动者之间的经济不平等更加严重，则大致可以说明，市场化改革很可能是推高民族间经济差距的重要力量。

在控制了性别、年龄、户籍、受教育程度之后，维吾尔人进入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工作的比例明显大于新疆本地汉人，但进入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工作的机会均较为稀少。在政府部门/事业单位之外寻求机会的维吾尔人，因为受到国有企业、私营企业的用工排挤，大量成为个体户。在进一步控制了每周工作时长、所在乡镇、所在职业、所在产业之后，各劳动部门内部的维汉收入差距与市场化程度呈显著正相关——在政府部门/事业单位，维汉劳动者的收入基本没有差距，但在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私有企业、个体户这三个部门中，维族人平均收入分别比本地汉人低

12.9%、28.3%、33.0%。

而外来汉族人口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表现，呈现出与维吾尔人截然相反的趋势。外来汉人在进入政府部门 / 事业单位时遇到较大的壁垒，但受到国有企业、私营企业用工者的欢迎。因此外来汉人主要集中在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工作，在政府部门 / 事业单位工作和成为个体户的比例都较低。在收入水平上，在政府部门 / 事业单位工作的外来汉人收入接近部门平均水平，但在国有企业 / 集体企业、私有企业、个体户这三个部门中，外来汉人平均收入比本地汉人分别高 9.7%、16.0%、8.7%，比维吾尔人高得就更多了。

这一研究告诉我们，在边疆地区民族间经济不平等结构中，体现着鲜明的政府-市场二元分野。在政府干预能力较强的领域，政府依靠行政手段有效维持着民族间的经济平等；但随着中国的经济转型，市场竞争相对充分、受政府影响较弱的经济部门，却逐渐拉大了民族间的经济地位差距。

参考文献

- Wu, X., & Song, X. (2014). Ethnic Stratification amid China's Economic Transition: Evidence from the Xinjiang Uyghur Autonomous Regio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44, 158–172.

天津教案、谣言与隐秘空间

在清末的民间传言中，传教士们会剜取病人眼球并保存在教堂地窖中，因为它们有着各种想象中的用途——或是用于组装照相机，或是用于炼银——《海国图志》中便出现了相关记载。这或许与当时教会医院主要提供眼科手术有关。

◎ 刘冉

清朝末年，中国曾盛行诸多关于西方传教士的谣言，例如他们会拐卖儿童、剜取尸体眼珠、盗取病人器官乃至活剖孕妇肚里的婴儿等。这些看似荒诞的谣言获得了广泛且持久的传播，直接或间接引发了民间多起针对国外传教士的攻击事件，甚至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近代史的走向。

这些谣言究竟从何而来？香港大学社会学系学者田晓丽通过研究 1870 年天津教案之前在中国民间流传的谣言，指出：谣言产

生的主要原因在于传教士对空间的理解和实践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差异。

西方传教士最初进入中国时，发现传统传教方式在根深蒂固的中国文化中步履维艰，因此转而采用提供医疗服务的方式感化民众，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到 1889 年，传教士已在中国开设了 61 座医院，吸引了许多病人；从当时传教士的报告中可以看到，这些举措获得了病人的感激。

然而与此同时，谣言开始滋生且愈演愈烈。传言中，传教士们会剝取病人眼球并保存在教堂地窖中，因为它们有着各种想象中的用途——或是用于组装照相机，或是用于炼银——《海国图志》中便出现了相关记载。这或许与当时教会医院主要提供眼科手术有关，例如传教士 Peter Parker 在广东开设的医院从 1845 到 1847 年收治的所有病人中，75% 的病例都是做眼科手术。西方传教士之所以偏好眼科手术，一是因为当时中国医生的眼科知识和经验非常有限，导致此类病人比例很高；二是由于眼科手术能够迅速令病人重见光明，效果显著且震撼，有助于对病人进行宗教感化。

需要注意的是，与绑架儿童或偷取婴儿相关的谣言贯穿中国

历史且确有事实依据，但“剜眼”谣言仅仅出现于传教士开始建立医院并进行眼科手术之后，这也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谣言与手术的关联。此外，建立医院和诊所的主要是新教传教士，但剜眼等谣言却影响到了所有教派，因为当时的中国民众并没有知识和能力来对新教和天主教等进行分辨。

在这样的背景下，天津教案发生了。1870年，几名人贩子被指控与教堂合谋拐卖儿童和贩卖器官；经衙门审理，拐卖儿童属实，但教堂与之并无干系。然而，愤怒的群众包围了教堂并爆发了激烈冲突，最终导致21名西方传教士和30余名中国教徒的死亡。朝廷随后指派曾国藩对天津教案进行调查。曾在报告中明确指出，教案由谣言引发，而谣言内容无一属实；因此，他主张公布真相、消灭谣言。然而他的努力适得其反，普通民众不仅不相信辟谣，还将他视为叛徒；大臣纷纷上书对他进行弹劾，甚至慈禧也对谣言深信不疑，并指责他没有发现被传教士们销毁的证据。最后，曾国藩遭到贬黜，并在强大的压力下不得不承认“剜眼”等谣言有可能是真的。

作者指出，曾国藩的遭遇印证了谣言背后有强大的文化支持，而其最主要的文化根基就在于对空间的理解。作者对当时流行的

207份反传教士宣传册进行了研究分析，发现绝大部分谣言都与医疗实践和“秘密空间”相关。66%的宣传册提到了传教士窃取病人器官，36%提到对病人实施麻醉，29%提到毒死病人——这些都是对正常医疗实践的误解。值得注意的是，许多谣言都涉及实践所在的空间，例如教堂紧闭的大门，远离公共空间的教士居所，隐秘而隔离的忏悔室，以及被怀疑用来存放病人器官的地下室等。此外，传教士进入当地时必然会占据和改变原有的社区空间，这种陌生的空间构造也加剧了矛盾，例如民众常常抱怨教堂破坏了风水。

作者进一步分析指出，对空间的理解主要可以分为三个方面：活动的可见性，空间的可达性以及人在空间中的位置。传教士的行为在这三个方面都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理解相悖。

首先，传统中国文化中，病人一般在家中进行治疗，并由家人照管；而在传教士开设的医院中，病人被带到陌生的环境之中，并由陌生的护士照料。这导致许多治疗过程并不为病人家属和公众所见，从而产生了“他们一定在隐瞒什么”的错觉。

第二，传统的中国庙宇很大程度上是公众空间，而当时的教堂却总是大门紧闭，且往往禁止公众随意出入。此外，教堂独特

的外观和构造对中国民众而言也十分陌生，他们能够看到教堂占据的巨大空间，却不知道其内部结构和用途，这进一步引发了种种猜测。

第三，人群在空间中的位置分布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文化差异。例如，在对于传教士诱奸妇女的指责中，绝大部分提到了“男女共处一室”——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这是无法接受的空间分配方式。

作者最后指出，并无证据表明当时传教士有意隐瞒信息，然而对空间的不同理解导致中国民众无法获得正确和足够的信息，从而促进了谣言的产生与流传。谣言既可能来自于模糊和有限的信息，也可能来自对“隐秘空间”的不同定义，因而常常发生在两种文化碰撞之时。这一发现不仅有助于理解历史，也为将来的谣言传播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

参考文献

- Tian, X. (2014). Rumor and secret space: Organ-snatching tales and medical missions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Modern China*, 40(4), 1-40.

小众“教门”是怎样炼成的？

炼成小众教门的三种机制：精神病理学式，往往由患有精神病，或有精神病史的个人发起；创业式，和运营一门生意差不多；亚文化演变式：不需要权威教主来创建，由一群人联合起来，一步一步自成型，走火入魔。

◎ 缪莹

山东招远血案令此前并不为人熟知的“全能神教”走进了大众的视线。实际上，除了这一犯下劣迹的异端之外，古今中外还有种种其他小众“教门”。那么，小众“教门”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早在1979年，贝勒大学宗教研究所教授罗德尼·斯达克（Rodney Stark）便对小众教派（cult）这一现象做了研究，并认为其产生机制可以分成三种：精神病理学式（psychopathology model）、创业式（entrepreneurial model）、亚文化演变式（sub-cul-

ture evolution model)。在这三种模式中，都有必不可少的两种要素：一种虚无缥缈却有一定可信度的“好处”，以及带动“信教就有好处”这种信念在社会上流通的人群。

要炼成一个“教门”，需要分两步：首先，一种新的宗教信仰需要被“发明”出来；其次，这种新的信仰需要被一群人所接受。无论信仰怎么新颖，只有一个人信它，是不能够形成“教门”的，所以，要理解“教门”的形成机制，就必须理解“教主”们是如何传播他们的信仰的。在 Stark 教授看来，教门的形成，其实就是教主们发明新的信仰，并将其传播给大众，用来交换“补偿品”的社会过程。

这种“交换补偿品”机制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人类从根本上是趋利避害的生物。在不停付出代价换取奖励的过程中，我们建立了人和人之间的交换机制——因为有些奖励资源稀少，必须来自他人。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奖励都是有价的：人都乐意相信永生是至高无上的奖励，但大家不知道永生可以用什么代价来换。在这些虚无缥缈的奖励面前，人们发明了“补偿品”机制——一系列可以代替即时奖励的行动和信仰。虽然买不到后悔药，但信教可以洗刷原罪；尽管世上没有长生丹，但信教便可得永生……从

某种意义上，“补偿品”就是欠条，而这些欠条只有在深信不疑的前提下才有效。而且，小众“教门”所打的欠条，往往融合了外来宗教和文化的元素，是本土居民们闻所未闻的，这便使它们看上去更具有吸引力。

是疯子还是神喻？精神病理学式的“教门”炼成法

许多人类学家和民族心理学家（ethnopsychiatrists）常用精神病理学机制来解释小众教门形成的过程。其解释的机制有多种变种，但大体离不开以下几种主要的思想：

1. 小众“教门”是一种针对个人或者社会危机的文化应对方式。
2. 新“教门”往往由患有精神病，或有精神病史的个人发起。
3. 这些个人往往在病发时得到所谓的“神喻”。
4. 所谓“神喻”，其实是这些个人在病发时发明的一系列“补偿品”，往往针对其个人的需要。
5. 其个人的病情使他对此深信不疑：或许是因为他的幻觉恰好

和现实相符，或许是因为他迫切需要一种代替奖励的补偿品。

6. 倘若此人所遇到的个人和社会问题恰好在社会上引起共鸣，那么他得到的“神喻”（他个人发明的“补偿品”）就会得到广泛传播。
7. 所以，小众的“教门”往往随着社会问题的崛起而崛起。
8. 假如这个“教门”得到了一批教徒，那么“教主”的精神病反而会因此而治愈，或者部分治愈，因为外界的肯定使他自创的“补偿品”变成了真正的奖励。

这种精神病理学说的基础来自于传统精神分析法，其大意是魔法和宗教皆是对现状不满或幻觉的精神投射。不过，这种分析法并不认为小众教门就一定是错误的，或者是邪教。它意在研究的是：个人如何发明小众观点，并将其广而传播的。从许多“教主”的个人传记来看，有精神障碍影子的并不少：创立了奥奈达团契（Oneida Community）的 John Noyes 就经常在自我“完美”和自我痛恨的状态中来回不定，是典型的躁郁症。科学教（Scientology，又名山达基）的创始人 L. Ron Hubbard 因为宣称并坚信自己创

教的伟大程度“和人类发明火相同，而比人类发明轮子更甚”，因此被心理学家怀疑为经典偏执妄想症。这些幻觉若非精神病所致，则是因为吸毒或接触致幻物所致：创立了 The Love Family 的 Love Israel 便坦然承认自己曾在吸食致幻物后，看到了自己和另外一人合二为一的状态，而这个人成了他后来最忠诚的追随者。

如果说精神病、致幻物是对这种现象最简单的解释，那么，还有一种更微妙的心理机制值得我们关注。有些时候，这些“先驱教主”们并没有精神病，也没有受毒品影响，仅仅是遇到了严重的个人危机，比如因为某些事情而自尊心大受打击。他们终日陷在自己的问题里，逐渐脱离社会，甚至可能远离城市而躲入荒野。在缺少外界刺激的情况下，他们可能会因为极度的自我感官剥夺（不吃不喝，在黑暗中长居等等）而产生幻觉。这种由于感官剥夺产生的幻觉可能在任何一个精神健康的人身上发生，而这种如梦境般的幻觉便被当成了“神喻”。倘若这些人可以说服他人接受自己的幻觉，那么他便成功化身为了一教之主，而他们破碎的自尊和自信也可以被再次找回；假如失败，他们便可能彻底成为精神病患者。

这并不是说所有的小众教义都是疯狂的，或者邪恶的。这种

分析法的着重点在于，这些教主其实是“意义经济”（economy of meaning）的参与者。在人类不停寻求宇宙和人生终极意义的旅途上，现实是如此苍白而无力，那么这些包含感情，似是而非，近乎艺术解析的“病理想法”得到追捧和支持，似乎也是可以理解的。

学成出师、白手起家：创业式的“教门”炼成法

和病理式的教主们不同，那些创业式的教主们发明的“补偿品”机制并不是先针对他们个人然后传播于大众的，而在一开始便是为了大众而创造的。这些“教门”的中心思想，和运营一门生意其实相差不太远：

1. “教门”和公司一样，目的是朝顾客贩卖商品。
2. “教门”所卖的商品便是人们想而不可得的“奖励”的“补偿品”，或者新发明一种，或者给旧的主意换上一件新马甲。
3. 所以，要想“教门”生意兴隆，便需要有源源不断新的补偿品。而这些补偿品的生产和贩卖，都通过创业人来完成。
4. 这些创业人是被其中的利益所吸引而来的，因为他们可以用

这些补偿品（教义）来得到对自己有好处的奖励（募捐来的金钱，得到支持而膨胀的自尊心等）。

5. 成功的创业者需要技术和耐心，所以他们往往在其他教门有过“工作经验”，然后自立门户。
6. 失败的“补偿（商）品”各不相同，而成功的“补偿（商）品”都差不多。所以，小众“教门”的教义往往看起来似成相识，连教主也是一代一代从母教脱离，另起炉灶而去的。
7. 特立独行的“补偿品”或教义不是不行，但创业人会小心地观察市场反应，从而决定是否要在这种补偿品上进行精力或者金钱的投资。

创业型的“教门”往往充满了隐蔽性。我们对此了解不多，但被公开的情况已经惊人的。Arthur Bell 的人类团结教（Mankind United）在 1934—44 年间收到了四百万美元的捐助。在 1956—59 年短短四年间，科学教光是在华盛顿的分会便收到将近 75 万美元。哪怕是一些更小众的教门，也有月入十万美元的例子，更别说那些不能用金钱衡量的好处了：这些教主利用自己在教徒心

目中崇高的形象而骗取女性青睐的案例数不胜数。就像商人会通过商品的欢迎度而肯定自己商品的价值一样，许多教会会因为教徒的狂热而对自己贩卖的教义深信不疑。

更有趣的是，研究小众教门的学者们发现，这种学成出师、白手起家的模式，和大学毕业创业的模式有许多相似之处。就如麻省理工是科技创业者的天堂一般，科学教是小众教门的天堂：根据其教义修改分支而出的教门林林总总竟有百种之多。他们吸取母教成功的经验，改造母教不足的地方，并争先恐后冲向人们精神匮乏的市场。

一群人的狂欢：从亚文化演变而来的“教门”炼成法

和前两种情况不同，从亚文化演变来的小众“教门”往往不是源于一人之力，而是来自人和人之间的互相影响。这种演变模式的重要处在于：或许小众“教门”并不需要权威教主来创建，而是可以一步一步自成型。这种模式可以这么解释：

1. 亚文化“教门”是一种新兴的社会形式，必须有一群人在其中紧密地联系着。

2. 这些人往往已经对密宗（occult）、小众教门等概念熟悉，但不一定来自已有的教门。
3. 这些教门亚文化的起源，来自于一群人试图集体寻求“奖励”，以及他们的失败。
4. 在寻找终极奖励（比如永生）的过程中，他们可能互相交换低级的奖励，或者个人金钱和物品。
5. 当他们寻求的终极奖励无法得到时，他们不得不转而自己发明，或寻求补偿。
6. 倘若这种寻找和交换补偿品和低级奖励的过程成功，一个新的小众教门就自主自发地产生了。

在有些学者看来，人类所做的一切，不外是不停地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么，当一群人联合起来想要解决一个宇宙难题（如何永生）的时候，小众教门便有了生长的土壤。在教门中人互称兄弟姐妹，关系增强的同时，教徒们和其原本社会关系的联系便弱了（哪怕是自己的家庭）。和外界的联系越是弱，教徒们和此教

的依赖便越强，这便成了一种恶性循环，俗话说，走火入魔。

尽管这三种教门炼成模式各有各的特色，但它们在现实中往往是以混合模式出现的。一个曾经患有精神障碍的“教主”，在清醒的状态下会用创业者的模式来传播自己得到的“神喻”；倘若教徒遇到信仰危机，则可能再次令自己产生幻觉，以得到更多的“神喻”。而假如一个社群里有多人产生类似的幻觉或超现实的理解，便产生了亚文化，进而互相影响演变成“教门”，然后不得不通过创业者的模式来吸取新教徒，以维持运作。

归根结底，小众“教门”之所以能够得到支持，或许还是因为人类与生俱来的求知欲，以及不安全感。我们来自何处？去向何方？这些关于生命和宇宙终极问题的答案，真的只是“42”吗？小众“教门”所对准的，其实正是我们恐惧未知、渴望公平奖励的软肋。

参考文献

- Bainbridge, W. S., & Stark, R. (1979). Cult formation: Three compatible models. *Sociology of Religion*, 40(4), 283–295.

Image courtesy of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
Photo by Michael Ferguson.

学人自述

白柯：法治与转型中国



白柯：法治与转型中国

白柯（Larry Backer）教授是美国法学院中不多见的中国问题专家，他对中国宪政模式有着独到的见解。近日，“政见”团队在宾夕法尼亚采访了白柯教授，来听听教授怎么谈法治、“关系”以及……拖延症。

◎ 武卓韵 / 采访

精彩观点集锦

- ※ “法治”有三个层面。我们观察到的“法治”的失败通常是在第一个层面，即个人仍然在规则制定过程当中扮演了不相称的角色。
- ※ 共产党必须要在党内的各个层面内化它的核心价值——正如

我们在美国将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内化一样。在这个方面，共产党仍然有很艰巨的任务要完成。

- ※ 如果你问一个美国人“美国如何避免最高法院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他一定会像我一样大笑的。
- ※ 研究美国政府的制度和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制度所面对的问题是一样的：人们通过什么聚集在一起？在组织内部通过什么来保持和谐和稳定，并同时能够达成共同的目标？国家、先锋政党、政治团体、企业等等都在面对这些问题。
- ※ 当中国人跟外国人——尤其是外国的学者们打交道时，首先会不由自主地预设对方要做的事情和立场，然后说一些外国人想要听到的答案并打发走他们——这是中国人非常擅长的事情。
- ※ 尽管我已经有了 35 年的学术研究经验，仍然会遇到坐在电脑前抓耳挠腮一整天却一个字都写不出来的情况。这确实很令人抓狂，但是我也逐渐领悟到了两种对付拖延症的方法。

白柯（Larry Backer）教授是在美国法学院中不多见的中国问题专家，他对中国的宪政模式有着独到的见解。“政见”团队曾经介绍过白柯教授的两篇有关中国宪政和私企与公民权利的论文。近日，“政见”团队在宾夕法尼亚采访了白柯教授。

一、要想理解古巴，先得理解中国

政见 CNPolitics：您出生于古巴，四岁时移民美国。尽管很早就离开了古巴，但是您的古巴背景和您的研究兴趣之间是否存在着某些联系？尤其是您对中国的兴趣，是否和古巴和中国在意识形态上的类似有关？

白柯：我觉得这种联系并非来自意识形态，而是纯粹来自学术。我一直认为，了解自身之外的体制是非常重要的，它可以极大地帮助你认识自己所处的体制。

我对古巴的研究最早是从经济方面入手，而并非政治方面。即使对我来说，古巴仍然是一个很特别的国家。它不寻常的地方在于，1989年之后古巴并没有选择和中国相同的发展道路。中国选

择了改革开放，尤其是在内部进行了市场化的改革，但是古巴却选择了完全相反的道路。

古巴和中国同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但是这两个国家越来越不同。古巴最特别的地方在于，它并没有给企业组织任何生存的空间，所以对于个人来说，他们必须要依附于国家——这也是七十年代晚期中国的左派所试图维护的。当然，中国这方面的争论后来很大程度上被邓小平理论所解决，但是古巴却选择了相反的发展道路。我好奇的点在于，如果要理解古巴的经济体制和内部经济组织的运作方式，就首先要理解古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于是我开始着手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下经济制度的安排，但是在研究过程中我意识到：除非我可以了解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道路，否则就无法完全理解古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扇门一旦打开，我就再也没能离开过，因为它里面是如此令人着迷。

所以你看，我的家庭来自于古巴，它自然而然地引导着我的兴趣，但是这种兴趣最初完全来自于经济方面。而后我又意识到对古巴经济制度的研究无法离开对中国的制度的理解，这也就是我的背景和研究领域的关系。

政见 CNPolitics: 您刚才讲的是古巴和中国经济制度的不同，那您觉得在政治制度方面这两个国家应该如何进行对比呢？

白柯: 在我看来最主要的不同在于，古巴很大程度上是以前苏联和欧洲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为模型，它们经过了斯大林等人的进一步提炼。我认为正如邓小平指出地那样，对中国来说这条道路会走进死胡同。1978年之后，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道路——或者说社会主义道路——在各个方面都与前苏联和欧洲的道路非常不同，比如党的组织、党和国家机器之间的关系、政党路线和经济活动等等。

二、地方试验的界限

政见 CNPolitics: 您觉得法治在西方社会，尤其是在普通法系国家成功的关键是什么？为何法治在东南亚一些国家往往会流于表面？

白柯: 这是一个非常宏大的问题，我只能简要地回答一下。“法治”一词涉及到很多方面。首先，“法治”在于避免个人独裁——在中

国这叫做个人崇拜。“法治”通过制度而非个人来制定规则。它可以从制度层面保证这些规则不受个人专断的影响，从而让这些规则更易于接受和遵守——这被称作程序方面的法治。

另一方面，“法治”还有另一层含义，我们称它为实体法上的“法治”。在实体法上，不仅没有个人可以专断这些规则的制定，而且这些规则受到来自实体法的约束和限制——这在西方被称作宪法权利和自由，在中国它可以被理解为政党路线。实际上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比较中国的政党路线和西方的实体法在这一方面类似的作用。

第三个理解“法治”的层面，也是最重要的一层，是将规则制定者的行为合法化。一方面，从内部来看，它制定出了彼此和谐的法律体系；另一方面，在外部，它也建立了统治者和政府的合法性，即使在其他国家看它的统治和国家机器也是合法的。

我们观察到的“法治”的失败通常是在第一个层面，即个人仍然在规则制定过程当中扮演了不相称的角色。在第二个层面，实际上，实体法上约束可以非常庞杂。这种约束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可能完全不同。但一旦有了这样的约束——无论这种约束是什么，你制定的规则就不能违背它。在这一点上，无

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国家都是相同的。

政见 CNPolitics: 您觉得中国内部是否存在管制竞争？比如在不同的政府部门之间，或者是在地方政府之间，以及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

白柯: 我觉得竞争也许是一个不恰当的词，但确实在中国国家机关内部的各个层面都存在着大量健康的对话。举例来说，中国的主权基金是全世界规模最大和最具影响力之的主权基金之一。中国本来可以将他们置于一个统一的基金下面，但是它却选择设立了若干个不同的基金并将这些基金交给不同的部门来管理。从某个角度来看，他们之间似乎是在彼此竞争，但是他们之间的对话和竞争的最终目的都是提高整个主权基金运作的效率。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当中。我认为这种对话都是良性和健康的。

同样，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也有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趋势。但在其中确实存在着紧张的关系。一方面，中央政府、省级政府和地方政府要在那些重大问题上完全统一，比如党的路线、法治等等。另一方面，正如邓小平指出的那样，地方必须要将当

地的具体情况与这些重大方针和政策结合起来。

政见 CNPolitics: 可目前中国存在许多所谓的“地方试验”，但在宪法层面上权力又统一于中央政府。

白柯: 我觉得这是必需的。试想一下即使在美国，我们又在多大程度上能允许联邦宪法层面的地方试验呢？我们在某些方面会允许这样的试验，但是这样的试验依然是在宪法所提供的框架之内的，超越宪法框架之外的地方试验即使是在美国也是不会被允许的。也许当新的情况出现时确实会有一些争论，但这些争论都逐渐通过法院解决掉了，所以最终宪法的核心内容仍然是统一的，宪法层面的约束也是一致的。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中国，尽管中国和美国的制度如此不同。在中国，宪法规则的创造者、最终的仲裁者和宪法的保卫者都是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先锋政党，共产党不仅在政治方面，而且在国家机关层面领导着中国。它自身创造出来的这些核心的宪法原则同样约束着自己。这些原则不仅仅存在于1982年的宪法当中，也存在于共产党自己的党章之中，例如“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等等。这些原则划出了一条清晰的界限，超越这个界限

的试验是不会被允许的。所以我们设想的政治层面的地方试验也许对于这些宪法核心原则的误解。而除此之外，在服从于上述核心原则的前提下，中国确实在进行着很多非常有趣的工作，例如上海自由贸易区，中国南方一些省份进行的地方行政机关——不是政党机关——的改革，这些在中国目前的政治环境下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三、违宪审查机构必须独立和忠诚

政见 CNPolitics: 您之前的论文曾经建议过在中国共产党内部设立违宪审查的机构，假设这样的机构存在，我们如何避免它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呢？

白柯: [大笑] 这个问题很有趣。之所以说它有趣是因为，如果你问一个美国人“美国如何避免最高法院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他一定会像我一样大笑的。

大量针对美国最高法院判决的研究都涉及到了这些问题，比如：案件的判决是否是政治影响的结果？大法官们个人的政治倾

向是否会影响到案件的判决？但奇怪的是美国人和外国人都觉得这是问题：一方面，美国人可以把最高法院看成是独立的发布法律意见的司法机关；同时另一方面又在谈论它背后的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的影响。

所以问题是为什么政治影响在美国的最高法院是可以被人们接受的，但是当谈论在共产党内部建立一个解释宪法的机关时就会遇到巨大的挑战？我认为这二者共同的关键点在于，这个解释机关的所有成员必须独立地存在于一切其他权力之上，并且完全地忠实于这个制度本身，并且将他们的忠诚具体地应用在这个制度上。

政见 CNPolitics：那在这种环境下如何避免腐败呢？

白柯：两个方面。首先从政治和政党方面，共产党必须要在党内的各个层面内化它的核心价值——正如我们在美国将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内化一样。在这个方面，共产党仍然有很艰巨的任务要完成。

但这种方法不一定永远管用。比如曾经在奥克拉荷马州有过一起丑闻。在六十年代，人们发现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州最高法院

的法官们一直在秘密地把他们的判决卖给出价最高的当事人。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司法腐败的例子呢？对于美国人来说，这些丑闻的意义在于我们必须更加认真地监督、管理和惩罚。即使是在美国的体制下，我们仍然没有办法完全避免司法腐败。所以在政治层面不断内化这些核心价值的同时，我们必须要有有一套强有力的机制将腐败排除在外并施以严惩。

最终的问题是中国能否通过上述的方法，将腐败控制在足够小的范围之内。我很难想象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完全排除腐败，但确实可以将它控制在一定范围，而这需要不断地在实践当中去训练。

政见 CNPolitics: 您对中国的未来有什么样的预测？是否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您对中国目前现状的看法？

白柯: 我认为中国会不断地成熟并且适应在世界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并且，它会在自身内部逻辑的推动下不断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并对人民的诉求有更好的回应。对于现状，我认为人们有些缺乏耐心，大部分人们可以看到未来的美好蓝图，但是这样的蓝图并不会立刻变成现实。

四、研究中国，“关系”很关键

政见 CNPolitics: 您的研究领域十分广泛，从国际法、宪法到中国研究等等。在您开来“学科研究”和“地域研究”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具体一些，您认为法学研究和中国研究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白柯: 我的答案是：不要接受这样的分类。在你看来我的研究领域十分广泛，但在我看来却十分狭窄。如果你问我在研究什么，我不会说自己在研究宪法或者在研究国际法，我会说自己在研究制度。对我来说，尽管美国和中国的意识形态如此不同，但研究美国政府的制度和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制度所面对的问题是一样的：人们通过什么聚集在一起？在组织内部通过什么来保持和谐和稳定，并同时能够达成共同的目标？国家、先锋政党、政治团体、企业等等都在面对这些问题。所以我只是在研究一个东西的不同方面。

当你从那些定义好的领域的角度来看时，我做了很多跨学科的研究，比如法律、经济、政治、国际关系等等，同时我也做很多政治理论层面的跨地域的研究。但是反过来看，我只是从制度这一个出发点来看这些不同的问题。

政见 CNPolitics: 听上去似乎和社会学的某些领域很类似？

白柯: 这很有趣。如果我们是在德国的话，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当我和德国的同事们交流时，他们把这叫做“法律社会学”。这个领域在欧洲的发展比较完善，但是在美国了解的人比较少。所以当你一定要把我归类为某一领域的学者的话，我应该算是法律社会学领域里研究制度的学者。

政见 CNPolitics: 您在研究中国问题的过程当中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白柯: 最大的问题，同时也是我最想克服的问题是我对没有办法阅读和讲中文。[笑]

政见 CNPolitics: 这是来自于您个人方面的困难，那在制度方面呢？

白柯: 制度方面最大的问题，尤其是对来自于中国之外的学者或者那些共产党体制之外的学者，是如何建立信任。当西方学者研究中国时，他们是在研究一种外来的事物，所以正如过去一百多

年那样，他们倾向于把这种研究当做教育中国向更好方向发展的工具。换句话说，他们在做的并不是在研究中国，而是以一个外来者的身份进入中国，试图搞清楚中国为何与自己不同，并坚持认为中国应该改变——这在我看来是非常具有冒犯性的。

而另一方面，在过去的一百二三十年当中，中国人似乎也习惯了西方学者用这样的方式来研究中国。并且已经形成了对这些学者的态度。

政见 CNPolitics: 似乎已经是一种内化的想法……

白柯: 对，所以当中国人跟外国人——尤其是外国的学者们打交道时，首先会不由自主地预设对方要做的事情和立场，然后说一些外国人想要听到的答案并打发走他们——这是中国人非常擅长的事情。如果我自己处于这样的环境，我也会用同样的方法面对这些外来者。

想要突破这个障碍，建立中国所称的“关系”就非常关键。它可以让对方觉得舒服：你不是以一个教育者的身份在教导，而是以学习者的姿态在提问；你不是以外来者的身份在指挥，而是以普通人的身份在参与。这是非常有挑战的一项任务，也许会花费

大量的精力和时间——但它非常值得去做，因为一旦你能成功地建立这种信任，你将会发现一个异常丰富而且不同寻常的学术世界——这也是为何我如此积极投身于中国研究的原因，这个世界是身处西方世界的学者们无法了解到的。

政见 CNPolitics: 我们的读者当中有很多青年学生和学者，大家共同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大牛”们如何管理自己的时间？您在做学术研究的过程当中是否有自己独特的习惯或者方式？

白柯: [大笑] 我想对青年学者们说的是，我自己认为的时间管理和我太太认为我的时间管理方式是两种非常非常不同的东西。我们对此已经有了长达 35 年的讨论并仍然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幸运的是她对我的时间管理方式非常包容并且愿意配合我。

政见 CNPolitics: 我们平常总是会抱怨自己犯了拖延症……

白柯: 哈哈，每个人都有拖延症。我觉得对青年学者来说这是非常困难但却非常有意义的过程，它在我身上也经常发生。学术过程包括两个方面：首先它要求你去了解在这个领域当中其他人做过哪些研究，尤其是那些在领域当中领头的学者们。同时它又要

求你能消化这些研究，并且应用这些研究。你可以比较轻松地控制前面的步骤，比如通过不断地阅读著作来了解他们的思想。但是将这些原始的资料转化为自己内在的知识却是相对比较难的过程。对于我来说经常遇到的情况就是它看上去也许是在拖延，实际上是大脑在告诉自己：“稍等，我还没有完全理解这些知识。”

这也许听上去还像是借口 [大笑]。但诚实地讲尽管我已经有了35年的学术研究经验，仍然会遇到坐在电脑前抓耳挠腮一整天却一个字都写不出来的情况。这确实很令人抓狂，但是我也逐渐领悟到了两种对付这种情况的方法：第一是先去完成一些其他的小任务；第二是培养一个能够帮助你思考的业余爱好。对我来说非常有用一个爱好是养兰花。每当坐在电脑前却发现自己没有思路的时候我就会去看看我种植的兰花，很多灵感就是在打理兰花的过程当中忽然闪现的。在更年轻一些的时候，我会选择和我的孩子们玩耍一二十分钟，或者和我的妻子喝喝茶并抱怨自己没有思路——通常她都会嘲讽一下我。受到她的嘲讽之后我通常就会找到思路！ [大笑]

其实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很多，“拖延”并不是一件坏事。当然如果你在电脑前坐了两个月仍然没有任何思路那就是另外一回事

了。前提是你自己知道自己兴趣在何处并且愿意走这条道路。对青年学者来说它能够提供一个回头看看的机会，去思考自己的研究路径是否是死胡同。如果真的发现当下的研究路径行不通，就应该尽早地考虑别的方法。

政见 CNPolitics: 非常感谢您的耐心解答，最后，您是否可以为我们推荐一位您推崇的研究中国的专家？

白柯: 我立刻能想到的是 Randall Peerenboom，他写过不少有关中国的著作，对中国内部问题有着相当深刻的理解和洞察。谢谢你们。

“政见”系列访谈之八

加入我们

政见是一个完全由志愿者组成的团队，我们期待并随时欢迎你的加入。这是一个开放的平台，我们相信：志同道合者在一起工作，协力实现自己的想法，是一件快乐而又令人获益良多的事情。

在这里，你可以与一群优秀的朋友共事，施展自己的才华。

成为政见观察员

目前，政见观察员以在国内外修读政治学相关专业的学生和从事政治报道的媒体人为主。我们致力于将理性、深刻、富于启发的学术研究成果介绍给大众。

如果你认同我们的理念，并且能够完成以下两项工作，那么你就是我们希望吸纳的新成员：

- ※ 阅读学术期刊或智库报告中与中国政治社会相关的文章，并撰写千字左右的文章对作者观点予以介绍。例文：〈“重感情”的中国基层政治〉 CNPolitics.org/2011/12/local-political-participation
- ※ 联系研究中国政治的国内外学者，并进行访谈。例文：〈访法国汉学家潘鸣啸〉 CNPolitics.org/2012/02/michel-bonnin

加入我们的团队之后，你的职责将是定期提供稿件。因此我们希望每周都能有一定时间用于政见团队的工作。

政见自身拥有多种新媒体平台，并和国内外多家媒体建立了合作关系，可以让你的作品获得广泛的传播。我们是非营利团队，因此没有办法向你支付薪酬；如果作品被合作媒体选用，你可以得到稿酬。

有意加入者，欢迎投递简历和作品。作品需为上述第一类文章。来信请致：
Webmaster@CNPolitics.org

成为政见设计师

如果你爱好信息可视化，如果你是 Adobe DTP 专家，如果你计较像素对齐、标点挤压……如果恰好你也像我们一样，关注中国政治，政见期待你施展以下任一才华：

- ※ 优雅的文字设计：擅长图文编排，对文本有严谨的控制力，对图像有丰富的表现力。在这里，你将亲自实践屏幕呈现的图文设计，还将参与平面媒体的信息图制作。
- ※ 精致的用户界面：擅长信息架构，熟知互联网及移动设备的交互模式，良好的视觉表现技能。在这里，你将直接推动政见网站的改版，探索政见在移动互联网中的产品设计。
- ※ 创造性的信息可视化：擅长基于互联网技术的动态、可交互的信息图设计。在这里，你将与时政领域最优秀的观察家紧密合作，探索中国政治话题下的信息创意传达。

有意加入者，欢迎投递简历和设计作品。来信请致：Webmaster@CNPolitics.org

成为政见主页君

政见是一个基于新媒体的团队，我们生产的内容依托多种新媒体平台传播。在今天这个媒体变革的年代，好的内容更需要依靠懂传播的人才能产生更重要的影响。

我们希望政见主页君认同团队理念，并且能够完成这些工作：

- ※ 与现有团队成员合作，运营政见新媒体平台（包括微博、微信等）——既包括独立撰写微博等内容，也包括发布他人撰写的文章，还包括与读者互动。
- ※ 与其他网站、平台联系开展合作。

我们希望寻找的新成员，应该具备这样的能力：

- ※ 做事靠谱，认真细致。对细节有完美主义的追求更佳。
- ※ 新媒体运营对及时性的要求很强，因此希望你大部分时候每天都能有一定时间用于政见团队的工作。

- ※ 思维活跃，熟悉新媒体运营，熟练掌握各种新媒体平台以及 Photoshop 等软件的使用。懂得基本的 HTML 语言更佳。
- ※ 掌握基本的政治学、社会学知识。修读相关专业者更佳。

有意加入者，欢迎投递简历，并附文介绍自己对政见新媒体运营的想法。来信请致：Webmaster@CNPolitics.org

成为政见工程师

Web 前端工程师:

- ※ 具有扎实的计算机基础知识。
- ※ 熟悉 W3C 标准及规范, 熟悉 HTML、CSS、JavaScript 等技术。
- ※ 熟悉各类 JavaScript 框架, 如 jQuery、ExtJS、Yahoo UI、Prototype、MooTools 等。
- ※ 能熟练高效手工编写 HTML、CSS 及 JavaScript 代码, 确保代码对各种浏览器的良好兼容性。
- ※ 熟悉面向对象的软件设计方法、对设计模式有深入的理解及应用。
- ※ 具备 JavaScript 框架开发经验者优先考虑。
- ※ 其实这些都不重要, 只要你喜欢、认同这个事儿并愿意奉献自己的部分时间就行。

Web 后端工程师：

- ※ 精通 web 编程，具备 PHP 开发经验，熟悉常用设计模式。
- ※ 熟悉至少一种主流数据库及 SQL 语言、熟悉 Linux，熟悉主流开源框架。
- ※ 热爱技术，喜欢钻研，有良好的学习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
- ※ 有良好的沟通技能，团队合作能力。
- ※ 有移动服务端开发经验者优先。
- ※ 其实这些都不重要，只要你喜欢、认同这个事儿并愿意奉献自己的部分时间就行。

有意加入者，欢迎投递简历。来信请致：Webmaster@CNPolitics.org

政见 CNPolitics.org © 版权所有

欢迎投稿推荐或自荐研究成果!

联系邮箱: Webmaster@CNPolitics.org